亚欧丛书　EurAsia Series

4

犍陀罗艺术探源

〔意〕卡列宁　菲利真齐　奥里威利　编著
魏正中　王倩　编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亚欧丛书 EurAsia Series

4

犍陀罗艺术探源

卡列宁 PIERFRANCESCO CALLIERI
菲利真齐 ANNA FILIGENZI
奥里威利 LUCA M. OLIVIERI

魏正中 王 倩 编译

At the Origin of Gandharan Art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犍陀罗艺术探源／(意)卡列宁，(意)菲利真齐，(意)奥里威利编著；魏正中，王倩编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7
(亚欧丛书)
ISBN 978-7-5325-8123-8

Ⅰ.①犍… Ⅱ.①卡… ②菲… ③奥… ④魏… ⑤王… Ⅲ.①犍陀罗—佛教—宗教艺术—研究 Ⅳ.①J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1053 号

本书出版获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及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资助

本书出版获得意大利使馆文化处的支持
，谨致谢忱

亚欧丛书
犍陀罗艺术探源
[意]卡列宁　菲利真齐　奥里威利　编著
魏正中　王倩　编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惠敦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5　插页 12　字数 303,000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
ISBN 978-7-5325-8123-8
K·2215　定价：10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地中海与东方学国际研究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TERRANEAN AND ORIENTAL STUDIES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丛书名称

亚欧丛书 EurAsia Series

Founded by **发起人**

尼奥利（意大利亚非研究院 院长）
GHERARDO GNOLI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President)

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院长）
ZHAO HUI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Dean)

Directed by **执行干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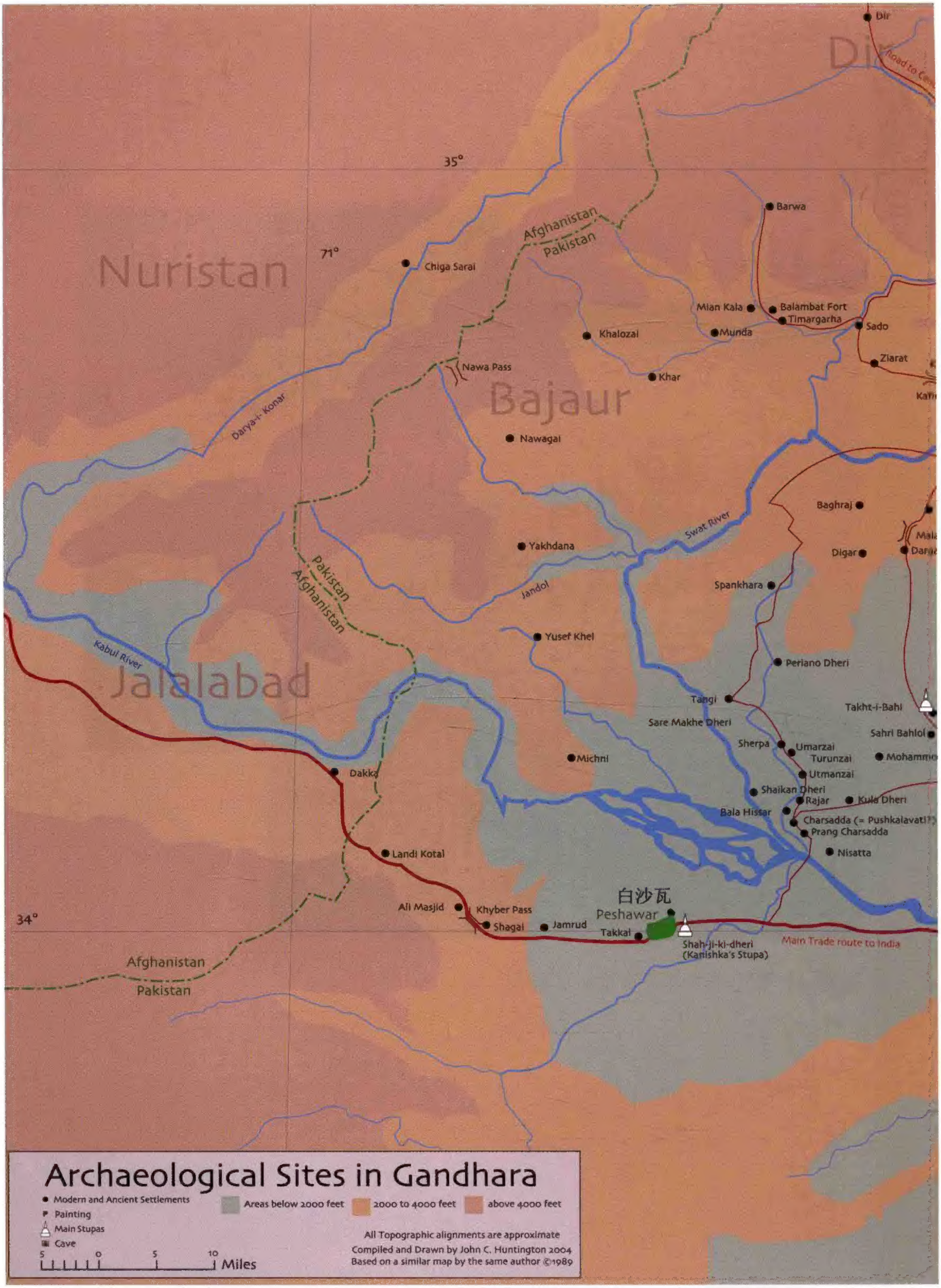
魏正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GIUSEPPE VIGNATO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达仁利（地中海与东方学国际研究协会）
FRANCESCO D'ARELLI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terranean and Oriental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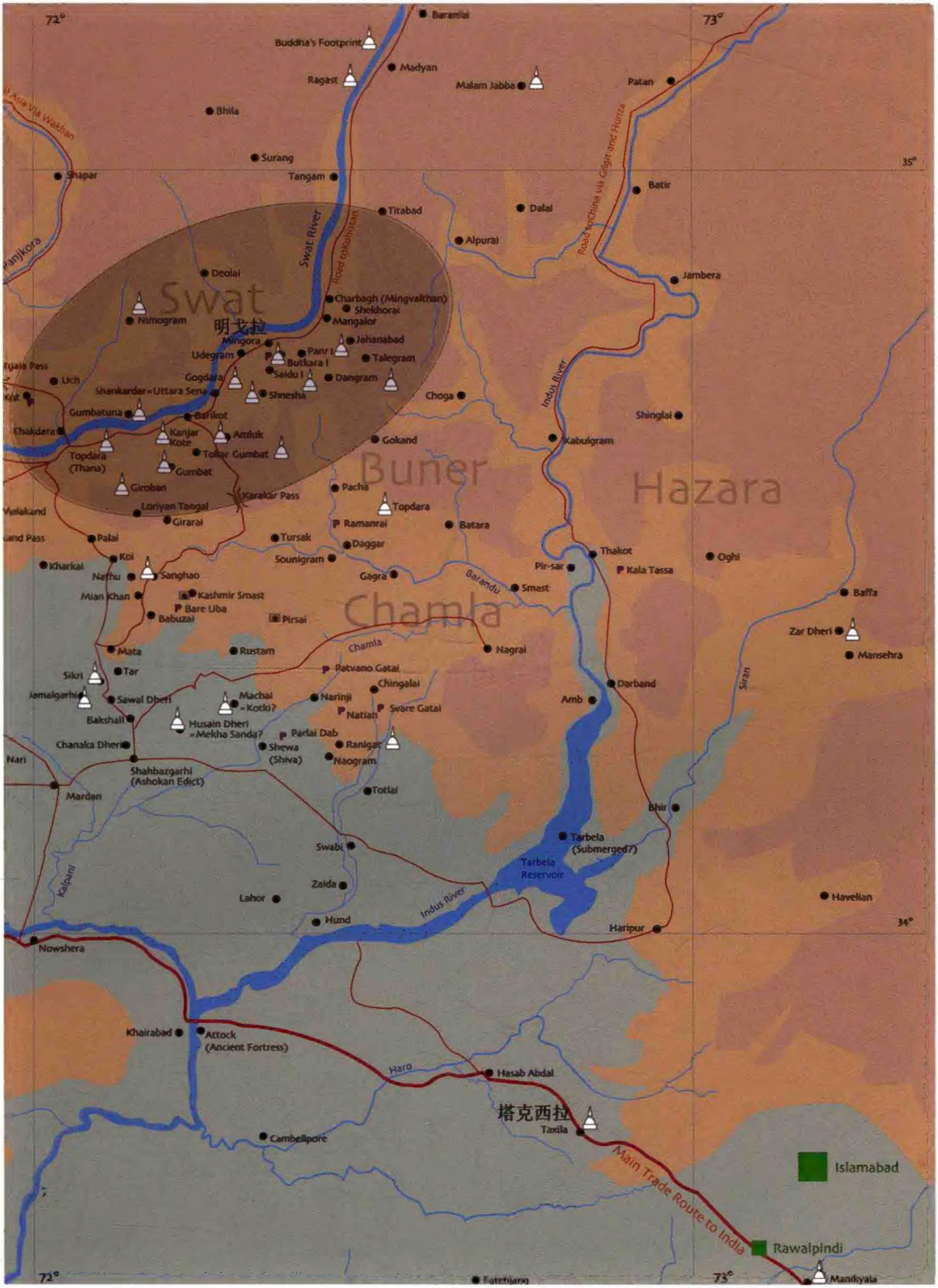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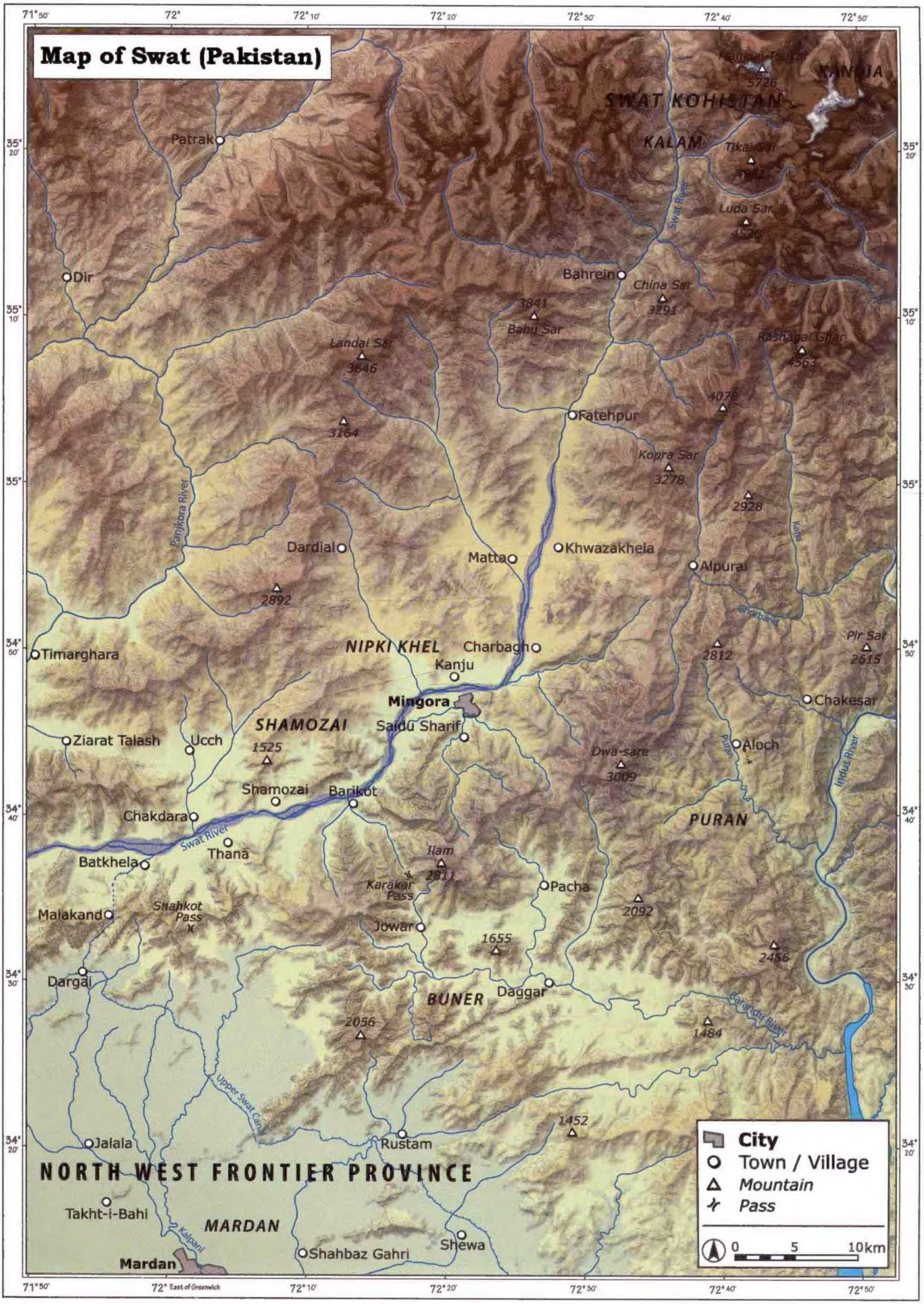
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 PECHINO
意大利使馆文化处

图版 1　斯瓦特河谷位置及斯瓦特河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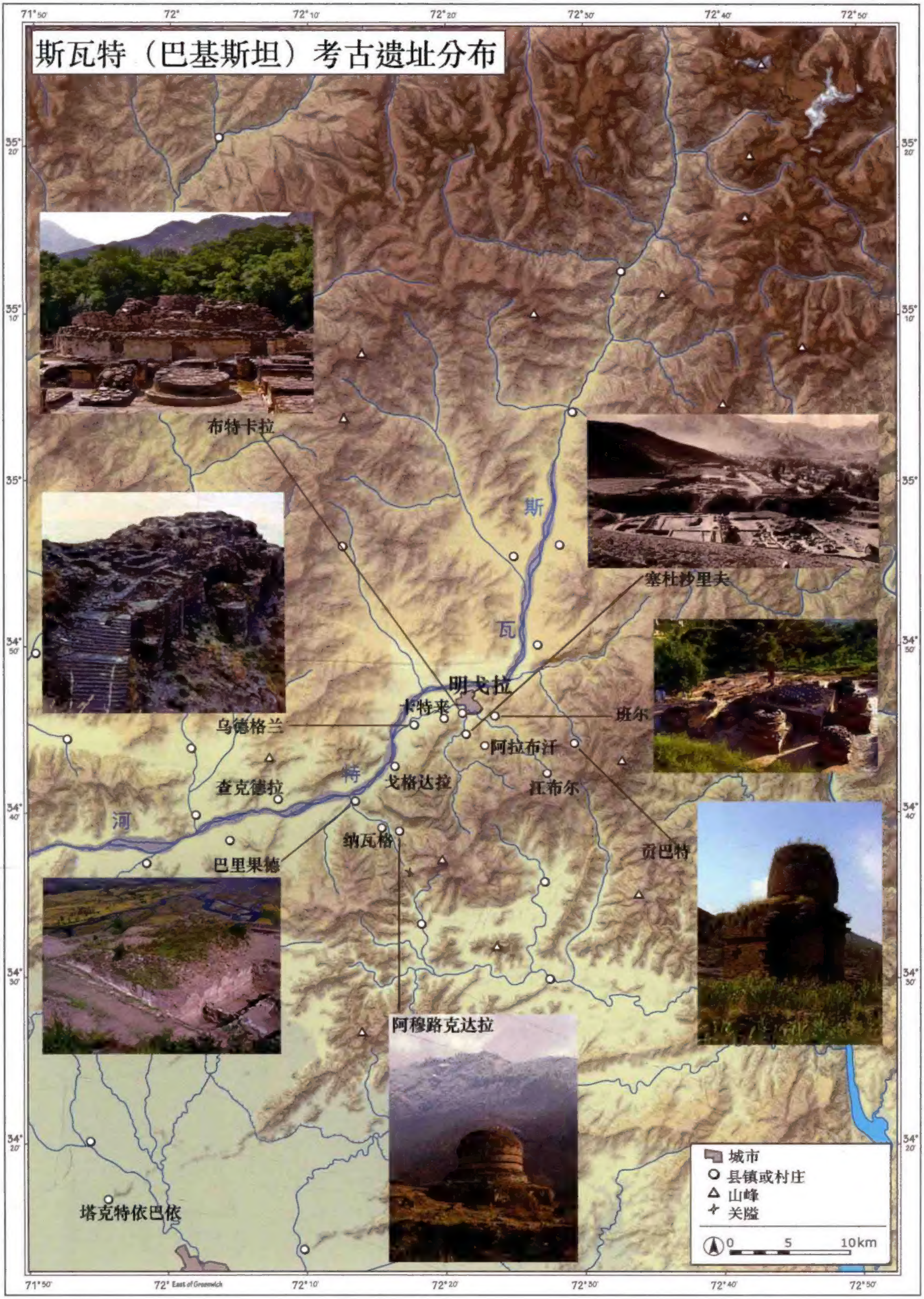


图版 2　犍陀罗地区考古遗址分布图


72°
73°
35°
34°
Swat
明戈拉
Buner
Hazara
Chamla
Swat River
Indus River
Road to Kohistan
Road to China via Gilgit and Hunza
Barandu
Siran
Kalpani
Haro
Main Trade Route to India
Baranial
Buddha's Footprint
Madyan
Ragast
Malam Jabba
Patan
Bhila
Surang
Tangam
Shapar
Titabad
Dalai
Batir
Alpurai
Jambera
Deolai
Charbagh (Mingvalthan)
Shekhorai
Mangalor
Nimogram
Mingora
Jahanabad
Udegram
Panr I
Butkara I
Talegram
Saidu I
Dangram
Uch
Gogdara
Shankardar=Uttara Sena
Shnesha
Choga
Shinglai
Gumbatuna
Barikot
Kabulgram
Chakdera
Kanjar Kote
Amluk
Gokand
Topdara (Thana)
Tokar Gumbat
Gumbat
Giroban
Pacha
Karakar Pass
Loriyan Tangai
Topdara
Malakand
Girarai
Ramanrai
Batara
Palai
Tursak
Dagger
Thakot
Oghi
Koi
Sounigram
Pir-sar
Kala Tassa
Kharkai
Nathu
Sanghao
Gagra
Smast
Baffa
Mian Khan
Kashmir Smast
Bare Uba
Babuzai
Pirsai
Zar Dheri
Mata
Rustam
Nagrai
Mansehra
Chamla
Sikri
Tar
Patvano Gatai
Chingalai
Darband
Jamalgarhi
Sawal Dheri
Machai =Kotki?
Narinji
Amb
Swre Gatai
Natian
Bakshali
Husain Dheri =Mekha Sanda?
Parlai Dab
Chanaka Dheri
Shewa (Shiva)
Ranigat
Naogram
Shahbazgarhi (Ashokan Edict)
Mardan
Totlai
Bhir
Swabi
Tarbela (Submerged?)
Tarbela Reservoir
Zaida
Lahor
Havelian
Hund
Haripur
Nowshera
Khairabad
Attock (Ancient Fortress)
Hasab Abdal
塔克西拉
Taxila
Campbellpore
Islamabad
Rawalpindi
Manikya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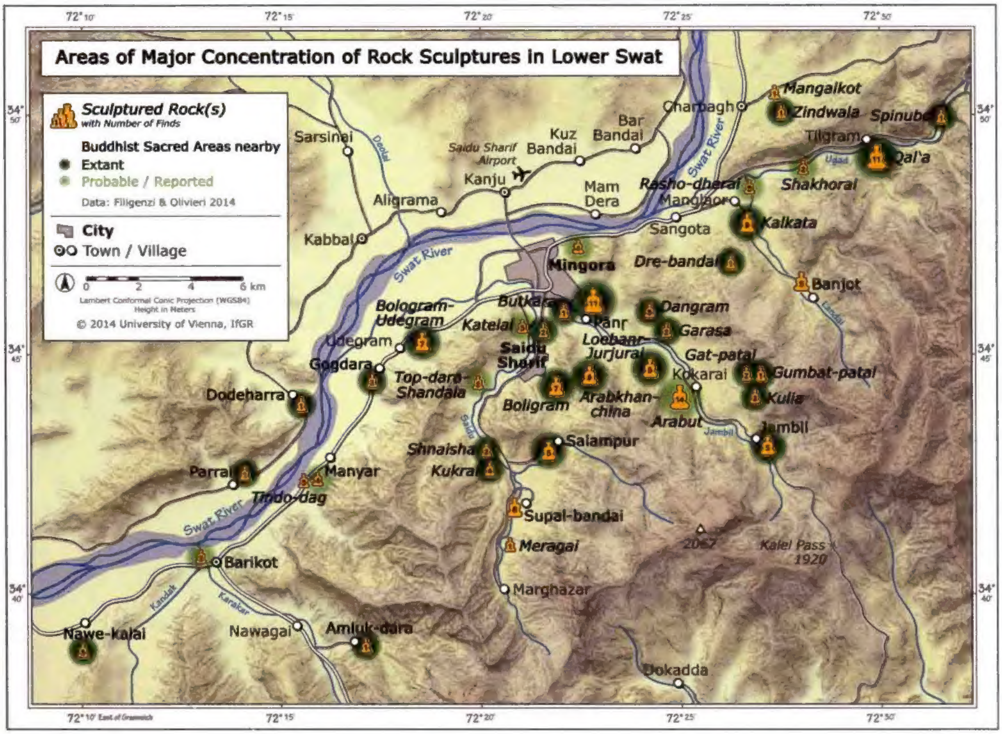

Map of Swat (Pakistan)
SWAT KOHISTAN
KALAM
5726
Luda Sar
4526
Patrak
Dir
Bahrein
China Sar
3291
3841
Babu Sar
Landai Sar
3646
Rashagai Ghar
4563
4076
Fatehpur
3164
Kopra Sar
3278
2928
Panjkora River
Swat River
Dardial
Matta
Khwazakhela
Alpurai
2892
Timarghara
NIPKI KHEL
Charbagh
Kanju
2812
Pir Sar
2615
Mingora
Chakesar
Ziarat Talash
Ucch
SHAMOZAI
Saidu Sharif
Aloch
1525
Dwa-sare
3009
Shamozai
Barikot
Indus River
Chakdara
PURAN
Thana
Batkhela
Ilam
2811
Karakar Pass
Pacha
Malakand
Shahkot Pass
2092
Jowar
1655
2456
Dargai
Daggar
BUNER
2056
1484
Upper Swat Canal
1452
Jalala
Rustam
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
Takht-i-Bahi
MARDAN
Shewa
Shahbaz Gahri
Mardan
City
Town / Village
Mountain
Pass
0
5
10km
71°50′
72°
72°10′
72°20′
72°30′
72°40′
72°50′
72° East of Greenwich
35° 20′
35° 10′
35°
34° 50′
34° 40′
34° 30′
34° 20′

图版3　斯瓦特河谷地图



图版 4　斯瓦特地区考古遗址分布图

图版 5　明戈拉附近主要遗址图



图版 6　斯瓦特河下游地区佛教石刻造像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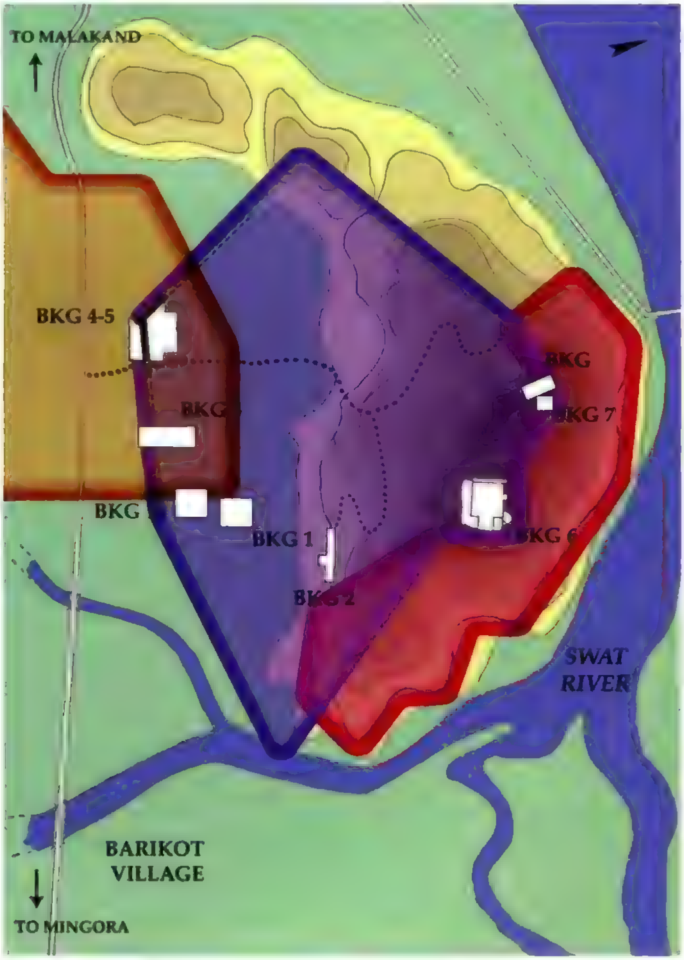
图版 7　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公元前 3 世纪—公元 11 世纪）

图版 8　班尔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公元 1—5 世纪）

图版 9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公元 1—4 世纪）

图版 10　比尔·科特·古万代遗址（从斯瓦特河谷中央远眺巴里果德山）

图版 11　斯瓦特河下游科塔的碉楼遗址（公元 7—10 世纪）



图版 12　比尔·科特·古万代遗址及发掘区分布示意图

图版 13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 BKG 4—5 公元前印度—希腊时期城墙（自南向北）

图版 14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 BKG 4—5 西墙内居住区（公元 4—5 世纪）

图版 15　巴里果德山顶的长方形殿堂基址（自西南向东北）

图版 16　比尔·科特·古万代出土的陶塑女神像(公元1世纪)

图版 17　阿巴萨赫布佛教寺院遗址

图版 18　江布尔河谷阿拉布汗的摩崖造像

图版 19　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新馆照片

图版 20　乌德格兰墓地发掘

图版 21　比尔·科特·古万代古城西南区正射影像图

图版 22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 BKG 11 西端发现的神龛内的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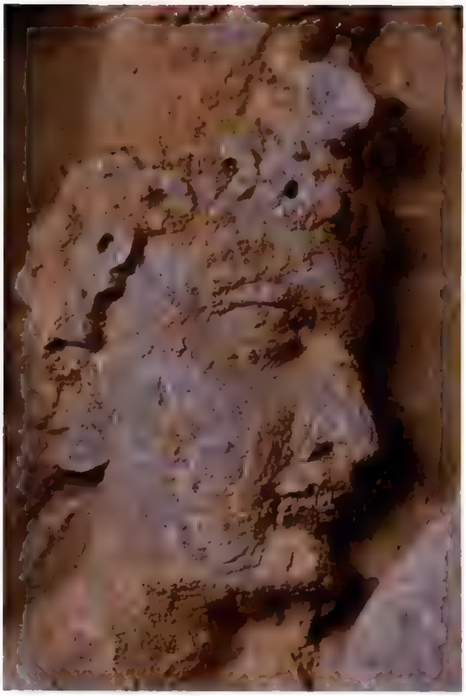
图版 23　发掘修复前的贡巴特佛殿

图版 24　发掘前的阿穆路克达拉大窣堵波

图版 25　发掘后的阿穆路克达拉大窣堵波（踏道部分被修复，前有一座小型的克什米尔式盝顶寺庙）

图版 26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 BKG11 西端发现的造像碑

图版 27　贡巴特佛殿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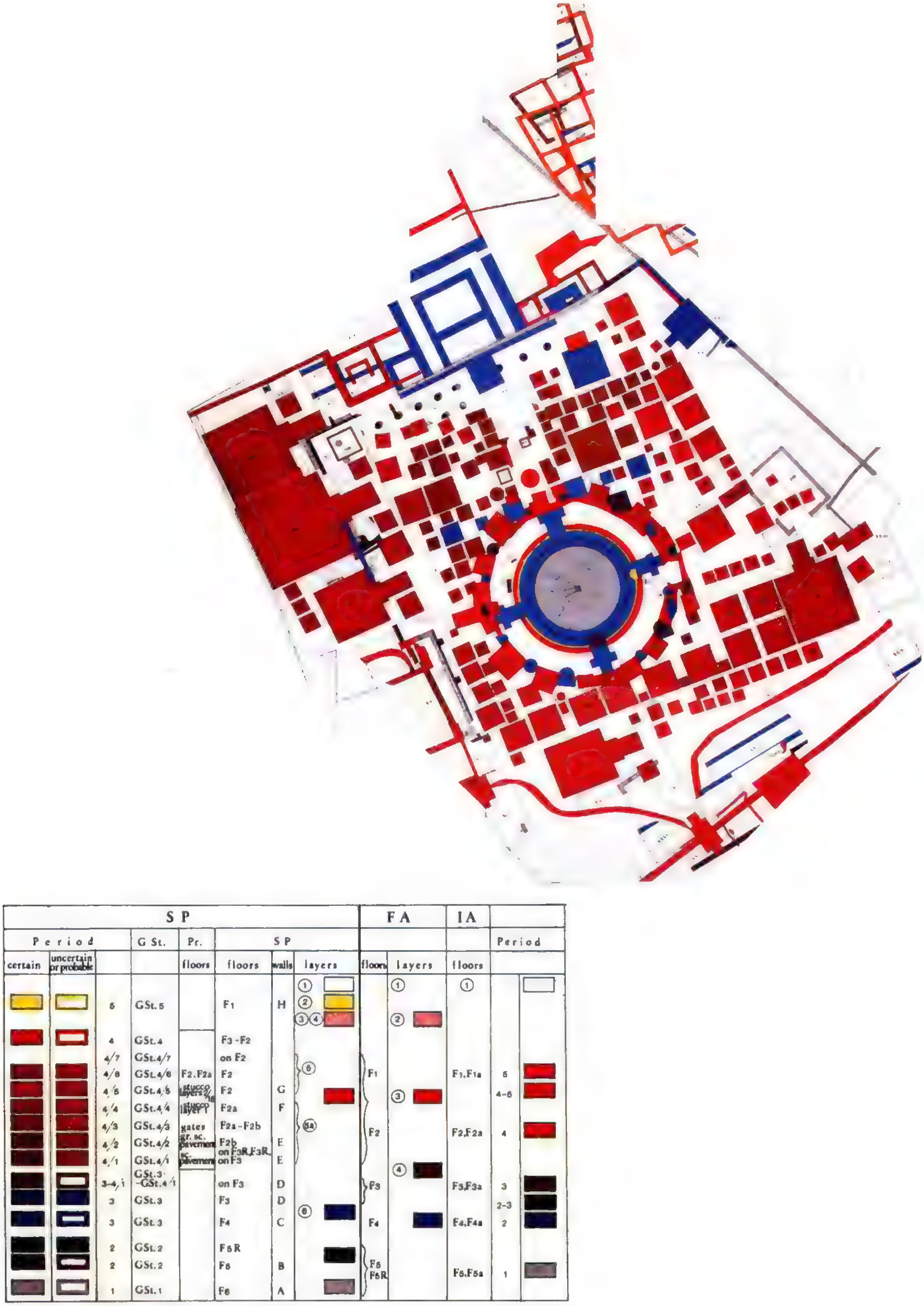


图版 28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残段细部

图版 29　塞杜沙里夫一号小型窣堵波的发掘

图版 30　萨尔纳特出土的阿育王石柱上的狮子柱头

图版 31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 BKG 12 修复后的城墙及城壕



图版 32　布特卡拉一号发掘区示意图，不同颜色和形状分别代表不同建造阶段

前 言 一

《犍陀罗艺术探源》的中文版汇集了意大利巴基斯坦考古队，尤其是项目负责人法切那先生有关犍陀罗佛教艺术研究的重磅文章。该书的出版，是在意大利地中海与东方学国际研究协会（前身乃意大利亚非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签署的学术合作备忘录的框架下，取得的令人欣慰的成果。

2015年正值意大利考古队巴基斯坦考古项目开展60周年，《犍陀罗艺术探源》的出版对意大利地中海与东方学国际研究协会而言无疑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对法切那先生最好的纪念和缅怀，也是对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考古与博物馆部门数十年如一日大力支持意大利斯瓦特考古项目最有力的答复。

这本书的出版凝聚着许多人的努力，我谨代表意大利地中海与东方学国际研究协会感谢法切那先生的家人欣然同意再次使用先生的文稿，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院长和魏正中教授对翻译工作的有效调节与指导，感谢驻北京的意大利使馆文化处参赞史芬娜教授的帮助，感谢意大利外事部对意大利考古队斯瓦特考古项目的支持。

罗西·阿德里亚诺（Adriano V. Rossi）
意大利地中海与东方学国际研究协会学科主任

前　言　二

佛教在中国又被称为"象教"。公元439年（北魏太延五年），太武帝出兵凉州，灭北凉，统一中国北部，并将北凉平民和僧侣迁往平城，这就是《魏书·释老志》所说的"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在佛法东渐的过程中，佛教艺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佛教艺术的源头却在印度河上游的犍陀罗地区，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峡谷一带，这里也是东西文化碰撞交流的重要地区，因此，对于犍陀罗艺术的探索历来为学界所重视。

60年来，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持续在巴基斯坦开展犍陀罗艺术的考古工作，相继出版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既是以往工作的结晶，也是今后继续研究的基础。魏正中教授作为意大利籍研究佛教考古的著名学者，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工作之后，为中、意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已经出版的《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和即将出版的《犍陀罗艺术探源》，就是其中重要的两项成果。这两本著作也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地中海与东方学国际研究协会（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的合作项目"亚欧丛书"中的一部分，我们期待这套丛书能有更多的著作嘉惠学林。

杭　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前 言 三

欣闻《犍陀罗艺术探源》一书即将付梓，感谢编著和编译的意大利与中国学者以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意大利地中海与东方学国际研究协会为学术界提供新材料和新观点。

意大利考古队巴基斯坦斯瓦特考古项目的渊源颇深，在其60年的发展历程中，以著名的东方学家朱塞佩·图齐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大师和先驱学者为之注入了科学严谨、全面系统这一一以贯之的优良学统。在其熏陶下，《犍陀罗艺术探源》一书除无可置疑的学术价值外，也展示出当代值得推崇的美德：默默无闻、精益求精、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在当今极速变化的社会中这让我们意识到，速度和外在的“可见度”不能也不应成为衡量所有事情的基本准则。这本探讨犍陀罗佛教艺术起源、介绍意大利考古学者的研究工作和贡献的著作，更是提醒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在狂飙疾进的时代浪潮冲击下不忘初心，在漫漫修远的求知道路上谦逊前行。

最后，真诚地祝贺参与《犍陀罗艺术探源》编写的所有学者和研究机构不负众望，创出惠及学林之作，同时意大利使馆文化处能够在此过程中献出一份绵薄之力，实属荣幸。

史芬娜（Stefania Stafutti）
意大利使馆文化处文化参赞

序　　言

2010年，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提议由魏正中教授负责将《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译成中文时，我欣然应允。因当时我有幸参与了意版《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编纂前的构思和讨论，充分了解此书的价值。这本书由我的老师法切那先生发起，在菲利真齐的帮助，和我带队的专家团的合作下完成。尽管意识到将意大利学者的工作成果引介到像中国这样截然不同的学术传统中难度颇大，但我还是对为有着历史悠久学术传统的国度提供这样一本具有可读性的杰出工具书抱有高度的热情。

现在看来，《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的翻译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翻译工作开始后不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意大利考古队的同行就希望通过更加多元的途径和形式让中国研究者借助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地区（即中国古文献中的乌苌或乌仗那）60年来的发掘与研究成果更全面地了解犍陀罗佛教艺术。在这一理念引导下，2015年正值意大利斯瓦特考古项目开展60周年之际，意大利考古队、驻北京的意大利使馆文化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将联合敦煌研究院、浙江大学、西北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组织意大利学者在中国举办犍陀罗佛教考古与艺术系列讲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意大利地中海与东方学国际研究协会共同签署的学术合作备忘录为此次活动提供了筹办框架。意大利考古队能够在斯瓦特地区持续工作60年，离不开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考古和博物馆部门（之前属巴基斯坦政府）的长期合作与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对斯瓦特地区从史前到伊斯兰时期的历史进程中独树一帜的亦作为犍陀罗艺术重要分支的佛教艺术的研究，可以说是意大利斯瓦特考古项目取得的最突出成果。在艺术史上进行了数十年基于主观解释的年代学和图像解读争论之后，系统的考古工作为深入分析提供了一系列客观资料。由法切那先生带队，于1956年至1982年间对布特卡拉一号、班尔一号和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的发掘在犍陀罗艺术研究史上第一次确凿地证明了犍陀罗艺术中首次出现以人的形象表现佛陀，以精神传记的形式讲述佛传故事。

为使更多学界同仁了解法切那先生精深的研究成果，2002年意大利考古队在罗马

举办了一次专题展览，展示犍陀罗佛教雕刻艺术杰作——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它也是犍陀罗地区目前发现的唯一完整的横饰带。法切那先生认为构成横饰带的65块浮雕板出于同一雕工之手，并据古希腊、罗马学者的习惯称其为“塞杜大师”，还专门著书进行讨论（Faccenna, 2001），但由于这部著作用意大利文写成，对世界范围内的读者来说并不容易理解它应有的价值。因此，配合2002年展览、收录法切那先生及其他学者研究性文章的图录（Callieri and Filigenzi, 2002）中已有部分被译成英文发表（Faccenna, Callieri and Filigenzi, 2003）。从2013年起，《犍陀罗艺术探源》中文版的编译工作也开始酝酿。

对中国学者而言，基于这些客观材料和主观性较低的研究，通过可靠的途径进入犍陀罗佛教艺术研究领域，相比于不得不纠缠于没有根据的复杂材料和主观臆想的西方学者，可以说有巨大的优势。对参加这个项目的意大利学者来说，以适当的方式与像中国这样有着知名学术传统的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是极大的快慰。同时，在意大利考古队斯瓦特考古项目60周年纪念之际，以此向我们的老师法切那先生多年来付出的工作热情表达由衷的敬意。

《犍陀罗艺术探源》的最终完成归功于众多人士的努力：意大利方面，感谢积极配合并提供新出资料的考古队成员；中国方面，感谢驻北京的意大利使馆文化处参赞史芬娜教授、汤荻女士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院长；巴基斯坦方面，感谢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考古和博物馆部门负责人阿布杜·萨满德博士和前任负责人以及他们所做的严谨细致的发掘与整理工作。

《犍陀罗艺术探源》是在斯瓦特河谷科学考古工作基础上展开的对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初步探索。其中法切那先生有关佛教寺院遗址、布特卡拉一号雕刻中心及早期石刻、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的研究是全书的核心，菲利真齐对公元1至3世纪间犍陀罗佛教叙事艺术的探讨亦是重点，而朱莉阿诺、洛·穆兹奥、菲利真齐等撰写的有关斯瓦特地区历史和社会的文章则为理解该地区的佛教寺院和石刻提供了更广阔的文化背景。此外，意大利斯瓦特考古项目的现任负责人奥里威利介绍了项目的新进展并首次公开了最新出土资料。

因此，《犍陀罗艺术探源》一书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通往未来的桥梁。相信年轻一代的中国考古学者将会热情地与巴基斯坦、意大利的同行共同参与到这项极具挑战又令人着迷的工作之中。

卡列宁（Pierfrancesco Callieri）
博洛尼亚大学教授
意大利考古队斯瓦特考古项目前任负责人

译　者　序

《犍陀罗艺术探源》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是希望向中国学者译介意大利考古队斯瓦特考古项目60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书中汇集了参与此项目的考古学者、艺术史学者撰写的12篇文章，其中大多已发表于*Il Maestro di Saidu Sharif. Alle origini dell'arte del Gandhara* (Callieri, P. and Filigenzi, A. eds., Roma, 2002)一书中，该书是为配合罗马举办的犍陀罗艺术展编纂的意大利文图录，其中的部分文章曾被翻译成英文。

犍陀罗地区相当于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公元前2至公元8世纪曾是佛教文化和艺术异常活跃之地，本书主要探讨犍陀罗最北部的斯瓦特河谷，其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被称作乌仗那：这一地区既带有印度和伊朗波斯文化色彩，也深受土著居民达尔德人的影响。达尔德人是继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征服者之后统治该地的群体，他们的文化具有典型的希腊化特征。斯瓦特地区曾先后被塞人、帕提亚、贵霜、萨珊、嚈哒、突厥沙希占领，直到公元9世纪才纳入印度诸多王国的领地。关于犍陀罗文化和艺术的大多数中文文献将其诞生和发展期归于贵霜和嚈哒时期。然而，意大利考古队的发掘证明犍陀罗艺术萌发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相当于塞人统治时期，这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在。同时，由于对早期促成犍陀罗艺术形成的关键阶段所知甚少，即公元前3世纪末至前1世纪末，因此，书中亦从不同角度、通过分析不同材料以关注使佛教在斯瓦特地区被接受并繁荣发展的历史和文化环境。

中文版以意大利文版为基础，加入作者的修改和补充，特别是最近几年发掘所得但尚未发表的第一手资料，如考古地图、新出石刻等。为使读者对斯瓦特地区的历史地理、考古资料有更清晰的认识，在征得原书编者同意后，我们在中文版的正文前附加斯瓦特地区的地形图和遗址分布图；与每篇文章作者联系，增加文中遗址、遗物尤其石刻资料的图片或线描图。另外，正文之后的附录中还增加了意大利考古队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截至2015年6月出版的英文论著、译名对照表、斯瓦特地区朝代表以向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深入钻研的线索。

译稿有幸得到了何利群、萨尔吉、李雨生、张丽香、王芳的建议与指正，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此外，还要特别感谢原文作者的积极配合，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提供的图片以及驻北京的意大利使馆文化处在翻译期间给予的莫大帮助。

魏正中

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2015年8月15日

目 录

前言一 …… i
前言二 …… iii
前言三 …… v
序言 …… vii
译者序 …… ix

斯瓦特考古项目

意大利考古队的斯瓦特考古项目（卡列宁）…… 3
斯瓦特考古项目新进展（奥里威利）…… 16

斯瓦特河谷的历史

孔雀王朝和佛教在斯瓦特的传播（菲利真齐）…… 31
西北印度地区的印度—希腊人（卡列宁）…… 42
塞人、帕提亚时期：阿不拉遮和乌迪王朝及其对佛教的支持（卡列宁）…… 50

从考古实物看文化影响

西北印度地区希腊至前贵霜时代的钱币（朱莉阿诺）…… 57
印度—希腊、塞人和帕提亚时期西北印度的化妆盘（洛·穆兹奥）…… 74

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及艺术

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的始建与发展（法切那）…… 87
布特卡拉一号雕刻中心及其早期石刻（法切那）…… 94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及艺术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法切那、卡列宁）…… 115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法切那、菲利真齐）…… 122

犍陀罗叙事艺术解析

犍陀罗的叙事艺术（菲利真齐）…… 161

附录一：意大利考古队斯瓦特考古项目的英文论著（奥里威利）…… 181
附录二：译名对照表 …… 198
附录三：斯瓦特地区朝代表 …… 204
附录四：图片说明 …… 206
参考书目 …… 221

斯瓦特考古项目

意大利考古队的斯瓦特考古项目

卡列宁

犍陀罗平原以北山区的斯瓦特河谷是意大利考古队开展巴基斯坦斯瓦特考古项目的基地(图版1—6)。该项目于1955年由图齐启动(图1),1956年至1995年由法切那主持(图2),1995年至2000年由塔代伊担任项目负责人(图3),2000年至2013年由卡列宁继任,2006年奥里威利加人并指导项目工作进行至今[1]。

图1　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年)

斯瓦特即古代文献中的乌仗那国,公元前327年曾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在以后的数个世纪中先后被印度—希腊、塞人、帕提亚、贵霜、萨珊、嚈哒、突厥沙希侵占。斯瓦特河谷曾经繁荣富庶,是犍陀罗平原与面向中亚的北部山区之间的贸易中心,亦是佛教文化重地。这一地带寺塔林立,香火鼎盛,乃古代西行求法者(5世纪的法显、6世纪的宋云、7世纪的玄奘、8世纪的慧超)的必经之地。斯瓦特西邻伊朗,受其文化熏陶甚深;而活动于印度—伊朗边境北部地带的达尔德人对斯瓦特的影响也颇巨,尤其是佛教方面,使其成为金刚乘佛教秘密教法的荟萃弘扬之地。随着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与印度港口之间翻越喀喇昆仑山的贸易渐盛,扼守犍陀罗地区多条山路出口的斯瓦特河谷,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一跃成为贸易往来乃至思想交流的枢纽。斯瓦特的要冲地位并未被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经济衰退动摇;公元8世纪,此地诞生了藏

〔1〕开展斯瓦特考古项目的意大利考古队先后属于三家研究机构。1955年创建之初隶属于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IsMEO);1995年,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与意大利非洲研究院(IIA)在意大利外交部的协调下合并成意大利亚非研究院(IsIAO);2012年,意大利亚非研究院解散后,原成员组建了意大利地中海与东方学国际研究协会(ISMEO)。

图2　法切那（Domenico Faccenna, 1923—2008年）（左）

图3　塔代伊（Maurizio Taddei, 1936—2000年）（右）

传佛教的祖师莲花生大士。为寻找藏文文献中莲花生大士降生的“圣地”，图齐于1955年来到了斯瓦特河谷[1]。

1926年，著名的探险家、考古学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斯瓦特河谷的考察，掀开了此地考古研究的序幕。当时，英明的瓦利米安谷·巴德沙哈伯统一了当地之前从未屈服于英国武力，且敌视任何西方侵入势力的骁勇好战的阿富汗部落，并建立了和平的独立国家[2]。继斯坦因的调查之后，巴格尔和赖特受印度考古调查局委托，于1938年在斯瓦特河谷进行了一次粗略的调查和简单的清理[3]。

1956年意大利考古队在亚历山大大帝远征路线上的乌德格兰古城（图4）和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图版7）的发掘是斯瓦特地区最早的系统性考古工作[4]。当时在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法切那的指导下，考古队的研究视角很快转向佛教建筑和艺术领域。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发掘后，考古工作又拓展至班尔一号（图版8）、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图版9），大量犍陀罗风格的石刻资料缘此得以重见天日。

〔1〕 Tucci, 1958.
〔2〕 Stein, 1930.
〔3〕 Barger and Wright, 1941.
〔4〕 Faccenna, 1964a.

这三座佛教寺院遗址是西北印度最早经过科学、系统研究的遗址，为了解当地建筑、艺术的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

随后，意大利考古队的发掘和研究延伸到了其他时期的遗址。布特卡拉二号、卡特来一号（图5）及洛伊班一号墓地（图6）等都属原史时代（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出土遗物的相对年代关系可在盖勒戈岩棚内发现的地层序列中找到关键参照（图7）。此外，比尔·科特·古万代（图版10）、洛伊班三号、阿利格拉马（图8）和卡拉克德莱（图9）等遗址的考古调查深化了我们对原史时代斯瓦特地区聚落和手工业的认识[1]。

为进一步还原斯瓦特地区历史的真实场景，谢拉多探索了公元11世纪因伽色尼王

图4 乌德格兰古城（公元5—14世纪）

[1] Stacul,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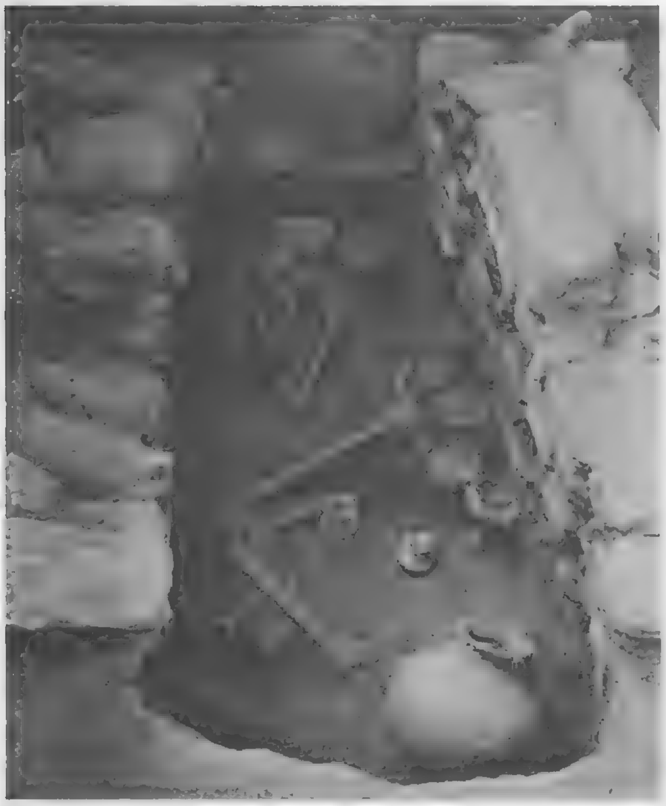


图5　卡特来M185（公元前7—前4世纪）

图6　洛伊班一号墓地

图7 盖勒戈岩棚内的地层堆积

图8 阿利格拉马聚落遗址（公元前18—前4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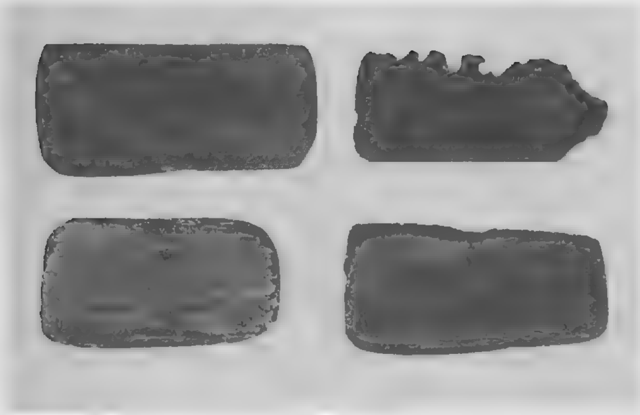


图9　卡拉克德莱遗址出土的石质收割工具
（公元前18—前15世纪）

朝马哈茂德大军入侵而导致伊斯兰教渗入的时期。他系统考察并记录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仍存在的集当地传统建筑之大成者的清真寺，尤其是其精雕细刻的门、柱、柱头等木构（图10），在它们消失殆尽之前保存了完整的信息。然而，考古工作的最大收获是巴基斯坦北部乌德格兰遗址内清真寺的发现与发掘，该寺的年代可上溯至公元11世纪的伽色尼王朝，乃斯瓦特地区年代最早的清真寺[1]（图11）。

通过以上的简要介绍，可初步了解图齐与法切那对巴基斯坦斯瓦特考古项目的基

图10　斯瓦特河谷巴林清真寺门楣局部（公元19—20世纪）

---

〔1〕 Scerrato,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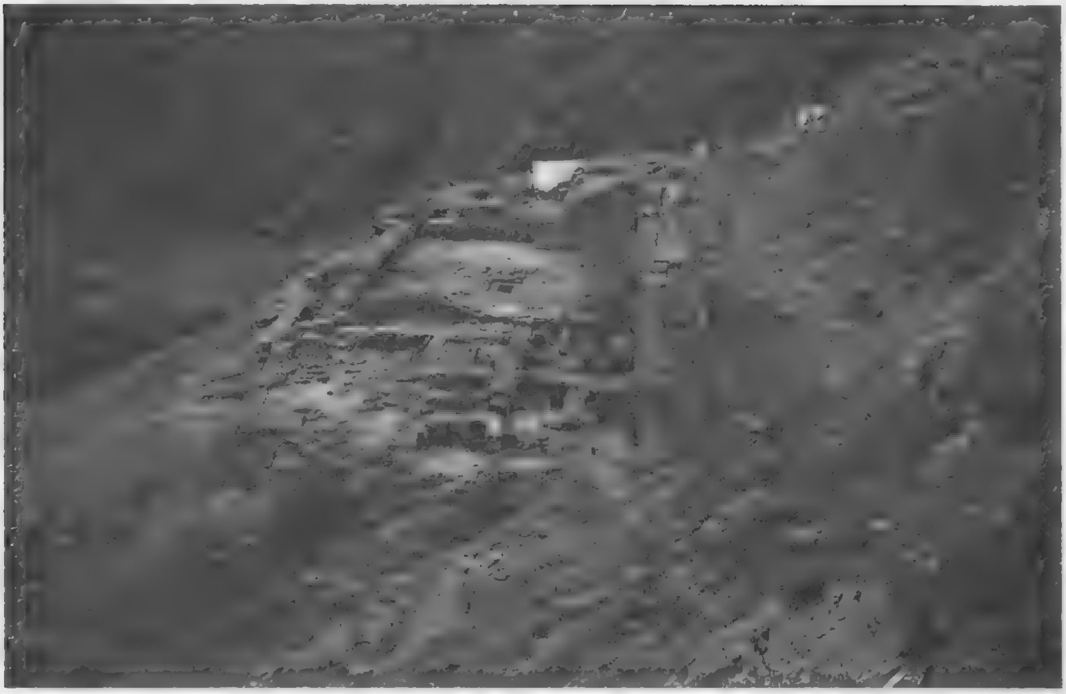


图11 公元11世纪伽色尼王朝时期清真寺遗址(自西向东)

本构想,即复原斯瓦特及周边地区始自人类居住直至当今的历史文化面貌[1]。在践行这一构想的过程中涉及的领域并不局限于考古学和历史学,而是囊括了人类学和环境学,也没有忽视建筑修复与保护等方面。这一高瞻远瞩的研究视角在30年之后才成为一种范式。如今被视为惯例的考古学、史学、语言学、人类学、古植物学、地质学、文化遗产保护等多学科合作,是意大利考古队斯瓦特考古项目自始至终秉持的理念,且在其引领下考古项目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果。

意大利考古队的发掘与相关工作成果已经刊布于《东方与西方》和系列丛书《报告与回忆》及其他出版物中,此处不作赘述。工作的开展和顺利进行离不开巴基斯坦考古与博物馆机构的热忱帮助、长期信任和大力支持。

关于前伊斯兰历史时期的文化,除清真寺外,意大利考古队的研究还涉及佛教寺院遗址和同时期的城址。乌德格兰(图12)、戈格达拉、巴拉马及布特卡拉一号城址的发掘开启了对斯瓦特地区城市考古的研究[2]。古城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因不断被摧毁和重建而形成了复杂的地层,而道路和居址的分布以及砌墙技法,是划分与串联城址的不同

[1] Callieri, 1982; Taddei, 1997.
[2] Gullini, 1962; Faccenna, 1962; 1964-65.

图12　乌德格兰巴扎遗址发掘（公元前4—公元4世纪）

时段并分析其周边地理环境的关键线索。

世俗建筑的另一研究领域是分布在斯瓦特河谷南岸高地上的古代晚期和中世纪（公元7—10世纪）的要塞。它们均表明此地存在以碉楼与城堡等特殊类型建筑为基础的防御体系[1]（图版11）。

斯瓦特项目最近35年的研究致力于前伊斯兰时期的城址。其中比尔·科特·古万代古城因现代城市的扩建而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以及尽快向相关机构提供长期保护方案成为迫在眉睫的工作。1984年至1992年的首次发掘[2]和1998年的第二次发掘[3]，以及对遗址所在地区地形图的测绘和地表建筑遗存的研究[4]，确认了此时期城址的重要性（图版12）。比尔·科特·古万代曾被斯坦因和图齐认定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史官记录的马其顿大军在公元前327年攻克的巴齐拉古城。古城内除四个区域发现有丰富的地层序列外，还有保存相当完好的建筑遗迹，其中有平地上建于公元前2世纪的印度—希腊时期古城的城墙西、南段（图版13），及城内两片公元4至5世纪的居住区（图版14）和一处公元2世纪末至5世纪的小型佛堂（图13）。古城外山坡上的梯田里有一处四角尚保存圆形扶垛的高台，其上有一方体建筑，内立四根砖石柱，年代约为公元7至9世纪（图14）；山顶上发现一处规模庞大的长方形殿堂基址（图版15），基址内出土的石雕像（图15）和灰泥像（图16）可确定其原为婆罗门教的礼拜圣所，建造的时间为公元7至11世纪的突厥沙希时期。古城历史的概貌可由地层序列勾勒：从公元前2世纪起，延续至公元4到5世纪，

〔1〕 Olivieri, 1996.
〔2〕 Callieri et al., 1992.
〔3〕 Callieri et al., 2000.
〔4〕 Olivieri, 2003.

图13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BKG 4—5城墙内的小型佛堂（公元2—4世纪）

图14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BKG 2高台上的方体建筑内立四根砖石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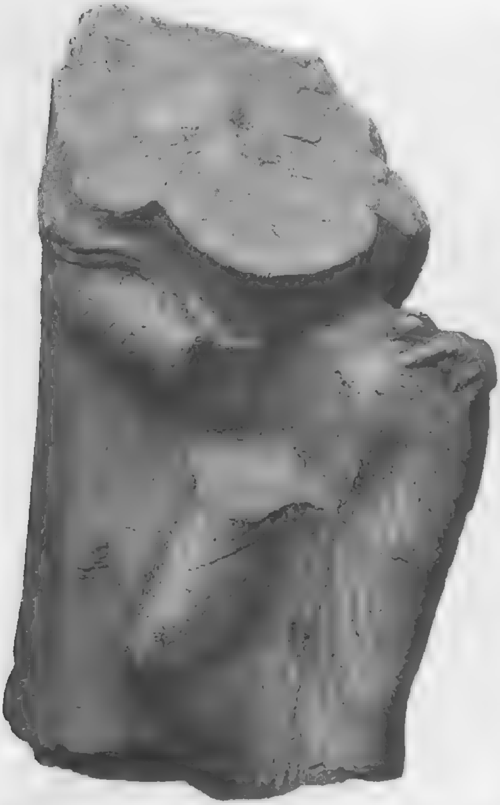


图15　巴里果德山顶的长方形殿堂基址出土的毗湿奴权杖的拟人形象噶达德韦石雕像残段

随后向斜坡和山丘扩展，持续至伊斯兰时代前夕，约相当于公元13至14世纪。出土遗物再现了城市生活所需的多种手工业制品：大量陶质人物和动物塑像（图版16），串珠及其他饰品，红铜、铁制品以及可供建立编年体系的大批钱币[1]。然而，最富价值的是每一地层中出土的大宗陶片（图17）。这些陶片为斯瓦特地区历史时期至今仍缺失的物质文化信息提供了重要参照[2]。比尔·科特·古万代遗址的大量材料是通过先进、严谨、科学的手段发掘而得的，可作为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城市考古的新标尺，其珍贵之处正在于克服了20世纪上半叶塔克西拉等遗址所用考古方法的缺憾。

斯瓦特地区宗教建筑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布特卡拉一号、班尔一号、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另一为河谷地区地表上形制各异的众多建筑遗迹（图版17）。它们是了解当时的建造技术、建筑结

图16　巴里果德山顶的长方形殿堂基址出土的灰泥像残段线描图

[1] MacDowall and Callieri, 2004.
[2] Callieri, 1990; 2000.

构等的重要窗口，拓展了有关大窣堵波上半部分如覆钵、塔刹、刹竿、平头锥形分隔件以及伞盖构件的认识；此外，还为若干建筑类型的判断，如圆柱、方柱、精舍、假精舍（具有方体基座、方形建筑体和四面弧顶）等提供了参考。

借助地层学可在每一处建筑群中确定各类建筑的演变以及建筑群在不同时期的空间布局，这是斯瓦特地区考古首次以发掘出土的一系列客观资料而非由果溯因的推测为依据进行研究。因此，就这个角度而言，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尤其是大窣堵波的五次重建成为研究的基石，即通过建筑结构或活动面提供的线索，将佛教寺院的附属建筑与大窣堵波的五大阶段分别对应，如此便可描绘出一幅既包括不同类型建筑演变，又含有不同阶段建筑装饰演变的完整画面。布特卡拉一号、班尔一号、塞杜沙里夫一号三座寺院中，塞杜沙里夫一号的年代跨度虽短，但却是唯一可供了解佛教寺院整体（由塔院和僧院构成，塔院是以大窣堵波为中心的礼拜区，僧院是僧房集中的居住区）面貌的佳例：左右两侧台阶汇聚于中央形成的踏道是僧院的入口，僧院西侧有一高台，其外立面墙体上砌拱券结构，这与犍陀罗平原地带的僧院样式相比十分特殊，不过后者的发掘并不严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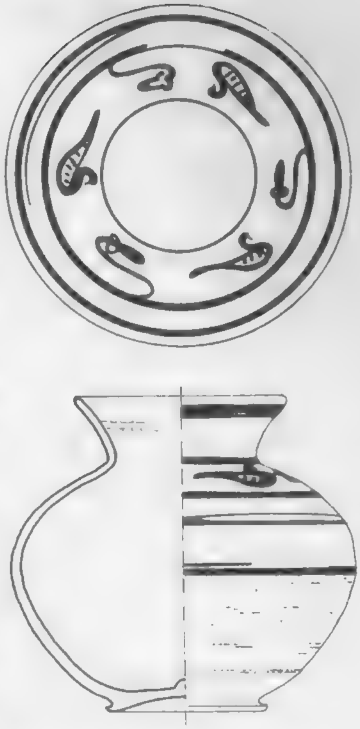


图17 比尔·科特·古万代出土的彩绘陶罐（公元4世纪）

另一重要成果是关于上述遗址中发现的石刻资料的研究。尤其是布特卡拉一号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刻，因其基本属于同一雕刻中心，从而为全面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每件石刻都被单独研究，通过对主题的图像、风格等元素进行分析，将这些石刻归纳为不同系列，进而把系列分成若干组。虽然每个系列各有差别，但在浮雕板雕刻区内不同形象的安排方面，每一组各具特色。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组内二次使用的浮雕板，亦即最初在浮雕板的正面雕刻，而后重新使用时，为符合新需求，先经过切割修整，再在背面雕凿。组与组之间的风格差异在这种二次使用的浮雕板上表现最为明显，也因此确立了它们的相对年代关系。另外，遗址中包含年代信息的数据使得至少能够确立同一组内若干系列的绝对年代，而其余系列与之共时或历时。布特卡拉一号出土石刻的年代关系只适用于此遗址，斯瓦特河谷地区的其他遗址也可与之参照，但严格说来，不能将之推广到犍陀罗其他地区。不过，布特卡拉一号遗址出土石刻的年代关系仍然构成了一个可信的参考体系，有助于加深对犍陀罗艺术的全面理解。

与石刻类似，灰泥像技术和风格上的发展痕迹也被识别出来，且其发展的时段相当于布特卡拉一号大窣堵波4晚期，即公元4世纪中叶至6世纪。

佛教寺院遗址出土遗物的研究尚在进行中，只发表了部分资料[1]。考古队在编写报告的同时还承担了另一个项目，即与意大利遗产和活动部及全国学术研究理事会合作创建犍陀罗石刻数据库。因意大利外交部的支持，数据库也将包括巴基斯坦博物馆馆藏资料。文物信息数据化的优势显而易见，既有助于优化对展厅和库房中收藏文物的保护，又能为研究的检索提供方便。

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地区的考古项目对未来考古工作制定的计划涉及若干重点，其中包括田野工作、出土遗物的研究和出版等。

对斯瓦特地区石刻的研究还延伸到后犍陀罗时代，摩崖造像和石碑遗存（图版18）除表明衰败的寺院之外，还说明当地佛教仍一息尚存[2]。

继续发掘比尔·科特·古万代遗址十分必要，除了其较高的学术价值外，发掘也有助于保护遗址。在遗址上建立考古公园，其内以博物馆化的形式展示遗存，是保护和推广遗址的最佳方式。这一设想也得到了巴基斯坦考古部门的鼎力支持。

田野工作中首先应受到重视的是绘制斯瓦特河谷地区的考古地图。迄今，考古队已收集了海量数据，其中部分经常涉及现被严重破坏的遗址。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采用最先进的地形学、地质考古学、古植物学等技术方法将这些数据纳入一个系统框架，并对至今不甚了解的河谷中的其他地区进行勘察[3]。

研究和出版方面尚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目前考古队正致力于创建斯瓦特地区佛教建筑资料库，同时也包括河谷地区地表遗存的勘测图和照片，相关成果已于2014年出版[4]。比尔·科特·古万代遗址出土资料的研究和报告编写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其中前两册即将出版，分别涉及该地区的最初考察和出土古币。最后，对犍陀罗石刻的研究和数据库的建设也是考古队的工作重点之一，旨在与学界同仁全面分享第一手资料。《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的出版是这项工作迈出的第一步[5]。由菲利真齐继续的法切那未完成的布特卡拉一号雕刻中心石刻资料的编辑和出版是深入研究的奠基性工作。

意大利考古队将继续遵循对该项目奉献毕生心血的大师们设定的路线：以深入而详细的考古工作为出发点，建立稳固基础，提出综合结论，继而逐渐扩大视野，包

〔1〕 附录一：意大利考古队斯瓦特考古项目的英文论著，第181—197页。
〔2〕 Filigenzi, 1997.
〔3〕 Olivieri and Vidale, 2006.
〔4〕 Faccenna and Spagnesi, 2014.
〔5〕 〔意〕多米尼克·法切那、安娜·菲利真齐著，魏正中、王姝婧、王倩译：《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以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斯瓦特考古项目所出资料为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容更广阔的领域。斯瓦特河谷作为犍陀罗至塔里木盆地商贸要道出口，把中国及中亚与东西方商贸连成一体，有史以来一直是商品交换和思想交流的枢纽。巴基斯坦和德国联合在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流域及周边山谷地区开展的二十余年的研究表明，在不同历史时期，这种交流相当频繁。因此，斯瓦特河谷不仅与犍陀罗地区联系密切，而且与印度北部边境地区的往来亦十分紧密。斯瓦特是一个海纳百川之地，欣然接受了由陆续到来的征服者及途经此地的众多商队带来的纷繁芜杂的文化信息。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考古队对斯瓦特河谷的研究具有超越地理局限的价值，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重塑的当地文化面貌将被纳入更广阔的作为东西方文化大熔炉——西北印度地区——的历史洪流之中。

斯瓦特考古项目新进展

奥里威利

一、研究背景

引发图齐考察斯瓦特河谷的兴趣，以及促成塞杜沙里夫长期考古工作的历史与政治背景已有讨论，此处不再赘言[1]。意大利考古队得以在斯瓦特地区开展项目需归功于图齐在1956年开创的外交合作框架，并确定了逐步解决的历史时期考古问题，而项目能够延续至今的主要贡献者则非法切那莫属[2]。

斯瓦特项目伊始采用了意大利当时通用的考古工作规程。首先，将考古活动构建在当地的法律体系内。其二，建立起保护与展示遗迹和遗物的博物馆。第三，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古调查与测绘。第四，设计周详的发掘方案，按照先进的方法开展发掘工作，同时创建编目系统，定期出版发掘报告。尽管并非有条不紊，但这些设想基本全部实现。

在图齐的外交努力下，1958年斯瓦特的瓦利贾罕泽布·米安谷少将在斯瓦特自治区接受并推进了巴基斯坦的行政法律[3]。因此已被巴基斯坦考古部门批准的发掘项目就被置于明确的法律框架内。

考古出土的遗物需要安全的、尽可能毗邻发掘现场的库房。而当布特卡拉始掘的1956年涌现出大批石刻后，博物馆的建造被提上日程。遗物最初被临时保存在贾罕泽布学院图书馆的库房中。1958年，伴随着巴基斯坦法律在斯瓦特的生效，博物馆终于落成，与此同时，意大利罗马也建成了一座专门保存、展示斯瓦特出土文物的博物馆（即今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斯瓦特博物馆曾在地震和炸弹的双重摧毁下受到重创，2011年塔利班暴动造成的武装对峙解除后，斯瓦特地区重

---

〔1〕 卡列宁，本书，第3—15页；Olivieri, 2006; Tanweer, 2011.
〔2〕 Olivieri, 2006, pp. 27–28.
〔3〕 *Ancient Monument Protection Act*, VIII, 1904; Tanweer , 2011.

新对外国学者开放，意大利考古队立即展开了博物馆的重建工作[1]（图版19）。

最初由图齐指导的斯瓦特河谷地区的全面调查为项目的日后工作奠定了基础[2]。法切那在布特卡拉和班尔的田野工作之余，主持了这两处遗址周边地区考古地图的测绘。在他的建议下，威达勒和笔者于2000年开展了覆盖面更广、更系统的调查，截至目前涵盖了比尔·科特·古万代地区的所有河谷及塞杜和江布尔的部分河谷[3]。其他主要河谷和山口已被菲利真齐带领的晚期佛教摩崖造像项目调查过（图18）。

1956年，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和乌德格兰城址的发掘工作同时展开，并同步进行至1962年乌德格兰发掘领队古利尼的离开。之后，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成立了亚洲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心，总部设在罗马，斯瓦特、阿富汗（始于1957年）和伊朗（始于1958年）的考古项目皆隶属其下。在当时兼任罗马博物馆馆长的中心负责人法切那领导下，制定了一套完备的考古工作规范，亚洲考古项目还得到罗马博物馆的技术支持，发掘人员也在罗马博物馆接受了行政和管理培训。

图18　加哈那巴德大佛

〔1〕 Olivieri, 2013.

〔2〕 Tucci, 1958.

〔3〕 Olivieri and Vidale,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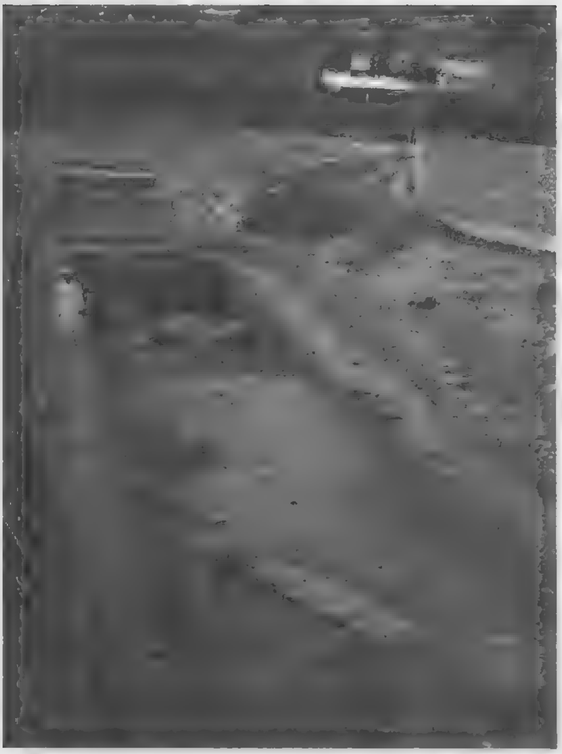


图19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BKG 10

乌德格兰工作的中断标志着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地区历史时期城市考古的停滞，1964年法切那在巴拉马城址的发掘只是先前工作的初步恢复[1]。因此，1956年至1982年间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的工作极不平衡，重心集中于布特卡拉一号、班尔一号和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1984年卡列宁在巴里果德地区比尔·科特·古万代城址启动的一项成功且长期的考古项目才最终填补了城市考古的空白。法切那引入巴基斯坦的探方发掘法和记录系统使得这些田野工作成为至今仍有效的典范，而比尔·科特·古万代的发掘采用了更先进的地层学概念和水平层位发掘法[2]（图19）。

二、方法论问题

地层学方法引入斯瓦特地区佛教寺院遗址的发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佛教考古的重生。探方发掘法直到1942年才被惠勒引入印度，但并未被施用于佛教寺院遗址发掘中。在斯瓦特地区，法切那首次使用探方发掘法清理佛教寺院遗址，所出石刻是犍陀罗地区首批具有可靠层位关系的考古资料。

20世纪80年代，正值犍陀罗研究热潮，法切那团队建立的年代序列和取得的其他成果被频繁征引，并受到了积极评价。达尼、福斯曼、桑山、塔代伊等学者之后，仅个别犍陀罗学者具备田野考古经验，且几乎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考古地层学的重要性，只有法切那注力不多的聚落考古和史前考古两大领域的研究者继承了他的方法论。最近20年，长期的地区危机致使发掘减少，工作粗糙，以及盗墓活动的猖獗，同时也使得研究犍陀罗艺术、古币和碑刻的学者多于田野考古学者，研究重点也从遗址转向了遗物。

[1] Faccenna, 1964b.
[2] Olivieri, 2014.

卡列宁在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的发掘中首次引入了水平层位发掘法[1]以及“哈里斯矩阵”。30年后，为培训青年考古学者和田野工作人员，意大利考古队整理出版了一部发掘手册[2]。

三、当前项目

2007年至2009年，斯瓦特地区是暴动战乱的中心舞台。直至2011年该地区才得到军事控制。

意大利的考古活动在2007年搁置，2010年得以继续，从2011年起因被纳入意大利考古队和巴基斯坦合作的更大型项目中，而受到意巴两国2006年签署的“巴基斯坦—意大利债务互换协议”的资助。

近年开展的“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新项目旨在培训能够胜任田野发掘（图版20）、保护修复以及保存和管理考古遗址的当地民工、大学生等，此项目的主要贡献之一还包括重建斯瓦特博物馆[3]。

四、研究课题

斯瓦特河谷考古地图项目的全面进行凸显出巴里果德地区佛教寺院的重要角色[4]。从中也可发现，寺院通常选建在土地肥沃之处，内部还建有堤坝、水井、水渠等水利设施。根据收集到的陶器标本可知佛寺发展的最盛期在公元1至3世纪之间。佛教团体的逐步扩大与非佛教群体，即至少到中世纪一直活动于斯瓦特的兴都库什山区印度—伊朗土著部落达尔德人的生活空间的压缩相伴发生[5]。制陶技术的分析暗示了公元2至3世纪物质文化的印度化达到巅峰，此时正是统治中心在恒河平原的贵霜帝国的高度集权时期。比尔·科特·古万代城不再垒建印度—希腊时期的大型防御城墙，原有城墙变成外围建筑的地基，从中心城市退变为大型住宅聚集区，与周边众多佛教寺院的地位相当[6]。佛教寺院不仅自给自足，而且管理农业生产（包括达尔德人），掌控矿业和林业以及山口和要道[7]。

---

〔1〕 Callieri, 1989.
〔2〕 Olivieri, 2014.
〔3〕 2005年的地震和2008年2月的爆炸使斯瓦特博物馆受到了重创。
〔4〕 Olivieri and Vidale, 2006.
〔5〕 Olivieri, 2011.
〔6〕 巴里果德地区所谓的“非军事化”或“和平贵霜”时期，参见 Olivieri, 1996.
〔7〕 Olivieri, 2010.

图20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BKG 11的发掘

中断于2006年的研究在2013年重启。除了修复及与本书研究的时代相距较远（如史前墓地）的课题外，项目的主要课题包括以下四个。

贵霜晚期和后贵霜时期比尔·科特·古万代城址的调查以及城市废弃的决定因素和年代的研究。因发掘面积有限，尽管城市发展的年代序列清晰完整，但城市布局的信息有待完善（图版21、22，图20、21）。

贡巴特建筑的调查，这是唯一一例不见于犍陀罗其他地区的弧顶穹窿顶双顶佛殿，不同学者对其进行了各异的断代。这座建筑曾面临着坍塌的危险，现已被修复（图版23，图22、23）。

年代被认为是犍陀罗时代晚期（公元二三世纪之后）的阿穆路克达拉大窣堵波的调查。旨在理解此时期的佛教建筑，并探寻它与毗邻的比尔·科特·古万代城址的关系（图版24、25，图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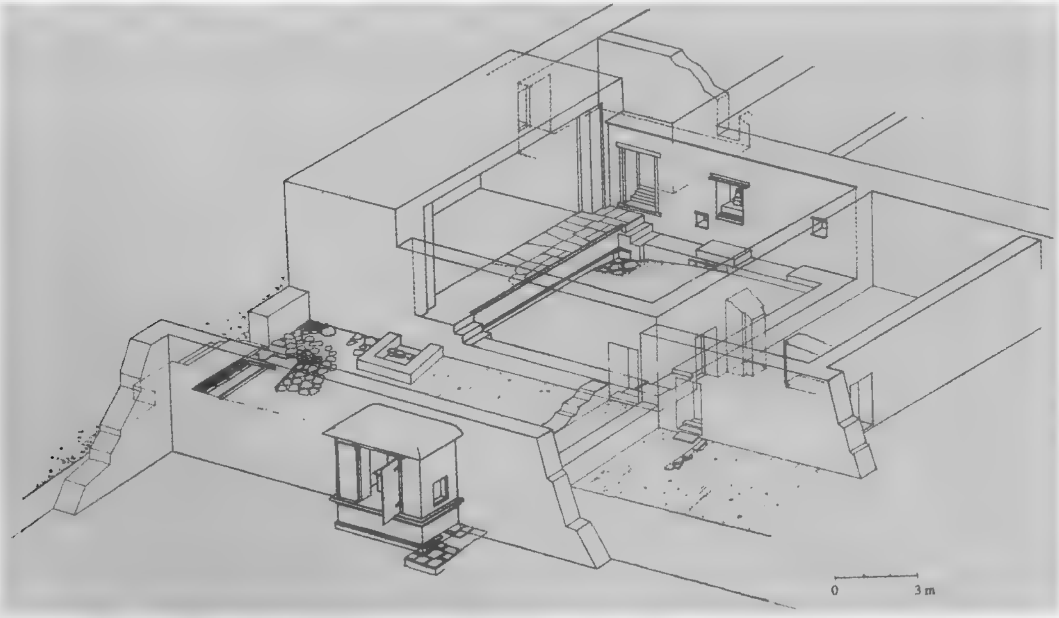


图21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BKG 11东端和家用佛堂轴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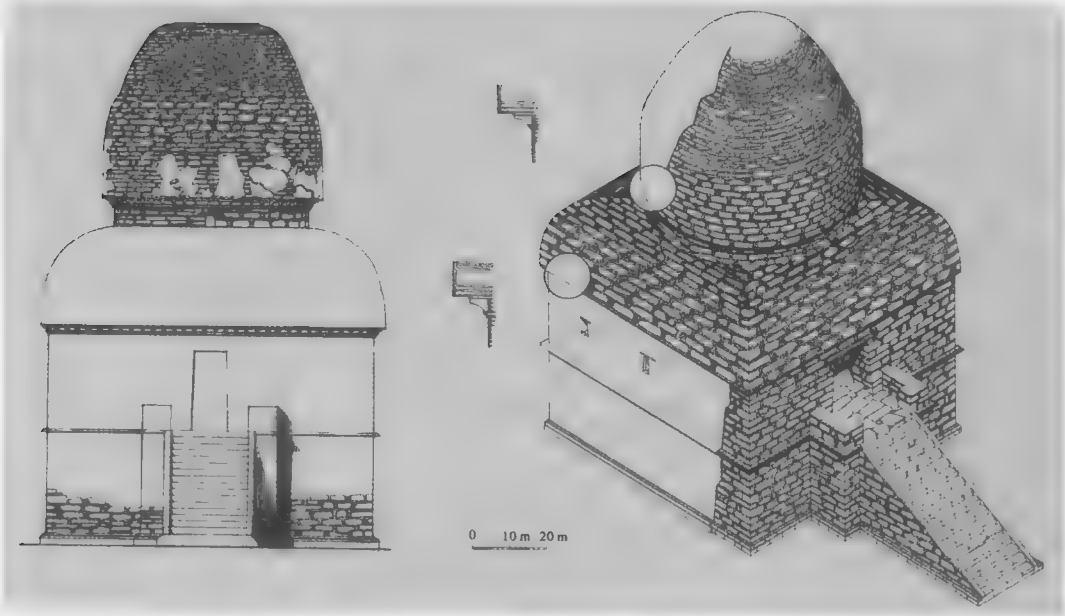


图22　贡巴特弧顶穹窿顶双顶佛殿复原后的正视图和轴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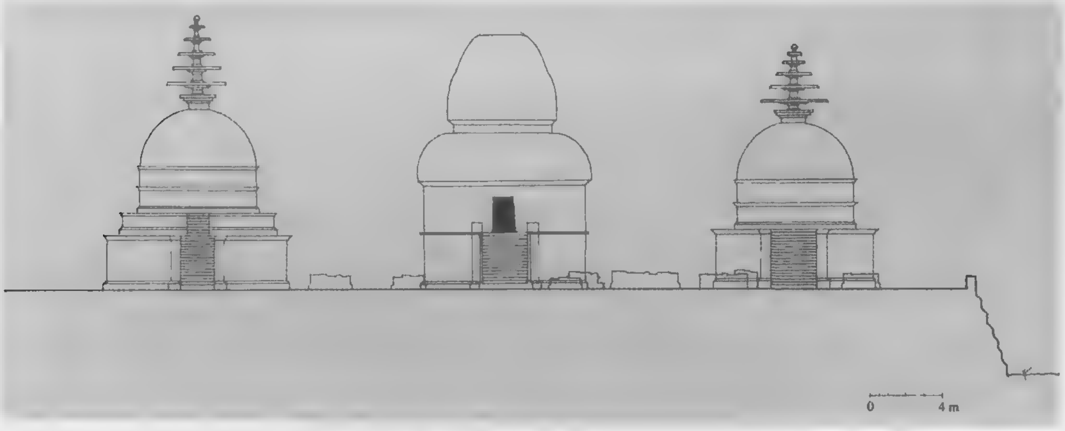


图23　贡巴特台地上的三座大型建筑复原图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的评估和保护工作（图25、26）。

比尔·科特·古万代城坐落在斯瓦特河左岸，以一处天然崖壁为屏障，贡巴特和阿穆路克达拉位于河谷两侧，原应属于比尔·科特·古万代城控制的周边地区，这三处遗址彼此相距五公里。城市和佛教寺院之间的关系是印度—巴基斯坦西北考古面临的紧迫问题，而且将近30年一直无法突破。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在城址内开展新发掘工作的条件尚不充足；另一方面，因发掘方法的过时和技术的缺失，已经清理的佛寺遗址无法提供有效的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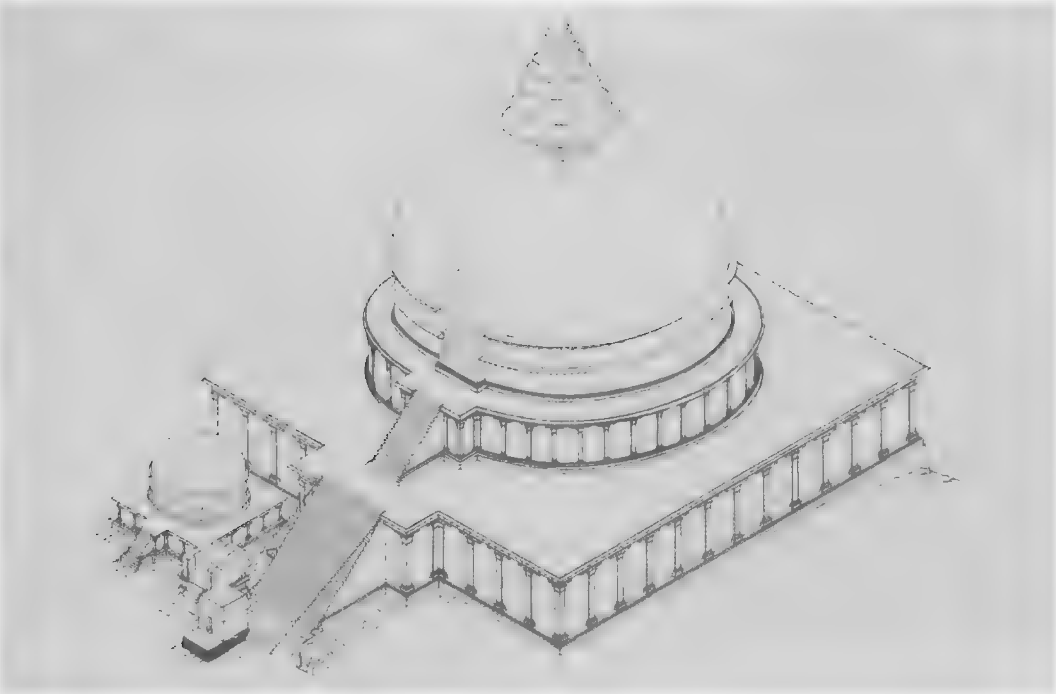


图24　阿穆路克达拉大窣堵波复原轴测图

图25　修复前的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

图26　修复后的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

2011年至2013年有关这三处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编成报告出版[1]，简报和专题研究已发表于巴基斯坦和相关的国际刊物中[2]。上述四个课题的田野工作进展如下。

比尔·科特·古万代古城西南区的发掘面积达8 000平方米。该区域周围有防御墙结构，墙的南、西部已被发掘，参照先前的研究成果，其年代可被定为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目前的发掘揭露出城市废弃之后被再次利用的晚期遗迹，可被划分为十一个独立的、规模不等（300—700平方米）的街区，主街临近西墙。碳十四测年表明，此城废弃之前的最后阶段约为公元3世纪后半叶，公元4世纪早期被再次利用，这一变化可能与萨珊政治势力的进入相关（图版26）。

贡巴特遗址原有三级台基。第一级台基呈阶梯状，其上原建有三座规模相当的建筑，中间为佛殿，两侧各一座窣堵波。根据佛殿上部凹槽中残留梁木的碳十四测年可知其建造年代约为公元1世纪晚期。修复佛殿弧顶东南角时发现的三根木梁残迹的碳

[1] Olivieri, 2014.
[2] Olivieri, 2012; Cupitò and Olivieri, 2013; Olivieri, 2013; Meister and Olivieri, 2012.

十四测年为公元2世纪左右。这一事实似乎表明弧顶穹隆顶双顶建造或重建于晚期。三座建筑周围的小型建筑均增建于晚期（图版27）。

阿穆路克达拉大窣堵波是犍陀罗地区最壮观、保存最好的建筑杰作之一，从公元2世纪到10世纪经历了建造、翻新和再使用的复杂过程。最初在公元3世纪用片岩雕刻，后来曾全部重新改装彩绘石膏和石灰岩雕刻；踏道被加长，正面增加一个用灰泥修整的石灰岩小龛，类似阿富汗卡比萨地区公元500年左右的绍瓦基和托普达拉等建筑。约至公元6世纪，踏道上增建一座小型、带方体基座的克什米尔式盝顶寺庙。根据碳十四测年，在公元6至7世纪期间，塔院虽部分坍塌，但由石膏活动面可知其仍被持续使用；亦可由出自一座几乎被完全掩埋的小窣堵波外立面描绘的太子诞生场景的二次使用浮雕板证实（图27）。公元7至10世纪，塔院走向衰落，遗址中保存的震后痕迹，如塌毁的伞盖等表明其最终被废弃。

图27 表现太子诞生场景的浮雕板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发掘所获信息和最初发掘资料对比，证实了法切那和卡列宁在报告中对遗址分期的推断[1]（图版28、29，图28—31）。发掘过程中尤其关注废弃阶段，其相当于大窣堵波基座上的四角圆柱、部分横饰带、基座和踏道上栏楯等的坍塌时期。这批遗物出自大窣堵波东北角圆柱周围。法切那推测此阶段为公元3世纪后半叶[2]，与比尔·科特·古万代大地震年代相当。一系列现象表明，大地震之后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导致了东北角圆柱和大窣堵波部分横饰带的坍塌，其他佛教寺院（班尔一号第二期，布特卡拉一号第四期）可能遭到了同一地震的袭击。目前虽然尚无直接证据表明阿穆路克达拉大窣堵波也被地震破坏，然而它却在3世纪后半叶被修葺，尤其是第一层踏道（高4.7米，与第一层塔身等高）的重修暗示出大窣堵波曾受地震影响：第一层踏道被重建并加长，片岩装饰大部分被灰泥替代，新修后的斜度与第二层踏道斜度不平行，是犍陀罗地区仅见的个例，似乎可解释为通过减小倾斜角来弥补结构方面的缺陷。

图28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供养人雕像

图29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残段细部

〔1〕 Faccenna, 1995a; Callieri, 1989.
〔2〕 Faccenna, 1995a, table XX.

图30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残段

图31 塞杜沙里夫一号坐佛像大浮雕板残段

五、总　结

公元1世纪帕提亚人取代印度—希腊人控制了西北印度，并继承了他们的遗产。其证据不仅有印度—希腊的要塞在帕提亚时代巴里果德的比尔·科特·古万代（和乌德格兰）表现出的结构上的连续性，而且这一时期新建要塞如西尔卡普（塔克西拉）沿用了希腊化模式，这些要塞带有军事殖民色彩，与本地其他城市差别显著。斯瓦特地区佛教寺院也于此时开始营建。

公元2至3世纪时，佛教寺院出现了大发展，不断侵吞土著群体的生活空间，同时使之成为依附者，且因拥有大量的钱财和田宅而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和生产作用。此时期斯瓦特不再作为前沿阵地，军事要塞也逐渐失去了防守和抵御功能，变成贵族宅邸和手工业生产区。

贵霜时期，比尔·科特·古万代由军事重镇发展成真正的城市，并随着贵霜的衰落而被废弃。从出土遗物判断，此城的文化结构颇为复杂：除典型的犍陀罗式佛教寺院外，还有中亚的神殿；物质文化中有当地起源的陶器，但主要是印度式陶器和贝壳饰品，而青铜发簪是由当地先前文化中派生出的本土形式。民众礼拜的神祇皆属于佛教，公元3世纪时开始出现的便携式神龛中有弥勒菩萨像和当地神祇。比尔·科特·古万

代的衰亡是由一系列混合因素和政治原因，再加上毁灭性大地震造成的。贵霜通过若干与之结盟的贵族家族来管理斯瓦特地区，他们将接受佛教视为与贵霜统治者共享的身份象征。萨珊崛起之后，贵霜的社会动荡不安，精英阶层和社会控制体系崩溃。后贵霜时代的权力或更加分散，当地贵族纷纷私自制币，与萨珊钱币同时流通。当大地震袭击比尔·科特·古万代时，贵霜统治者已束手无策，任由比尔·科特·古万代破落衰败，最终沦为贫民窟。

城市周边地区的不同佛教寺院以各自的方式设法度过了危机。塞杜沙里夫一号和阿穆路克达拉在公元3世纪以后仍被使用——前者很快被废弃，而后者经历了长期的修整和改建，与原状相距甚远。阿穆路克达拉上装饰有大量石膏和石灰岩雕刻，这不仅是审美追求的改变，也是新砌筑技术的应用。石膏的生产与生石灰的获取和熟化相关，其大量生产需要高度组织的作坊。虽然信息有限，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技术在最初使用时水平已经相当高超，以至于难以梳理其发展脉络。新技术和审美标准的出现似乎可以解释为同时代的波斯石膏艺术向阿富汗地区的漫溢。

石膏与石灰岩的使用涉及年代问题。最近的发掘结果表明在公元3世纪中期，城内的佛寺重新利用先前的犍陀罗石刻，城外的佛寺不再使用片岩装饰。片岩雕刻板重新用于其他场所，或被石膏装饰取代。建筑的装饰雕刻依赖从开采到运输，从预订到制作、安装的一条复杂生产链[1]。主要客户缺失将会导致工作规模缩减，直至这一生产链终止。石灰岩在公元3世纪开始流行，且一直使用到公元4世纪初，主要用于雕刻中、小型石碑，其内容大多数表现的是私人礼拜的菩萨像和本地及印度的女性神像，少数为佛像。值得注意的是，与片岩不同，斯瓦特地区使用的石灰岩不出自当地，而是来自犍陀罗东部边界的塔克西拉和岩盐矿带之间。由此，或许出现一条集中管理（至少是组织有序）的新生产链：首先大规模开采原料、进行粗加工，而后运输半成品，最后在建筑工地将用于砌筑墙体的粗凿石切边修整成方石，废料制成石膏。新生产链的出现可能是权力中心转移的迹象之一，但尚无法确定是缘于政治因素抑或使用群体的改变。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大窣堵波的年代和雕刻。公元1世纪中期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已建成[2]；公元1世纪末期贡巴特大窣堵波尚处于建造中；公元2世纪初期阿穆路克达拉大窣堵波落成。贡巴特的雕刻可被归入“自然”组，而阿穆路克达拉属于“立体”组，两者都晚于公元1世纪前半叶早段以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为代表的“线刻”组之后[3]。

---

〔1〕 Callieri, 2006.
〔2〕 Callieri, 1989, p. 118.
〔3〕 法切那，本书，第96页。

斯瓦特河谷的历史

孔雀王朝和佛教在斯瓦特的传播

菲利真齐

曾有数百年，佛教艺术和建筑是古代印度，尤其是西北印度最显赫的人类遗存。如今所谓的犍陀罗艺术于公元后最初若干世纪蓬勃发展于西北印度，覆盖的范围远超出白沙瓦平原（狭义的犍陀罗地区），包括今阿富汗大部分地区、斯瓦特及其周边地区，即现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区。

尽管至今尚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对犍陀罗与前犍陀罗艺术及建筑的研究无疑是探索佛教历史、佛教在教义和礼拜层面上的演变以及佛教传播的基础，这种传播不仅是地域范围的拓展，也是它对征服之地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渗透。

佛教在印度恒河流域诞生后，随即便在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促进与推动下迎来了勃兴期：跨越边境广泛流布于印度北部地区，并东渐至中亚东部及以东诸国。某些情况下，被佛教征服的地区成为活跃的宗教中心，在佛教中加入本土元素，偏重某些方面，调整某些表达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佛教向其他地区的传播。其中包括乌仗那国，即斯瓦特地区。暂且不论后来的传奇故事，佛陀实际上从未亲临此地[1]，而在汉文和藏文文献中，它却被描绘成景色壮丽、佛法兴盛的圣地之一[2]。这或许归因于遍布整个地区的窣堵波、精舍、还愿建筑、寺院等众多宏伟的宗教建筑，其中大多数幸存至今，保存状况有所不同，部分仅露出地表，部分仍被堆积掩埋，还有部分建筑已被发掘清理。

斯瓦特地区的佛教信仰绵延了数个世纪，并且长期以来与促进该地区发展的、对其有益的重大事件紧密交织。尤其是斯瓦特作为印度与中亚及中国商贸往来必经之地的地缘优势，使其不仅具有狭义的政治意义上的战略重要性，而且就宗教宣传角度而言，也能促进教义的光大和弘扬。此外，斯瓦特地区兴旺发达的经济，适于宗教团体和寺院发展的文化与自然环境，以及提供的包容氛围与宽敞空间，为佛教发展和地区之间的交

〔1〕 Lamotte, 1958, pp. 366–69.
〔2〕 Tucci, 1958, pp. 279, 324 n. 1; 1977.

流创造出互惠互利的纽带。这一纽带可能在公元5世纪以后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剧变：风云诡变的政治形势，贸易干道被挪至其他更安全的旁支后造成的经济危机，数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均蛀蚀着斯瓦特地区的宗教基础；拥护佛教的社会阶层也开始动摇，并逐渐减少且失去社会影响力[1]。尽管如此，即使在伊斯兰入侵前多灾多难的数百年中，佛教依然在斯瓦特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并发展出了新的宗派——金刚乘，一种秘传形式的佛教，在引进北部地区后得以生根发芽。

斯瓦特地区佛教的漫长没落史尚不清晰。同样，对佛教进入以及后来在该地区渗透和扎根过程的记载也是凤毛麟角。与佛教萌芽直接相关的物质文化遗存暂未发现，或没有留存至今。目前可确定的最早阶段是孔雀王朝阿育王（公元前268—前232年在位）时期。阿育王极大地拓展了祖父旃陀罗笈多一世创立的王国疆域，成就了古印度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然而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作为首位也是最伟大的佛教君王，他虔心奉佛，广传佛法。据信汇集了佛教最古老典籍的巴利三藏就是在阿育王召集的第三次佛教大结集期间完成的[2]。

阿育王登基的年代常被用来推断乔答摩·悉达多，即佛陀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代，足以表明这位国王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传统认为，或更确切地说根据长久以来得到广泛认同的传统说法，佛陀涅槃后218年阿育王登基；又佛陀在世80年，则其应生于公元前560年左右。这一年代对于探索佛教史的学者来说，意味着要面临两百余年的佛教沉寂期。目前学界更倾向于另一观点，即佛陀的涅槃和阿育王的即位仅距一百年[3]。

考古、碑刻和文献均表明，阿育王对于佛教的发扬光大的确功不可没。古印度缺乏文字记载的历史信息，所知的少量线索又常与传说和神话交织。佛教纪念性建筑的历史也始于传奇。尽管如此，通过碑铭、文献和考古资料等史料的稽考钩沉，探赜索隐，可窥知传说背后的历史真实。佛陀涅槃、荼毗后，被视为珍物的舍利引起八王纷争，最终被平分。为存放供奉所得舍利，他们均建立了窣堵波。据史书记载，佛陀曾指出窣堵波是最适合珍藏如来遗骨的建筑[4]。

八王分舍利这一具有重要训世和象征意义的事件又与阿育王的传说嫁接。据传阿育王皈依佛教后，打开王舍城的窣堵波，取出佛舍利重新分配。为了让觉悟者的教义传播到五洲四海，在地神的帮助下，一夜之间修建了八万四千座建筑，其中大部分

---

〔1〕 Tucci, 1977, 自第224页起；Kuwayama, 1987.
〔2〕 Pisani, 1970, p. 62.
〔3〕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p. 125, ‘Era, Buddhist’.
〔4〕 *Dīghanikāya*, 16.5.10.

是用来奉放佛舍利的窣堵波，被称作达摩拉吉卡窣堵波[1]。此传说借用了印度人熟悉的象征符号：阿育王认为佛经包括八万四千个部分，按照古印度的面相学，人体也由八万四千个部位组成，换言之，佛陀的身体和教义没有随着他的涅槃而消亡，而是重新得以弘扬。

传说虽然荒诞不经，但仍有所本。阿育王尽管也支持耆那教等其他宗教，但对佛教尤为优待。或许，阿育王将他的个人信仰与宏伟的政治蓝图相连，而佛教恰是他实现理想的推助力。佛教也确实在吠陀教陷入危机后，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在吠陀教社会中，除刹帝利对婆罗门隐忍的、时强时弱的不满外，不断扩大的吠舍又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吠舍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孔雀王朝建立的崭新国家机制所必需的商业和服务网络，并成为王朝经济建设的有力后盾。对阿育王般高瞻远瞩的君王来说，与其选择社会等级森严稳固的传统吠陀教，不如选择受到新兴经济政治阶层拥护和支持的佛教作为促进社会交融和维护社会和谐的工具[2]。

佛教在西北印度的繁荣也许正是在于这些原因。西北边境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结构和正统的婆罗门教一贯存在着潜在的冲突，更容易接受多元影响（图32、33）。此地的战略重要性致使这些影响或是通过和平的商业往来，或是作为外来入侵的结果。

阿育王在华氏城组织大结集后，除派遣传法者前往从阿富汗至斯里兰卡的广大区域传教外，还通过在今叙利亚、埃及

图32 布特卡拉一号出土的浮雕板残段，上刻丑化的婆罗门像

[1] Malalasekera, 1960, p. 218, ‘Aśoka’;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p. 189, ‘Aśoka’.
[2] Thapar, 2000, 自第856页起。

图33 犍陀罗地区出土的浮雕板，上刻佛陀慰问婆罗门苦行者

和马其顿的使节，让南亚以外的地区闻知佛法[1]。为配合佛法的传播，阿育王兴建了大型纪念碑式建筑，以传统的形式具象化正法和普世王权的理念[2]，也许是有意为之，使这些建筑具有双重含义。以正法为基础的正义而英明的王权观念，使人同时联想到作为普世精神法则主宰和动力的佛陀，以及取法自然、宽容、正义的君王，这恰与阿育王碑铭中宣扬的自我形象相符。然而，在被认为是阿育王修建的大型纪念碑式建筑（包括著名的阿育王石柱，图版30）中，窣堵波是一类纯粹的佛教建筑。公元7世纪，西行求法的高僧玄奘曾提及多座据传是阿育王修建的窣堵波。传统认为，阿育王曾敕令建造了不可胜数的窣堵波，但幸存至今且可考证的却寥寥无几。

位于印度中部恒河流域中央邦的桑奇一号大窣堵波，被认为是阿育王时期首屈一指的佛教建筑（后来的巽伽王朝重修时将原窣堵波包砌在内）。旁遮普邦（阿育王年轻

〔1〕 Huntington, 1985, p. 44.

〔2〕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p. 190, ‘Aśoka’; Thapar, 1966, pp. 85–88; Irwin, 1973–76; 1987.

时曾代父亲统治的地区）塔克西拉的达摩拉吉卡窣堵波和斯瓦特地区的布特卡拉一号大窣堵波（见图版7）是西北印度前犍陀罗时期两座重要的窣堵波，后者根据遗址中发现的两则分别刻于二次使用的片岩石板和陶器上的佉卢文题记可知，亦为达摩拉吉卡窣堵波[1]。将这两座窣堵波归于阿育王或孔雀王朝时期是基于考古信息和其自身的结构特征：圆形平面，平行六面体石块砌筑，较扁的覆钵立于圆丘上；以及达摩拉吉卡窣堵波这一指代传统认为是阿育王敕令修建的最古老窣堵波的名称。达摩拉吉卡窣堵波一名反映了传说中阿育王（法王）对佛舍利的重新分配，或直指佛教典籍中阿育王的尊称"法王"[2]。

布特卡拉一号大窣堵波第一期[3]证明佛教很早就在斯瓦特地区传布，这应与阿育王最初发起的佛法弘传有关，他不仅口头上同意佛教的弘扬，而且也给予经济支持。此外，佛教在斯瓦特地区传衍之久还体现在宗教典籍中，其中部分文献（包括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毗奈耶）保留了一些源于该地区的古方言词汇[4]。高僧传记中也早已收录了将乌仗那国描绘成圣地的传奇，并将其设置为佛陀生平众多重要事迹的发生地，例如阿波波龙被如来降伏，皈依佛门；佛祖涅槃后分得舍利的八王之一乌仗那国王上军王[5]。关于上军王的一则重要信息见于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的一件刻有一位手捧舍利盒的骑象国王浮雕板残段上，可能表现的是上军王载佛舍利返回的场景（第145页，附图10）。根据玄奘记载的当地传说，上军王骑着白象接近城门时，白象暴毙而亡化作一块巨石，他就在这块奇石旁修建了保存佛舍利的窣堵波。

由寺院和窣堵波本身悠久的历史可知，布特卡拉一号大窣堵波在古时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历经多次重建，但它的结构并未被显著改变，始终保持着圆形平面；而犍陀罗地区的其他窣堵波则发展出另一种独特形制：除覆钵顶下面的双层圆柱形塔身使整个结构显得高耸挺拔之外，还增设了一个方体基座[6]。对布特卡拉一号大窣堵波的崇拜或许源于其古老性，因而后世不可避免的修缮均尊重和保持了其原状。

除了被确认为当地最古老、最重要的佛教寺院布特卡拉一号遗址外，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地区还调查和发掘了其他两处同等重要的遗址，即同建于公元1世纪的塞杜沙里夫一号和班尔一号佛寺遗址，两者均由塔院和僧院组成，分布在高度不同的台地上。班尔一号和塞杜沙里夫一号的大窣堵波在方体基座四角竖立的四柱（前者四柱围

---

〔1〕 Faccenna, 1980–81, vol. 1, p. 167.
〔2〕 Marshall, 1951, pp. 234–35; 参见 Tucci, 1977, p. 59, note 73 提及的未发表的论著。
〔3〕 或为公元前3世纪末，略晚于阿育王时代。
〔4〕 Tucci, 1977, pp. 59–60.
〔5〕 Tucci, 1958, p. 281.
〔6〕 法切那，本书，第87–9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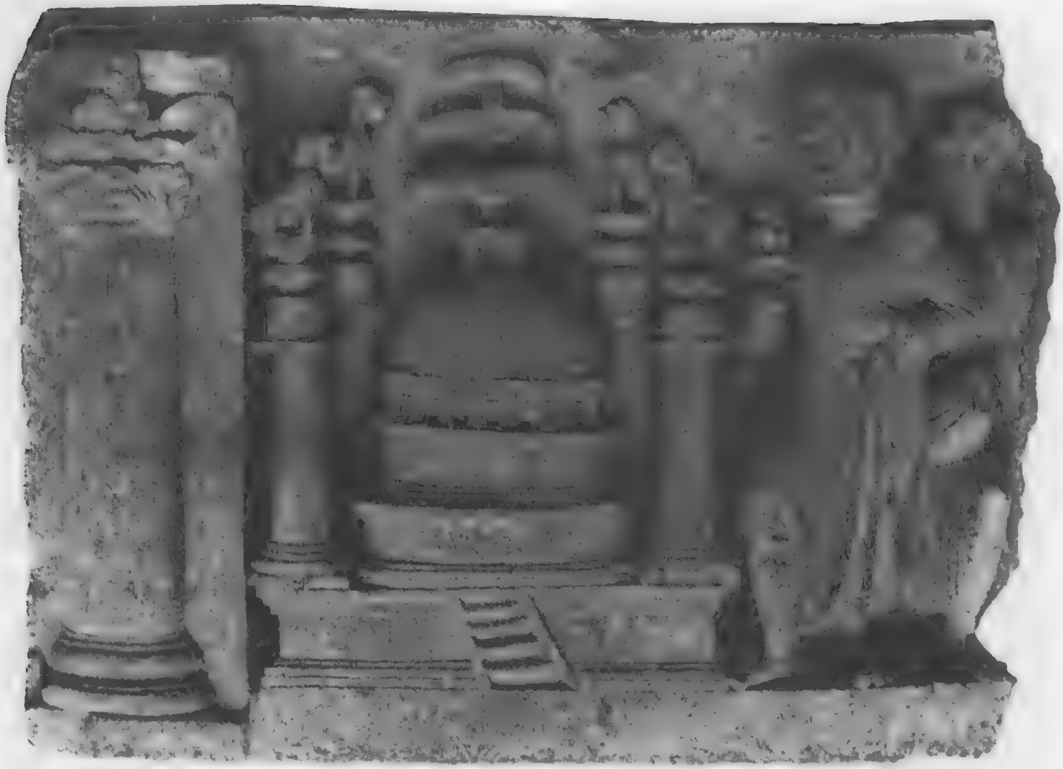


图 34 布特卡拉三号出土的犍陀罗浮雕板，上刻僧侣礼拜四角立柱的窣堵波

绕方体基座立于平地上，而后者四柱立于方体基座上）不仅从建筑层面而且就宗教象征而言也意义非凡，暗示了空间的基本方位[1]。窣堵波昭示的基本方位反映了佛法弥漫整个宇宙，是实际和象征意义上的中心，宇宙充满动力的运动发自或返回此中心，这似乎隐现了后来金刚乘中更明确陈述的曼荼罗宇宙精神图。原被视为犍陀罗地区特有的这种建筑类型，经过重新考察，也发现于斯瓦特的提卡尔达拉、塔克西拉的西尔卡普以及阿富汗的哈达、特佩卡兰、特佩萨尔丹和马吉安那的乔尔卡拉；此外，在一些浮雕和舍利盒上也见有此类建筑的图像[2]（图 34）。它虽然不是斯瓦特地区独有的建筑类型，但较早出现于（或有可能创造于）此地，表明了佛教思想在当地的活跃。

意大利考古队、巴基斯坦政府考古和博物馆部与白沙瓦大学考古系调查的佛教寺院遗址如尼莫村、布特卡拉三号、贡巴图那、巴里格拉姆、新沙、纳瓦格、马拉姆贾巴、马尔加奈以及大量仅做过简单考察的遗址，是佛教兴盛弥漫于斯瓦特的有力佐证。从大型建筑、周边小型建筑的数量和质量、建筑上的雕刻装饰等可以隐约窥见佛教在社会中

〔1〕 Faccenna, 1986; 1995a; 本书，第 115－119 页。
〔2〕 Faccenna, 1986, pp. 60－69; 1995a, pp. 566－72.

图35　现已不存的恰特帕特小窣堵波老照片

受到的财力支持。关于此话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诸如，哪些群体在供养佛教？他们之间是否有过代替？

假若全面考量这一问题，可认为在近两百年的时间内，除现已不存但老照片表明其为古风形制的恰特帕特小窣堵波（图35），布特卡拉一号大窣堵波的唯一性绝非偶然[1]。布特卡拉一号大窣堵波是佛教进驻的象征、存在的明证，或许如前文讨论阿育王时提到的那样，它是为宣扬佛教而建造的大型地标式建筑。现有考古资料似乎同时指向一个事实：当地佛教建筑的真正勃兴始于公元前1世纪末，并于公元1世纪得到迅猛发展。当时，除布特卡拉一号寺院发生了巨变外，其他重要的寺院如塞杜沙里夫一号、班尔一号、布特卡拉三号、新沙等寺院也建成面世。这段时期内，因权势群体的大力支持，佛教建筑不仅遍布斯瓦特地区，而且规模相当可观。塞杜沙里夫一号、布特卡拉三号等大型寺院，以及卡特来等若干小型寺院都建造于史前墓地上或与之毗邻，甚至建造之前某些墓地还在使用中（如塞杜沙里夫一号）[2]。图齐已注意到[3]，在其他地方特别是

〔1〕 Foucher, 1905–51, vol. 1, figs. 10, 12.
〔2〕 Faccenna, 1997b.
〔3〕 Tucci, 1977, p. 10.

印度的安得拉邦[1]也存在此现象，如此多见，应当并非偶然。这种做法在斯瓦特地区更像是有意选择，为寻找视觉冲击力的佛教驱逐了其他古老的宗教习俗。

然而，仍需对佛教的社会基础进行追索。前已述及，佛教受到流动社会的欢迎，投合富裕的贸易、生产和服务阶层即中高层财富阶级的心意，他们的势力从孔雀王朝开始的城市化阶段起就不断加强。同时，佛教也迎合了在印度社会中掌握实权、行使军事职能的世俗阶层，这些人不仅包括传统社会中的刹帝利，还有身份地位相当于刹帝利的其他群体，如外国贵族等。与凝滞的种姓制度相比，佛教为他们提供了促进融合的更灵活体系。因此，佛教不仅与印度—希腊人的统治和平共处[2]，而且受到了塞人（并不专信佛教）、帕提亚人和贵霜人的拥护和支持。与此同时（公元前1—公元3世纪），西北印度的佛教建筑、雕刻出现了崭新的艺术形式并达到了巅峰。

目前学界关于斯瓦特的政治史所知甚少，而且常常是基于推想。尽管这一地区始终保持着自治，但因处于上述主要政治实体的势力范围内，从而为佛教提供了繁荣发展的条件。统治布奈尔并有可能统治斯瓦特地区的塞人王朝阿不拉遮时代[3]的国王因陀罗跋摩、其妻郁多罗以及其他人的碑铭不仅表明了一种个人信仰，而且以历史眼光来审视，还反映出国王及其家族的信仰对所统治社会的深刻影响。信徒通过布施，不仅表达个人的宗教信仰，积累功德，同时也得到社会的认同；具体可见的供养宣扬了个人的宗教情结和佛教的友善（图36）。佛教强烈激发和传播社会功德心的能力反映在图像体系中，西北印度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多民族共处的特点在犍陀罗艺术中找到了合适的空间。佛陀现世及前世的生平事迹暗含着浓厚的印度文化色彩，而图像中表现的当时生活又体现出佛教的普世宗教趋向：供奉场景并非局限于印度文化，而是穿戴印度、希腊、斯基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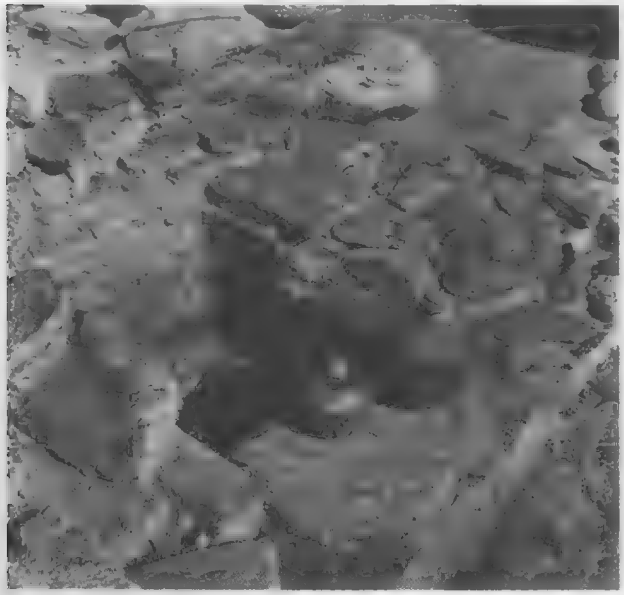


图36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供奉龛遗址

〔1〕 Schopen, 1996.

〔2〕《弥兰陀王问经》记录了印度—希腊王米南德与那先长老的问答，表明两者沟通无碍。

〔3〕 卡列宁，本书，第50-54页。

图37 斯瓦特发现的浮雕板残段，上部刻佛陀在窟内禅定（仅下方保存），基座上刻服饰各异的信众举行火祭仪式

亚各种服饰，如同多民族的舞台，但他们却都属于同一佛陀世界[1]（图37）。现世与往昔交错，如穿戴斯基泰服饰的人物突然出现在描绘佛陀生平的场景中[2]，通过这种虚构的历史传统塑造了统治阶层的形象，虽然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的贵霜人，被佛教赋予了统治的合法性。与犍陀罗其他地区相比，斯瓦特或许更为全面地卷入到具有双重功能的佛教传播，即一方面强调佛教的普世性，另一方面为信徒的社会认同与和谐共处提供了关键渠道。

因此，大量贵重美观的供养品具有功利性，与不见于印度传统世界的社会动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相关，这一动态涉及某一特定的，即长期在广大地域中维持了政治稳定并促成了经济兴旺的阶层和群体。而在这一具有相当规模的阶层和群体之外，佛教如何被接受的情况并不清晰[3]。佛教遗址中发现的考古资料，尤其是公元1世纪开始兴建的围绕着大窣堵波的众多小型建筑，以及佛教寺院的骤增，皆证明了佛教在斯瓦特地区的

〔1〕 Taddei, 1990.
〔2〕 De Marco, 1983.
〔3〕 卡列宁，本书，第50－54页。

兴盛（与西北印度相同），但在同时期的世俗遗址内却没有发现佛教迹象。就信仰层面而言，居址中出土的小型陶质女像和动物像，其所具有的寓意吉祥的特征折射出当地民众对生育和丰产的希冀，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在历史演进和宗教更替中传承不变。即使在佛教已扎根的城市中，世俗生活也没有任何佛教的印记。寺院之外，与佛教信仰相关的造像等遗物更是罕见。这种现象不能给以简单机械的解释。佛教中没有掌办与生死婚嫁等重大事件相关的仪式的群体，因而不难想象，民间信徒仍继续采用已沉淀在传统习俗中的婆罗门教的部分仪轨。甚至佛教最终也不得不采纳和吸收若干相关仪式，逐渐建立一套特有的程序，这在晚期密教中得到了大发展。佛教悖于原初理念而吸收了与之无关的仪式，其确切原因尚难界定，是对世俗需求的迎合，抑或是宗教体系内部的演变，关于此问题，或许可从犍陀罗石刻中窥探一二。例如，传统的火祭仪式被引入佛教图像中，信徒将火献给佛陀或菩萨或绕拜窣堵波，有时由僧侣主持[1]（见图34、37）。佛教在诞生后的最初数百年中也许留出较大的发展空间以使之与传统宗教习俗和平共处，或至少达成默许的妥协，而后逐渐全面影响日常生活。从初次渗透起，经过若干世纪，佛教才形成了自己的宗教体系，与传统习俗相当（甚或取而代之）。

斯瓦特巴里果德地区的比尔·科特·古万代古城从史前时期持续到印度教沙希时期，直至伊斯兰时期从未间断，是历时研究的极佳个案（图版31）。斯瓦特地区的历史充斥着佛教狂波巨澜冲击下遗留的痕迹，而比尔·科特·古万代古城直到公元2世纪中叶至3世纪的贵霜王朝兴盛期，城内才首次出现了一座小型佛堂[2]（见图13）。这种情况是罕见还是普遍尚无法判定，因迄今只有一个先例，即塔克西拉的西尔卡普宗教建筑（不一定是佛教建筑）也建在城内[3]。然而，若依大型佛教建筑一般建于远离城市的相对偏僻之处的规定，则不能排除将来在其他地方发现与比尔·科特·古万代遗址类似的遗址的可能性。这座建于城内的小型佛堂的意义重大，表明佛教的深度渗透造就了规定或至少习惯之外的特例。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城内建造小佛堂，仍属未知。如果说它是某一位社会要人的捐建，那么只有在普遍认同下才能得以建成，而且只有共同的宗教心理才能使之被接纳并成为城市体系的一部分。

以现存遗迹试图解释斯瓦特地区的佛教部派并不容易。佛教从来不追求统一的思想，而是多种很少因正统和异端之争而决裂的思维体系的有机结合。除数次大结集来讨论和衡量各自的立场，使某些部派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或失败外，多种部派各有其集中影响之地，基本上和平共处。就斯瓦特，或整个犍陀罗地区来说，从公元6世纪伟

---

〔1〕 Verardi, 1994.
〔2〕 Callieri, 1992, pp. 27–35.
〔3〕 Marshall, 1951, pp. 140–41; 201.

大的注释家真谛法师记载的传统得知，在华氏城大结集后，迁往北部地区的部分僧团属于阿育王不再支持的大众部，其与当时代表佛教保守思想的上座部相对。大众部被认为是大乘佛教的起源[1]，这一部派及其衍生出的其他部派，在西北印度的盛行体现在许多铭文中；同时这些铭文也记载了在当地具有相当规模的说一切有部及法藏部等分支[2]。

从图像学角度来看，斯瓦特地区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早期缺乏如斯里巴哈劳尔、塔克特依巴依、罗里央唐盖等犍陀罗其他遗址中多见的佛陀示现场景（一佛两胁侍、净土等）[3]。就某些玄奥题材而言，斯瓦特的艺术创作对神变主题保持着低调隐晦的姿态，文字叙述也含而不露。总而言之，由于目前佛教艺术中心尚未确定，资料的信息不够详细，因而在犍陀罗艺术内部进行严格比较研究的时机未到，而只有通过这种比较才能进一步探索更多问题，诸如甄别出佛教不同部派的影响。

最后还应重新考量佛教在斯瓦特地区的分布情况。佛教寺院主要集中于斯瓦特河东部支流地区，原因或是毗邻主要干道，更适于居住、集市、人员往来和货币流通，从而为大型建筑的建造和维持以及依靠民众施舍供养的僧侣团体的入驻提供有利条件。根据图齐的推测斯瓦特西部地区受辖于并不大力支持和推进佛教发展的统治者[4]，但是佛教也辐射至西部地区：马尔加奈遗址就是直接例证，其内发现的手工业制品显示出它是以布特卡拉及周边地区为中心的佛教教义和艺术荟萃之地的边缘分支[5]。

---

〔1〕 Demiéville, 1931–32.
〔2〕 Tucci, 1958, p. 281; Salomon, 2006.
〔3〕 Filigenzi, 1990a, p. 95; 1990b, pp. 11–12.
〔4〕 Tucci, 1958, p. 283.
〔5〕 Khan, 1995; Khan, 1996.

西北印度地区的印度—希腊人

卡列宁

公元前327至前326年间的马其顿大军远征是西北印度历史上的转折点，该地区自此被纳入源自地中海的政治行政体中。西北印度在亚历山大大帝撤离后的历史不甚明朗，约在公元前4世纪末，虽然希腊在喀布尔山谷尚留存驻军，但此地区又被重新划入印度的政治势力范围。

希腊文化对西北印度的强烈冲击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之后。公元前3世纪中叶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希腊人从塞琉西王朝独立出来，公元前200至前190年在国王德米特里的率领下，他们南下翻越兴都库什山征服了西北印度。以德米特里为首的印度—希腊诸王的复杂世系几乎不见于希腊化正史，虽然通过古币反映出的王朝之间的冲突（诸如米南德王与欧克拉提德王）可初步复原印度—希腊的政治史[1]，但其物质文化面貌仍然模糊。

上述问题除了本身具有的历史意义外，还有助于理解公元初西北印度主要艺术的发展，即属于犍陀罗艺术各流派的诞生，其中佛教题材不仅与印度中部的佛教雕刻有关，而且与希腊化艺术的关系尤其密切。在远离地中海的地区，为何会诞生一种与希腊化艺术在某些方面极为近似的艺术？长期以来，西北印度艺术中希腊化因素的性质和起源一直是“罗马学派”和“希腊学派”激烈争论的焦点，前者认为与罗马帝国的商业和文化往来是希腊化艺术形式借以传播的主要渠道；后者则把这些特征上溯到希腊先后对巴克特里亚、印度的统治。法国学者富歇于20世纪初撰写有关犍陀罗艺术的奠基性著作时，因印度和巴克特里亚尚未发现希腊化遗存，他不得不将其称作“巴克特里亚幻想”。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在巴克特里亚的塞琉西殖民地阿伊哈努姆发现了明显的希腊化遗物，证明了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中叶希腊—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程度要远甚于公元前190至前60年印度—希腊时期的印度。但百年之后却是在西北印度诞生了犍陀罗艺术。

---

〔1〕 Narain, 1957; Bopearachchi, 1991.

通过对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钱币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巴克特里亚与印度的明显差别。巴克特里亚希腊国王铸造的钱币与塞琉西钱币基本类似，采用的是阿提卡—塞琉西重量单位和希腊图像，且只用希腊铭文。印度前孔雀王朝和孔雀王朝时期已有打压制造钱币的传统，希腊人进入印度后，采纳当地传统，制造的钱币在重量单位和币面图像上皆与巴克特里亚迥异。因此，希腊人统治的印度地区出现了有印度钱币重量单位（约2.45克）的德拉克马银币，币面图像除希腊化传统图像外，还有瘤牛、大象等印度图像，正面铭文为希腊语而背面为俗语。钱币的形状也有变化：除圆形钱币外，还打制了仿孔雀王朝的方形钱币。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希腊王有意将印度元素引入钱币，表明当地传统力量足够强大，可与希腊化势力相抗衡。两个地区钱币的差异暗示出印度的希腊化程度远不如巴克特里亚。此外，从印度引入的希腊钱币的图像、铭文和工艺来看，希腊化在印度的本土化过程所采用的方式有别于巴克特里亚。

全面浏览印度—希腊时期的考古和艺术材料，发现资料的匮乏是目前开展系统研究的最大障碍。

长久以来，旁遮普邦西北地区的塔克西拉被视作关键的、可参照的古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希腊时期的城址位置迄今没有确定。马歇尔曾认为西尔卡普遗址始建于希腊时期[1]，但后来的考古发掘[2]和研究[3]将其年代推后了近一个世纪，并且西尔卡普城的棋盘状布局是否源于印度—希腊尚无定论。至于塔克西拉的手工业，除一处印度—希腊制币坊外，还在比尔丘遗址的印度—希腊地层（公元前2世纪），特别是西尔卡普的塞人和帕提亚地层（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中发现了许多明显具有希腊化风格的遗物，尤其是金属容器、青铜制品和饰品。将西尔卡普的塞人和帕提亚时期地层中出土的饰品与巴克特里亚城毁灭之前的阿伊哈努姆时期（公元前145年）的同类物品对比后，也许可将前者的年代推测为印度—希腊时期（公元前2世纪），因此这些饰品就比其所处的地层更古老。若考虑到其贵重价值，也不足为奇[4]。同样，西尔卡普的塞人和帕提亚时期地层中发现的本地其他贵重物品也可在阿伊哈努姆找到对应物，年代也可能比其所处地层更早[5]。塔克西拉和阿伊哈努姆之间关系的构建不只依赖贵重物品。塔克西拉珍迪尔佛寺遗址的石柱础和柱头的规制表明其制作于希腊化传统作坊，换言之，不是模仿外来样式的印度制造，而是名副其实的希腊化制造（图38）。目前所见的佛寺中阿提卡式柱础的排列布局有待商榷，原因在于发掘时的记录不足，且马歇尔

〔1〕 Marshall, 1951.
〔2〕 Ghosh, 1948.
〔3〕 Erdosy, 1990.
〔4〕 Callieri, 1995.
〔5〕 Rapin, 1992.

图38 塔克西拉附近的珍迪尔佛寺遗址

的考古报告编写出版于佛寺全面修复之后(塔克西拉存档的若干照片中显示刚发掘出的佛寺前的高台较现在的保存状况差),但如此规模的柱础和爱奥尼克式柱头从偏远之地运来的可能性较小,所用石材也应来自本地[1]。另外,珍迪尔佛寺并非西北印度唯一采用阿提卡式柱础的建筑。塔克西拉地区穆拉玛丽让佛寺遗址的一根石柱和两件柱础因收藏在拉合尔博物馆而为人熟知,不过,富歇曾提到过的斯瓦特地区查克德拉城塞中发掘后即遭破坏的一座带有爱奥尼克式柱头的佛寺遗址却鲜有人知[2]。

惠勒据航空照片发现的白沙瓦平原贾尔瑟达地区的谢汗代里遗址[3],是唯一一座布局呈规整棋盘状的城市,其内出土遗物证明曾有印度—希腊人在此居住[4]。因此,该遗址在印度城市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城内印度—希腊时期遗存的数量不多,保存状况也不佳。此遗址及毗邻的巴拉希撒遗址中发现的一些希腊化风格的制品和图像,可以说明城内原住有希腊或希腊化工匠,并解释了古城晚期的手工制品,尤其是陶器中普遍存在的希腊化特征。

---

〔1〕 Dar, 1998, p. 71.
〔2〕 Foucher, 1889.
〔3〕 Wheeler, 1962.
〔4〕 Dani, 1965-66.

图39 刻有希腊字母的陶片

希腊人活跃于西北印度的观点并非假设。目前已发现的若干希腊人名是采用佉卢文字体拼写的犍陀罗俗语。斯瓦特西南巴焦尔地区出土的一件佛舍利盒上刻写的米南德，即公元前155年左右执政的米南德王，以其名命名的哲学对话录《弥兰陀王问经》记载了他对佛教的赞赏。此件舍利盒上后来增刻了Theudora，即地区行政长官提奥多罗斯（民事长官，为希腊化官衔）。此外，出土于阿富汗的一件银器上的俗语铭文中也见有Theudora，铭文中记载他的儿子取有印度式名字[1]。巴焦尔出土的一枚公元1世纪的印章上出现了另外一个名字Theudama，是希腊语提欧达马斯的俗语写法。此外，巴黎纪念章陈列馆收藏的一枚希腊印章上还刻有希腊语狄奥多德（所有格形式）。此枚印章来自白沙瓦，可能出土于西北印度或阿富汗[2]。

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地区首次发现了刻在陶片上的希腊语简短铭文。乌德格兰遗址的陶片上刻的希腊字母或为某一人名的前一部分Nous（图39），比尔·科特·古万代遗址的一块陶片上有四个字母，另一块上只有一个字母，这些是希腊语波及的亚洲最东之地。

乌德格兰和比尔·科特·古万代遗址（见图版12）发现希腊语铭文并非偶然，这两处遗址已先后被斯坦因[3]和图齐[4]考证为奥拉古城和巴齐拉古城，即希腊文献中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攻克的众多城市之中的两座。

阿利安笔下的巴齐拉是一座坚不可摧的要塞，与比尔·科特·古万代遗址的地形吻合。意大利考古队从1984年起对该遗址的发掘[5]揭示了此城在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它占地约十万平方米，东、北以山为屏障，西、南以城墙作防御。此城的希腊化源头体现于城墙这一目前已揭露的建筑结构上。城墙的方位、平面形态和建造特征，都属于东方希腊化建筑，年代可追溯到印度—希腊时期（公元前2世纪）。

〔1〕 Falk, 2001.
〔2〕 Fussman, 1972，自第25页起。
〔3〕 Stein, 1930.
〔4〕 Tucci, 1958.
〔5〕 Callieri, 1992.

图40 比尔·科特·古万代印度—希腊时期城墙西南角的五边形角楼

城墙墙体厚2.7米，外面整齐地包砌大石板和卵石，用泥浆胶结，内堆填泥土碎石。城墙上的长方形实心马面间隔约29米，目前确认和部分清理了南墙上的三座和西墙上的一座马面，以及城墙西南角的五边形角楼（图40）。距南墙约5米处，有一与墙体平行延伸的陡峭斜坡，打破了城外地层，或为城壕的北岸，而南岸应在发掘的探沟外。城墙分段加筑，相邻马面之间的墙体也并非一次筑成。续建和修葺的痕迹很多，一方面与防御工事的维修有关，另一方面缘于城内建筑的扩展，逐渐侵占了城墙用地将之用作城内建筑的地基。

迄今，尚未发现卫城城墙的遗迹。但有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痕迹，推测其或许曾是一堵宽厚的墙体，后被拆除以便在山顶上修建其他建筑。根据初步分析，卫城中发现的一批陶器组合与其下城墙内出土的印度—希腊时期的陶器组合一致。

比尔·科特·古万代带长方形马面的城墙和壕沟的防御体系，也见于印度和希腊化的东方地区。这种防御体系在希腊化东方地区相当常见且有许多研究，而在印度多记载于建筑技术类书籍[1]，尚没有发现考古遗存[2]。因此，比尔·科特·古万代防御工

〔1〕 *Arthaśāstra*, II, 3, 7, 10; *Māyamatā*, X, 13-16, 44-46.
〔2〕 Deloche, 1992.

事的类型、平面和建造特征可在希腊化东方地区找到对比的实例[1]。比尔·科特·古万代的防御工事和同时代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稍有不同，可解释为边远地区的保守性，也可理解成对本地环境的适应，如砌墙用石头而非土坯。值得注意的是，塔克西拉西尔卡普的防御体系也是由长方形马面和五边形角楼构成的。惠勒和戈什的调查证实，西尔卡普的防御工事较比尔·科特·古万代约晚一个世纪[2]，前者的墙脚增加一道凸出矮墙以连接相邻的马面从而使接近墙体更为困难，似乎是对原型的完善。

比尔·科特·古万代古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连接斯瓦特和布奈尔地区以及犍陀罗平原各条通道的交汇点，而且拥有天然的屏障，与希腊化地区的其他许多遗址相似。另外，因对印度防御工事所知有限，尚无法将基于严格模数设计的马面间隔距离作为判断其为希腊化城市的决定因素。

在与比尔·科特·古万代城墙相关的地层中发现了印度—希腊钱币和陶片，将它们与希腊—巴克特里亚时期的相关资料对比，可初步将城墙的建造年代定为公元前2世纪。地层中的四枚钱币中有三枚分别属于印度—希腊王米南德一世、索伊罗一世及欧克拉提德斯王（仿制币），年代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前1世纪中叶。还有一枚是多次打压制作的印度钱币，时代约为公元前3至前2世纪。采自南墙上一个马面第一次重修地层中的样本的碳十四测年（校正）结果为公元前150 ± 60年，也证实了由钱币推测的城墙年代。就陶器而言，修建城墙的同时，当地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希腊化之前制作传统的新工艺。希腊化之前的典型陶器是灰陶和黑陶，而此时则出现了红陶，并最终取代了灰、黑陶。红陶通常表面施釉，陶胎配料因器物造型和规格不同而有差别。陶器中既有与恒河流域典型器型相似的敛口鼓腹、平底内凹的钵，葫芦形瓶等，也出现了新器类，包括三角折沿盘、侈口直壁盘、三角折沿喇叭口小碗、折沿各异的带颈罐等。这些新器型可在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城市中找到逐一对应的陶器，表明了与之前设想不同的事实，即印度—希腊时期希腊化元素已经开始见于斯瓦特地区。陶塑像对编年史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发现的大多数陶塑像身上，尤其是头部堆饰繁复而显得冗余，被惠勒定义为“巴洛克女士”[3]（图41）。另一种当地传统的陶塑女像被形容为“提琴形”，身体扁平，臀部圆润，腰身纤细，上身宽大。“提琴形”陶塑女像在斯瓦特地区历史悠久，可上溯到公元前二千年中叶[4]。

此外，还有两类制品：化妆盘和印章可被归入印度—希腊时期。

---

〔1〕 Leriche, 1986, pp. 88–98.
〔2〕 Ghosh, 1948, p. 45; p. 84.
〔3〕 Wheeler, 1962, p. 104.
〔4〕 Wheeler, 1962, p.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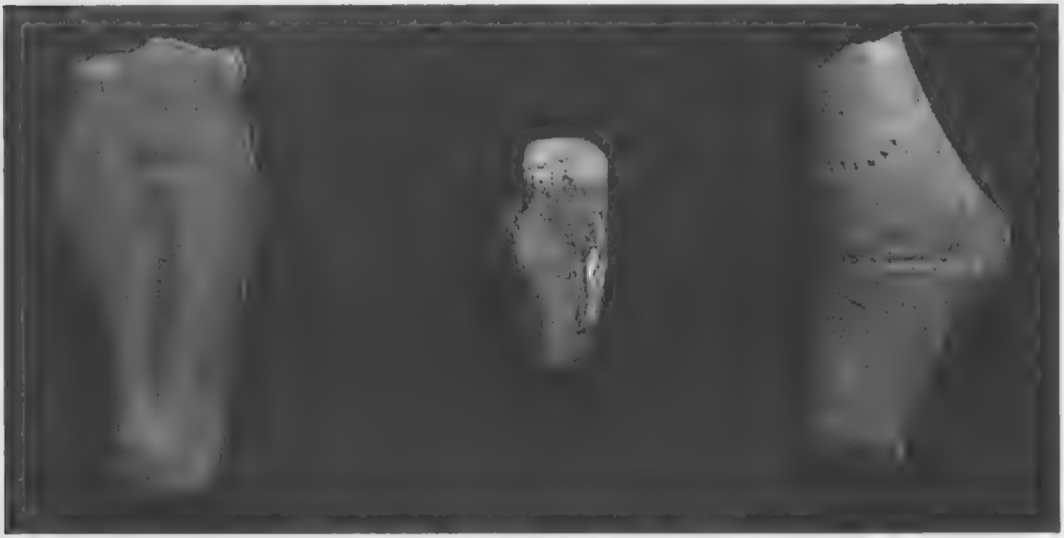


图41 比尔·科特·古万代印度—希腊时期地层出土的“巴洛克女士”陶塑像残段

目前功能并不十分确定的化妆盘[1]，由不同种质地较软的石材制成，被认为是希腊化渗透到西北印度的产品[2]。此类物品的最早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中叶，恰好属于印度—希腊时期，所以成为当时手工制品中一类极其重要的构成。法兰克福指出，年代最早的化妆盘中既有一组纯粹希腊化风格的制品，他称之为“希腊组”；还有一组混有印度图像和风格特点的制品，他称之为“印度—希腊组”。这表明希腊人进驻初期，在希腊化的主流中，制作化妆盘的工匠也没有完全排斥印度本地传统。

在印章方面[3]，能够追溯到印度—希腊时期的一些罕见例证，或是基于图像的比较，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枚与印度—希腊钱币极为类似的印章；或是根据古文字研究，如三枚同时代的印章，一枚是希腊化风格、一枚是毫无希腊化影响的本地风格、第三枚是“希腊—波斯”风格[4]。其中希腊化风格的印章上，刻有带脚镯的裸体阿芙洛狄忒，法国学者福斯曼认为脚镯是印度的典型首饰[5]，并指出此枚印章出自接受过希腊训练的本地工匠之手，因为只有他们才会制作出此类风格的物品。

因此，印度—希腊时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幅双重画面。一方面，在纯粹本地的、不受西方影响的制品之外，还存在完全希腊化风格的，与印度传统毫无关联的制品，后者或为舶来品，或由迁来的西方工匠在当地制作。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融合印度、希腊

〔1〕 洛·穆兹奥，本书，第74—83页。
〔2〕 Francfort, 1979, pp. 91–94.
〔3〕 Callieri, 1997.
〔4〕 Fussman, 1972, pp. 24–27.
〔5〕 Fussman, 1972, p. 25.

化因素的制品，如印度—希腊钱币、化妆盘、比尔·科特·古万代的陶器，甚至是古城的防御体系，虽是基于东方希腊化原型，但受到了本地工匠的影响和建筑材料的制约。

前文述及的钱币对于了解希腊人对印度臣民的态度极为重要。这种尊重的态度也流露在印度文献的记载中和皈依印度宗教的希腊人身上。根据福斯曼的观点，希腊文化被印度接受的原因在于，希腊人进入印度后敬重且推崇伟大的印度文化[1]。这种钦佩只是出于印度哲人折服了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因为在印度的希腊人因人少势弱而选择了谨慎从事，不得而知。面对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国，希腊人认识到需尽可能接纳当地传统，同时也引入希腊化制品，通过迁入的希腊工匠带来当地不曾闻知的工艺，如雕刻宝石、石质容器等。此外，还有一个至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历史缘故。东巴克特里亚约在公元前145年被西迁的月氏人征服，西巴克特里亚在十年之后也被征服。无论是内战还是月氏人入侵，阿伊哈努姆最终都被希腊人抛弃了[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可以想见古城中的工匠并没有坐等入侵者的到来，而是追随希腊人，先撤离到巴克特里亚西部，而后可能逃至希腊人在约半个世纪前已占领的西北印度。月氏人侵占巴克特里亚后，钱币制作技术水准骤降。希腊在西北印度的影响最初只局限于若干贵重物品，并未波及重要且普遍的陶塑像。不过，希腊化风格逐渐赢得了西北印度上层群体的赏识，并且到了公元前1世纪的塞人统治时期成为主流；之后在帕提亚统治时期发展出一种深受希腊化影响的艺术。印度—希腊时期见证了希腊化影响直接渗入西北印度，对于这一重要现象的重新认识有助于理解犍陀罗艺术的诞生。犍陀罗艺术在塞人和帕提亚人时期发展至高峰，意味着希腊的长期影响得到了彻底认可。就这个角度而言，比尔·科特·古万代的发掘意义重大，如同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印度—希腊人也不再是“幻想”。

〔1〕 Fussman, 1991-92.
〔2〕 Leriche, 1986, pp. 83-84.

塞人、帕提亚时期：阿不拉遮和乌迪王朝及其对佛教的支持

卡列宁

从中亚南下并建立政权的第一波古伊朗游牧民族是斯基泰人的一支，即印度人称呼的塞人，他们的到来预示了印度—希腊统治的危机。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塞人是突然侵入，还是逐渐渗透后掌权，但根据塔克西拉制币坊发行的毛埃斯王（希腊语Maues、俗语Moa，约公元前90—前80年在位）铭文钱币可知塞人势力的增强[1]。不过被塞人驱赶的希腊人只是被迫向东、西撤离，数年后，他们又重新主宰了西北印度。

毛埃斯王统领的首批南下塞人可能翻越了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从北方入侵，而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末的第二波塞人从西南方，即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带的锡斯坦地区进入犍陀罗平原。此次入侵由国王阿瑟斯一世指挥（希腊语Azez、俗语Aya），为庆祝新政权的创立，他启用了不同于犍陀罗地区传统纪年的新年号，即毗讫罗摩纪年，具体年代包括公元前58和前57年[2]。此次希腊人被彻底击溃，他们完全放弃了旁遮普邦西部地区，撤离到该邦的东部地区并延续统治至公元10年左右。

塞人的政治史并不清晰，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名为阿瑟斯的国王有两位[3]，因此塞人的统治前后共历阿瑟斯一世、阿最利西斯和阿瑟斯二世三代。属于阿瑟斯二世晚期的掺红铜银币暗示出当时存在的货币危机，标志着塞人王朝的彻底没落，并最终在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后段被同样来自锡斯坦地区的帕提亚人（即印度—帕提亚人）推翻。此外，这类钱币还可作为梳理当时复杂货币体系的关键参照。根据一些题记和贡多法勒斯（人名或年号）铭文钱币可知印度—帕提亚政权持续至公元1世纪下半叶初，之后被贵霜人驱逐。

塞人和帕提亚人继续使用希腊人的制币坊，许多币面图像沿袭了希腊传统。但毛埃斯王引进犍陀罗的君主骑马像取代了希腊的国王半身像，折射出塞人浓厚的游牧

---

〔1〕 Widemann, 2000, p. 229.
〔2〕 Salomon, 1982, p. 68.
〔3〕 Jenkins, 1955.

特色。钱币背面出现了新的神像或被赋予新标识的希腊神像，反映出塞人王朝的伊朗源头[1]。

塔克西拉的西尔卡普、贾尔瑟达、比尔·科特·古万代等地出土的遗物表明，此时期希腊化风尚深受当地民众喜爱。印度—希腊时期，希腊化风尚只限于少数几类奢侈品，而此时已有足够的力量影响风格守旧、地方特征浓厚的宗教陶塑像（图42、43）。当地出现了单模或合模制作、遍布于整个希腊化地区的陶塑女像。而且希腊化风格的工艺品制作，如饰物、器皿、银铜制品等，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图42 比尔·科特·古万代塞人时期地层出土的希腊化风格陶塑女像头部

图43 比尔·科特·古万代塞人和帕提亚时期地层出土的单模制作的陶塑女像

〔1〕 朱莉阿诺，本书，第57—73页；Sinisi, 2003.

根据题记和钱币等出土物推测，塞人王朝的政治统治为非集权式。犍陀罗的部分地区发现了地方总督或藩国发行的钱币，其上的刻铭表明他们臣服于塞王。这些藩国中，统治今斯瓦特西南的巴焦尔地区的阿不拉遮对斯瓦特的影响最大。

由目前所知的十五则题记（其中一则来自巴焦尔与阿富汗接壤的地区，其他或许出自同一地区）可大致勾勒出公元前1世纪中叶至公元20年间阿不拉遮的国王世系。人名学的分析显示出他们深厚的印度背景，但也有非印度式名字的国王，尤其是开国君主伊希马霍，可能源自伊朗或本地：或是与塞人中的伊朗人有关的本地国王，或是进入此地后取用梵文名字的塞人国王。目前已知六位国王，及四位王后的名字，其中最早见于题刻的是胜友王。巴焦尔信科特曾出土一件舍利盒，其上的印度—希腊国王米南德刻铭之后增加的三则题记中都见有胜友王的名字。若其中一则可上溯到米南德时代与胜友王同名的祖先[1]，那么其他两则应为公元前58至前57年阿瑟斯一世任命的阿不拉遮王[2]。胜友王之后或由其子因陀罗婆苏继位，后者的统治可由若干铭文以及部分曾被释读为因陀罗跋摩[3]的古币[4]证实。据这些线索，因陀罗婆苏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世纪末，之后由其子因陀罗婆苏或毗沙跋摩继位，并于公元6年受封阿不拉遮王。毗湿奴跋摩的继承者是其子因陀罗跋摩，然而目前尚未发现因陀罗跋摩被封为王的直接证据，因此原来被认为是因陀罗跋摩发行的钱币现被考证为属于其祖父因陀罗婆苏。不过，根据因陀罗跋摩的儿子阿湿婆跋摩先后以阿瑟斯二世和印度—帕提亚贡多法勒斯大将军身份发行的钱币可推知因陀罗跋摩也曾被封为阿不拉遮王。阿不拉遮王族以后的踪影可能还出现在臣服于贡多法勒斯王的萨萨王钱币上。萨萨王自称是Aspa的后裔，Aspa或许是Aśpavarman，即阿湿婆跋摩。因陀罗跋摩之后唯一一条明确记载阿不拉遮王的铭文刻在一件公元20年的舍利盒上，铭文中须扶提喀之子帕噶莫亚提到了王朝的创建者胜友王，帕噶莫亚或听命于阿不拉遮王朝，或篡夺了最后一位国王毗湿奴跋摩或因陀罗跋摩的王位[5]。

钱币铭文与题刻并不完全相符。阿湿婆跋摩的钱币是合金币，而非纯银币，这引发了前文提到的阿瑟斯二世在位末期的货币危机：如果合金币在阿瑟斯二世以后才流通，那么阿湿婆跋摩的钱币可能与贵霜人首次入侵当地有关，其年代约为公元1世纪中叶[6]。

因此，阿不拉遮王国的统治时代从公元前1世纪中叶延续至公元1世纪中叶，其间

〔1〕 Fussman, 1993, p. 104.
〔2〕 Salomon, 1996, p. 447.
〔3〕 Whitehead, 1944.
〔4〕 Senior, 1994.
〔5〕 Salomon, 1996, p. 449.
〔6〕 MacDowall, 1991, p. 248.

历代国王都大力支持佛教发展。如因陀罗跋摩供养的银舍利盒及其王后郁多罗供奉的金瓶[1]，可与同时代其他地区更具影响力的国王供奉的珍品相媲美，也显示出阿不拉遮王国相当雄厚的财富和国力。郁多罗供奉的金瓶放置在片岩制成的舍利盒内，盒上的题记称她曾在塔玛洛斯帕（或塔玛），或在阿不拉遮的首都出资捐建了一座窣堵波。而在此之前，阿育王已经在塔玛洛斯帕修建过一座达摩拉吉卡窣堵波[2]。这些材料揭示了塞人王朝及其附属国王对西北印度佛教兴旺繁荣所起到的，或可称为决定性的作用。宏伟壮观的佛教建筑，独特的雕刻叙事艺术的诞生，以及新发现的佛教俗语文献都是这种繁荣的见证。如果说佛教的活力主要归因于商人阶层（他们将打破正统婆罗门教森严种姓制度的佛教视为同盟）的鼎力支持，那么，王权政治的认可和襄助则使佛教在社会中占据着愈益重要的地位。早期佛教文献中称赞孔雀王朝和印度—希腊人对佛教的全面支持，至今尚未发现任何物证。然而，却有相当数量的题记证明塞人及其附属国对佛教寺院的修建和僧侣团体的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阿不拉遮国王题记的内容和形式与乌迪国王的题记有明显的相关性。乌迪的年代较阿不拉遮略晚，也位于斯瓦特河谷的巴焦尔地区。乌迪或为今乌德格兰，这一地名与斯瓦特的古称乌仗那有关[3]。目前所知的与首位乌迪王阿质达霰有关的铭文内容是对诸佛及弟子们的赞颂，和阿不拉遮的郁多罗王后及帕噶莫亚王供奉的舍利盒上的铭文格式近似[4]。阿质达霰的铭文初步推定在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之间[5]，与阿不拉遮王朝的后半段同期。这两个王国彼此相邻，似共享同种文化。阿质达霰之子斯那跋摩留下的一条铭文[6]，提到了同时代的贵霜王丘就却的儿子，他们生活的准确年代虽不确定，但推测在公元1世纪中叶左右应无大误。

大英博物馆曾收藏一组陶罐，其内保存有极其重要的佛教写本[7]，陶罐上的献辞铭文中出现了同见于斯那跋摩铭文中的“anakaa”，源自希腊语anankaios，意为“国王的臣民”，表明了这批写本与乌迪王宫之间的关联。它们是最早用佉卢文书写的犍陀罗佛教俗语文献，其重大价值还在于为犍陀罗佛教俗语文献的研究提供了从叙事到哲理等内容不同的完整文本，而之前仅有刻记在窣堵波中的舍利盒上的只言片语。结合语言学、古文字、历史学和考古学推测，写本的年代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前段，恰好与斯瓦特地区佛教建筑、雕刻的勃兴期一致。写本中出现了多名塞人统治时期的要人，包括文献

〔1〕 Salomon, 1988, p. 169.
〔2〕 据一尊佛像底座上的铭文可知，参见Bailey, 1982, p. 149.
〔3〕 Salomon, 1986, p. 290; Fussman, 1986, pp. 9–10.
〔4〕 Salomon, 1995, p. 29.
〔5〕 Fussman, 1986, p. 10.
〔6〕 Salomon, 1986.
〔7〕 Salomon, 1999.

中提及的阿湿婆跋摩大将军,因陀罗跋摩的儿子吉霍尼迦总督。若这批写本确如邵瑞祺推测的来自犍陀罗以西、阿富汗东部的哈达地区,那么犍陀罗、巴焦尔及斯瓦特等更北地区的塞人显然拥有在王国偏远地区建立佛教寺院的雄厚实力。无论写本编纂于何处,皆可证实塞人在西北印度佛教寺院和文化发展中起到的巨大推动力,以及阿不拉遮和乌迪王朝对佛教的慷慨资助。

由于先前西北印度佛教初传的资料不充分,学界曾将犍陀罗地区佛教艺术的兴盛归功于贵霜统治时期。贵霜王朝对佛教的发展确实功不可没,但近年来愈来愈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已经逐步揭示出塞人及其附属国才是佛教文学、雕刻和建筑等领域出现萌芽的推助者。

从考古实物看文化影响

西北印度地区希腊至前贵霜时代的钱币

朱莉阿诺

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西王朝境内尤其是东部边境，政治局势风起云涌，变化莫测。先是帕提亚总督安德拉戈拉斯从塞琉西王朝独立出来，发行刻有自己名号的钱币。随后不久，原居里海东边的伊朗帕尼人部落侵占了安德拉戈拉斯的领地。可能亦是在此时，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德趁相对远离塞琉西统治中心之机，建立了独立于塞琉西的王国，并加冕称王。边境地区的政权纷纷独立，一方面是历史走向所致，另一方面在于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充分意识到其未来的发展不再以地中海世界为中心。从历史文献和发现的古币可知，狄奥多德的独立并非突发事件，而是经历了长期的预谋准备[1]，由发行的不同系列的钱币可知[2]：第一系列，正面是狄奥多德的国王安提欧库二世头像，背面是塞琉西式阿波罗像；第二系列，狄奥多德已不再遵从国王统治，正面虽名安提欧库二世，却是狄奥多德的头像，背面以雷神宙斯像取代阿波罗像，雷神宙斯或为狄奥多德的保护神，可能代表了边境地区希腊人的政治态度；第三系列，其他特征与第二系列钱币相同，只是正面铭文为狄奥多德国王（ΒΑΣΙΛΕΩΣΔΙΟΔΟΤΟΥ），表明狄奥多德与塞琉西王朝的彻底决裂。

上述钱币是统治巴克特里亚和西北印度的希腊国王发行的众多钱币中的首批。在阿伊哈努姆及相关遗址的发现证实希腊—巴克特里亚艺术并非“幻想”之前，这些钱币几乎可被视为希腊人在公元前3世纪至前1世纪活动于远离地中海地区的唯一佐证。近几十年的发掘深化了对公元前数个世纪巴克特里亚和西北印度文化艺术的认识。不过，这些钱币迄今仍是重建这两个地区希腊王国历史，复原其统治疆域的有力证据，也提供了可补充其他遗物所不具备的国王相貌、服饰、标志等信息。它们对宗教图像的研究尤为重要，通过分析其上的希腊神像，建立起不同神像的图像样式演变序列，可知这些神像逐渐适应了当地宗教氛围，有时甚至与当地神像融合起来。

---

〔1〕 Justin, XLI, 4; Pompeius Trogus, XLI.
〔2〕 Bopearachchi, 1991, pls. 1－2; pp. 1－16.

希腊“远东”地区发行的银币通常为希腊化样式，即正面有君主头像或半身像，背面是神像。而铜币的正背面图像都是神像，有时背面神像也由与之相关的标志或动物像代替，如用三足祭坛代表阿波罗，用猫头鹰象征雅典娜。

制币坊最初制作的钱币甚为精细，在国王头像中表现出其逐渐衰老的面部特征。这些钱币以阿提卡钱币重量为标准，金、银币的基本重量单位分别为金标币（8.48克）和德拉克马银币（4.24克），背面神像旁附希腊语铭文。这些钱币通常被称为希腊—巴克特里亚钱，专门流通于塞琉西王朝曾经统辖的巴克特里亚、马吉安那和索格地亚那总督区。公元前2世纪前半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向南跨越与印度文化的边界兴都库什山，其控制的领地从而被分为两部分，即北部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地区和南部的印度—希腊地区，为适应南部地区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制作发行新钱成为紧要之事。北部地区阿提卡重量的德拉克马银币，白银含量高，无法与南部地区原来流通的钱币混用：后者使用的是孔雀王朝的卡尔沙巴纳钱，重3.33至3.74克，白银含量为80%。通过若干次尝试，印度—希腊双语德拉克马币终于制成，重2.42克，白银含量较高，顺利取代了卡尔沙巴纳钱。印度—希腊双语钱币流通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坎大哈至旁遮普邦萨特莱杰河的广大地区，多为圆形，部分呈方形与印度钱币相似。钱币正面为希腊语铭文，背面为西北印度官方用语即西北俗语。背面的西北俗语是对正面希腊语的逐字对译，采用的是佉卢文字体。佉卢文起源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晚期的阿拉米语，常见于帝国东部地区碑刻题记。还有极少量钱币上使用了阿育王敕令刻文的印度北部婆罗谜文字。

采用阿提卡钱币重量的希腊—巴克特里亚钱与融合了印度钱币重量单位的印度—希腊钱的差别，缘于统治两个地区的希腊人秉持的经济、文化态度不同：统治巴克特里亚、活动于中亚地区的希腊人与祖国的传统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控制西北印度的希腊人更倾向于与印度的融合。不过这只是概而论之，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某些国王如德米特里一世（约公元前200—前190年在位）和德米特里二世（约公元前175—前170年在位）同时统辖着两个地区，但只发行了希腊—巴克特里亚钱；相反，部分在巴克特里亚没有领地的印度—希腊王国却制造了印度—希腊双语钱和希腊—巴克特里亚钱。印度—希腊钱币经过一系列改造，被公元1世纪逐步取代希腊人统治西北印度的塞人沿用。他们继承了双语体系，钱币正面用国王全身像、坐像或骑马像代替头像，背面神像一方面直接使用希腊古典神像，另一方面引入希腊古典中融合伊朗、印度元素的新神像。公元1世纪前半叶，继塞人之后统治西北地区的印度—帕提亚人，也延续了印度—希腊钱币的传统，并进行了调整，正面重新采用国王头像，背面常用胜利女神尼姬像。

一、希腊—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塞人和印度—帕提亚人的钱币及其王朝历史

巴克特里亚的独立是塞琉西王朝的巨大损失。据波利比乌斯记述[1]，公元前208年塞琉西国王安提欧库三世（公元前223—前187年）被帕提亚打败后转迁至巴克特里亚，将杀害狄奥多德家族后裔并篡夺其王位的欧西德莫斯一世（公元前230—前200年在位）包围封堵在巴克特拉城内，欧西德莫斯一世却以巴克特里亚国作为希腊化世界防御游牧民族入侵的战略性要地为由成功地说服了安提欧库三世。取代狄奥多德家族的欧西德莫斯在发行的钱币上不再使用雷神宙斯像，代之以成年的赫拉克勒斯神，其形象为倚靠在狮皮覆盖的石头上，右手扶木棍作休息状（图44）。有学者认为这一图像来源于欧西德莫斯家族原居地梅安德河谷城流通的钱币[2]，也有学者将之视为欧西德莫斯获取的无可比拟的功绩，以及他与安提欧库三世达成协议的象征[3]。

图44 欧西德莫斯一世（约公元前230—前200年在位）四德拉克马银币

波利比乌斯提到，欧西德莫斯之子德米特里一世（约公元前200—前190年在位）以其父亲的名义与安提欧库三世签订了和平条约，他发行的钱币上使用年轻的赫拉克勒斯神像，呈现手举王冠准备佩戴的站立状而非倚石休息（图45），这一形象不难使人联想到德米特里一世积极进取的政治策略和扩张领土的野心，他也正是首位跨越印度政治文化边界兴都库什山的巴克特里亚希腊国王。德米特里一世发行的钱币上还出现了其戴象头的头像，象征对印度的征服，可能效仿了埃及托勒密一世发行的以亚历山大

〔1〕 Polibius, XI, 39, 2.
〔2〕 Bopearachchi, 1991, p. 47.
〔3〕 Tarn, 1951, p. 93; Allouche-Le Page, 1956, p. 95.

图45　德米特里一世（约公元前200—前190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

四世为名的钱币。德米特里虽然统治着兴都库什山的南北两侧，但没有发行希腊—俗语双语钱币，或许因为南侧的领土仅限于阿拉霍西亚和帕洛帕弥撒达较小的区域。这两个地区从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王开始就被印度统辖，但并不排斥希腊人在此地区，尤其是在阿拉霍西亚的亚历山德里亚城和高加索的亚历山德里亚城发展势力，所以两地一直保留着浓厚的希腊化遗风[1]。还需提及的是，阿育王曾要求其敕令在坎大哈地区被翻译成希腊文。德米特里因重新征服了一个世纪前旃陀罗笈多王占领的塞琉西一世的部分领土而被称为“印度之王”，币面头像为戴象头式[2]，但因这些地区希腊化程度较深，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制造双语钱币。

根据钱币上阿加托克利斯（约公元前190—前180年在位）和潘达雷昂（约公元前190—前185年在位）相似的头像，以及相近的制币技术与币面图像，有学者认为他们是兄弟[3]。这两位国王将希腊人的统辖之地拓展至兴都库什山南侧、印度河盆地直至占拉姆地区。他们发行的流通于这些地区的钱币，首次使用了希腊语—婆罗谜字母俗语双语，呈方形，仿印度钱。尤为重要的是币面图像具有浓郁的印度文化色彩，如六枚出土于阿伊哈努姆的阿加托克利斯银币，正、背面的人像除了标志有别外几乎完全相同，其一被认为是大力罗摩，旁有犁和杵，另一为黑天—婆苏提婆，旁有轮和螺[4]。阿加托克利斯和潘达雷昂发行的其他双语铜币上常见有右手持花向左行进的女性像，有学者通过分析阿伊哈努姆钱币上的图像将之考证为黑天的妹妹须跋陀罗[5]。

〔1〕Bernard, 1985, pp. 85–95.
〔2〕Justin, XLI, 6.4.
〔3〕Tarn, 1951, pp. 156–60; Narain, 1957, pp. 58–59.
〔4〕Filliozat, 1973, pp. 113–23.
〔5〕Errington and Cribb, 1992, p. 62.

阿波罗多托斯一世（约公元前180—前160年在位）通过数次尝试最终完善了兴都库什山南部地区的双语钱币[1]。他首次发行了印度—希腊重量单位（2.42克）的德拉克马，背面铭文用佉卢文字体。银币币面图像为已见于当地钱币上的大象和瘤牛等印度图像（图46），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阿加托克利斯和潘达雷昂开创的借鉴印度文化的传统。铜币上则使用希腊古典阿波罗神像和三足祭坛。阿加托克利斯和潘达雷昂之后的国王，不再发行双面皆为纯粹印度图像的银币，虽然沿用阿波罗多托斯一世创制的印度—希腊钱币，但在币面图像体系中加入希腊古典神像，如安提玛科斯二世引入胜利女神尼姬像（图47），米南德王使用雅典娜·阿尔西德莫斯像（图48、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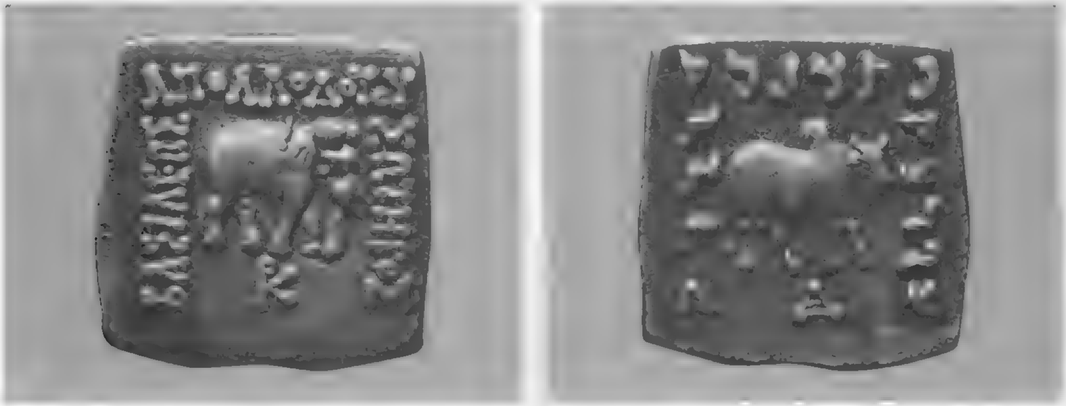


图46 阿波罗多托斯一世（约公元前180—前160年在位）德拉克马方形银币

图47 安提玛科斯二世（约公元前160—前155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

〔1〕 Bopearachchi, 1991, p. 62.

图48 米南德（公元前155—前130年在位）四德拉克马银币

图49 米南德（公元前155—前130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

统治兴都库什山南北两侧的最后一位希腊国王是欧克拉提德（约公元前170—前145年在位），目前已发现与他相关的大量钱币，证明他的执政时间较长。欧克拉提德发行的钱币中包括金币，其中一枚重达20金标币（约170克），现藏于巴黎纪念章陈列馆，堪称古代最重的钱币[1]。欧克拉提德也是此地区为数不多的见于西方文献记载的国王之一，他与帕提亚的米特拉达梯一世（约公元前171—前138年在位）处于同一时代[2]。从同一文献中还可得知欧克拉提德将巴克特里亚国王德米特里二世驱逐出境从而篡取了王权，并征服了印度（即西北印度）。根据欧克拉提德及同时代的印度—希腊国王发行钱币上的标记，他向兴都库什山南侧的扩张很可能侵占了佛教文献中记载的

---

〔1〕 Bopearachchi, 1991.
〔2〕 Justin, XLI, 6.

伟大的印度—希腊王米南德（约公元前155—前130年在位）的领土。欧克拉提德篡取巴克特里亚王权初期发行的钱币上只用希腊语：ΒΑΣΙΛΕΩΣΕΥΚΡΑΤΙΔΟΥ（意为“属于欧克拉德王，大王”），刻于骑马的狄俄斯库里像上方。这组最早的钱币中有部分币面图像沿用了古希腊奥波小银币上的尖帽与棕榈枝图像。欧克拉提德在统治后期发行了单语、双语钱币（图50、51），并增加了称谓ΜΕΓΑΛΟΥ\ΜΕΑΣΓ（意为“米南德”）。这些钱币上的标记与米南德制币坊打制的首批钱币上的标记相似，或许暗示出欧克拉提德掌控了西北印度曾属于印度—希腊王米南德的大片领地[1]。

欧克拉提德被其子弑杀的年代，可根据阿伊哈努姆王宫宝库中发现的一件瓶上与经济相关的题刻推测[2]。其中提到某位国王的第24年，部分学者主张“某位国王”

图50 欧克拉提德一世（公元前170—前145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

图51 欧克拉提德一世（公元前170—前145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

[1] Bopearachchi, 1991, pp. 67–69.
[2] Justin, XLI, 6.

即指欧克拉提德[1]。若此，欧克拉提德可能死于统治的第24年或稍后，也就是公元前145年[2]。而恰在这一年，阿伊哈努姆城中部分建筑因遭到可能是游牧民族入侵者的破坏，而被希腊人废弃。这是首次中亚民族大规模入侵巴克特里亚，多见于西方文献[3]，《史记》和《汉书》中亦有记载。此次事件的爆发与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迁移有关。

欧克拉提德去世、阿伊哈努姆被弃后，欧克拉提德二世（约公元前145—前140年在位）和赫利奥克勒斯一世（约公元前145—前130年在位）将统治中心迁到阿姆河中游河谷和巴克特里亚南部地区。据中国史书记载，公元前129年张骞的队伍抵达时此地已被月氏人征服，而兴都库什山南侧领地则在赫利奥克勒斯一世统治期间被米南德夺取。赫利奥克勒斯一世的去世标志着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统治的终结[4]（图52、53）。

米南德（约公元前155—前130年在位）可谓统治西北印度最为重要的希腊国王之一。许多纪年题记中提到某一始于公元前155年的年号，部分学者将之推测为米南德王开始执政的年号[5]，另有一些学者主张此时仍属欧克拉提德王朝[6]。

米南德王的声名颇为显赫，他的名字不仅出现于希腊古典文献中，而且是诸多希腊国王中唯一见于印度文献者[7]。他是巴利文佛典《弥兰陀王问经》中的主角，现今《弥兰陀王问经》的七篇中只有三篇是原作。此经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米南德王与那先长老

图52 欧克拉提德二世（约公元前145—前140年在位）四德拉克马银币

---

〔1〕 Bernard, 1985, pp. 97–105.
〔2〕 Bopearachchi, 1991, p. 71, note. 1.
〔3〕 Strabo, XI, 8, 2; Justin, XLI, 6; Pompeus Trogus, XLI.
〔4〕 Bopearachchi, 1991, pp. 74, 85.
〔5〕 Tarn, 1951, pp. 494–502; Narain, 1957, pp. 143–53.
〔6〕 Dobbins, 1970, p. 31; Fussman, 1980, p. 36.
〔7〕 Strabo XI, 11.

图53　赫利奥克勒斯一世（约公元前145—前130年在位）四德拉克马银币

关于佛法的问答。虽传统上认为米南德王大力支持佛教，但他是否真正皈依了佛教尚需进一步探讨[1]。米南德王对佛教的优待与支持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与其他外来国王相同，在面临势力强大的印度婆罗门的阻碍时，他积极扶植无种姓制的佛教，从而得到佛教团体的拥护。

米南德王发行的钱币中，除铜币上可能为法轮的轮状图像外[2]，其他神像与佛教均无关。而且银币和铜币上通常有面向左、左臂上有盾、右手呈投掷状的雅典娜·阿尔西德莫斯，这是典型的希腊古典形象，与马其顿首都佩拉的雅典娜·阿尔西德莫斯像如出一辙[3]（见图49）。或许是为标明与先贤米南德王的关系，雅典娜·阿尔西德莫斯像被后续的继承者们不断沿用而变得流行[4]（图54）。希腊—巴克特里亚与印度—希腊诸王中，米南德王发行的钱币数量最多，币面图像最丰富。除德拉克马和四德拉克马上的雅典娜·阿尔西德莫斯、雅典娜半身像、代表动物猫头鹰以外，米南德王敕令在方形铜币上表现了胜利女神尼姬像、海豚、木棍、三足祭坛、棕榈树或当地的大象、象头、公牛头以及巴克特里亚骆驼等图像。

据斯特拉波记载，米南德是印度的征服者，并被提及希腊人曾征服恒河流域的印度文献证实。以预言形式记述印度历史上若干重大事件的《瑜伽往世书》记载，希腊人行进到花幢，即摩揭陀国的首都波吒厘城。钵颠阇利或许目睹过这些事件，他在公元前150年左右写成的《大疏》中提到，希腊人包围了拘萨罗国（奥德）的娑枳多城（阿逾陀）城和阿槃提国（摩腊婆国）的中央城。如果相信迦梨陀娑的《摩罗维迦与火友王》

〔1〕 Tarn, 1951, pp. 268 – 69; Bopearachchi, 1990b, pp. 1 – 15; Fussman, 1993.
〔2〕 Bopearachchi, 1991, pl. 33.
〔3〕 Brett, 1950, pp. 55 – 72; Allouche – Le Page, 1956, p. 111.
〔4〕 Bopearachchi and Pieper, 1998, p. 182.

图54 阿波罗多托斯二世(约公元前80—前65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

的真实性,即信德的希腊军队阻止印度君主"马祭"仪式中脱缰的马过河,那么米南德王带领军队占领印度中心的年代约相当于巽伽王朝弗沙蜜多罗王前不久,即《瑜伽往世书》中记载的公元前150年[1]。另外,《瑜伽往世书》也提及希腊人的内讧导致他们撤离印度中部地区。将上述文献、古币、米南德王与欧克拉提德王钱币上的标记综合起来分析,便可捕捉到部分历史真相。前文提及欧克拉提德发行的第二组钱币上出现了与米南德王第一组钱币上同样的制币坊的标记,被解释为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征服了西北印度。公元前155至前150年间当米南德率领大军征讨印度恒河流域时,欧克拉提德趁机占领了西北印度,米南德不得不放弃在印度侵占的领地返回攻打欧克拉提德。《瑜伽往世书》中提到的希腊人内讧可能正是此事。欧克拉提德攻占西北印度之后,米南德王退守至旁遮普邦东部的奢羯罗地区,一百五十年之后,此地区成为希腊在印度统治的最后据点。米南德王发行的第二组钱币暗示出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其上具有同见于欧克拉提德钱币上的标记,并添加了新的标记,似表明米南德重新收复了失地,并扩张了王国的疆域。这或许发生在欧克拉提德去世之后,米南德充分利用了希腊—巴克特里亚因国王去世造成的不稳定形势。

米南德王驾崩后,印度—希腊控制的领土被分割成若干小国,这些国王的名字仅可通过钱币得知。1943年巴克特里亚昆都士发现的钱币窖藏引出了关于此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2]。其中有一批印度—希腊国王吕西阿斯、安提奥西达斯、菲洛克塞努斯、提奥菲罗斯、阿敏塔斯、阿契比乌斯、赫尔迈欧斯发行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四德拉克马和二德拉克马。而在此之前,仅知这些国王发行了印度—希腊双语钱币。此外,窖藏中还有米

[1] Boperachchi, 1991, pp. 82-83.
[2] Curiel and Fussmann, 1965.

南德、索伊罗一世和狄俄墨得斯发行的希腊—巴克特里亚钱。有学者认为印度—希腊钱流通于兴都库什山南侧，而希腊—巴克特里亚钱则用于北侧，两类钱币只在各自发行的地区流通，因此将这一重大发现解释为游牧民族进驻巴克特里亚后，印度—希腊国王对其中部分地区仍保留控制权。这些希腊—巴克特里亚钱币上的标记类型使人想到它们打制于兴都库什山以南，目的是为了与巴克特里亚保持必要的联系。关于此，学界有两种观点：其一，这些钱币是用于与巴克特里亚的贸易往来[1]；月氏占领巴克特里亚时，没有自己的钱币，而是仿制欧克拉提德一世和赫利奥克勒斯一世曾发行的古币。其二，印度—希腊国王发行的这些希腊—巴克特里亚钱用于纳贡以换取东南地区的和平[2]。

公元前1世纪，印度—希腊王国被中亚侵略者打败，他们是来自东边的月氏和西边的伊朗游牧民族，即印度人所称的塞人。依靠钱币和碑刻提供的信息复原的这段历史争议颇多。然而，通过对钱币分布地域、标记以及二次打制钱币的分析，可知不同国王的继承序列，也推翻了赫利奥克勒斯是最后一位统治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的希腊国王的观点[3]。最新的研究似证实了力量逐渐削弱的印度—希腊人直到公元1世纪最初十年仍控制着西北印度部分地区[4]。钱币提供的证据显示，赫利奥克勒斯（约公元前90—前70年在位）是统治喀布尔地区帕洛帕弥撒达的最后一位希腊国王，赫帕斯特拉托斯（约公元前65—前55年在位）是统治塔克西拉的最后一位希腊国王，而旁遮普邦东部地区的拉维河与萨特莱杰河之间的萨伽拉城，在公元10年斯拉托二世及其子（约公元前25—公元10年在位）被秣菟罗的总督拉吉乌拉打败之前一直是希腊人的据点。

月氏人打败赫利奥克勒斯，占领巴克特里亚后又将目标锁定在东南地区，并翻越了兴都库什山。与在巴克特里亚的货币政策相同，他们发行一批仿赫利奥克勒斯的白银含量较低的粗劣钱币，背面图像是宙斯神像，吸收了密特拉神的特征，坐于宝座上，头部放射光芒。

与月氏人同时，塞人逐步变成削弱犍陀罗和旁遮普邦西部地区印度—希腊人的主要力量。公元前90至前80年统治塔克西拉地区、非希腊名字的毛埃斯王（希腊文Mause，俗语Moa）发行的钱币可被视为西北印度政治变化的信号。毛埃斯王可能也是塔克西拉发现的一件红铜碟上刻铭中提到的国王，时代为年号不确定的第78年（或是从米南德王执政起，即公元前155年开始计算）。毛埃斯王是外来入侵者，还是原来臣服于希腊人的篡位者，目前尚未确定他究竟如何获取王位。塞人的首次入侵很快以失败告终，因为毛埃斯王之后印度—希腊人在阿波罗多托斯二世（约公元前80—前65年在位）带

---

〔1〕 Bernard, 1985, pp. 97–105.
〔2〕 Bopearachchi, 1990a, p. 102.
〔3〕 Narain, 1957, p. 164.
〔4〕 Bopearachchi, 1991, p. 125.

领下收复了塔克西拉地区，并持续统治至公元前55年。大约此时塞人在阿瑟斯一世领导下发起了第二波入侵，多数学者认为印度至今使用的始于公元前57年的毗讫罗摩纪元（得名于摩腊婆传说的超日王）由阿瑟斯一世开创。如同毛埃斯王，阿瑟斯（约公元前57—前35年在位）也保留了大部分希腊行政组织结构，继续使用先前希腊国王的制币坊。毛埃斯王、阿瑟斯一世和后来的国王们继承了双语钱币制度。钱币正面的国王半身像被替换为全身像、双腿交叉坐像、佩戴长剑像或骑马像等（图55—57），或许表明国王和王权理念发生变化，与军事、战争的联系被强化。骑马像容易使人联想到游牧君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图像并非首次见于西北印度，而是改造自先前国王发行钱币上更为僵化的骑马像，如安提玛科斯二世（约公元前160—前155年在位）、菲洛克塞努斯（约公元前100—前95年在位）、赫尔迈欧斯和卡利俄珀（公元前90—前70年）、阿波罗多托斯二世及赫帕斯特拉托斯等。双语钱币的图像体系中，既重新使用印度—希腊钱币上的若干希腊古典神像，又引入了未曾见于西北印度的希腊、伊朗或印度神像。

图55 阿瑟斯一世（约公元前57—前35年在位）四德拉克马银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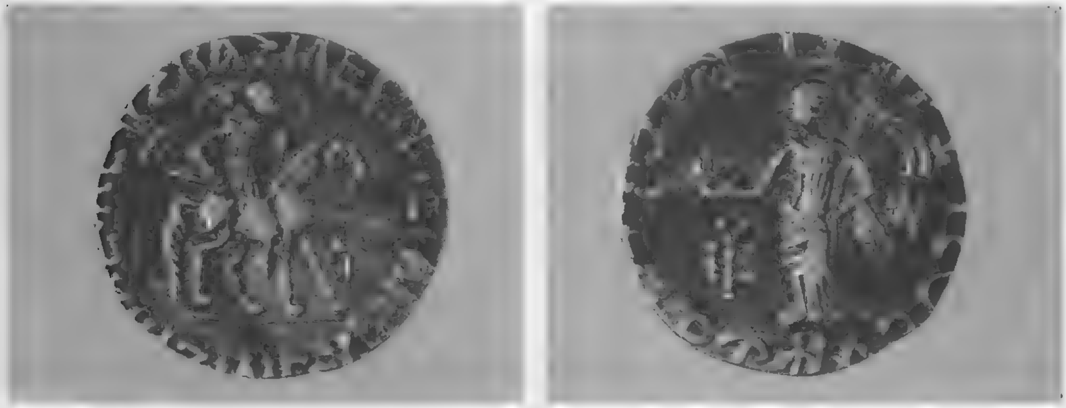


图56 阿最利西斯（约公元前57—前35年在位）四德拉克马银币

图57　阿瑟斯二世（约公元前15/5—公元17/20年在位）四德拉克马银币

阿瑟斯一世之后，先后继位的是阿最利西斯和阿瑟斯二世（约公元前15/5年—公元17/20年）。阿瑟斯二世当政晚期，或许由贸易需求引发了钱币的重大变化，白银的含量骤降。同类现象也出现于旁遮普邦东部地区最后的印度—希腊王斯拉托二世和斯拉托三世的钱币上，至印度—帕提亚国王贡多法勒斯发行的不含白银的纯铜四德拉克马时最为恶化（图58）。贡多法勒斯是帕提亚国王，他们和塞人都来自锡斯坦地区，于阿瑟斯二世晚期抵达西北印度，被印度人称为印度—帕提亚人。根据塔克特依巴依遗址发现的题记，可以确定贡多法勒斯王的统治年代：题记中提到古杜哈罗大王的第26年，也就是阿瑟斯一世继位（公元前57年）之后的第103年，那么贡多法勒斯于公元20年登基。他的钱币上重新使用了国王半身像，也有模仿帕提亚国王阿尔塔巴奴斯二世币面图像的骑马像[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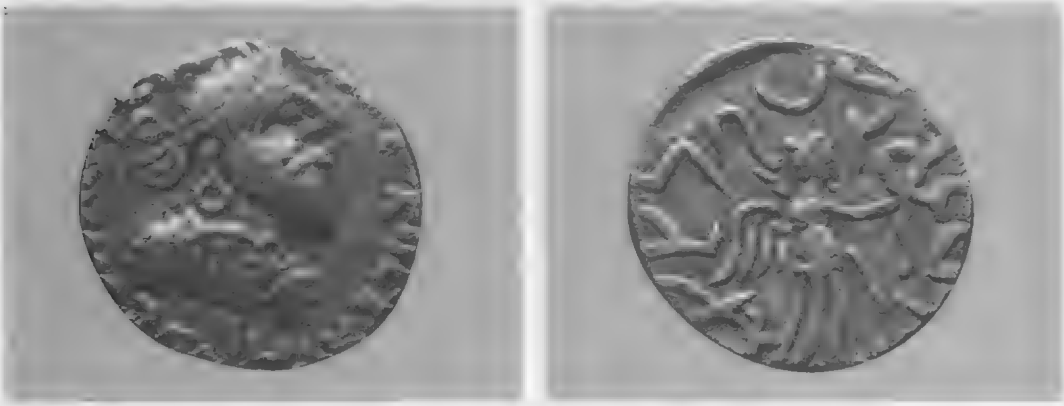


图58　贡多法勒斯（约公元20—55年在位）四德拉克马掺红铜银币

［1］ Errington and Cribb, 1992, p. 51.

二、钱币和宗教图像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巴克特里亚与西北印度发行的钱币与文献、碑刻以及考古资料为重建地区历史提供了丰富信息。此外，钱币也是理解该地区的宗教现象与希腊文化融入当地传统的珍贵线索。通过分析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的钱币上的神像，不仅能够复原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塞人、印度—帕提亚人的诸神体系，而且可以判断某些图像的发展及宗教信仰的演变。

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钱币上最常见的希腊古典神像有宙斯、赫拉克勒斯、雅典娜、阿波罗、狄俄斯库里、阿耳忒弥斯、尼姬、波塞冬、提喀、赫利俄斯、狄奥尼索斯。其中宙斯、赫拉克勒斯、雅典娜像最为流行。通常每位希腊国王发行的银币上有一或两位保护神，被选中的原因或与国王的名字有关，如狄俄斯库里见于狄俄墨得斯（约公元前95—前90年在位）的钱币上，阿耳忒弥斯见于阿特米多鲁斯（约公元前85在位）的钱币上；或是宣扬了国王的政治立场，如开创巴克特里亚的狄奥多德选择雷神宙斯表明与塞琉西王朝的断裂，欧西德莫斯选用成年休息状的赫拉克勒斯神像（见图44），而其子德米特里一世则选择青年加冠的赫拉克勒斯神像（见图55）。保护神也被视为可以赋予王权且维护稳定，如赫拉克勒斯或胜利女神尼姬手持王冠或棕榈枝（图59，也见图47—53），宙斯手托胜利女神（图60），宙斯和提喀举手赐福（图61）。诸神的佑护和赏赐对象应是国王。除此之外，从钱币上的宗教图像中或许也能够追踪出某一朝代的国王世系。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赫拉克勒斯只见于欧西德莫斯王朝，即欧西德莫斯后裔的钱币上[1]；许多印度—希腊国王，尤其是晚期退守在旁遮普邦东部地区的国

图59 索伊罗一世（约公元前130—前120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

〔1〕 Allouche-Le Page, 1956, p.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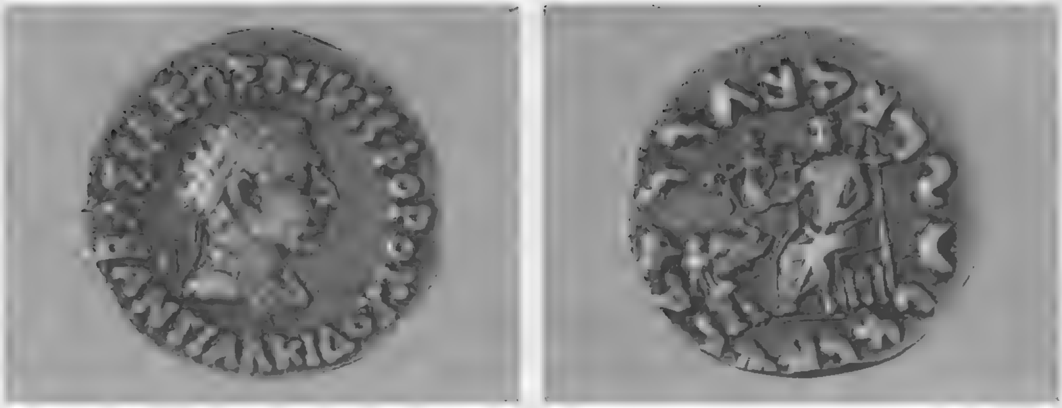


图60 安提奥西达斯（约公元前115—前95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

图61 赫尔迈欧斯（约公元前90—前70年在位）德拉克马钱币

王倾向于在钱币上表现雅典娜·阿尔西德莫斯神像，以显示他们效法米南德王的态度和立场。

上文已多次提到图像的混合现象。早期希腊—巴克特里亚钱币上的图像遵守"正统"，忠实于古典传统，常是已见于希腊钱币和雕塑上的类型，尚未出现混合现象。然而，当希腊人越过兴都库什山向印度挺进时，钱币图像清楚地展示出与当地文化互动的尝试。希腊统治者希望其发行的钱币尽可能与印度钱币相似或雷同，或创造出一种双语钱币。印度—希腊时期的希腊人对印度宗教思想持有一种类似于亚历山大遇见裸行外道时的兴趣和惊讶，这被部分历史人物或真诚或有目的性的宗教实践证实。如被佛教称颂的米南德王；印度—希腊国王安提奥西达斯派往巽伽宫廷的大使黑里欧多拉斯，在毗底沙为纪念婆苏提婆树立的石柱上，自名为薄伽梵，即毗湿奴的信徒；以及见于巴焦尔舍利盒题刻中的提奥多罗斯（民事长官）。

就币面图像体系而言，除前文提及的希腊神像，还出现了受当地宗教影响的图像，

如阿加托克利斯钱币上的大力罗摩和黑天，阿波罗多托斯和其他国王钱币上的大象和瘤牛（见图46）。有时也会观察到逐渐借鉴印度—伊朗的痕迹，意味着部分希腊古典神像被理解成或同化为本地神像，这一文化适应现象或许代表了希腊古典文化与当地文化整合的初次尝试，其中以宙斯神像最为突出，可作为文化融合的范式，也可被视为理解本土化动态过程的模式。宙斯神像逐步具备非西方传统的特点和标志：希腊—巴克特里亚晚期赫利奥克勒斯一世，以及印度—希腊时期赫利奥克勒斯二世、阿敏塔斯、阿契比乌斯、赫尔迈欧斯钱币上的宙斯像头部有放射状线条；赫尔迈欧斯的部分钱币上宙斯头戴弗尼吉亚帽，可能是吸收了密特拉神的特征[1]；也有学者根据发现于阿伊哈努姆的巨大宙斯像残段所在神殿的东方式建筑结构和礼拜方式推测其被当作密特拉神[2]。

安提奥西达斯（约公元前115—前95年在位）钱币的币面图像有宙斯"胜利者"坐在象头宝座上，或宙斯面向左，后有一大象，头上立胜利女神尼姬，部分学者将之推测为迦毕试国的宙斯—因陀罗像[3]，其他学者则认为其与迦毕试的信仰有关，是创造象鼻神神像的第一阶段[4]。除了与迦毕试相关外，宙斯和因陀罗的对应关系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因陀罗是吠陀教中的诸神之主、风暴神，手持金刚杵，坐骑是大象阿伊罗拔塔。时代较晚的塞人毛埃斯王发行的一枚钱币上表现出了宙斯与因陀罗像的融合：宙斯坐于宝座，右手举在周身发光的男性人物上，后者被某些学者解释为闪电最初的拟人化表现[5]，是印度的典型图像，已见于龙树窟的一些浮雕上的因陀罗像旁侧[6]。

因此，塞人发行的钱币见证了希腊古典文化与西北印度文化互动的深入阶段。塞人钱币币面上的古典图像呈现出多种趋势。一方面，延续古典图像传统，有时按照当地宗教需求在古典神像上增添新的图案和标识，这只有在希腊宗教思想与边境地区多元信仰碰触后的持续演变背景中才能理解。另一方面，重新利用印度—希腊钱币上的古典图像，如休息状的赫拉克勒斯、手持木棍和狮皮站立的赫拉克勒斯、坐于宝座上的宙斯、持闪电站立的宙斯、宙斯"胜利者"（见图57）、胜利女神尼姬和雅典娜等。同时也在古典图像框架内加入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钱币上完全不见的赫淮斯托斯（阿最利西斯）、赫耳墨斯（阿瑟斯二世）等神像[7]，或许是缘于与西方世界的新接触。此外，还出现了西北印度不曾见过的图像，如古典时代流行的波塞冬神像，右脚立于河神上（毛埃斯、阿瑟斯一世），可能以科林斯人请留西波斯在伊斯米亚神殿雕刻的波塞

〔1〕 Bivar, 1979.
〔2〕 Boyce and Grenet, 1991, pp. 160-73.
〔3〕 Banerjea, 1941, p. 148; Allouche-Le Page, 1956, pp. 130-32.
〔4〕 Narain, 1988.
〔5〕 Banerjea, 1941, pp. 148-49; Mani, 1985, p. 11.
〔6〕 Giuliano, 1998.
〔7〕 Mitchiner, 1975-76, p. 513 type 790; 543 types 831-32.

冬像为原型[1]。有时古典图像上添加了与希腊传统完全不一致的元素，如上文提到的宙斯旁的人形闪电，或宙斯与波塞冬特征合一的神像（毛埃斯）。

塞人钱币的图像体系中除上述或忠于希腊古典原型，或于古典原型中增加、融合其他图案的神像外，还包括伊朗神像，如持火炬或棕榈枝的女神像（阿瑟斯一世、阿最利西斯）（见图55、56），以及印度神像，如葡萄藤之间的夜叉或树神（毛埃斯、阿瑟斯一世），象征丰饶的甘迦拉克希米（阿最利西斯）等。

印度—帕提亚时期的钱币也表现出相似的现象，既有胜利女神尼姬和宙斯等希腊古典神像，也有当地神像。贡多法勒斯发行的部分钱币上有一位神像被许多学者解释为湿婆，或是这一神像最古老的形式，可能受到了波塞冬图像的影响。

综上所述，印度—希腊时期西方影响已波及西北印度，希腊文化和当地文化开始了初步交流。塞人时期发行的钱币反映出一个极为复杂的阶段，此时希腊化影响得以巩固，与当地宗教的互动更为深入，西北印度全新图像整合的趋势愈发清晰明朗。因此，就钱币图像而言，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中叶可视为之后贵霜钱币发展的前奏。

---

〔1〕 De Puma, 1991, p. 85, 105 n. 6.

印度—希腊、塞人和帕提亚时期西北印度的化妆盘

洛·穆兹奥

犍陀罗艺术中西方元素的起源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迄今尚未完全厘清。西方元素虽常被简单地概括为影响了犍陀罗造型艺术，但事实上也波及了围绕佛陀生平和佛法精髓等中心主题的图像和纹样素材。同样，印度元素在佛教建筑装饰雕刻中的影响亦不仅仅限于题材，也体现在造型、风格和装饰纹样上。此外，伊朗元素也应加以关注，其来源不仅包括古波斯地区，也涵盖伊朗及中亚的广大地区。伊朗元素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面上对犍陀罗艺术的成型期（或尤其是此期）影响至深。

本文不拟讨论犍陀罗艺术的发展，不过上述观点也适合犍陀罗艺术诞生之前和酝酿期。文中通过分析犍陀罗地区一类本地制作的物品——化妆盘来展开对印度—希腊、塞人和帕提亚时期的考察。

化妆盘呈圆形，直径一般不超过17至18厘米（通常为11—12厘米），由块滑石、片岩、千枚岩等制成，因盘内底部带有雕刻而激发了学者的兴趣。部分雕刻出现在盘内底部中央，但更常见的是占用盘内空间的上半或四分之三，盘内下格（常用横隔将之与装饰分开）素面，或装饰简化植物纹样，或被竖隔分成左右两格。除此之外，也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布局，例如某些化妆盘内以横、竖各两隔将盘底分成九格，其中部分格内雕刻，部分素面；另有一些采用辐射状布局，中心圆环内是圆形花饰，周边是斜隔分成的不规则四边形扇面，其内雕人物、动物或植物。

达尔和法兰克福编纂的图录是此类文物研究最重要的参考，书中集录了约150件化妆盘[1]。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发掘出土品，主要来自20世纪初马歇尔在塔克西拉主持的考古工作最集中的西尔卡普遗址。除西尔卡普的69件化妆盘外，另有一少部分出自犍陀罗地区的贾尔瑟达和巴克特里亚[2]。其他化妆盘则是博物馆或私人收藏的采集品，

〔1〕 Dar, 1979; 1984; Francfort, 1979.
〔2〕 Litvinskij and Sedov, 1983, pp. 76－77, fig. 11.

因其与出处明确的化妆盘在形制、图像上近似而被认为是西北印度的制品。另外，还有近三十年来流入古董市场的50件化妆盘。

虽用“化妆盘”这一传统名称，但并不能将之等同于化妆品容器，亦即女性的梳妆用品。布特卡拉的一件浮雕板似乎证实了化妆功用的观点：一位女子左手持镜，右手的手指则点在身旁男子递给她的化妆盘中（图62）。尽管如此，至少就一部分化妆盘而言，其造型恰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例如，在若干化妆盘中，雕刻部分与放置粉彩或精油的小格没有完全分开（尤其是对盒底中心进行雕刻的情况下）；又如，一些化妆盘的下格用浅浮雕植物图案装饰。而且这些化妆盘中都没有发现化妆品痕迹，不过这些观点是否系统分析过充足样品尚并不清楚。

图62 布特卡拉发现的绿泥片岩浮雕板残段，上刻一对夫妻站在圆拱下

化妆盘雕刻的题材提供了可供学者深入探讨的线索。其中的大多数可归于希腊化神话主题或具体的故事情节。法兰克福认为可以将此类化妆盘与神话主题类徽章联系起来，后者被大量表现于绘画、马赛克和金银制品（古罗马时期）中[1]。化妆盘中神话故事色彩的装饰不一定证明其具有仪式用途，但法兰克福完全否定了它们的仪式功用，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化妆盘的主题不仅包括神话，还有相当一部分显然与仪式相关（例如祭坛祭祀场景，与太阳崇拜有关的图像和标识），此类化妆盘在一定意义上可被视为承载宗教含义的实体，或被供奉在家中神龛内，或是还愿物。关于这一点，有必要提到西尔卡普遗址

〔1〕 Francfort, 1979, p. 85.

出土的化妆盘大多数来自宗教建筑集中区，除一件发现于佛殿内，其他皆出自殿外[1]。

希腊化地区的艺术和工艺的比较研究，虽未得到关于犍陀罗化妆盘原型来源及功能问题的确切答案，但浮现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重要线索。巴克特里亚作为犍陀罗希腊风最浓郁的地区之一，出乎意料的是迄今尚未发现与化妆盘类似的器物。阿伊哈努姆也没有类似物，但此处发现了若干残破的带盖浅盒，盒内的辐射状布局与犍陀罗的部分化妆盘相似。将化妆盘与希腊罗马时期极有可能是宗教物品、雕刻神像的埃及滑石圆盘直接相联似乎不妥[2]。将之与巴尔米拉的巴尔—夏明圣地内希腊墓葬中出土的雪花石膏盘[3]，或哈特拉发现的象牙盘[4]相比或更恰当，与犍陀罗的大多化妆盘一样，象牙盘内下格与其上雕刻区之间有一道明显的横隔。

西尔卡普的化妆盘是科学发掘所得，虽了解其出土环境，但相对年代关系并不清晰。能够确认的只是这类器物的年代上下限与古城地层年代一致。目前发掘面积有限的西尔苏克（贵霜时期的塔克西拉）以及希腊人出现之前的比尔丘古城都没有发现类似的化妆盘。上文提及的带盖浅盒发现于贵霜时期的地层，应是趋于衰落的化妆盘制作的余绪。因此，西尔卡普化妆盘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50年至公元50年，这段时间涵盖了包括征集品在内的全部化妆盘。

因发掘信息不充足，试图确定这些化妆盘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尚十分困难（马歇尔也不曾探讨过）。图像学和风格分析似是唯一方法。法兰克福正是采用这种方法对这些化妆盘做了尝试性的系统梳理，虽有待完善且偶尔缺乏说服力，但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参考[5]。

法兰克福将97件化妆盘依技术特征（石材和加工方式等）分成A、B、C三组，并据图像和风格分别命名为“希腊化式”、“帕提亚式”和“印度式”（或“印度—斯基泰式”）。此外，他还强调了组与组之间的过渡式化妆盘，以及无法归类的化妆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佛教题材仅见于两件化妆盘[6]，却有学者试图将所有化妆盘纳入佛教框架内，并将其题材内容与涅槃联系起来[7]。下文具体阐述法兰克福的分类。

就制作方式、风格和题材而言，A组包括工艺传统汲取希腊化精髓的化妆盘，多表现古典神话题材：如阿波罗和达芙妮（图63）、阿芙洛狄忒和帕里斯、森林之神追逐宁芙、阿芙洛狄忒惩罚厄洛斯、喝醉的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与阿里阿德涅的婚礼（图64）。此外，还有宴饮娱乐、骑海马或海兽的涅瑞伊得斯。女神涅瑞伊得斯是此组化妆

〔1〕 Dar, 1984, p. 136.
〔2〕 Francfort, 1979, pls. LI.b, LII.a–b.
〔3〕 Francfort, 1979, pls. L.a–b, LI.a.
〔4〕 Francfort, 1979, pls. LIII.a.
〔5〕 Francfort, 1979.
〔6〕 Francfort,1979, pp. 96–97.
〔7〕 Tanabe, 1985.

图63 西尔卡普发现的绿泥片岩化妆盘，内刻阿波罗与达芙妮

图64 西尔卡普发现的绿泥片岩化妆盘，内刻狄奥尼索斯与阿里阿德涅的婚礼

盘中最常见、沿用时间最久的题材之一[1]。她或以希腊化典型造型出现，即背面而坐，臀部下面的披巾呈弧形，或正面而坐，手持镜或杯。

B组中也有部分神话主题的化妆盘，但做工较A组粗糙（也可见到涅瑞伊得斯的形象，但姿态不优雅，甚至粗俗，跨坐在海洋动物上[2]）（图65）。B组主要由表现躺卧宴乐场景的化妆盘构成（图66、67）。这一题材源自古典，但图像和风格的某些特征（尤其是对正面观表现的偏好和衣褶的处理），促使法兰克福将这些图像与同时期的近东联系起来，并认为它们是伴随着印度—帕提亚人的进驻而传入犍陀罗地区的。如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收藏的一件化妆盘，其内刻两对男女，男性把酒杯举至女性唇边。馆藏此组的另一件化妆盘，内刻一右手举杯的骑狮女性，与巴克特里亚黄金之丘发现的月氏人或更可能是塞人的墓中出土的一条金质腰带上的形象相似[3]。这一形象易于使人联想到其与贵霜钱币及中亚中世纪盛期绘画中常见的骑狮持杯女神娜娜之间的关系。

图65 出处不明的黑泥片岩化妆盘，内刻涅瑞伊得斯骑海兽

〔1〕 Barringer, 1995.
〔2〕 Francfort, 1979, 自第33页起。
〔3〕 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Sarianidi, 1985, pp. 88–97, n. 4.2.

图66　西尔卡普发现的黑泥片岩化妆盘，内刻宴会场景

图67　西尔卡普发现的灰泥片岩化妆盘，内刻宴会场景

C组即印度组中多见一对半身男女手持杯的题材（图68）。此类题材源自印度（尤其是秣菟罗艺术），似乎表明化妆盘的制作已完全脱离希腊化而与印度传统融为一体。该组中还有马车上姿态各异的成对男女及双狮等与太阳崇拜有关的形象。

以上是对法兰克福分类的简略概述，接下来重点探讨这一分类，尤其是其对年代问题的意义。事实上，可靠的年代节点确实极少。他唯一可用的线索是B组出现于帕提亚人抵达西北印度之后，其年代约为公元初数十年。由此推测，A组跨越了化妆盘制作的整个时期（公元前150年—公元50年左右），C组流行于公元1世纪塞人统治犍陀罗时期。

遗憾的是，地层序列对编年帮助不大，因西尔卡普的化妆盘分布在古希腊至帕提亚时期的六个地层中，无法判断组别与地层的对应关系。而且B组的一件帕提亚式化妆盘发现于西尔卡普第五层（马歇尔推测此层年代约为公元前2世纪中叶，另有学者认为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1]）。因而，法兰克福B组的年代观点就值得商榷。

图68 西尔卡普发现的灰泥片岩化妆盘，内刻一对饮酒者

---

〔1〕 Marshall, 1951, II, pp. 494–95; Erdosy, 1990.

厘清这些化妆盘的造型、图像和风格的演变脉络并不容易，排比出深受希腊化造型影响的化妆盘，不精致、甚至粗陋地模仿希腊化造型的化妆盘，以及几乎脱离希腊化造型只保留部分次要因素、题材和图像皆为印度式的化妆盘之间的年代序列难度更大。甚至也不能确定化妆盘之间的差异由时代演变造成，抑或缘于不同的定制者，即属于今人不甚了解的社会和经济地区内共同生活、相互影响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印度或当地、希腊、伊朗）的人群。

法兰克福的分类还有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前提假设，即他认为印度式组中常见的一对饮酒男女类题材的唯一源头是印度艺术。若仔细观察，则会发现大部分情况下这一题材中的形象并无印度特色（图69、70）。人物只表现出上半身，可见的装束类似于伊朗服饰（带褶长袖长袍，袖口和前襟有装饰带）。姿态僵硬，双目圆睁，这种神韵并非来自印度，反而更接近帕提亚时期的近东艺术。此外，还有一个细节引出了一条新线索：两个半身像通常紧靠，似是同一形象的两半，彼此并无不同；唯一的一件化妆盘内所刻的多对全身人像之间也没有太大差异（图71），只有一些细微之处可分辨出其为一男一女，乍看之下极似两位男性。

图69 犍陀罗发现的灰泥片岩化妆盘，内刻一对饮酒者

图70 犍陀罗发现的片岩化妆盘，内刻一对饮酒者

图71 西尔卡普发现的灰泥片岩化妆盘残片，内刻多对饮酒者

基于此，不妨作一个大胆比较：对比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黑海北岸草原斯基泰地区颇为流行的两男性头部紧靠构成一张面孔、用同一来通饮酒的图像（图72）。在斯基泰两男性饮酒图像（或源自希罗多德描绘的斯基泰“兄弟结义”仪式[1]）和化妆盘一对饮酒男女图像之间构建直接关联似乎过于冒险，但不能否定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而其搭建者或是塞人，但塞人恰是法兰克福体系的缺项。深入探索这些化妆盘与伊朗游牧民族的关系无疑会获得有趣的发现，尤其是部分化妆盘表现出的广为流布的太阳崇拜。1966年塔代伊发表的一篇有关斯瓦特乌德格兰出土的化妆盘的文章已将关注点引向了斯基泰地区[2]。

图72　克里米亚半岛库尔奥巴发现的金饰牌，上刻两位斯基泰人从同一来通中饮酒

〔1〕 Raevskij, 1977, p. 116.
〔2〕 Taddei, 1966; Lo Muzio, 2011.

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及艺术

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的始建与发展

法切那

穿过斯瓦特地区熙攘喧闹的商贸重镇明戈拉，江布尔河及矗立于两侧的江布尔峡谷顿时跃入眼帘。峡谷入口处，在南侧山丘和河流左岸之间坐落着以所在地命名的布特卡拉一号遗址（图73）。1956年和1962年意大利考古队先后在此地开展了发掘工作[1]，清理出曾是斯瓦特地区最重要的佛教寺院——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同时它也是犍陀罗地区规模最大、沿用时间最长的寺院之一。该寺院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之后历经重修与扩建，在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的最后一次重建后，急遽衰落，最终废弃于公元10世纪。

发掘前未见其他露出地表的遗存，仅有一处堆积若干石块，或为斯坦因在斯瓦特及周边地区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小丘，可能是一处窣堵波废墟，当地居民常从此处取石建房[2]。后来，图齐据文献、语音学和现代地貌将其所在地考证为陀罗寺[3]。北魏的宋云曾到访过此处，盛赞其庄严富丽。它毗邻乌仗那国首都瞢揭釐，斯坦因推断瞢揭釐城即今芒格洛尔，而图齐则认为是明戈拉。

布特卡拉一号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四边形（75×80米），略向西突出，中心区用片岩石板铺成（图版32）。该寺院的始建没有统一筹划，又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阶段不仅增扩建筑，而且改动原来的面貌和布局。在后来的建造过程中，通过修补已塌毁的北侧柱廊的后墙，连接西侧若干建筑的前部，塔院的围墙逐渐成形。其内大窣堵波居中略偏西，位于塔院中心、南门及僧院构成的近南北向中轴线上。塔院北墙外建有宏大雄伟的僧院，其南设踏道入口，侧列一排僧房；北墙内或为寺院生活和宗教活动的集中地。

大窣堵波周围被小型窣堵波、精舍和立柱等227座陆续增建而成的建筑拱卫。它们最初布局合理协调，后来因数量骤增而变得杂乱无序，最终挤满了全部可用的空间，阻塞了北、南、西门。

---

〔1〕 Faccenna, 1980–81; 1974.
〔2〕 Stein, 1930, p. 42.
〔3〕 Tucci, 1958, p. 280.

图73 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遗址照片拼接图

大窣堵波是布达卡拉一号塔院的礼拜中心，先后共经历了五次重建，标定出塔院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的各发展阶段（图74）。其中，前三期分别以大窣堵波1、大窣堵波2和大窣堵波3为代表。它们是观察建筑和雕刻演变的重要载体[1]。

大窣堵波1由较深的地基和黑千枚岩石块建成的覆钵（底部直径约11米）构成，周围堆垒石块，表面整体涂抹一层灰泥。内部用以奉放舍利盒的圆形空间是贯穿大窣堵波发展始终的核心。外围石堆中曾出土一枚当地古币，币面图像为承托新月的拱和标记符号，年代被定为公元前3世纪早期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时代[2]；后来又被推测为公元前3世纪末期[3]；还有学者则据之判断大窣堵波1建于公元前2世纪早期[4]，但这一年代或许太晚，难以为大窣堵波的后续发展留出充裕时间。然而，分别属于大窣堵波3晚期和大窣堵波4早期的两则刻铭中则将大窣堵波称作达摩拉吉卡窣堵波[5]。

石堆后来被一堵圆形墙体切隔开，由此也进入了大窣堵波2阶段，即第二期。此时，大窣堵波2建于地面F5上，印度式圆柱形塔身（直径13.44米）上支撑一个无线脚的覆钵。塔身经过了多次改造，其上先开东、西、南、北四龛，稍后封堵其他三龛，仅留南龛，该龛有一突出结构，后被改建成基座（或踏道），地面也被抬升至F5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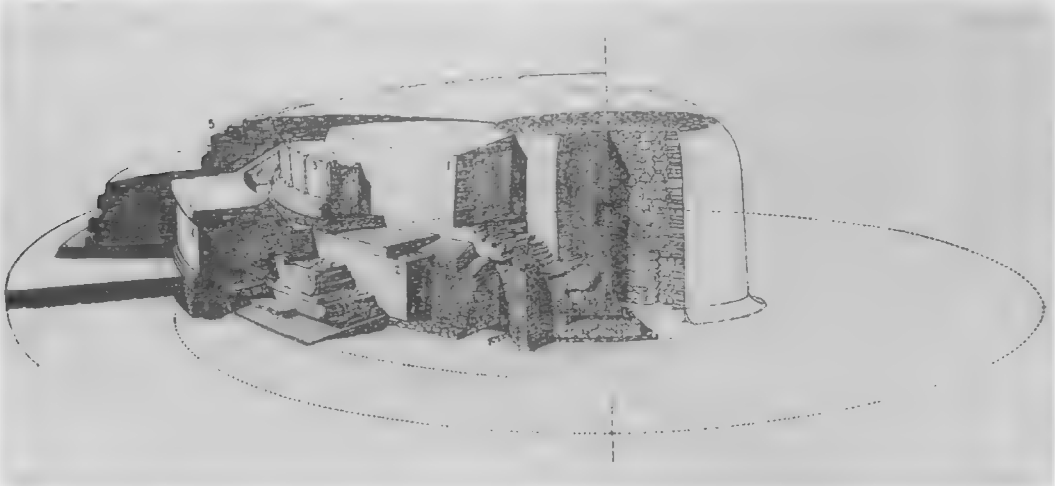


图74 布特卡拉一号大窣堵波五次建造阶段轴测图

---

〔1〕 Faccenna, 1980–81; 1962a; 1964a.

〔2〕 Göbl, 1976, no. 3.

〔3〕 Gupta and Hardaker, 1985，第6册。

〔4〕 Errington, 1999–2000.

〔5〕 其一见于片岩石板，被重新用于和大窣堵波3及地面F3同时代的第133号建筑；另一见于陶片，出自与大窣堵波4早期相关的地层中。

大窣堵波2的年代可根据一枚印度—希腊国王米南德时期的钱币判断[1]。此枚古币出于突出结构和基座之间，似乎是为动工修建而有意放置的，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世纪晚期至前1世纪早期。因此，大窣堵波2和地面F5的建造年代，应在此枚古币和出自大窣堵波1的古币年代之间：即公元前2世纪左右。

公元前2世纪及之前，至少在大窣堵波3建造前，塔院中已发现两枚古币：一枚打制币[2]，出自第一期的第129号大水槽，其于第二期遭废弃并于第三期被地面F3覆盖；另一枚印度—希腊王斯拉托一世时期的钱币发现于原为大窣堵波3的地面F4下[3]。

大窣堵波2外环绕一周圆柱，其中第66、149、140号圆柱与地面F5同时[4]。圆柱皆由千枚岩制成，基座为素面，形状分圆角方形和圆形两类，前者带凸圆线脚和枭线，后者为凹圆线脚，位于两个无枭线的凸圆线脚间。

后来，大窣堵波2地面F5R上同时建造了基座（在大窣堵波2南龛突出结构上增建础座、凸圆线脚、枭线而成），及第209、214号圆柱[5]，其中第209号圆柱有带线脚的方体基座（础座、凸圆线脚、枭线）和檐口（两个平缘间的上枭下混线）。因此，就建筑类型和装饰而言，第二期开始出现立柱和线脚、檐口等新元素。不过，线脚仅用于局部，檐口通常较简单，表明新元素尚处于萌芽期。千枚岩仍是主要的建筑石材，晚期偶尔也采用更为细腻的绿泥片岩和滑石片岩。

大窣堵波3（直径15.22米）营建时，新元素的发展程度已经颇高，此外，还出现一种前所未见的理念，冲击了大窣堵波及其附属建筑。大窣堵波3保持传统的圆形平面，但塔身被分成若干层，每层在基本方位处设带栏楯的踏道，第一层塔身外立有一周栏杆（图75）。圆柱的基座高大、比例协调，柱础的凹圆线脚在两个凸圆线脚之间，柱身通过枭线与柱础相连[6]，柱头上或有一蹲狮像；方柱的柱头为带雕像的犍陀罗—科林斯式[7]；窣堵波的叠涩十分精美[8]，使用细腻的滑石片岩和绿泥片岩，呈现出崭新的景观。此时，出现以两大建筑为焦点的寺院布局新理念：其一为平面呈圆形的大窣堵波，另一为平面呈四边形的僧院；两者同时建成，都有踏道，沿南北向轴线相对分布。大窣堵波3外围圆柱所在圆圈的北侧切线处有一排窣堵波、圆柱和方柱，平行于僧院的正立面，

---

〔1〕 Göbl, 1976, no. 13，币面图像有象头和木棒。
〔2〕 Göbl, 1976, no. 12; Errington, 1999–2000, 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前2世纪早期。
〔3〕 Göbl, 1976, no. 12.
〔4〕 Faccenna, 1980–81, figs. 61, 64, 68.
〔5〕 Faccenna, 1980–81, figs. 69, 74.
〔6〕 Faccenna, 1980–81, nos. 143, 33, 67, 78, 213, 93; figs. 95, 96, 100, 103, 105, 109.
〔7〕 Faccenna, 1980–81, nos. 14, 17, 27, fig. 97; Faccenna, 1984, p. 327; Faccenna, 1964, pls. DLI–DLCIII.
〔8〕 Faccenna, 1980–81, figs. 78–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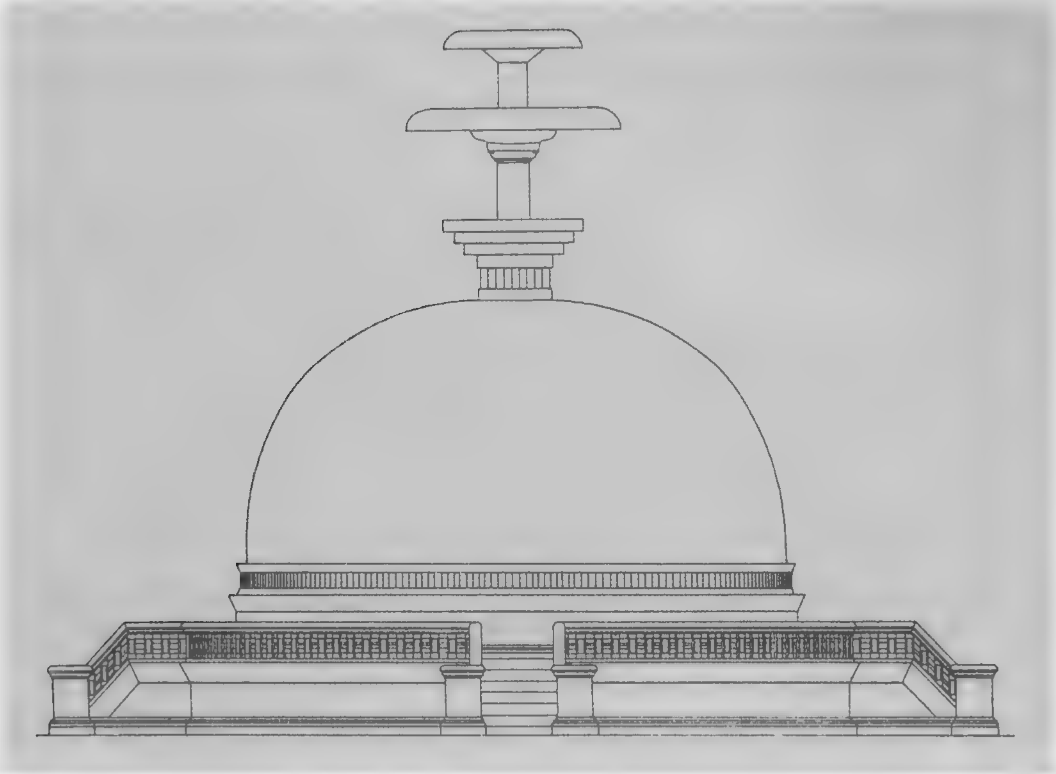


图75 布特卡拉一号大窣堵波3立面复原图

似乎是为调和其圆形与僧院的方形[1]。两座建筑的外立面上均装饰绿泥片岩方壁柱，其间填以壁画。

大窣堵波3的原初地面为F4，由片岩石板精细拼接而成。上文提到的保存了原装饰的第14、17号窣堵波以及柱头法轮被复原的第135号方柱同时建于地面F4上。根据发现的古币和地层关系推测，它们与大窣堵波3同时或稍晚。

大窣堵波3的年代尤为重要，须给予特殊关注[2]。第135号方柱的舍利盒内发现一枚保存较好的阿瑟斯二世四德拉克马银币，年代在货币危机时期（此时大量红铜掺入银币），即阿瑟斯二世末期。其背面的大象和瘤牛像上又打压德墨忒尔或提喀和赫耳墨斯像[3]。学者在重新检视阿瑟斯二世年表时强调了此枚古币的重要价值[4]。阿瑟斯二世的登基年代最初被定在公元前22或前21年，但据因陀罗跋摩舍利盒上的题记或为公

〔1〕 Faccenna, 1980–81, pl. 8.
〔2〕 Faccenna, 1980–81, pp. 167–74, table 2.
〔3〕 Göbl, 1976, no. 15.
〔4〕 Fabrègues, 1987.

元前15至前5年或公元6年，或至公元17或20年（？）[1]。地面F4的年代约在公元20年（？），由发现于塔院内同一地层其他地方的阿瑟斯二世钱币证实。其中一枚出于僧院内编号为a的房址基坑中[2]，为判断僧院的年代提供了关键线索；与其出土位置接近的另一枚古币出自与地面F4相关的FA II（6）[3]，还有两枚出自与塔院西北角年代稍晚于僧院的RX相关的地层中[4]。这些钱币提供的年代序列由以下发现得到进一步确认：大窣堵波3晚期，原地面F4被抬升，标记为F3，两者之间的地层中出土了阿瑟斯二世钱币[5]和其他（塔克西拉王、旃陀罗笈多、潘达雷昂）钱币，其中包括一枚丘就却钱币[6]及一枚"伟大的救世主"威玛·塔克图钱币[7]；后者为地面F3年代的确定提供了信息，F3在寺院的后续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持续使用至大窣堵波4初期。最后需要提及的是阿瑟斯二世仿制币[8]，它们均出自晚期地层中，与本文讨论的范围无关。地层关系、建筑和硬币均表明地面F4属于阿瑟斯二世时期。

在保持传统圆形平面的大窣堵波3之侧，同时代的第14（图76、77）、17、27号小型窣堵波呈现出崭新的外观：皆有方体基座，座身壁面上雕刻方壁柱，柱身通体饰长凹槽，柱头为犍陀罗—科林斯式，上方有带额枋的檐口；第14、17号窣堵波基座的檐口尤为突出，其上雕刻丰富，还在几何纹、植物纹、人物、动物纹之间补绘壁画。由此，这一始于数十年前的发展历程最终在大窣堵波3及同时代的小型窣堵波上展现出较为完满的成果。

大窣堵波3与附属建筑的年代虽据古币、地层和建筑结构提供的年代信息可推测为阿瑟斯二世晚期或稍晚，但还要考虑在乐于将新元素融入纯粹印度建筑如精舍，尤其是带栏楯的窣堵波等的精神氛围形成之后，它们落成之前，建造技术改良、审美情趣发展、新视觉景观被接纳的时间；同时也不能忽略大窣堵波、僧院的布局设计，塔院北区的重新规划等所需的时间。

---

〔1〕 Bailey, 1978; Salomon, 1999及参考书目。
〔2〕 Göbl, 1976, no. 24, 贬值的四德拉克马，币面图像有瘤牛和狮子。
〔3〕 Göbl, 1976, no. 20, 四德拉克马，币面图像有瘤牛和狮子。
〔4〕 RV（10）Göbl, 1976, no. 25，古希腊硬币，币面图像有瘤牛和狮子。RIV（8）Göbl, 1976, no. 62，四德拉克马，币面图像有瘤牛和狮子。
〔5〕 Göbl, 1976, no. 23, 四德拉克马，币面图像有瘤牛和狮子；no. 16, 四德拉克马，币面图像有瘤牛和大象。
〔6〕 Göbl, 1976, no. 85, 币面图像有国王半身像和赫拉克勒斯像。
〔7〕 Göbl, 1976, no. 142, 币面图像有国王半身像和骑马国王像。
〔8〕 Göbl, 1976, nos. 28–59, 币面图像有骑马国王像和宙斯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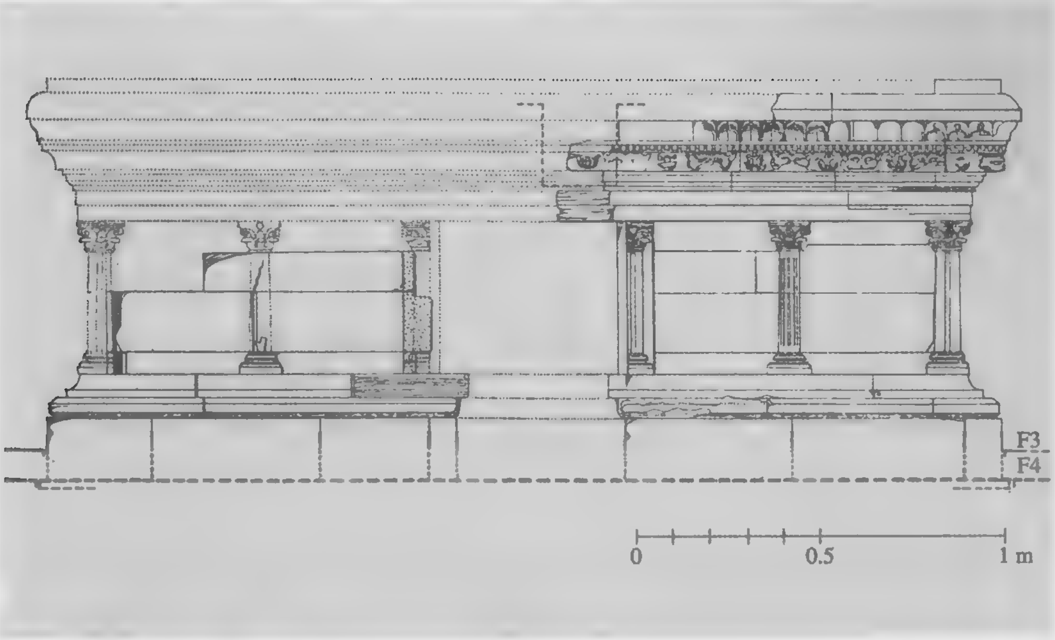


图 76　布特卡拉一号遗址内第 14 号窣堵波东侧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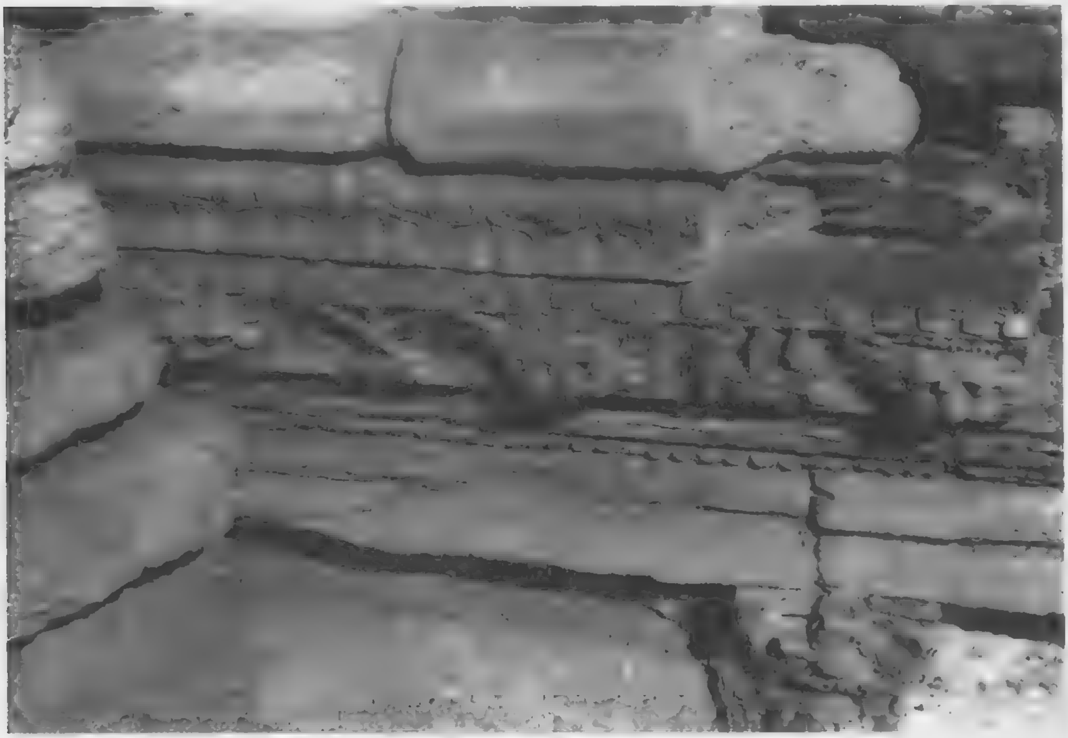


图 77　布特卡拉一号遗址内第 14 号窣堵波西侧檐口细部

布特卡拉一号雕刻中心及其早期石刻

法切那

布特卡拉一号塔院内最初塔刹稀疏，此后持续的增建工程使得其内建筑鳞次栉比，晚期更是交错杂列，判然无序。大窣堵波周围的小型建筑与不同活动面、地层的关系及它们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不仅表明它们建于不同时期，而且可以据之追溯布特卡拉一号遗址的雕刻艺术之源。

以大窣堵波3为代表的第三期是塔院布局最协调的时期。大窣堵波与僧院对称分布；大窣堵波周围环绕一圈圆柱，圆圈北侧切线位置另有一排圆柱，其间建有第14、17号窣堵波和第135号方柱；由地层关系判断，这些建筑与大窣堵波第三期同时或稍晚，随后又增建了西侧的第27号与东侧的第133号窣堵波。

第14、17号窣堵波，尤其是第14号窣堵波的檐口（图78）上饰丰富的雕刻（莱斯博斯岛拱形纹、狮首、莨苕叶、程式化花饰、莲花上的金翅鸟、莲花上手持长剑的有翼小爱神、花草、禽鸟及其他器物），与其类似的、下部另刻一排半身像的三块浮雕板残段的雕刻如出一辙[1]（图79）。

半身像肩并肩以正面观呈现：宽脸，大眼内刻瞳仁，均身穿罩衫，部分所着大衣从左肩垂下，形成竖直平行的褶纹；男性都有胡髭，头发垂至耳畔，佩戴尾端叠合的项圈；女性常有平齐刘海，直发下垂至脸颊处，戴水平麻花绳盘绕而成的头饰，颈部或有中间带圆形饰的短项饰，或有串珠长条项饰；胸部均较平坦，头部间隔处饰程式化花朵。可与之比对的其他残段上刻有相似的图案和狮首，根据狮子毛发的差异推知其中部分出自同一作坊的不同工匠之手。在比较研究类似的檐口时应特别关注长期沿用的图案之间的细微差别[2]。

第135号方柱柱头（图80），与第14、17号窣堵波为同一时期，其上雕刻的半身像与上述半身像近似，不同之处在于：其头部方圆，眼睛呈球状，眉弓较长，嘴巴较小且唇

---

〔1〕 编号B 6841、B 2587、B 3792，参见Faccenna, 1980–81, pp. 77, 105, 107, 679, 691, 700; pl. 203a.

〔2〕 Marshall, 1951, pls. 217, 79, 80; Fabrègues, 1987; 例如第14、17号窣堵波原檐口与第17号窣堵波檐口修复后的南端部分的比较，参见 Faccenna, 1980–81, pls. 133–136, 146c; pl. 147.

图78　布特卡拉一号遗址内第14号窣堵波基座的檐口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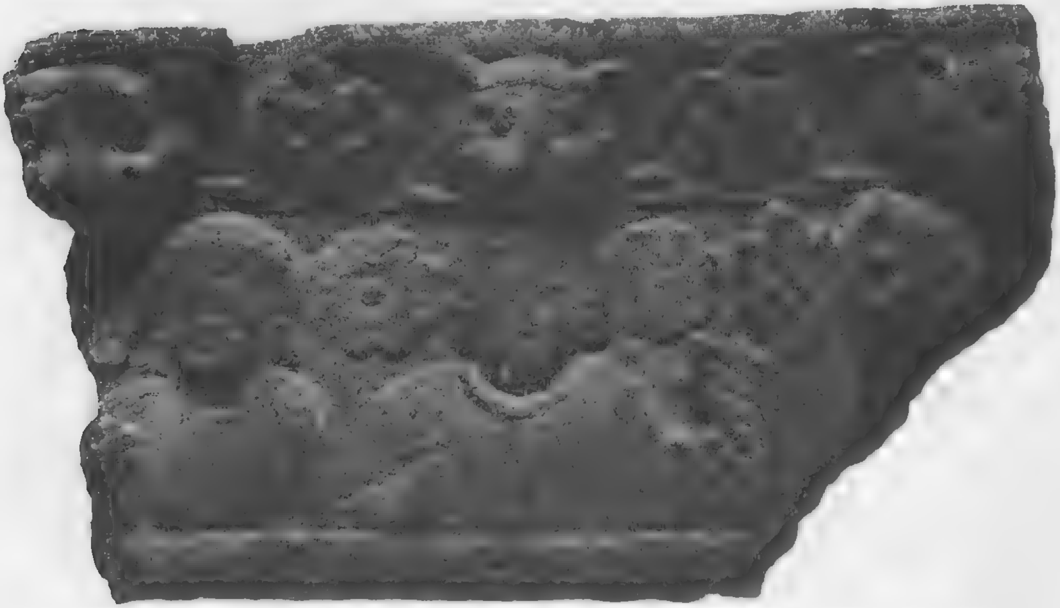


图79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檐口残段，上部雕刻与第14号窣堵波檐口类似，下部刻一排半身像

图80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第135号方柱柱头，上刻叶丛与半身像

部凸出，衣服褶纹较粗糙[1]。此科林斯式柱头体量较大（高0.325米），柱头雕刻部分与第14、17号窣堵波柱头有所差异，后者的题材更丰富，茛苕叶生动逼真（图81、82）。

由上文列举可见布特卡拉雕刻艺术多变性之一斑，它们均可归入第一组，即布特卡拉一号和毗邻的班尔一号、塞杜沙里夫一号遗址出土石刻划分成的三大组别中的第一组。结合内、外特征界定出石刻所属的不同系列，而后归纳成三大组别，又据显著特征分别概括为：

第一组"线刻"，衣褶雕刻成平行线条，人物扁平略有棱角；

第二组"自然"，人物呈现出丰富的神韵（图83—85）；

第三组"立体"，人物丰满厚重，衣褶简单（图86、87）。

三组之间的年代关系可由二次使用的浮雕板推测，即一面先雕刻某一组图像，二次使用时于背面雕刻另一组图像；考古发掘为三组发展的特定时段提供了绝对年代数据。本文主要探讨布特卡拉一号遗址的早期石刻，即属于第一组的石刻，试图在许多系列中探寻雕刻艺术的丰富表现力。

〔1〕 Faccenna, 1984.

图81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柱头，上刻叶丛与半身像

图82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柱头，上刻叶丛与半身像

图83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自然”组浮雕板残段，上刻佛陀和供养人像

图84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自然”组浮雕板残段，上刻沉思女性和老年苦行者，表现的或是占梦

图85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自然”组浮雕板残段，上刻向金刚手守卫的佛陀致敬

图86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立体”组由三块残段组成的浮雕板，上刻两位佛陀（中、右）和左手持净瓶的弥勒菩萨（左）

图87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立体”组拱形浮雕板残段，上刻菩萨像和结跏趺坐于莲花上的佛像（左）

基于外观和造型将石刻划为多个系列，并把因不同缘由而散布至各处的残段重新整合起来。每一系列的作品由一人或技法相似属于同一作坊的多人制作，拥有各自的“口音”，与其他系列或交织或分离；并且具备各自的素材和构图模式。

布特卡拉一号遗址第一组石刻中，除部分较为一般外，绝大多数堪称艺术杰作。其中有些石刻构图简洁，所有浮雕像均为正面观且颇为僵硬，分布于不同层次，细节的勾勒使之更显扁平；有些石刻构图饱满而平衡，被简化且压缩的躯体更有力地凸出于背板，关键部位如双手被强调，头部与双眼等被放大。这些特点均呈现在同一雕工创作的两块拱形浮雕板上（图88、89）：年老虚弱、表情生动、手提水壶背对观者而立的仆人

图88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拱形浮雕板残段，上刻坐佛、王室供养人和一位年老仆人

显示出雕工敏锐的洞察力；两排身材清瘦的人像，其弯折的胳膊和手腕特色鲜明。另有一块拱形大浮雕板描绘了净饭王见太子的故事，场景复杂，充满动感和空间感，人像的比例大小暗示出其等级的高低[1]。雕刻赠送大象场景的浮雕板中流露出更强烈的动感（图90）。舞乐者浮雕板则展现了卓越的表现力：两人胳膊弯折构成的圆环、腿部的弯曲与不对称创造出的韵律被衣褶的平行线条加强（图91）。

相比之下，部分石刻显示出不同的艺术感知力，雕刻得相当粗疏，衣纹的程式化线条消解了人像宽大而平坦的躯体。例如一个包括众多尺寸较小石刻的庞大系列，它们的制作水平一般但较为奇特，构图简单，均表现施禅定印或无畏印的结跏趺坐

---

〔1〕 Faccenna, 2001, pl. 84a.

图89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拱形浮雕板残段，上刻坐佛和王室供养人

图90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浮雕板残段，表现赠送大象场景

图91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浮雕板残段，上刻一对舞乐者

图92 贡巴特发现的"线刻"组浮雕板,"印度式"佛像两侧分别为梵天(左)和帝释天(右)

佛,两侧各立一供养天人(图92)。再如圆雕中有一系列立姿女像,包括近乎全裸、只佩戴髋部饰和腰带的夜叉女雕像(图93、94),女供养人或女神(诃梨帝?)雕像[1],般遮迦—诃梨帝和阿特拉斯背靠背像[2]。这使人联想到一批尺寸更小、部分身着帕提亚式服装的男、女雕像(图95、96)。此外,还有大量建筑构件如檐口(图97)、托座、柱头、伞盖、假龛等,以及刻有爱神承托波浪形花纲(图98)、有翼的弗里吉亚人等形象的分隔构件。

---

〔1〕 Faccenna, 1996, fig. 1; Quagliotti, 1999 – 2000, fig. 7; Faccenna, 2001, pls. 89a, b – 90a.
〔2〕 Faccenna, 2001, pls. 90b, 91a, b.

图93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夜叉女雕像（左）

图94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夜叉女雕像（右）

图95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着印度式服装的男供养人雕像（左）

图96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着帕提亚式服装的男供养人雕像（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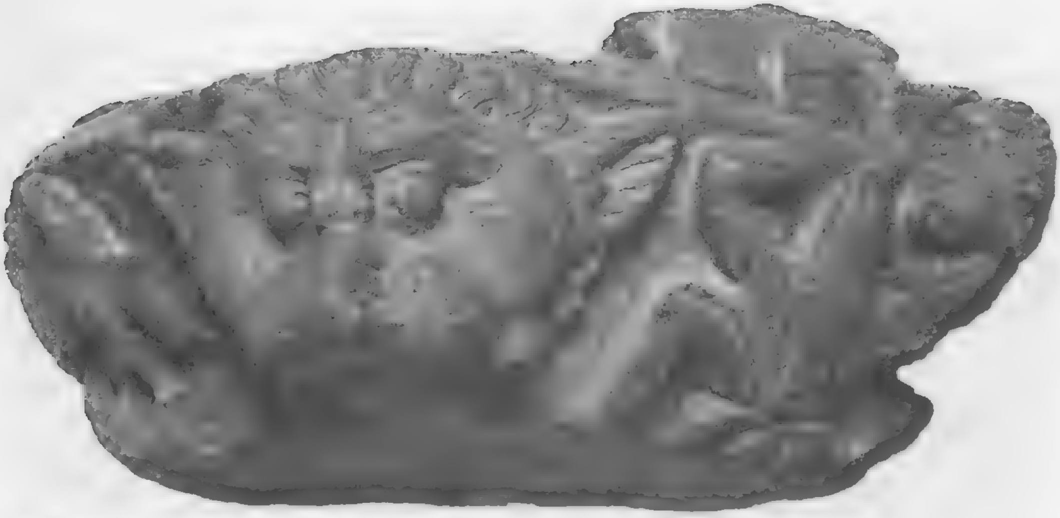


图97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檐口残段

图98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爱神承托波浪形花纲的分隔构件

布特卡拉一号遗址第一组石刻中存在连续场景被建筑元素分隔的构图形式，但其年代范围尚不确定。如刻有佛陀坐于两名或多名供养人之间的浮雕板残段（图99、100）。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上也有同样构图，题材丰富且生动[1]。然而布特卡拉此类构图的石刻题材单一不变，无传记性内容[2]（图101）。由分成上下雕刻区的浮雕板推测，两者题材的差异或是因为装饰在窣堵波的不同位置造成的。

图99 “线刻”组浮雕板残段，上刻坐佛及两侧供养人

〔1〕 法切那，本书，第127－138页。
〔2〕 Zwalf, 1996, p. 53.

图100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浮雕板残段，上刻坐佛及两侧供养人

布特卡拉一号遗址第14、17号窣堵波与第135号方柱和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提供了两条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代线索。但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当地石刻制作的起点与终点，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显然不代表着终结，第14、17号窣堵波和第135号方柱也不标志着开始。通过分析布特卡拉一号遗址第一组石刻中的形象和构图，发现它们的表现形式多元且富有变化，年代集中于公元1世纪前半叶。

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佛陀生平故事场景中佛陀形象的出现。

佛陀不见于布特卡拉一号遗址第14、17号窣堵波檐口或相关建筑构件，以及第135号方柱柱头或类似的柱头上。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中交换衣服（第144页，附图8）和车匿拿回宝冠（第143页，附图7）的场景中太子像也仅略有迹可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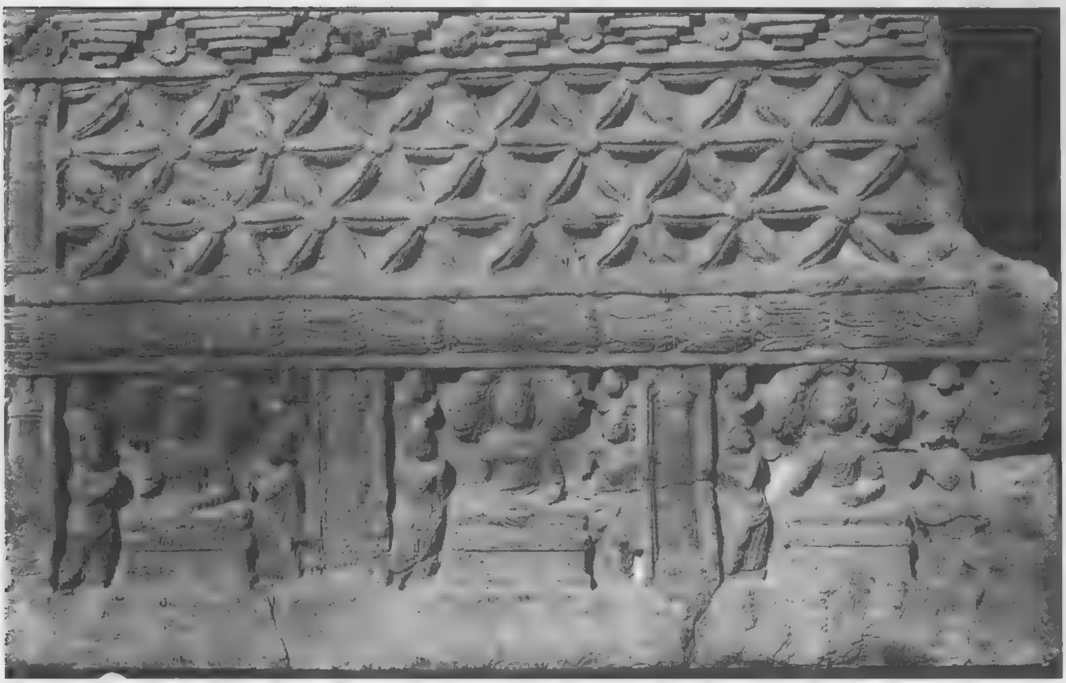


图 101 “线刻”组浮雕板残段，下排刻坐佛及两侧供养人

然而，佛陀的形象依然可据布特卡拉一号遗址第一组石刻来还原。太子像常见于他的生平故事场景中，同样多见的还有正面站立、施无畏印、着内衣和上衣、戴宝冠的菩萨像（图 102），较少见无宝珠和宝冠饰的结跏趺坐菩萨像，没有坐佛或立佛像，或有或无宝冠的饰珠宝坐姿、立姿菩萨像皆无。

坐姿菩萨像及坐佛或立佛像集中于第一组的一个系列。该系列石刻的基本场景构图为帝释天和梵天或供养人之间有一头饰、双目和服装富于变化的坐像：坐姿菩萨像的下裾从交叉双脚的下方露出；坐佛像的袈裟遮盖部分或全部躯干（见图 92），有的甚至遮蔽双手和双脚[1]。此系列也包括尺寸较小且相当普通的石刻，其上简略雕刻身着内衣和上衣，位于两供养人之间的佛像。这批石刻展现出两种雕刻技法，分别使用黑色板岩，片岩或绿泥片岩，佛像瘦削而有棱角的胳膊弯折成三角形，抽象的平行衣纹使之显得僵化生硬。

第一组中罕见身着袈裟的立佛像：大窣堵波 4 壁龛上二次使用的大浮雕板中佛陀立于莲花之上，两侧各有三排供养人占据整个场景（图 103）；另有一尊小佛像，与前者近似（图 104）。

---

〔1〕 Lohuizen-de Leeuw, 1981, fig. 34; pls. CCXIII, CCXIV.

图102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浮雕板残段，上刻华盖下的菩萨立像和供养人

综上，可以谨慎地推测，布特卡拉一号遗址第一组石刻上较常见坐佛像，罕见立佛像。通过个别佛像造型判断，它们或出现于公元1世纪中期前后。然而，如果赞同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上出现佛像的观点，那么佛像在见于布特卡拉一号遗址之前就已经存在。虽然有些冒然，但也不妨将佛像的创作与“塞杜大师”或他领航的时代联系起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佛像在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上见于佛传场景中，而在上述石刻中为“无传记”人物。

以上初步勾画出公元1世纪前半叶（仅可根据科学发掘所得资料定出大致的时代范畴，缺乏确凿的年代数据），即相当于塞人、帕提亚人、早期贵霜时代的布特卡拉一号塔院建筑和雕刻艺术两大领域的图景。

观察塞杜大师的作品与布特卡拉一号遗址第一组石刻，两者的素材和构图之别一目了然，但都常见于当时的犍陀罗地区，且均是大量借鉴印度和西方古典艺术元素的传统演变而来。那么，这种传统何时并如何在犍陀罗地区兴起，以哪种形式出现，如何

图103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浮雕板残段，上刻佛陀立于莲花上，两侧各有三排供养人

发生演变并最终发展成公元1世纪中叶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上呈现出的面貌。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参考建于此时段初期、年代确定的建筑以及更早期的建筑如布特卡拉一号的圆柱和塔克西拉的佛教寺院等提供的重要线索。

考察布特卡拉一号遗址第一组石刻作品的形成及出现时间，需将之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对它们的评价应以其自身为标准，视作独立的整体（犍陀罗内的犍陀罗）。开展综合研究必然伴随着对其他类材料（如陶器、印章、化妆盘等）的考察，同时需要考虑宗教、仪轨、社会和历史等层面；巴克特里亚与印度—希腊、东部希腊化与小亚细亚、伊朗与罗马等不同文化何时、如何出现，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地社会；佛教在这些地区的存在和渗透力，呈现的形式及接纳与支持它的社会阶层（经济、政治、宗教）；

图104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立于莲花上的立佛雕像

而所有这些考虑均需被纳入“毕竟是一我们不应忽视的一印度”[1]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世界中。以上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和内涵已被富有见地的重新探讨过[2]。最后需要考虑的是，第一组某一时段的石刻中出现的佛像，其类型和数量都很有限。然而，雕刻作品和建筑如何并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以上提及的不同情况并将之辨识出来，这一基本问题也无法回避。

研究这些多样复杂的石刻需要重建始于布特卡拉一号，延伸至斯瓦特及邻近河谷，之后辐射波及整个犍陀罗地区的不同雕刻中心[3]。首先考虑每一雕刻中心及其石刻作品，而后寻找它们之间的共时与历时关系，避免将我们的范式与理论强加到古代石刻上，否则会抹杀它们的特性，错失发现突破口的良机，甚至混淆艺术作品的承继关系（此类研究中容易出现的严重问题）。因而，为各个雕刻中心的石刻资料建立相对年代序列及可能情况下的绝对年代十分必要。这显然会成为比较研究雕刻中心之间的石刻作品以探寻影响、流布、传播等问题的前提。若此，将会更好地理解不同地区的石刻，并建立起可将犍陀罗地区多处雕刻中心、分支及与周边雕刻中心关系密切的所有石刻作品纳入其中的历史框架。最后，这一研究可折射出斯瓦特地区特别是布特卡拉一号雕刻中心石刻作品在如此广阔、绚丽、复杂的历史框架中曾扮演的首屈一指的角色。这项工作无疑艰巨且漫长，但却是我们寻求真相的唯一正途。

---

〔1〕 Lohuizen-de Leeuw, 1972, p. 43.
〔2〕 Fussman, 1994.
〔3〕 Errington, 1987; Swati, 1997.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及艺术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

法切那、卡列宁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位于分隔塞杜河谷与江布尔河谷的界山山脚下（图105）。附近还有一处古城址，图齐推测其为瞢揭釐[1]，曾是斯瓦特地区核心城市之一。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占据了山坡上的两级台地，北切岩体，南临季节性河流（图106、107）。1963年和1966年意大利考古队先后在此处开展了考古发掘。两次发掘揭露了由大窣堵波及其周围附属建筑占用的较低一级台地，也称作塔院台地[2]。1977年至1982年发掘的重点是较高一级台地，因清理出一座僧院而称为僧院台地[3]。山坡上还散布多处或为小精舍的建筑遗迹，其中部分与河流上修建于古时的"堤坝—水库—桥梁"曾被调查过[4]。

一、大窣堵波

塔院台地上的大窣堵波平面近方形（21×20米），北侧设踏道[5]（图108、109）。用滑石片岩石块垒砌而成，目前只保留第一层圆柱形塔身的局部及其踏道，而上部的塔身、覆钵、千枚岩石板叠筑而成的方形平头以及塔刹均已塌毁，仅存部分平头和塔刹残段。滑石栏楯沿踏道两侧树立，向上延伸至近方体基座的边缘并环绕一周。大窣堵波的某层圆柱形塔身上原装饰有绿泥片岩横饰带，由两排构成，一排为场景连续的浮雕板，一排为假栏楯纹样，后者位于前者之上，是不同复原方案中相对合理的假设。

---

〔1〕 Tucci, 1958, pp. 285–88.
〔2〕 Faccenna, 1995a.
〔3〕 Callieri, 1989.
〔4〕 Callieri, 1989, pp. 47–50.
〔5〕 Faccenna, 1995b, pp. 431–575.

图105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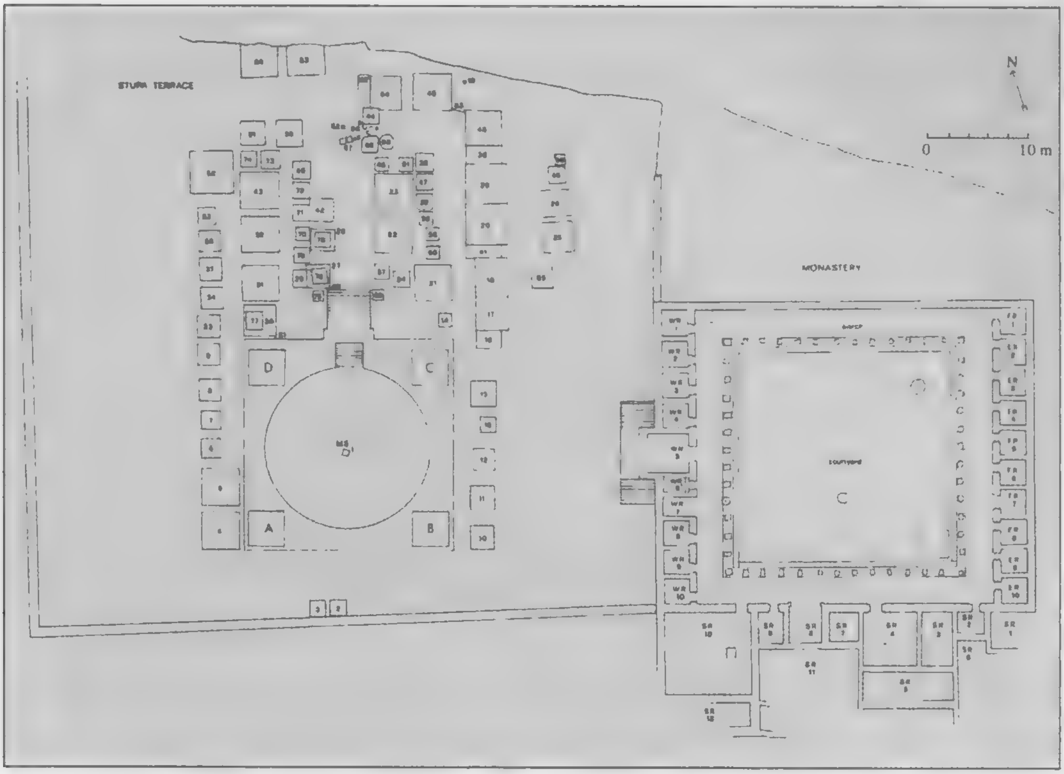


图 106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平面布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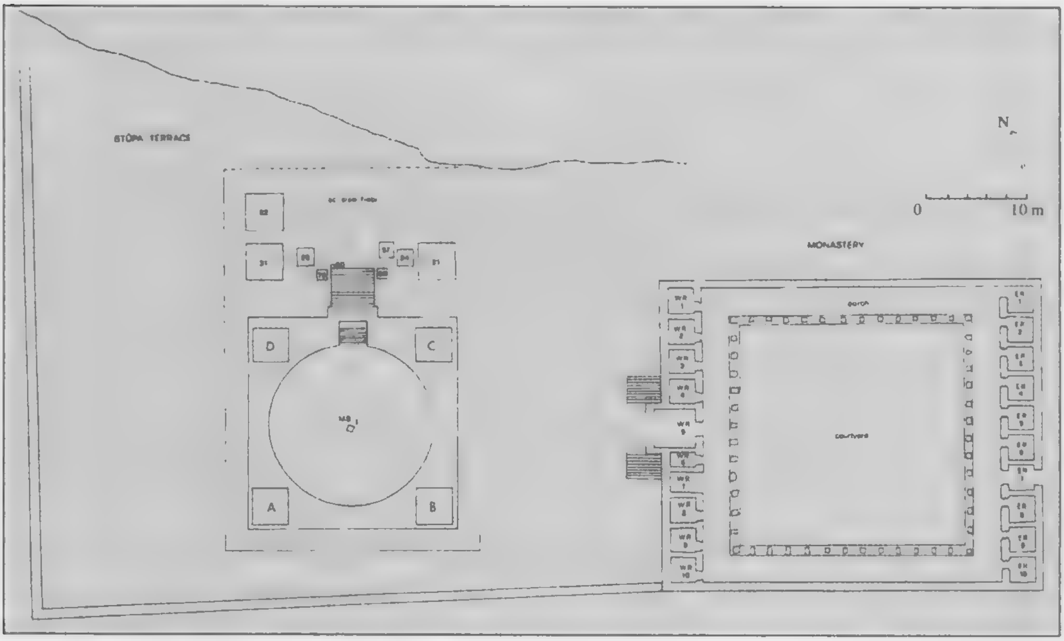


图 107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第一期平面布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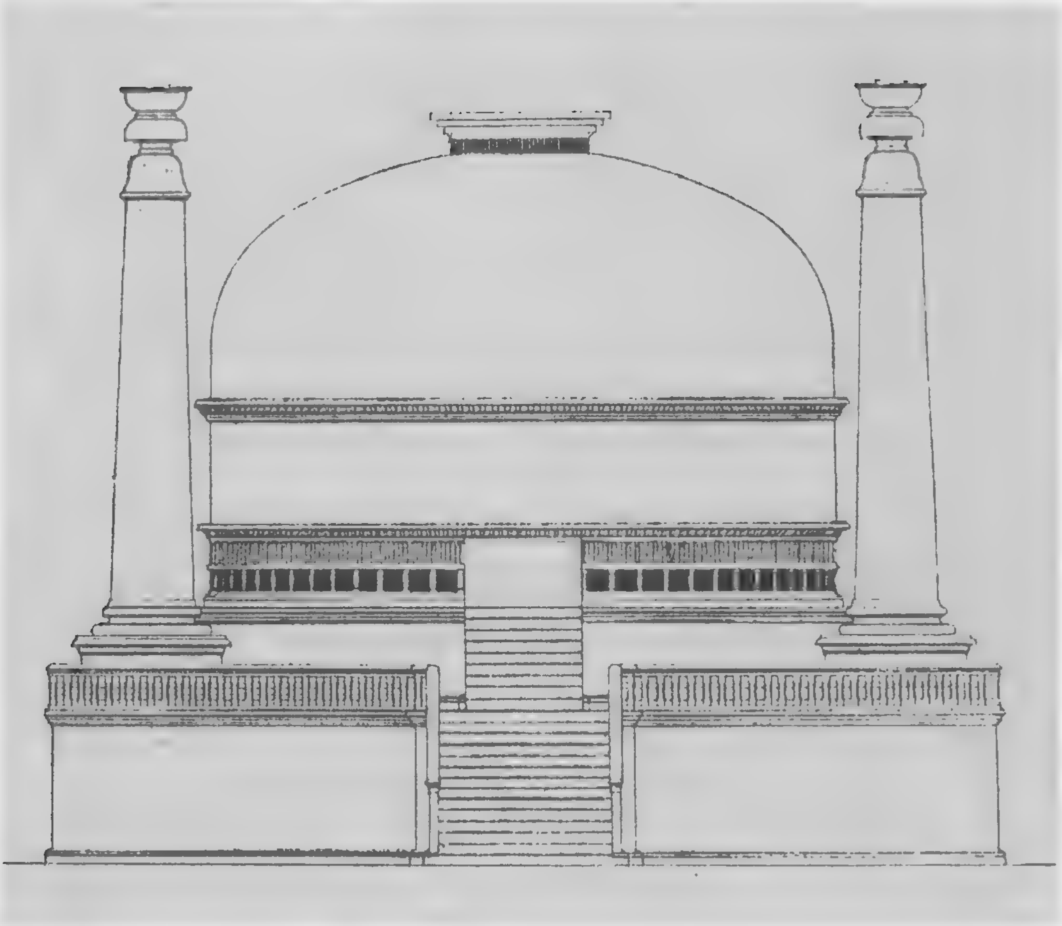


图108 塞杜沙里一号大窣堵波立面复原图

大窣堵波方体基座的东北角上露出一处方形遗迹，南、东、北（踏道之东）侧的台地地面上有倒塌的圆柱堆积，由此可知大窣堵波方体基座上的四角原分别立有一圆柱[1]。圆柱的束腰方体基座上或有一爱奥尼克式（础座、凸圆线脚、枭线）柱础；滑石制成的柱身和柱头幸存有残段，柱头为犍陀罗—波斯波利斯式，其钟形、覆钵形部分被保留，现已不存的杯形部分上可能原承托一蹲狮像。圆柱通高约为8米，或许高至大窣堵波平头或塔刹的起始处。

不难想象大窣堵波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之强：高大的基座上赫然撑起硕大的圆柱形塔身和覆钵，双层踏道给人以向上攀升之感，又被其上高耸的塔刹加强；四角的圆柱进一步强化了向上的动感，但至柱顶的蹲狮雕像处骤然结束，似乎将大窣堵波的主体框定起来。而视觉观感的完善还需配合颜色的使用，当时耸立在灰色片岩石板地面上的大

[1] Faccenna, 1986; Faccenna, 1995a, pp. 481－502.

图109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复原模型

窣堵波及圆柱的不同部分均施色或镀金。

大窣堵波周围及延伸至台地北侧切入岩体的空旷范围内原建有大量小型建筑，如窣堵波、佛殿、圆柱等[1]。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称立于大窣堵波踏道两侧的圆柱，年代与大窣堵波的建造和片岩石板铺砌的原地面同时。圆柱的柱础为两凸圆线脚夹一凹圆线脚（无础座），立于束腰基座上，柱头之上可能支撑一尊类似于大窣堵波基座四角圆柱柱头上的蹲狮雕像[2]。

塞杜沙里夫一号建筑的砌筑至少涉及平行六面体滑石小石块和片岩石板或不规整石片两类石材及相关技术[3]。

---

〔1〕 Faccenna, 1995a, 自第185页起。
〔2〕 Faccenna, 1995a, p. 499.
〔3〕 Faccenna, 1995a, pp. 91–101.

目前所见塔院台地的布局是历经演变的结果，其演变过程可大致分为三期[1]。第一期，大窣堵波和北界之间的建筑对称分布；第二和三期，小型建筑的数量骤增，还出现了部分晚期建筑包砌早期建筑的现象，对空间的需求促使台地进一步向北切割岩体。发掘过程中的年代信息[2]显示，第一期约为公元1世纪（更确切而言，公元25年至公元1世纪末），第二期相当于公元2至3世纪，第三期在公元四五世纪左右。

二、僧　院

僧院四周有围墙，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8米，南北宽32米（图110，也见图106、107）。东西墙内各建一排十座小僧房，北墙内无任何建筑，南侧有若干不见于第一期的房屋，规模和平面布局各不相同，或为公用场所。西侧的小僧房破坏严重，而东侧的保存相对较好，东北角处的僧房残高达2米。

除西侧中部三座小僧房外，其他小僧房平面均为方形（2.5×2.55米），具有若干值得注意的特点[3]。西侧小僧房的门靠南开，门槛分两部分，较低部分在内，被片岩石板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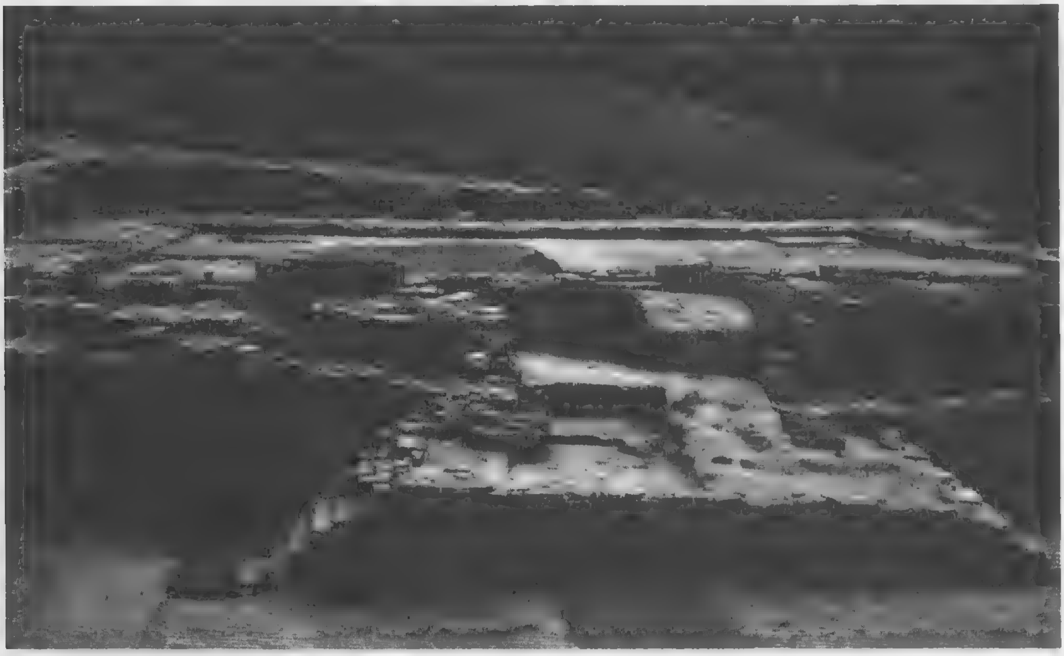


图110　塞杜沙里夫一号僧院遗址（自西向东）

〔1〕 Faccenna, 1995a, pp. 143–47.
〔2〕 Faccenna, 1995a, pp. 156–63.
〔3〕 Callieri, 1989, 自第11页起。

盖；门侧框根据门槛设计，外侧突出，内侧倾斜。东侧小僧房的门靠北开，地面和立面的垂直结构表明原安有木门框，门槛已不存，仅见其下部的石板和石块。所有小僧房内壁面不同高度处原开长方形小龛，地面上曾平整地拼铺片岩石板，其上被晚期陆续重建的石板或夯土地面叠压。小僧房内外原都建有壁炉。

小僧房和围墙前有一宽约3米的回廊，其内侧有矮墙。矮墙上规律地分布着作为木柱基座的片岩大石板，由石板的侵蚀痕迹可知木柱呈方形。回廊地面主要是夯土，极少铺石板，也被晚期地面叠压。

回廊矮墙外侧还有一道与之同高的窄墙，其上铺一层片岩石板，并与方木柱的基座石板衔接，整体拼接细致，形成略向外倾斜的表面，可能与回廊滴水有关。

回廊内的庭院地面较回廊地面低0.4米，庭院东南角发现一方形（2.90×2.85米）矮台，由片岩石板铺成，曾或为盥洗处。

僧院台地约高于塔院台地3米，西侧有一道高大的支撑墙体。两处台地之间由一踏道连接。踏道倚墙建造，于南北两侧设台阶，汇合处的月台通向僧院西侧中部较大的僧房，而后可进入回廊。在较大僧房的南侧有一稍小的僧房，其内尚保存一级台阶，可能向上通往屋顶或第二层，虽未留下痕迹，但犍陀罗地区的僧院通常有两层[1]。僧院原有另一门道，开在东侧一小僧房的东墙上，将回廊和僧院以东的建筑群连接起来，但在晚期被封堵。门外的山坡侵蚀严重，只留下两条残存若干片岩石板的小径。

为考察僧院台地的地层剖面及建筑的地基结构，开挖了若干条探沟，发现一些重要信息[2]。僧院建造于公元前2至前1世纪的墓地台地上[3]，侵占了墓地的空间[4]。但墓地中最晚的一座墓葬又打破了僧院台地回廊东南角的基坑填土层[5]。

僧院建筑群的砌筑技术相当一致，皆由中小型石板精细垒砌而成，但靠近大窣堵波的西侧建筑所采用的技术更为精致，墙壁转角处皆用石板交错垂直搭接。

通过地层学和建筑之间的关系分析，可划出僧院发展的三期[6]。第一期，公元1世纪左右，建造了长方形围墙和东西侧的小僧房，结构规整，空间宽敞，和占地面积相比，僧房的数量相当少，可能是内有庭院类精舍的最早实例之一。第二期，约公元2至3世纪，相继增建了南侧的共用房屋。第三期，约公元4至5世纪，僧院衰落，南侧建筑群倒塌，缩减至原初规模[7]。

---

〔1〕 Foucher, 1905, pp. 114–15; Marshall, 1951, p. 382.
〔2〕 Callieri, 1989, pp. 69–85.
〔3〕 Noci *et alii*, 1997.
〔4〕 Schopen, 1996; Faccenna, 1997a.
〔5〕 Callieri, 1989, pp. 131–32; Noci *et alii* 1997, p. 21.
〔6〕 Callieri, 1989, pp. 105–11.
〔7〕 Callieri, 1989, pp. 117–20.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

法切那、菲利真齐

塞杜沙里夫一号塔院内出土了一批用于装饰大窣堵波的浮雕板和建筑构件（第139—157页，附图1—33）。雄伟的大窣堵波从基座至覆钵顶通高达14.5米，其建成之初必是耀眼夺目，从远处即可望见洁白的墙壁、升至塔刹处的朱红圆柱（复原后约13.75米高）以及北侧的踏道（见图109）。

带基座和檐口的第三层圆柱形塔身上原有一条较宽的绿泥片岩横饰带，包括上下两排（图111中编号3的部分）：下排被带边框的犍陀罗—科林斯式半圆柱分隔成多个场景，上排内雕刻假栏楯纹样。

将上下两排构成的横饰带安装在大窣堵波第三层塔身上是众多复原假设中最接近实际情形者[1]。横饰带作为大窣堵波的原初装饰，与它的建造同期[2]。

推测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的年代为贵霜之前的塞人和帕提亚时期，而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被定为此时期的末段，与之同时的还有其他窣堵波（编号21、31、32、57），带基座和凹圆线脚柱础的圆柱（编号24、29），以及踏道旁侧的小型建筑（编号69、75）。这些建筑可被归入公元1世纪前半叶前段，后来的建筑则属于后段，接近公元1世纪中叶。

一、横饰带连接结构

如前所述，装饰大窣堵波第三层圆柱形塔身的绿泥片岩横饰带分为层叠的上下两排。下排由带雕刻区的浮雕板组成，每块浮雕板左侧有一叠涩边框内的犍陀罗—科林斯式半圆柱（见附图30），浮雕板排列有序，水平连续地展示了佛陀从诞生到涅槃的场景（见附图1—29）。尽管已发现了百余件残段，但未拼合出一件完整的浮雕板。这些

〔1〕 Faccenna, 1995a, Appendix A, 529–540; figs. 257–259.
〔2〕 Faccenna, 1995a, ch.15, Appendix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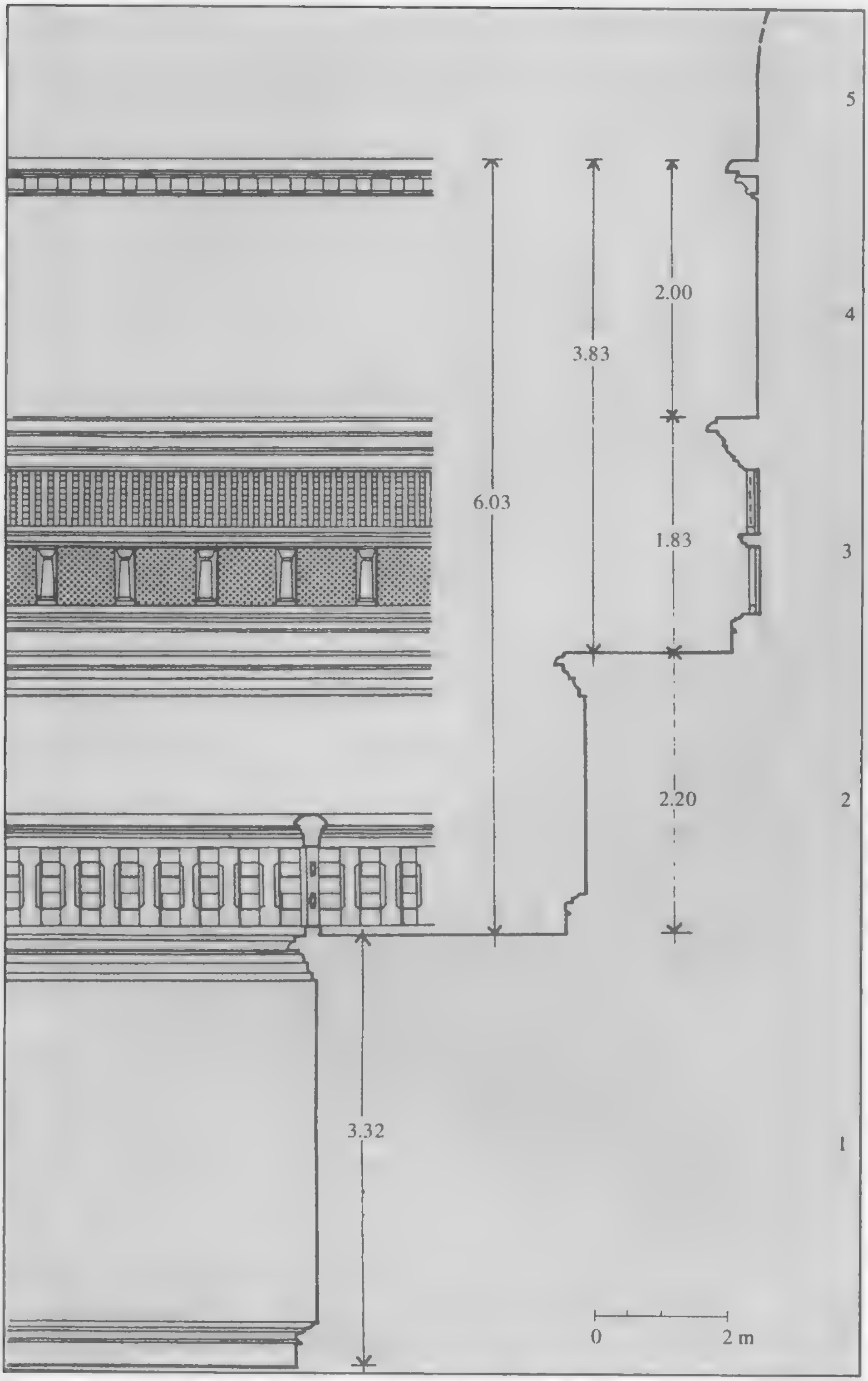


图 111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上的装饰复原正面图

浮雕板彼此连接，高45.5厘米，复原后长65厘米，60至65块绕塔身一周，总长约42.4米；安装于素面底座上，上方是装饰二方连续莨苕丛的檐口（见附图31—33）。

上排雕刻由横楣连接方柱式竖栏构成的假栏楯纹样，约有80件残段存留，同样有素面底座和装饰二方连续莨苕丛的檐口，此外，方柱式竖栏底部还刻有便于组装的标志。上排与下排的连接结构不同（图112），檐口下缘装饰二方连续短条和方锯齿纹[1]。假栏楯中实与空，光与影的节奏性交替变化产生一种宏伟华丽的生动效果，当时可能还被彩绘或镀金表面渲染强化，仿佛是以愈来愈密集的线条和空间终结于方体基座上的栏楯，续以横饰带下排带边框半圆柱的旋律。

横饰带上下两排的多数残段出自大窣堵波邻近地区倒塌或冲积形成的地层中。其中部分残段上有二次使用痕迹，还有一些残段发现于晚期建筑上[2]，暗示出大窣堵波彻底废弃之前出现的局部坍塌等不同状况。

残段皆为颜色相同或稍有差异的绿泥片岩，具有相同的结构构件、尺寸、加工技法等，这些外在和内在的特征清晰地表明它们属于同一整体；而且很容易据之将其从塔院内发现的大量石刻中辨识出来。只需知道这些以及诸如连接顺序、数量、尺寸、曲度等信息，即可断定它们属于大窣堵波，而非其他建筑。

因此，就横饰带的下排而言，除带有连接构件（连续榫和槽，连续扣接部和凸部）的残段外，或许还可纳入一批四边破损而缺乏结构特征的残段。通过对它们的外在因素（如对眼睛、服装、装饰的刻画，构图，人体解剖以及工艺技术等）的形式与风格的综合分析，也可在很大程度上确认它们属于此排。

横饰带的浮雕板、底座、檐口等组件单独制作，而后依其上的标记按顺序组合在一起安装到大窣堵波上。通过对结构构件的分析，可以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理解组装和安装方法，判定它们的连接序列，进而复原整个横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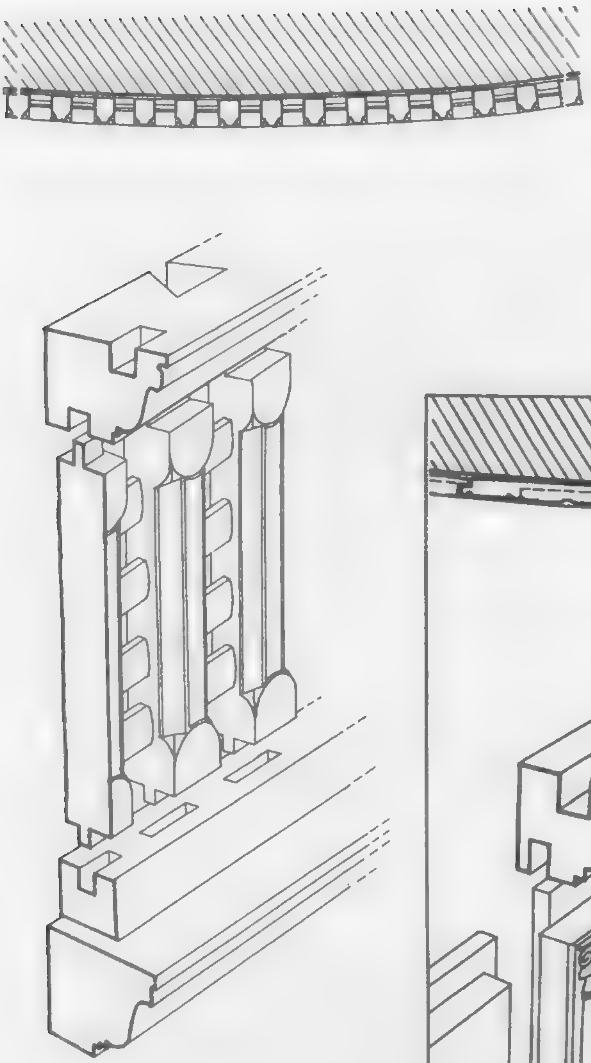
每块浮雕板的顶部和底部各有一个水平连续榫，底座和檐口的相应部分各有一个水平连续槽用以水平啮合（见附图32）。浮雕板左右侧的彼此连接采用另外一种方法，即垂直连续凸部和扣接部的垂直搭接。因此，就有两套连接方法将众多浮雕板彼此连接起来并安插在底座和檐口之间（图113）。这种做法无疑巧妙高明，易于操作，仅通过上下左右移动调节浮雕板便能确保每处细节的精确完美。

每块浮雕板的上部均有一个小孔（剖面呈方形或圆形）用来安插钉子，以利于在组装浮雕板时使其固定并调整至垂直。

---

〔1〕此类装饰也见于布特卡拉一号的窣堵波，如第14号窣堵波第一层塔身檐口，第17号窣堵波第二层塔身檐口。

〔2〕Faccenna, 1995a, ch.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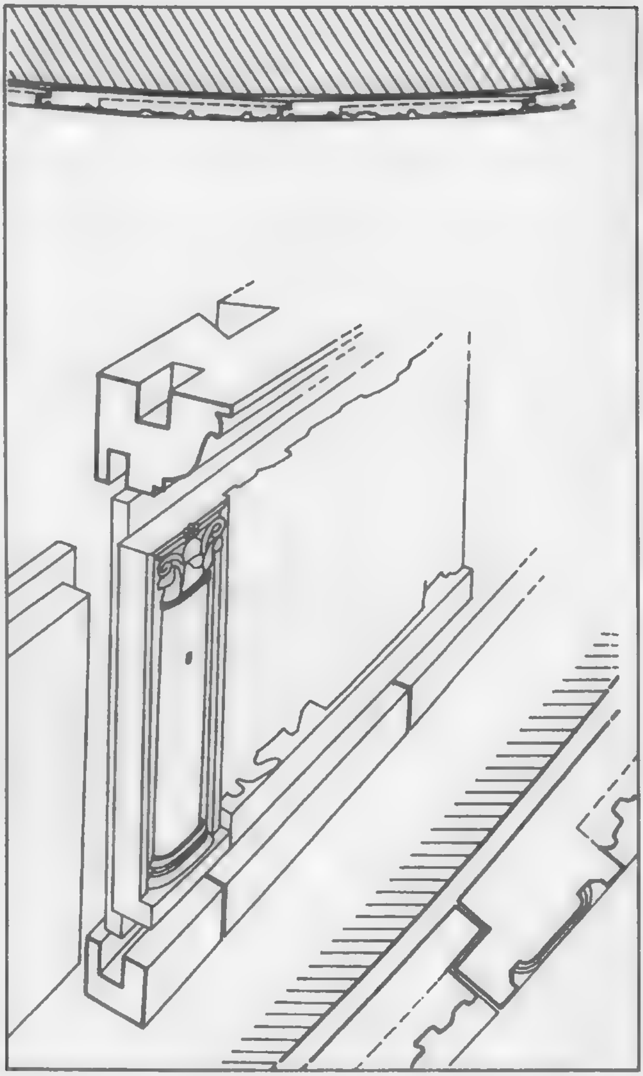


图112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上排组件彼此连接以及与大窣堵波壁面连接示意图（左）

图113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下排组件彼此连接以及与大窣堵波壁面连接示意图（右）

浮雕板安装在底座上，凸榫插入槽眼，就与大窣堵波的壁面分开，间距为底座背面连续槽眼的距离（平均1.2厘米）。檐口组装到浮雕板上部时，必须将浮雕板临时固定，此时钉子就发挥了作用，既将浮雕板稳定，又保持其垂直。

檐口上部内缘中间处还预留了一个安插楔形扣钉的楔形槽（见附图33）。当楔形扣钉插入大窣堵波墙体时，相关浮雕板便被牢牢地连接在石头建筑上以免滑落。石质或木质的扣钉很容易固定在用滑石片岩等较软石材砌筑的大窣堵波墙体上。

因此，可以断定塞杜沙里夫一号横饰带的安装与大窣堵波的建造不同步，而其他窣堵波的建造和横饰带的安装通常同时进行。

虽然尚不确定大窣堵波横饰带的底座、浮雕板和檐口安装顺序，但底座最先组装，浮雕板和檐口之后一起安装的可能性较大。采用上述连接方法将横饰带所有组件锁定在一起使之独立于大窣堵波墙体，从而避免后来的砌筑工作破坏这一精巧易碎的艺术品。鉴于此，推测横饰带的组装工作应开始于大窣堵波主体工程竣工之后。

上文展示了组装横饰带的最佳方式。既没有被固定在石头建筑上，组件之间也没有被牢固锁定，而是通过许多巧妙的办法使整套组装工序简易便捷：底座放置在一起但不连接，其连续槽可以使浮雕板下部的连续榫来回移动，浮雕板两侧的垂直连续凸部和扣接部之间预留出可调节的空隙，又因其与墙体保持一定距离，使得调节更为简易；钉子将浮雕板临时固定起来并微调使之处于垂直状态，而后浮雕板上部的连续榫套上檐口的连续槽，最终在檐口的楔形槽内插入扣钉从而将全部组件固定在大窣堵波墙体上。全套操作展示了周密的技术、高度的精确、专业的工匠、系统的工作流程，想必只有良好的艺术氛围才能孕育出来。

由于组件单独制作，这就要求预先规划。组装它们也需要准确无误的步骤，按照组件上的刻划标记进行。这些标记在浮雕板和檐口上均有发现，但却不见于底座，原因显而易见，后者彼此之间相互独立，也不与石头建筑相连，易于识别。

浮雕板上的标记刻在每一半圆柱柱础的凸圆线脚上，有左右两个，应分开解读，右侧标记可能代表此浮雕板，而左侧则表示左邻浮雕板。檐口上的标记出现在正面下缘的两端之一。将标记与上述其他细节一并考虑，则会发现工匠为制作出完美的横饰带所付出的细致与耐心。

底座和檐口上的水平连续槽稍有弧度，在侧面更为明显。尽管不易察觉，浮雕板也有同样的特征。较小的弧度反映出为符合大窣堵波的大圆弧而采用的相应装饰。

除弧度外，横饰带属于大窣堵波上的装饰还由带边框的半圆柱可知，它们重复而无变化、以均等间距将场景有节奏地串联起来，在破碎的浮雕板残段中，这种不变性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保存完整或仅留上部包括柱头的半圆柱共有20个，其中4个保存状况更佳。与之相对应的每块长65厘米的浮雕板连接起来长达13米。这一总长也证实了

横饰带当属于大窣堵波第三层塔身，其复原直径约为13.48（13.50）米，周长42.4米[1]，据此完整的横饰带应包括65块浮雕板。

二、横饰带场景

幸存的资料虽然丰富，却相当零碎。仅有少量残段上保留的场景是可以确定的，还有部分残段的场景可推测得出。这两组残段可断定为或小心推测作佛陀生平的特定场景，另外还有大量碎片，除个别外，场景皆无法辨识。

将前两组残段和第三组个别残段放置到横饰带的合适位置，需综合考虑残段的出处以及场景所表现的故事情节（图114）。对（也仅限于）幸存的浮雕板残段进行类别划分。所有人像（男性包括成年或青年、骑士、武士、猎人、僧侣、苦行者，女性和神祇）及他们穿戴的服饰，均对应着能够使我们确定其所属场景并通过不同形态辨别其角色的类别。除此之外，其他元素（如动物、树木、建筑、家具和物品）也有助于确定无法识别的场景。类别划分除其内在意义外，还为复原横饰带提供了关键线索。

尽管场景采用熟悉的构图，其中却未发现太子像。表现路遇猎人场景的浮雕板残段中保存一站立男性像的双脚和内衣下缘（见附图8），据此类场景的常见构图为太子位于一群猎人之前（图115），而推测其为太子显然不够充分，不过这是所有残段中唯一可能者。幸存的较大残段或保留了场景右侧，或左侧，皆无中间部分，而较小的碎片也无法拼合出完整场景。车匿返回王宫时携带的宽大扇形物和带前饰的王冠或提示了太子的存在。

因此，如何表现主角佛陀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只能推测根据他最后生活中的不同角色，通过象征符号或人物形象来表现。然而这两种形式都隐藏于横饰带场景中，若要发现答案，需将该地区雕刻中心所有残存石刻一并纳入考虑范畴。

（一）确定的场景

均根据常见的佛传序列，如乘象入胎（见附图1），白象冠头光且出现于屋檐下方（图116）；太子降生人间，因陀罗以布帛托举（图117，也见附图2）；提婆达多杀死大象，难陀拉其尾巴将之拖走（见附图3）；两个竞赛场景，前者表现一人跌倒，年轻人向其泼水（见附图4），后者表现立姿或坐姿人物以及一年轻旗手（见附图5）；太子出家，身后有一安睡的女性；与爱马犍陟诀别（见附图6）；车匿返回王宫（见附图7）；太子路遇猎人并交换衣服（见附图8）。佛陀涅槃后的事件，如八王争舍利（见附图9）；载舍利回国，包括骑象的上军王及其他骑士（见附图10）。

---

〔1〕 Faccenna, 1995a, p. 517; figs. 245, 523－525, 526; note 1; Faccenna, 2001, pp. 4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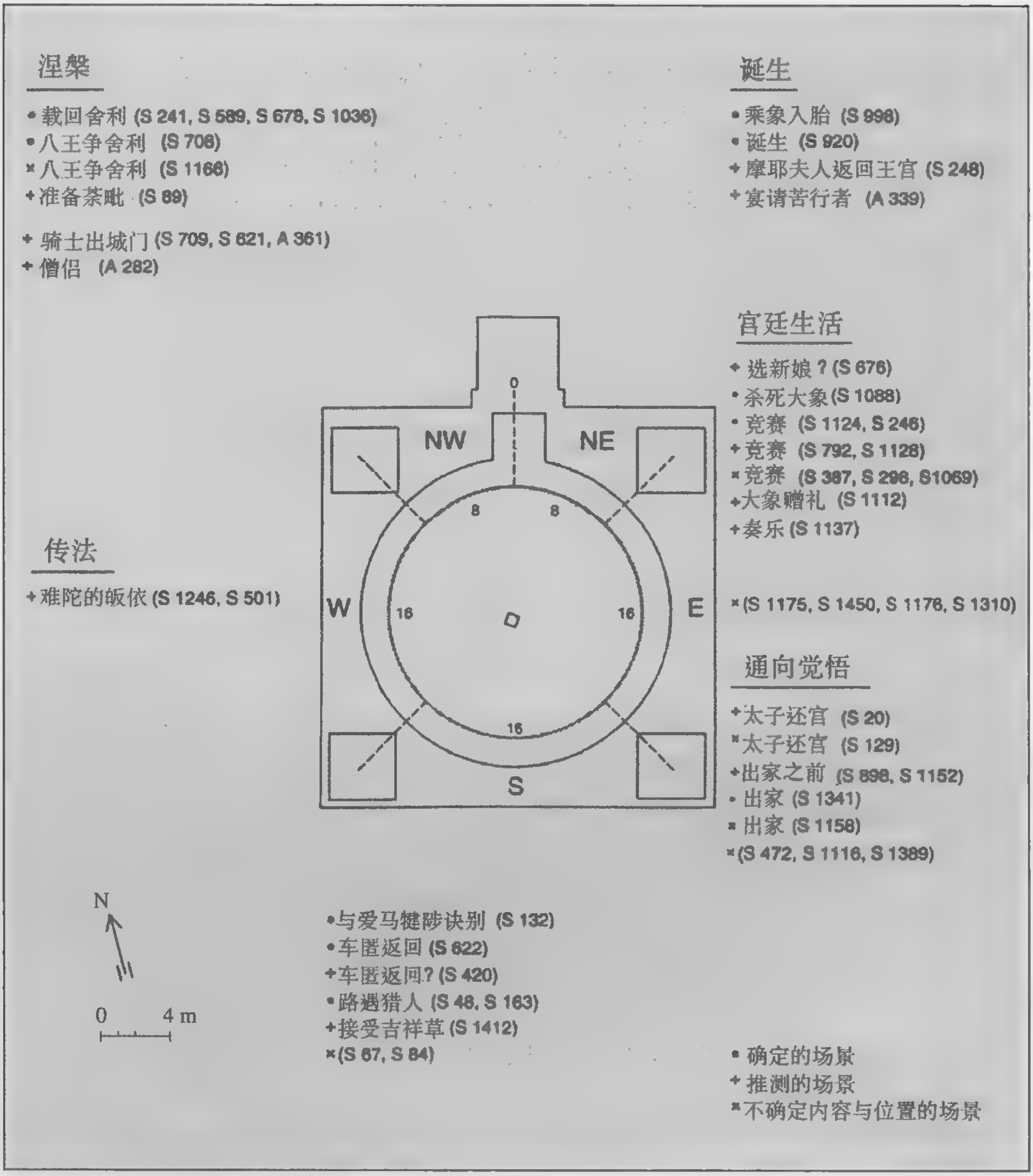


图 114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下排场景假设复原示意图

（二）推测的场景

第二组浮雕板残段所见场景的辨识包含一定假设。

表现佛陀出家之前的故事情节可能包括：摩耶夫人返回迦毗罗卫城，太子婚礼，赠送大象，王子们抵达拘尸那竭罗城或其他事件，苦行者在宴会上庆祝太子降生或婚礼（见附图 11），挑选新娘（见附图 12）。

图115 尼莫村出土的编浮雕板残段，表现太子路遇猎人并交换衣服的场景

图116 出处不明的浮雕板，表现乘象入胎场景

图117 罗里央唐盖出土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太子诞生场景

若干刻有太子青年形象的残段可归入与竞赛相关的事件，拔河比赛（见附图13或14），其时净饭王赠予太子大象（见附图15）。

另有表现太子还宫的场景（见附图16），宫廷宴乐生活场景（见附图17、18），逾城出家及车匿（？）返回王宫的场景。

出家之后的事件有：接受吉祥草（见附图19），难陀的皈依（见附图20、21），向僧侣讲法，有一骑士离开城门的场景仍存在争议，另一场景或为准备荼毗。

三、横饰带中场景的安排

识别出浮雕板残段的若干场景后，便可推测横饰带上的图像程序[1]。依据浮雕板残段出土地点，将其定位在横饰带上相应位置处，从而标定出图像程序中的某些节点。可以确定横饰带始于大窣堵波第二层踏道抵达第三层塔身处，起点可能在踏道中轴线对应的大窣堵波墙体上，如果此处开龛置像，也可能在壁龛的东侧。而后沿顺时针方向，依右绕礼拜的方式展开，最后回到踏道西侧。

根据上述确定的场景和推测的场景，横饰带的图像程序或如下（见图114）：

从踏道东侧开始，东北侧和东侧区域排布一系列佛诞题材（如摩耶夫人梦象、降生、宴请苦行者、摩耶夫人返回），出家之前的宫廷生活（选新娘、奏乐、杀死白象、竞赛、赠送白象），以及通往初禅的路上和出家；接着，南侧是诀别爱马犍陟、车匿返回、路遇猎人、接受吉祥草，然后通过若干传法场景，至西侧（难陀的皈依）和右旋礼（准备荼毗、分舍利、骑士启程、上军王和骑马的王子们载回舍利），最后在台阶的西北侧结束。

佛教典籍和石刻资料均揭示以上是流行于西北印度常见的传记故事。图像程序确定后，依照图像位置与类型学分析可将第三组内个别残段定位在横饰带上。

四、横饰带的艺术价值

以下概述横饰带的特殊艺术价值。

或为竞赛时赠送大象的场景中（见附图15），刻有一站立男子，身着垂至膝盖且平行衣褶至末端呈圆齿状的内衣，佩戴璎珞，头巾有竖直翼、装饰区及向后弯曲的冕，脸型长圆，充满阳刚之气，双眼较长且稍微倾斜，内刻瞳孔和虹膜，身材高瘦，肌肉丰满有型。左腿侧向一旁，右肩向后，面向左，整体线条如上升的螺旋线。左侧有一武士，披菱格甲，胸前有圆护，头巾与之有别，以一块布缠裹头部，前有交叉带、圆冕及下颚带。

---

〔1〕 Faccenna, 2001, p. 217.

武士身后是若干排头部等高的人像。

螺旋上升的动感也见于交换衣服的场景（见附图8），猎人穿托蒂，外衣边缘有刻画细致的垂饰。竞赛场景中年轻的旗手再次展现了动感（见附图5）；前排坐者躯干弯曲且前倾、右臂支在膝盖上，头巾有竖直翼、装饰区、扇尾和凸起的冕；后两排站立人像仅露出躯干或头部；面部不同朝向弥补了表情的单调：第二排皆面向右，越靠近他们的关注点，头部越倾斜；其他人的目光则投向不同方向，似乎漫不经心地张望远处。

有一残段保留了一位中年运动员形象（见附图14），因长期锻炼而形成强健结实的肌肉，发型与身后的年轻人相异。其中值得一提的菩提树的树枝被孔雀压弯，羽毛由带尖头的工具精密细致雕刻而成。骑士出城门的场景中（见附图22），前排有三位胸部和头部朝向各异的领头，以城门横梁为参照的前、下、后方表现穿过城门的行进队列，城墙的透视线在远处汇于一点，增强了整个场景的纵深感。

分舍利场景中两位战斗勇士的构图十分复杂（见附图9）。值得注意的是对两人胳膊的表现，交叉扭至左边，用力揪住对方，肌肉隆起。

精巧细致的技法也体现于吹奏横笛者的睫毛上（见附图17），情感和年龄的迹象一并显露在看到戴头巾的车匿返回城中的女性面部（见附图7）。螺号吹奏者半闭的双眼，鼓胀的双颊也是敏锐洞察力和精湛技法的注解。

这些对细节的处理尤其体现在一位年轻人形象上，他将水从罐中倒入对面同伴伸出的手中以泼洒在跌倒的人身上（见附图4）。年轻人的左腿抬起，侧向一边，其上支撑着水罐，背部内弯向水罐，动作自左腿起，从左肩升至低垂头部，以场景核心水罐形成一条圆弧。此件浮雕板残段构图复杂、比例协调、动感自然，折射出艺术家卓绝的创造力。

狭窄雕刻区（高0.41米，复原宽0.51米）内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场景的构成，赋予了每一单独人物相应的角色。场景构图或中轴对称，或相对，或朝同一方向。浮雕像占满了整个雕刻区，其中人像或被分成多排，后排只表现头部和躯干。当上方有树时，人像按头部等高对齐排列。树木和建筑既可指示故事的内容和地点，又是构图的重要元素。若整个场景朝一个方向展开，如竞赛场景、骑士离城场景，故事情节则占据若干连续浮雕板，此时分隔元素半圆柱，不再作为休止符，而是凸出于连续场景的独立结构。

通过叠置或并列，采用复杂透视法，以及表现具有动感的人物形象等使所有场景竭力突破平面维度创造出空间感。空间感、多种构图、动感和张力的确赋予了场景生命，并与精湛的技术、类别和功能界定清楚的素材相匹配。整体构图与细部描绘均体现着秩序和精准。

半圆柱柱头等复现元素的细微差别显示出横饰带或出于多名工匠之手，浮雕板不同部分或亦由工匠们分工合作完成。规模如此庞大的横饰带暗示出其背后有众多工匠参与[1]，他们一同创作出特征协调、风格统一的艺术品。

因此，横饰带可被视为一件非凡杰作，而构想并使其成形者想必是一位天赋异禀的雕刻家，堪称“塞杜大师”。

五、窣堵波上横饰带的出现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标志着犍陀罗地区艺术发展至一关键时刻，其可信的年代能够作为整个地区的基本参照点。此外，横饰带记录了将表现佛陀生平的浮雕场景配置在窣堵波上的变革性发展。

印度的绕塔礼拜仪式中，因带塔门的栏楯十分重要，所有图像都雕刻于其横梁、方柱、圆形构件上，而窣堵波及其墙体则不在装饰规划考虑之内。

然而犍陀罗地区并非如此。由布特卡拉一号大窣堵波3可知，塔门和栏楯不再出现，窣堵波之下增设方体基座。由于栏楯代表神圣区域的边界，故被转化成其他形式得以再现：或被配置在窣堵波方体基座上，在早期尤为常见（西尔卡普、布特卡拉一号）[2]；或被配置于窣堵波第一层圆柱形塔身上，与其原来的位置接近；或成为窣堵波的一部分，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及美化作用；或转变成半圆柱，并结合多利安式装饰构成窣堵波圆柱形塔身下层饰带；或变成装饰图案，见于小型窣堵波、舍利盒、建筑模型，及窣堵波圆柱形塔身上部（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其中以平头上最为多见；在上述诸多形式中栏楯的原初意义十分明显，偶因装饰过多而被淡化[3]。齐拉斯发现的摩崖石刻、一件小型窣堵波模型、秣菟罗发现的还愿碑等表明塔门有时与栏楯同时出现[4]。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上的半圆柱既保留了栏楯的理念，又融合了布特卡拉一号窣堵波上多利安式三槽线（图118）。

建筑元素被挪移至窣堵波上，随后装饰图像也被引入。这一过程始于布特卡拉一号遗址内第14、17号窣堵波，在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上雕刻的佛传场景中完成。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上以建筑元素分隔佛传连续场景的构图颇值得关注[5]。此种构图在印度既无原型，也无近似者。佛传故事在印度流行于公元前1世纪早

〔1〕 根据幸存的石刻可知布特卡拉一号和塞杜沙里夫一号雕刻中心存在雕工及其学徒的作坊。参见Faccenna, 1997a.

〔2〕 Faccenna, 1995a, pp. 566–75.

〔3〕 Faccenna, 1995a, pp. 529–35.

〔4〕 Faccenna, 1995a, pp. 279c, 284a, b, 285b.

〔5〕 Taddei,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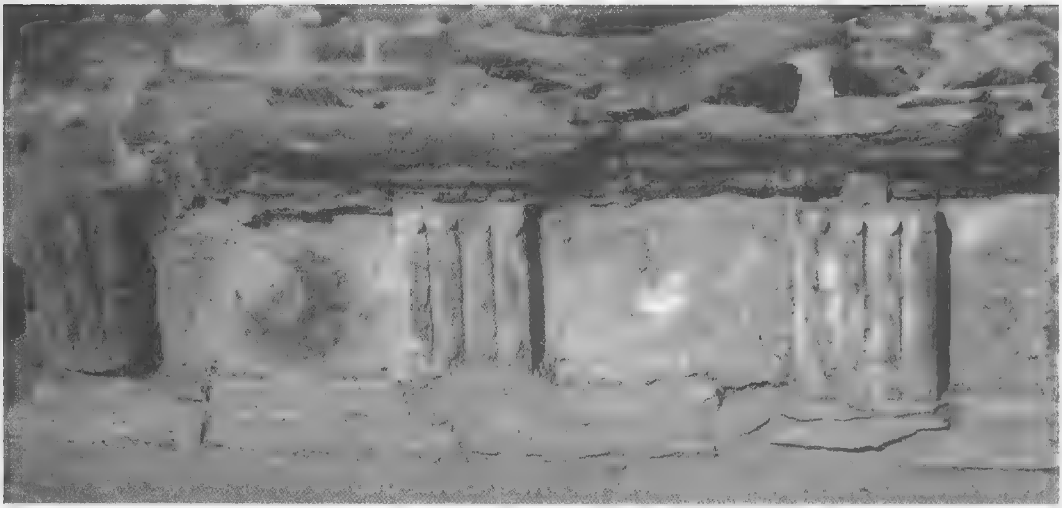


图118 布特卡拉一号窣堵波上多利安式三槽线细部

期，相当于巴尔胡特窣堵波（桑奇二号窣堵波）的年代；公元前1世纪出现于菩提伽耶、包尼、秣菟罗、阿马拉瓦蒂、阿旃陀（第9、10窟壁画）；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初见于桑奇一号窣堵波（图119）；公元1世纪中叶表现在桑奇三号窣堵波上[1]。栏楯、塔门的方柱和横梁上均刻有表现不同主题的佛传故事，但却未发现以建筑元素分隔、按时间顺序水平安排的佛陀生平场景[2]。这一构图在印度出现较晚：秣菟罗有一例，而在安得拉邦（阿马拉瓦蒂龙树窟）首次见于窣堵波上。

水平连续式叙事场景在西方亦未发现原型或近似者[3]。不过它使人联想到了希腊古风时期的多利安式装饰带，三槽线分隔的壁面上有节奏地安排神话故事；以及佩加蒙祭坛上的忒勒福斯装饰带（约公元前2世纪中期，尤曼尼斯二世）[4]。后来这些形式传入罗马，如埃斯奎利诺山发现的壁画中的奥德修斯故事场景（公元前50—前40年）[5]，共和国晚期至帝国早期（约公元前1世纪中期至公元1世纪中期）见于小画面或长卷（非连续）式壁画和雕刻，题材取自《伊利亚特》、《奥德赛》、特洛伊—拉丁人、罗慕路斯史诗，以及具有悠久传统和希腊化—意大利文化特色的罗马纪念与凯旋类绘画。然而，这些或真实或传奇的故事都不专门讲述某一人物的生平事迹。就目前所知仅有一例，见于罗马波图恩斯大街一座弗拉维—图拉真时期克里奈床式墓葬建筑的浮雕带上，场景

〔1〕 Dehejia, 1990; 1996; 1997; Taddei, 1993; 1999; 2008.
〔2〕 Dehejia，1997，提出的“连续叙事方式”。
〔3〕 Kräling, 1957; Holliday, 1993.
〔4〕 Altare di Pergamo, 1996; Andreae, 2001, pp. 136-47.
〔5〕 Andreae, 1996.

图119 桑奇一号窣堵波北侧塔门，上刻佛陀生平场景

再现了墓主从出生到受教育、玩耍、打猎、干农活直至最后死亡（克里奈床上刻画墓主形象）一生中的重要时刻[1]，但它们与其他场景一样，彼此之间并未被规律的、等距的建筑元素分开。

密特拉神像有时也表现于由建筑元素分隔的浮雕板上：神像位于中心，周围以建筑元素分隔的区域描绘从诞生到被尊崇的场景，公元2世纪下半叶左右见于西方[2]。属于同时代的斯特拉日出土的一件罗马式圆盘，其内表现朱尼厄斯·布鲁图斯的故事，场景由双圆柱分隔[3]。大约在公元4世纪，类似的构图见于朱庇特神殿的花车和圣坛石顶板[4]，以及凯泽劳斯特[5]刻有阿喀琉斯生平场景的银盘。

因此，如塔代伊阐释的，佛陀生平事迹场景被水平连续的建筑元素分隔式构图的出现或许缘于斯瓦特—犍陀罗地区多元因素的碰撞与融合[6]，可谓犍陀罗艺术的原创和特性，而年代约为公元1世纪中叶的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正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残存材料。

六、横饰带的艺术背景

若将此件横饰带置于当时广阔（但限于讨论的雕刻中心）的艺术背景中，则可更好的理解和鉴赏它。基于不同原因，将如下若干件发现于塞杜沙里夫一号和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遗址的石刻与横饰带联系起来：

布特卡拉一号的一件保存两位青年人形象的浮雕板，其一可能是太子，让人想到塞杜沙里夫一号的一件浮雕板中的年轻旗手（见附图5）；

布特卡拉一号的一组浮雕板（高0.73—0.74米），每一浮雕板上有一立像，凸出于素面背板（图120）；

以及布特卡拉一号的一件类似的刻有两位青年苦行者的浮雕板（图121）；

布特卡拉一号的两件与太子逾城出家有关的浮雕板，可能属于同一横饰带（图122）；

布特卡拉一号经复原为太子出家场景的大浮雕板[7]，由许多浮雕板组成，规模巨大，并营造出了宏伟的效果。

〔1〕 Faccenna, 1949-1950; Faccenna, 1951; Amedik, 1991, no. 178及参考书目。
〔2〕 Vermaseren, 1982; Beard, 1998.
〔3〕 Wölfel, 1997.
〔4〕 Stählin, 1906; Ensoli and La Rocca, 2000, pp. 608-10, no. 310.
〔5〕 Taddei, 1993, fig. 15.
〔6〕 Taddei, 1993.
〔7〕 Faccenna, 1995a.

图120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供养人雕像

图121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上刻两位青年苦行者

图122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太子决意出家的场景

上述例子均表明大师和工匠得天独具的灵巧双手使他们能在坚硬冰冷的石头上随心而为，而创作出非凡的杰作亦需要精湛的技术和作坊中高效的组织。他们为严苛的、不受原料限制且掌握丰富资源的赞助者服务，得到佛教团体、政治精英和权贵阶层的大力支持。

塞杜大师在这种艺术氛围中汲取营养，构建起自己的素材库，于悠久的历史传统中留下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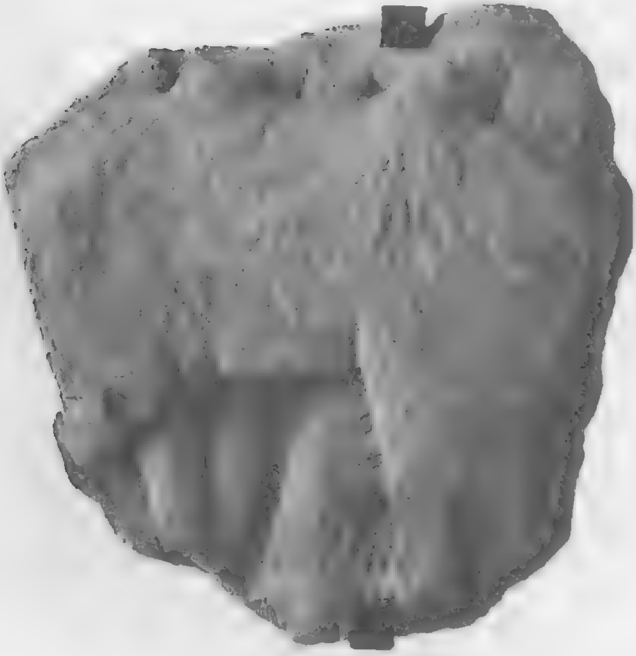
附图1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乘象入胎场景

附图2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太子诞生场景

附图3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提婆达多杀死大象场景

附图4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竞赛场景

附图5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竞赛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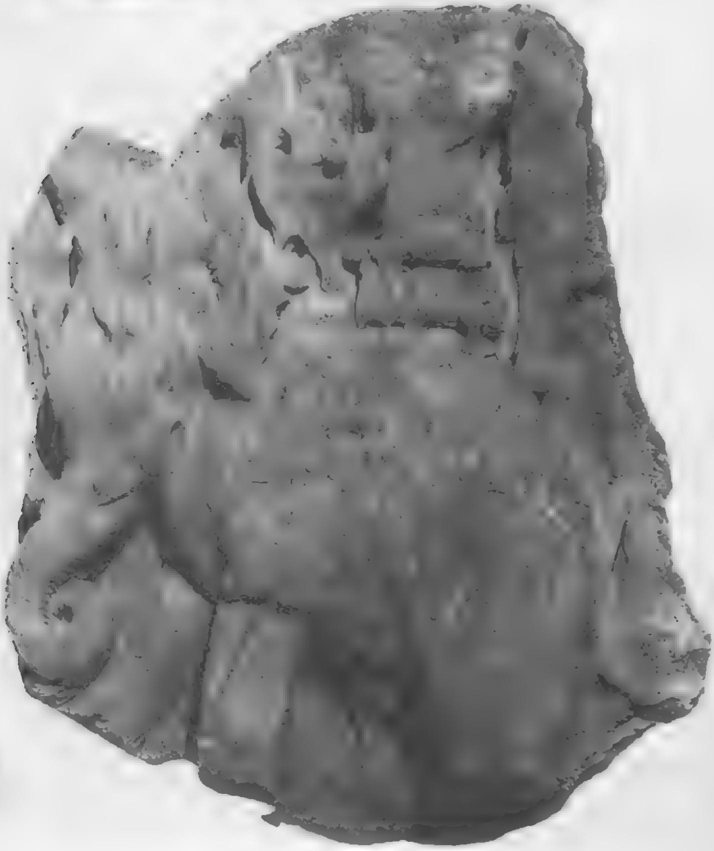


附图6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与爱马犍陟诀别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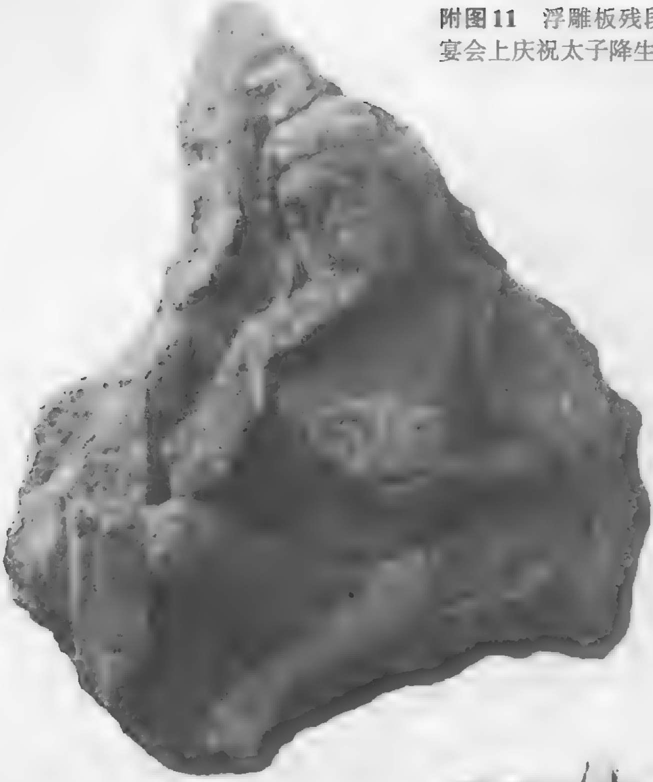
附图7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车匿返回场景

附图8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路遇猎人场景

附图9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八王争舍利场景



附图10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上军王骑象载回舍利场景



附图 11 浮雕板残段，表现苦行者在宴会上庆祝太子降生或婚礼场景

附图 12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选新娘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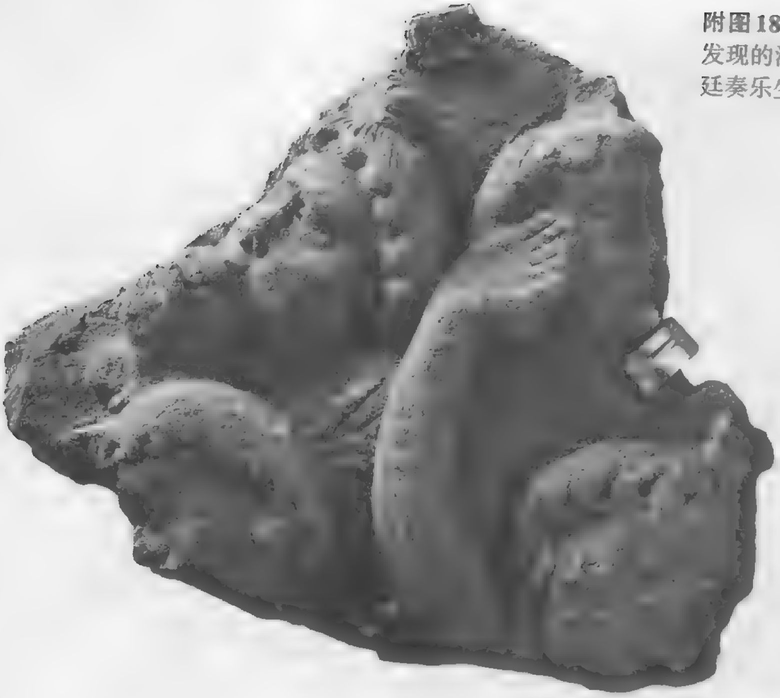
附图13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拔河比赛场景

附图14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竞赛场景

附图15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净饭王赠予太子大象场景

附图16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太子还宫场景

附图17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宫廷娱乐生活场景



附图18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宫廷奏乐生活场景

附图19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接受吉祥草场景

附图20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难陀皈依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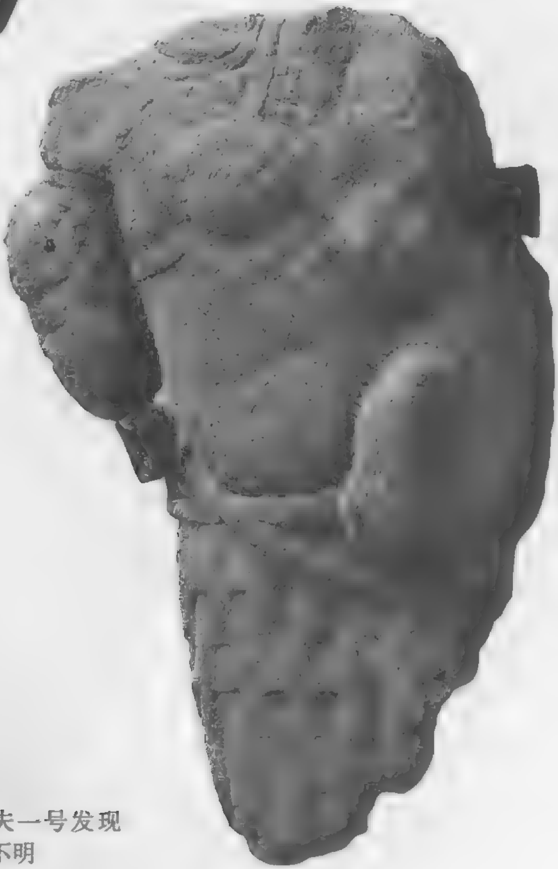
附图21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难陀皈依场景

附图22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骑士出城门场景

附图23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骑士场景

附图24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场景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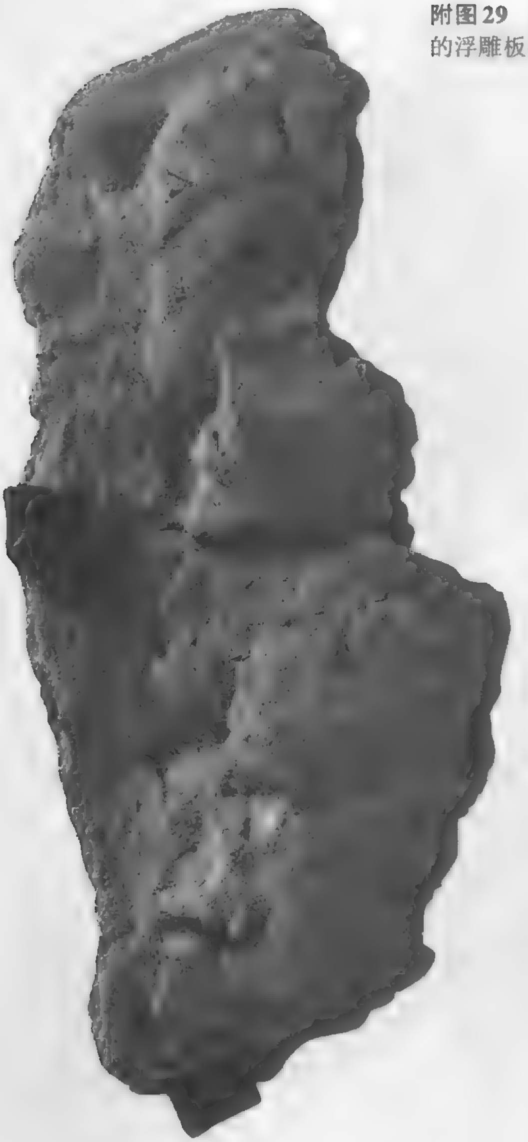
附图25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场景不明



附图26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场景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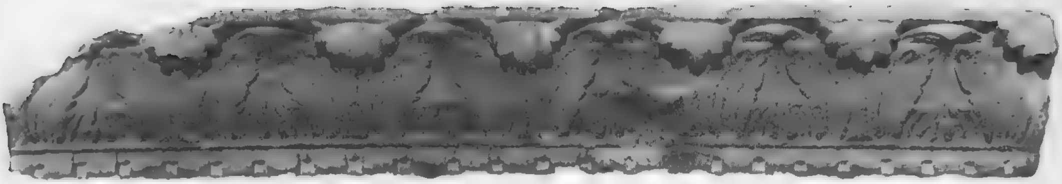
附图27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场景不明

附图28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场景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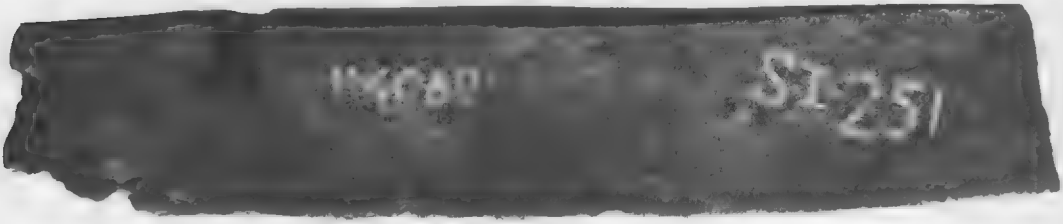
附图29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场景不明

附图30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叠涩边框内的犍陀罗—科林斯式半圆柱浮雕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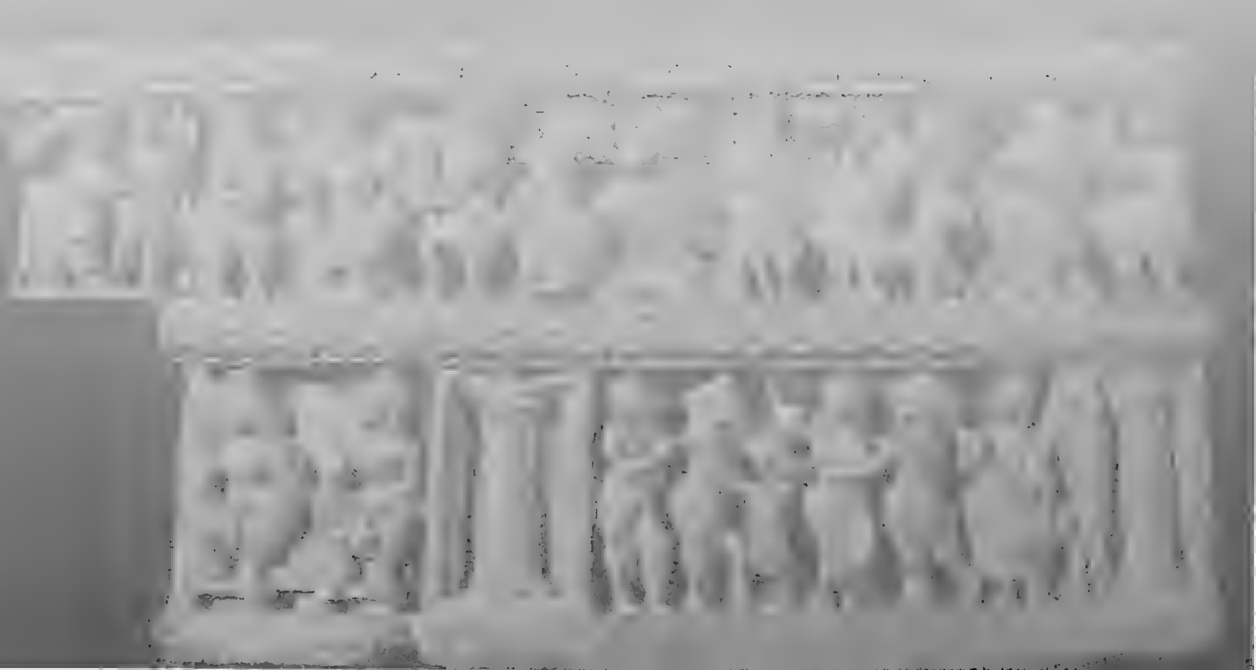
附图31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装饰二方连续莨菪叶的檐口残段，编号S 251

附图32 檐口下部的水平连续槽



附图33 檐口上部内缘的楔形槽

犍陀罗叙事艺术解析



犍陀罗的叙事艺术

菲利真齐

对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海量图像和信息的今人而言，古代世界中艺术的意义颇难把握，只能通过推想揣度，而无法拥有与古代观者相同的眼光、期待和审美心理。在那个已逝的世界里，艺术作为宣扬、传播和凝聚文化之理想工具，其社会价值远超于当下。然而，尤为困难的是，与远去的甚至和西方历史无关的时代构建关联，在试图从中搜寻差别和连接点时，不免会基于肤浅的印象和误入歧途的假设，这在犍陀罗艺术研究领域尤为突出。回顾西方近现代研究历程，已累积的经验使西方学者现在能够保持一定距离去批判地反思先前研究[1]。犍陀罗艺术给西方人的亲近感使其误以为手中攥着解读的钥匙，人们不仅识别出希腊罗马的古典符号与程式，还理所当然地认为在空间中以清晰的线性顺序安排的形象，讲述着不熟悉但容易理解的故事。不过正是这些曾诱发西方世界浓厚兴趣和热情的犍陀罗艺术的风格和图像特征，成为当下开展释读的枷锁。

自19世纪中叶发现犍陀罗艺术以来，数十年的研究可概括为若干基本点：造型与图像元素分析（尤其是希腊化、罗马、印度、伊朗等不同因素），佛像起源，题材识读，在无确切纪年比对的情况下建立起可将大量石刻纳入其中的相对年代框架。

犍陀罗研究中最不确定的因素是：尽管资料丰富，但极少或没有相关的历史考古信息。关于石刻的原初语境、地层和年代序列，甚至出处都所知甚少。因此，不难想象在信息缺乏或不足的情况下，研究者主观的意识形态倾向所占分量之大。

随着犍陀罗艺术的发现，西方世界终于在东方看到了熟悉面孔。首先引起关注的是希腊化因素，如同一件外衣披覆在印度实体上，鉴于印度内容的特殊性，犍陀罗艺术似乎更易被西方人理解。犍陀罗艺术的主角，即佛陀，及其教义与典范事迹中，西方人可轻易辨别出圣人形象——他不仅是印度，更是全人类精神遗产中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理性哲学的提倡者。

严格地从图像学角度而言，犍陀罗艺术几乎被普遍认为是首次以人的形象表现佛

〔1〕 Taddei, 1993.

陀。佛陀在早期佛教艺术（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桑奇和巴尔胡特的雕刻）中由菩提树、法轮、宝座、宝冠和足印等象征物表示。古典艺术以人为中心的特性与佛教“人文主义”的联合在犍陀罗艺术中的实现，才能赋予印度宗教艺术理念新生命，似乎是潜在的共识。同样，为人类提供行为模范的佛法，在犍陀罗节奏平缓的叙事艺术中寻得合适的环境，这种叙事艺术取材于记录佛陀生平事迹和说法，同时受到希腊历史观（尽管是神话历史）和再现历史能力的决定性影响的佛教文学。

以上是第一批伟大学者认知的犍陀罗艺术[1]。他们解读出了大部分的图像、模式、造型和风格，但也留下了一个时强时弱、萦绕不去的长期误解：即犍陀罗艺术诞生之初希腊化色彩浓厚，而后逐渐被印度元素覆盖；佛陀生平突出事件的历史化叙事中强烈的道德和说教理性主义后来被若干程式化、僵化的重复题材（重复的佛像和菩萨像、简化的神变故事）代替，折射出佛教思想向超验和救度方向的演变。

问题不在于上述重构是否正确，而在于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前提抑或相对立的观点。然而，最近几十年，许多已经改变或行将改变：尤其是得益于考古学的贡献，不仅犍陀罗艺术，而且与之有关的其他历史和文化现象的研究视角亦发生了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感知、认知能力也与以往不同，即使尚未形成新认识，但至少提出了建设性的怀疑。

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河谷佛教寺院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已将系统科学的数据分析引入犍陀罗艺术研究中。这是首次在佛教寺院遗址上展开的不以搜集陈列在博物馆的文物或揭露遗迹为目标，而是尽可能获取寺院从始建到废弃的全部资料的考古发掘。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遗址中出土的大批重要资料引发学者关注佛像起源这一尤为微妙的难题，以及更广泛的犍陀罗艺术图像与风格的演变。

布特卡拉一号遗址发现的最早佛像并非多数学者认为的典型犍陀罗作品中的“阿波罗式佛像”，而更似“印度式”，其特征接近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最具创造性的印度北部地区艺术中心秣菟罗的作品（图123、124、125）。此外，早期石刻（即法切那划分的“线刻”组，对线条的偏爱重于立体[2]）背后的图像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印度图像传统相关。这批考古资料的面世证明了戈路波[3]和库马拉斯瓦米[4]在偶尔激烈的希腊或印度佛像起源争论中始终坚持的印度秣菟罗最早“发明”了佛像的观点。

然而，如果布特卡拉一号见证了犍陀罗地区采纳了印度式佛像，那么同时也揭示出它很快被“希腊化”佛像替代。这提示我们重新思考并降低“发明”问题的重要性。真

〔1〕 如史密斯、塞纳、富歇、格伦威德尔等，详细研究和相关参考书目，参见Taddei, 1993, pp. 21–22.
〔2〕 法切那，本书第96页。
〔3〕 Goloubew, 1924.
〔4〕 Coomaraswamy, 1927.

图123　罗里央唐盖出土的具有希腊化“阿波罗”特征的说法佛像

图124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印度式”佛像

图125　秣菟罗恶醯掣咀逻发现的造像碑

正的问题更为复杂，涉及佛教整体，也就是既将以人的形象表现佛陀变成可能，又使得不仅一处雕刻中心而且整个社会都希望或至少同意此表现的佛教思想的发展。西北印度的佛陀呈现（或很快出现）希腊化面貌，更多地取决于当地显著的希腊化文化特征：出自古代巴克特里亚、阿伊哈努姆、塔科特依桑吉、铁尔梅兹和吉葛特佩地区的考古资料，以及西北印度塞人—帕提亚时期的塔克西拉，和斯瓦特比尔·科特·古万代最近出土的考古资料可为佐证[1]。文化的"希腊化"或许只影响社会中上阶层，即支持、赞助佛教的群体，而其他群体或多或少受到波及。因此，佛教及其艺术可谓纯粹的印度现象，移植入西北印度后迅速被吸收、转变、壮大，原因在于佛教（及佛教艺术和建筑）在此地觅得宣扬其普世使命的"世界语"，为其提供了走向印度以外地区的便捷工具。

传教（印度传统的吠陀教并不传播教义，而全盘吸纳当地信仰）的使命无疑影响了佛教艺术，尤其是犍陀罗地区的大部分叙事艺术，即通过讲述故事为信徒精神生活树立劝诫榜样。然而叙事并非犍陀罗艺术独有，也见于桑奇、巴尔胡特和阿马拉瓦蒂艺术

〔1〕 Callieri, 1995.

中，但它们的叙事方式差别显著，题材是传统的印度佛教艺术中共有的：悉达多太子从乘象入胎到涅槃的生平故事（譬喻），如同记录关键时刻的一帧帧照片；或他最终成佛前的每一次轮回转生故事（本生）（图126）。以人的形象表现佛陀在早期（巴尔胡特和桑奇）的缺失无关紧要，因为佛陀表现为符号而非肉体，以此强调其永恒不变的本体。早期场景通过多种方式调整"讲述"，即以综合视角总结事件，并将之概括或浓缩入独立叙事或水平连续叙事中，不一定按时间顺序展开[1]。将众多单独场景组织起来的理念在图像体系中找到了表达方式，而与题材的时间序列无关：事实上正是时间维度、事件或系列事件的发展动态被有意忽略。事件不能通过促其发生的某一或许多动作来观察，而是作为并无前因后果的独立单元存在[2]。

因此，只有从佛教艺术总体或从印度传统艺术出发，才能撷取犍陀罗艺术的独特之处：不在其内容，而在于方式。"事件"展开为尘世时空范畴内的精神传记。佛传或本生

图126 犍陀罗地区发现的浮雕板，表现尸毗王本生故事场景

〔1〕 Dehejia, 1997.
〔2〕 Taddei, 1993, pp. 26-30; Taddei, 1999, p. 77.

故事场景按线性连续方式逐一排列，由或为单独构件或为刻在雕刻区内的建筑元素（带边框的半圆柱）分隔。连续场景和单独场景内图像的安排基于它们在窣堵波上占据的位置，以及信徒沿着固定路线右绕窣堵波礼拜时的目光焦点（图127）。因此，伴随着信徒顺时针方向行进，场景从右向左形成连贯叙事。每一场景各有其中心，不一定位于雕刻区的正中，而是以佛像为焦点，凝聚场景内其他人像的手势、目光和动作。在空间安排上，许多场景宣示出下一场景的内容：佛像通常面向左，配合观者的目光并引导其不断行进。同时，每一场景又是独立的，它们各有其完整意义及善恶价值，包含且启发整体教义。

引导信徒相信、赞美、仿效，似乎强调一种自愿的意识行为，即行善积德，它超出世间，又总是在世间实现。由此，犍陀罗叙事艺术的首要特征可总结为，注重利用个人有限但可努力获取的最佳精力和资源来锻造命运。

如同印度的同行，犍陀罗工匠从佛教经典（《大事》、《普曜经》、《佛本行经》），许多现已佚失的文本和口述传统[1]，以及未幸存下来的、影响稍弱的当地传统中汲取灵感，并根据自己的艺术准则构建起独特的素材库[2]。犍陀罗叙事方式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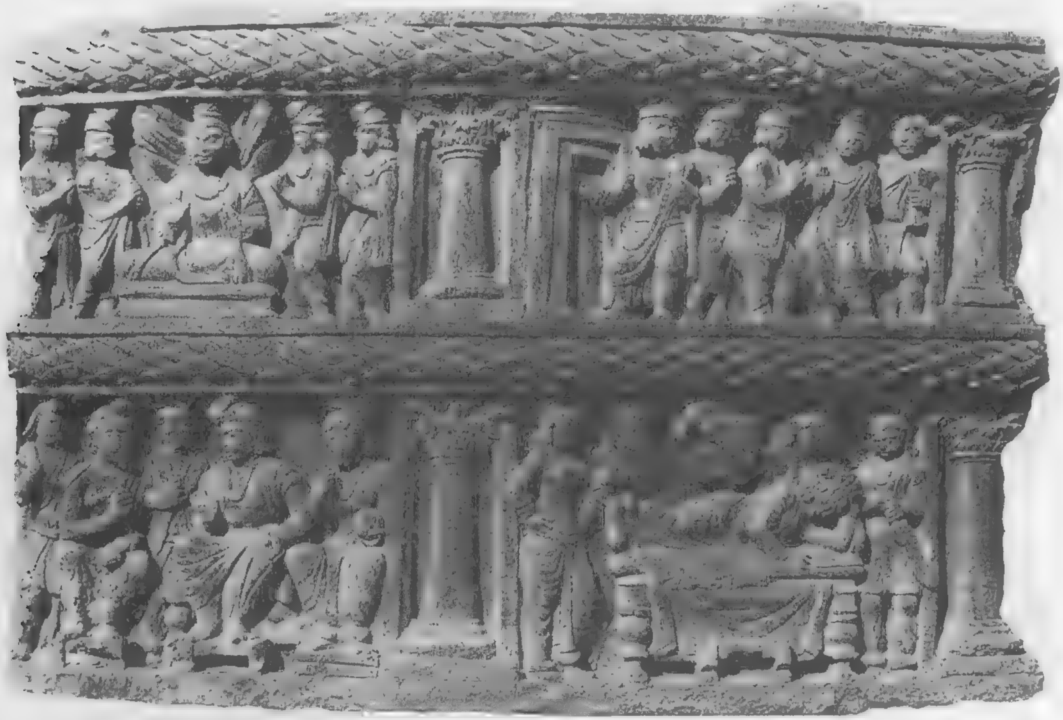


图127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的佛传场景从右至左展开

〔1〕 Santoro, 1999–2000.
〔2〕 Taddei, 1999.

类似方式不见于犍陀罗艺术之前或同时代的古代世界。为犍陀罗艺术提供范例和模型的希腊化—罗马世界只有晚期才出现线性叙事场景（如纪念圆柱上螺旋上升的浮雕饰带、神话史诗、罗马墓葬传记性浮雕），但没有如犍陀罗窣堵波上展现的佛传故事般可以或必须连贯解读的连续不间断的叙事场景，也无犍陀罗艺术中或受多利安式横饰带启发而成功创造出的场景间规律性的分隔元素[1]。

然而，尽管犍陀罗艺术中绝大多数作品是在“讲述”，却不能以一概全。叙事的模式、题材、特定的构图、人像尤其是佛像的细部处理，看似简单，实则异常复杂。

建筑的原初装饰和寺院的发展历程只能通过稀有的迹象和交叉对比得出的假设追溯。从保存较完好、时代和地点各异的小型窣堵波，如西尔克里窣堵波[2]、罗里央唐盖窣堵波[3]、莫赫拉莫拉都窣堵波[4]中可发现显著差异：第一座小窣堵波上有限的装饰空间仅能容纳若干场景，却讲述了佛陀完整的生平；第二座展示从出生到出家的部分事迹；第三座无任何叙事场景，上排是重复的佛像，下排交替出现大象和阿特拉斯像。可见，三个例子反映出不同的态度和选择。

前两座窣堵波为思考叙事艺术提供了实例。叙事模式和主题显然有许多重要变体。首先，西北印度发展起来的丰富的佛传故事，旨在创造出一张佛陀游历、神变[5]之地的传奇地图，这成为艺术家们在叙事情节中穿插当地传统尤其钟爱的题材的创作基点。此外，正如罗里央唐盖窣堵波见证的，可按主题组织部分事迹进行叙述。根据能够反映某一特殊说教目的或本地信奉的标准，从佛陀生平所有事迹中遴选出具有特别意义的事件。这显然更多见于大多数情况下作为个人布施的小型窣堵波，鉴于其体量较小和个人委托的性质，更倾向于表现某种主题。

第三座窣堵波上呈现出犍陀罗艺术晚期阶段的发展趋向（阿富汗哈达有丰富材料），主题和题材变得具体化，叙事几近消失，或仅存压缩入极简略的构图内、不受连续关系约束的若干事件。如同前文提及的，早期系统研究指出，如此显著的变化发生于宗教文化的总体变革中，此时兴起的神秘而虔诚的潮流，与大乘佛教相关。然而，变化并非骤然发生，正如大乘佛教的出现不是小乘佛教的革命性断裂，而是其内部稳定发展的、长期内没有被识别的运动。我们分析过去的零散信息可辨识出变化显现的时刻，而此前应当已有创新和尝试，或简言之，变化的线索分散在早期作品中，我们无法或难以将之析离出来。佛像是变化中首当其冲的元素。佛像作为犍陀罗线性叙事故事主角，

---

〔1〕 Faccenna, 2001, p. 174.
〔2〕 现藏拉合尔博物馆，参见 Ingholt, 1957, p. 17, pl. I.1.
〔3〕 现藏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参见 Majumdar, 1937, p. 116, pl. XIV.
〔4〕 位于塔克西拉，参见 Marshall, 1951, I, p. 361; III, pl. 95b.
〔5〕 Przyluski, 1914; Lamotte, 1958, pp. 366–69.

其首次出现依然难以界定。虽然几乎所有的善行都在佛陀身上得以最充分的体现和升华，但佛陀并不是天神，也不只是凡人。他超越仍驻轮回的天、人：作为"转轮圣王"（推转法轮），他转动佛法之轮，又如如不动，如同使轮子转动而自身不动的轮轴。无论是滚滚红尘还是佛法本身都不能掌控他的存在，佛陀获得一种动态的精神上的圆满：一切在他之外，一切被他超越。佛陀乃金刚之身，因他不受制于任何运动或偶发事件。他是宇宙的主宰，也是自己的主宰，并战胜了两者。

塑造一位既非凡人又非天神，且超越两者的形象，是艺术创作面临的巨大挑战。如经典所载，佛陀诞生时身上已有"超人间"的瑞相，映射出隐藏的圣王特质，这并非机缘巧合得来，而是通过多世的行善修德，涤除人性的缺陷锻造出的必然命运。佛陀因自我战胜成为宇宙之主，这由神话或哲学象征符号表现出来。犍陀罗艺术直译了可见的诸相，并发明了传达难表之意的图像：佛像通常大于其他人像，虽然差距较小，但足以表明较之其他人而言他是巨人；立姿佛像的双脚从未完全脱离地面，重心近乎一条垂线且类似圆柱，如同穿过并支撑宇宙的理想轴（图128）；坐姿佛像的造型则似完美的三角形[1]。佛像每个细节的处理（袈裟宽阔的衣褶，即使利用短缩法也依然尽可能宽大的躯体）都旨在突出由头光象征的光明（图129）。最显著的异相，白毫和肉髻（分别突起于眉间和头顶）分别对应上部的两个脉轮。在瑜伽修习中，它们是聚集和释放光明能量之处，该能量为粗重物质阻隔，眠藏于人体底部脉轮中，大瑜伽士能以禅定内火激发

图128 斯瓦特出土的犍陀罗浮雕板，上刻一立佛，胁侍金刚手，接受王公贵族的礼拜

---

〔1〕 Getty, 1914, p. 197.

图129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浮雕板，表现降魔成道场景

唤醒此能量，并使其从底轮出发，通过各处脉轮，最终流动至顶轮迸发，并从梵穴流射。许多单体佛像的头顶均开有一个无法看到、不具备任何结构或图像功能的孔洞，显然并非毫无意义，应被视为是赋予佛像生机的重要特征[1]（图130、131）。

佛陀的清净光明——即超凡脱俗之人达至的言语道断、心行路绝状态的本质——从一开始就被视作超验的能力。这不仅由线性叙事的方式和题材，而且可从宗教建筑的整体装饰规划中发现。除了描绘水平连续展开场景的浮雕板外，还有许多浮雕板暗示出不同于线性叙事的其他配置形式。这由它们的结构特征可推知：如插入连续场景中的假龛（具有某些重要意义）。假龛上表现的题材应承担着特定功能，但或许再也无法理解决定它们入选的多元标准。犍陀罗工匠的真正意图现今已难以料想。不过有许多假设，且彼此并不排斥：可以认为假龛用于突破单调的连续，或设置一种（总结？回想？礼拜环节？的）停顿，或标定关键点（基本方位点或空间定向点），或强调重要事件。因为不了解使假龛的用途和意义一目了然的原初语境，通常无法提取关键线索。然而有时却相当容易：如太子逾城出家故事，恰在假龛内找到了最理想的位置（图132、133）。虽与横饰带分离，但假龛的结构相当简单，其内雕刻的题材颇易解读。上拱券描绘太子诞生或宫廷生活场景，年轻的太子生活在贵族圈子里。中部的决意出家场景旋律加强：后宫佳丽们横陈的肢体显示出可悲的脆弱，也象征着太子决心解脱的无常人世。他意志坚定，不可

[1] Klimburg-Salter and Taddei, 1991.

图130　出处不明的菩萨苦修像，因长时间苦行后变得极度憔悴瘦弱，尽管不甚清晰，仍可看到头顶的梵穴

图131　梵穴线图

动摇。但高潮爆发于假龛下部场景，太子做出对自己乃至世间而言的重大决策：逾城离家，彻底放弃王子生活而代之以苦行。正值夜晚最黑暗时刻，太子骑着宝马，地神托举着马蹄，悄无声息地离开皇宫和都城[1]。场景以正面观展示，马的前腿跃出假龛的叠涩边框，或许如同假龛突出于均匀扁平的横饰带。太子凡人生活中的重要经历被全部嵌入单独的建筑结构中，浓缩但极具力量。黑暗中离开宫门及门内世界的太子是午夜的太阳，注定将照亮尚未觉醒的世界。画面震撼心灵，并从古代神话中汲取新意义：太阳神，只能以正面观表现，坐骑只应是太阳的代表动物马。假龛上的图像内容沿垂直轴线展开，愈向下愈紧凑，并配合假龛的形状得到强调，其最显要位置处凸显以综合视角叙事的高潮。假龛与其所属横饰带的原初关系或许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独立还是依附于横饰带的其他场景，它必然醒目突出，引起观者对逾城出家这一特殊事件的关注。其他场景水平连续排列，而假龛上时间和生动场景的递进与由高向低的安排相对应或许并非偶然，工匠可能着意借此传达光明“垂落”之感。事件被蒙上了神话色彩，太子的生平似乎揭示出穿透历史永恒不变的超验本质。

犍陀罗叙事艺术中历史和神话象征的双重维度，也可从占据窣堵波上的最佳位置——环绕圆柱形塔身分布得知。叙事的时间线性，与建筑结构以及时间

〔1〕 Vogel, 1935, pl. 9; Miyaji, 1998, n. 88; Zwalf, 1996, n. 176.

图132 犍陀罗地区发现的假龛，表现太子逾城出家场景

图133　犍陀罗地区发现的假龛，表现太子逾城出家场景

循环、永恒之象征的圆形相结合。叙事的终点是重新开始的起点，有时从横饰带连续几块残段可以判断，故事终结的场景中明确意味着时间的循环。如一件不明出处的浮雕板[1]，其上自右向左依次描绘礼拜窣堵波（通常位于涅槃、荼毗和分舍利场景之后）、两位供养人之间的结跏趺坐佛、摩耶夫人之梦，标志着太子以乘象入胎为起点的世间生活。因此，在叙事循环的终点（涅槃）和起点（诞生预言）之间，佛陀的形象（净土的象征？）莫非是进入历史又超越世间的超验、永恒本质的图像符号？再如卢浮宫收藏的一件浮雕板[2]，其上太子诞生场景之后是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一净瓶的菩萨像，位于山花及两侧较高处的、内有向外张望状人物的小阳台暗示出的宫殿内。山花外雕刻更多人物：左侧只残存一破损严重的人像，但右侧保存完好的场景暗示左侧原应有对称的内容：两位面向菩萨的人物，靠外者呈站立祈祷状，靠近菩萨者倚坐，似乎正与菩萨交谈。富歇认为此场景与青年太子有关[3]。然而，栖息在山花斜檐口上的鸟群也易使人联想到其所属的天界，进而山花代表的建筑或为一座天宫。同样，净瓶（内装永生甘露）及其他石刻中的类似元素，或许表明此场景描绘的是未来佛弥勒，在兜率天宫中等待降临人世时为众神讲法。可以认为，太子降生人间是为了终结他个人及世界的轮回，开启下一个轮回。

因此，历史化、循环的叙事必须同时从两个层面解读。个体修行及其重复循环的故事对于能够感同身受并进行效仿的信徒而言是邀请和希望，但同时也在持续提醒，感知的背后有一不可言说的维度，而佛陀揭示了其真谛和正道。因此，我们该如何从纯粹的罪福善恶角度思考叙事艺术呢？尽管其与历史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神话色彩依然明显。对信徒而言，叙事艺术应有更广阔、更普遍的意义，以一种复合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语言涉及日常经验与固有的文化模式，从日常生活到行为守则、传统、寓言，泛印度神话主题和其他外来题材，全被编入我们至今仍所知甚少的知识网中。

考虑石刻作品是否及如何与叙事背景相连时，这种复杂性就更为凸显。例如，长期以来富歇及其追随者认为若干浮雕场景为简化的舍卫城神变[4]，后来又推测其为净土场景[5]（图134、135）。这些浮雕大部分为造像碑，其中事件（是否真正暗示一个事件）被完全消解，从而向信徒展示佛陀的示现场面。佛教寺院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单体佛像和菩萨像，在我们看来似乎也独立于叙事语境（图136）。我们再次面临因缺乏相关信息而难以解读重要资料的困境。窣堵波及其所在寺院的历史是复杂且多层面的，即使最细致的

---

〔1〕 Taddei, 1993, p. 37, fig. 8.
〔2〕 Foucher, 1905–51, I, fig. 164.
〔3〕 Foucher, 1905–51, I, pp. 320–21.
〔4〕 Foucher, 1905–51, II, pp. 335–36; Foucher, 1909.
〔5〕 Huntington, 1980.

图 134 默罕默德纳里出土的造像碑，表现佛陀示现场景，曾被解读为舍卫城神迹

考古调查也无法复原所有细节。就犍陀罗而言，由于可用的考古信息极为匮乏，更加难以理解。佛教寺院的建造基于囊括建筑装饰和图像配置的周密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初面貌因改造、修复和捐建逐渐改变，大多被覆盖，局部被置换。然而，即使在无序的发展中，建筑的不同部分之间或仍保持着某种动态平衡。如果能追溯这一过程就可解读遗址的历史，及至更重要的支撑其动态发展的宗教文化。遗憾的是，只能划出大致阶段，其间的界限因过于突兀而显得不可信。如早期研究已强调的，犍陀罗晚期艺术呈现一种总趋势，即与叙事场景相比，单体像更流行，但一种趋势取代另一趋势之初，两者共存、互相补充，不能排除单体佛像和菩萨像或依精心制定的标准配置在寺院内，它们的意义不局限于自身，而是在某种象征性的位置连接中通过空间的相互关系得以完善[1]。

然而，我们对犍陀罗“原境”中的其他方面所知甚少，这涉及所有（事实上数量庞大的）不直接与佛教相关但在开始时就加入佛教艺术的石刻。尤其是属于其他宗教、以某种形式融入佛教素材库的神和半神像。其中部分可依佛教故事解释：诸如，自太子诞生起就伴其一生的婆罗门教天神帝释天和梵天，可能表征旧信仰对新信仰的从属；鬼子母诃梨蒂与那伽龙（特性不明的半神，属于地下和水的世界）一样代表未开化世界向佛陀世界的皈依。其他形象，如夜叉和夜叉女（与生产和生长周期有关的本地神）、“守护神夫妇”（图137），年轻战神塞健陀或六面童天[2]（图 138），保留了更多的神秘性，除所在的图像内容

〔1〕 Filigenzi, 1990b, pp. 18－19; Zwalf, 1996, p. 41; Schmidt, 2000.
〔2〕 Srinivasan, 1997–98; Filigenzi, 2006.

图135 公元5年造像碑

图136 弥勒菩萨像

图137　塔克特依巴依遗址出土的守护神夫妇雕像

图138　白沙瓦穆罕默德扎伊出土的年轻战神塞健陀或六面童天杀死恶魔马尼萨石造像

外，再无可说明其意义的信息。有些人物角色除代表自身的形象外，还在叙事语境中另有明确界定（虽无一致解释）：如佛陀的护法金刚手在犍陀罗艺术中以多种形式表现，这些形式受到印度世界（贱民、僧侣）或古典世界（法翁、萨堤尔、西勒诺斯、赫拉克勒斯）的启发（图139）。无论他的功能与真实尊格如何[1]，恰是其图像的多样性构建了他最重要的特征。这种多变并非偶然，为充分表现其角色或许经过了谨慎选择，果真如此，正如塞健陀或六面童天不仅在佛教艺术的广阔背景内，而且在叙事场景内的出现也并非偶然[2]。

图139 玛玛尼德里出土的帝释窟说法石造像，窟外最突出的两位形象是金刚手（左）和塞健陀（右）

〔1〕 Senart, 1905; Foucher, 1905 - 51, II, 自第48页起；Bussagli, 1984, 自第222页起；Raducha, 1985; Santoro, 1991; Filigenzi, 2005.
〔2〕 Filigenzi, 2005；2006.

图140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横饰带残段，下排表现佛传故事场景（右：太子诞生；左：占星，原为连续场景，现部分丢失），上排表现“非传记性”的故事场景

再次思考叙事场景的布局，位置相邻但内容迥异的场景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浮现出来。窣堵波圆柱形塔身上的横饰带由不同组件协调连贯而成，每一雕刻区由垂直（场景间的分隔嵌板）与水平（或复杂或简单的檐口）装饰元素框定。横饰带通常有两排或多排场景，包含区分明确的两个主题：下面一排或多排方形雕刻区由建筑元素分隔，表现佛传或本生等传记性叙事场景；上排场景通常连续排列或由树木装饰分隔（更为自然，间距不固定），主要刻画世俗人物，捕捉那些与下排主题和画面对比鲜明的姿态和情境加以表现（图140）。其节奏更富动感，有时几近冲动，与下排场景平缓的节奏不相称。着装各异（有时近乎赤裸）的男、女奏乐，跳舞，将物品或动物呈献给穿斯基泰服装的端坐人物（国王？），或为具有明显狄奥尼索斯风格的饮酒和（或）情色场景：他们在宁静平和的佛陀世界旁制造出一片震耳的喧嚣，但我们却识别不出任何声音。如果认为叙事艺术是犍陀罗独创的传记形式，那么将上排场景归入叙事就值得商榷，然而，两排场景的构图节奏虽不同，上排场景却与下排叙事场景汇聚起来且紧密相连。鉴于场景所饰建筑的公共性、教育性与强烈象征性，它们的存在既非偶然，当然也并非毫无动机。距之遥远且陌生世界中的我们显然无法把握当时人们对它们的评判准则。不知道他们如何解释让我们困惑的狄奥尼索斯场景（图141）。想必在拥抱的半裸人物、宴会的享乐氛围、小爱神战斗或向狮子献酒的顽皮兴奋，以及酒具和葡萄藤（图142）中他们

图141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带叠涩雕刻方框的门框残段：下部刻一佛像，上部刻一对欢爱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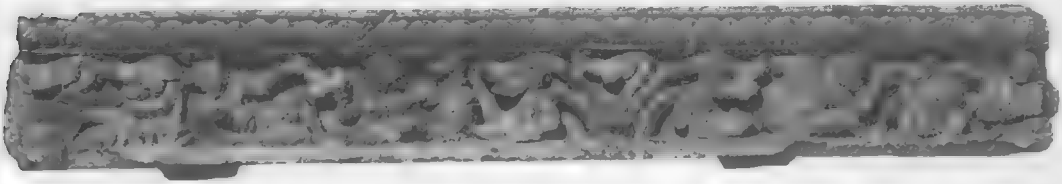


图142 班尔发现的檐口残段，表现被葡萄藤分隔的饮酒场景

读到了熟悉的编码，或许还有对超世间喜悦的期待与感知，这种喜悦不属于正常意识层面，而属于正常情况下无法体验的、由醉酒或性爱狂喜等精神状态引发的超感知范畴。同样，在音乐、舞蹈，或动作及人物不明的场景中，信徒们可能识别出常见的仪式活动或当时社会规范中与表达敬意、尊重、热情等相关的形式。

僧侣们守卫寺院，居住于附属僧院，规划并监管寺院建造，在他们的时刻监督下，犍陀罗艺术展示并宣传对佛法的皈依。他们鼓励布施，主持供奉，从世俗的纷扰中如法校定供养人的意图。所有迈进寺院并在佛陀世界觅得一席之地者，包括外来神祇、情色和狂欢场景，都有其理由，可惜我们尚未得知。或是对现实和无法根除的本地宗教的妥协，或是完全符合内在原因的深思熟虑的选择，日常生活中进入宗教艺术素材库的每一元素，皆有其直接或间接的缘由。也正是构成佛传故事背景的日常生活以及人们的情感、行为、风俗及思考方式，赋予叙事艺术面貌和力量，若不理解这种“合唱”就无望充分理解叙事艺术。同样，若将叙事艺术与单体造像和象征艺术对立起来，亦难以把握叙事艺术的涵义：因为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附录一：意大利考古队斯瓦特考古项目的英文论著

奥里威利

意大利考古队斯瓦特考古项目的发掘报告和学术论著大多以英文出版。斯瓦特考古项目犍陀罗研究的重要性需要繁重且颇具挑战性的出版计划，如此才可让更多的学界同仁共享这批资料。

下面列举意大利考古队斯瓦特考古项目截至2015年6月发行的主要英文出版物，其研究内容涵盖的年代范围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0世纪。

(1967) *Exhibi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Activity of the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n Pakistan from 1962 to 1967*. Rome.

(1982)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sMEO) Pakistan, Swāt, 1956*–1981,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kistan Archaeology,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Peshawar University, Peshawar March 1–4, 1982*. Peshawar.

Agrawala, R.C. (1966) An Interesting Relief from the Swāt Valley (I). *East and West* 16 [1–2], 82–83. (Repr. A. Filigenzi, and G. Verard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Alam, H., and L.M. Olivieri (2011) A recent acquisition of the Lahore Museum: Brief note on a post-Gandharan stele. *Lahore Museum Bullettin* XX-XXIII, 25–30.

Ashraf Khan, M. (1994) Historic Rock-carvings in Dir District. *East and West* 44 [2–4], 455–466.

Behrendt, K. (2015) Alexander Caddy's 1896 Survey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Swat Valley: the Chakdara Ionic temple and other sites. In L.M. Olivieri, *M.A. Stein and the 'Lords of the Marches'. New Archival Materials*, 263–284.

Brancaccio, P. (1991) The Buddha and the Naked Ascetics in Gandharan Art. A New Interpretation. *East and West* 41 [1–4], 121–131.

Brancaccio, P. (1999) Aṅgulimāla or the Taming of the Forest. *East and West* 49 [1–4], 105–118.

Brancaccio, P. (2006) Gateways to the Buddha: figures under arches in early Gandhāran art. In P. Brancaccio, and K. Behrendt eds., *Gandhāran Buddhism: Archaeology, art, Texts*, 210–224. Vancouver.

Brancaccio, P. (2010) The pottery from Bajaur: a window into the late Gandhāran tradition. In M. Alram et al. eds.,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II.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in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Archäologische Mitteilungen aus Iran und Turan)*, 329–340. Vienna.

Brancaccio, P. (2015) Catalogue of the Malakand Gandhara Collection. In L.M. Olivieri, *M.A. Stein and the 'Lords of the Marches'. New Archival Materials*, 285–305.

Callieri, P. (1984) A Potsherd with a Greek Inscription from Bir-kot (Swat).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VII [1], 49–53.

Callieri, P. (1985) Osservazioni su un rilievo su roccia presso Bunerwal (Puran, N.W.F.P., Pakistan). In Gh. Gnoli, and L. Lanciotti eds.,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I, 199–207. Roma.

Callieri, P. (1986) Una stele post-gandharica nel Museo dello Swāt. *Annali IUO*, 46, 433–440.

Callieri, P. (1989) *Saidu Sharif I (Swāt, Pakistan)*, 1. *The Buddhist Sacred Area, The Monastery*, (Reports and Memoirs XXIII [1]). Rome.

Callieri, P. (1990) Archaeological Activities at Bīr-koṭ-ghwaṇḍai, Swāt: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Pottery of Historic Age from N.W.F.P. In M. Taddei and P. Callieri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7*, (Serie Orientale Roma, LXVI [2]), 675–692. Rome.

Callieri, P. (1991)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Gandharan Culture: A Contribution from the Sphragistic. In G. Bhattacharya ed., *Akṣyanīvī. Essays presented to Dr Debala Mitra in Admiration of Her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67–72. New Delhi.

Callieri, P. (1992) Bīr-koṭ-ghwaṇḍai: An Early Historic Town in Swat (Pakistan). In C. Jarrige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9*, 339–346.

Callieri, P. (1993) Excavations of the IsMEO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at the Historic Settlement of Bīr-koṭ-ghwaṇḍai, Swat, Pakistan: 1990–91 Campaign. In A.J. Gail, and G.J.R. Mevissen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1*, 339–348. Stuttgart.

Callieri, P. (1993) Ranneistoricheskij Svat: primer akkul'turacii? *Vestnik Drevnej Istorii,* 2, 131–136.

Callieri, P. (1994) The Swat Valley and the Spread of Gandharan Art. In R.M. Cimino ed., *Ancient Rome and India.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Contacts between the Roman World and India*, 232–236. New Delhi.

Callieri, P. (1995) The North-West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in the Indo-Greek Period: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A. Invernizzi ed., *In the Land of the Gryphons*, (Monografie di Mesopotamia V), 293–308. Firenze.

Callieri, P. (1997a) Pots in Buddhist Sacred Areas: A Study of the Evidence from the IsMEO Excavations in Swat. In R. Allchin, and B. Allchin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5*, 184–427. New Delhi–Calcutta.

Callieri, P. (1997b) *Seals and Sealings from the North-West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and Afghanistan (4th Century BC–11th Century AD).* (Dissertationes I). Naples.

Callieri, P. (1999) Huns in Afghanistan and the North-West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he Glyptic Evidence. In M. Alram, and D.E. Klimburg-Salter eds.,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Essays on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277–291. Vienna.

Callieri, P. (2000) Decorated Pottery from the IsIAO Excavations at Bir-kot-ghwandai (Swat, Pakistan, 2nd cent. BC –15th cent. AD). In M. Taddei, and G. De Marco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7*, (Serie Orientale Roma XC [2]), 857–876. Rome.

Callieri, P. (2003) Les villes du nord-ouest du sous continent indien, des Indo-Grecs aux Kouchans. In O. Bopearachchi et al. eds., *De l'Indus à l'Oxus. Archéologie de l'Asie Centrale* (Catalogue de l'exposition), 211–216. Lattes.

Callieri, P. (2005) Excavation of the IsIAO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n Pakistan at Bīr-koṭ-ghwaṇḍai, Swat: The Sacred Building on the Citadel. In C. Jarrige, and V. Lefèvre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2001* [II], 417–425. Paris.

Callieri, P. (2006) Buddhist Presence in the Urban Settlements of Swāt, Second Century BCE to Fourth Century CE. In P. Brancaccio, and K. Behrendt eds., *Gandhāran Buddhism: Archaeology, Art, Texts*, 60–82. Vancouver.

Callieri, P. (2006) The Activity of Gem and Coin Die Engravers in North-West India between the Indo-Greeks and the Kuṣāṇas. In P. Callieri ed., *Architetti, capomastri, artigiani. L'organizzazione dei cantieri e della produzione artistica nell'Asia ellenistica. Studi offerti a Domenico Faccenna nel suo ottantesimo compleanno*, (Serie Orientale Roma C), 7–16. Rome.

Callieri, P. (2006) Tucci as Archaeologist. *East and West* 56 [1–3], 11–22.

Callieri, P. (2007) Barikot, an Indo-Greek Urban Center in Gandhāra. In D.M. Srinivasan ed., *On the Cusp of an Era. Art in the Pre-Kuśāṇa World*, 133–164. Leiden-Boston.

Callieri, P. (2008) Domenico Faccenna (1923–2008). *East and West* 58 [1–4], 425–454.

Callieri, P. (2008) The Archaeological Basis. In ed. M. Jansen, and C. Luczanits eds., *The Buddhist Heritage of Pakistan. Legends Monasteries, and Paradise,* 58–63. Bonn.

Callieri, P. (2010) Bīr-koṭ-ghwaṇḍai in the Post-Kushan period. In M. Alram et al. eds.,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II.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in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371–387. Vienna.

Callieri, P. (2011) Domenico Faccenna.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Special Issue) 34 [1], 17–39 (new version of Callieri 2008).

Callieri, P. (2011) Tucci as Archaeologist.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Special Issue) 34 [1], 1–16. (Revised version of Callieri 2006).

Callieri, P. (2012) New Evidence for Buddhist "Caves" from Panṛ I (Swat, Pakistan). In V. Lefèvre ed., *Orientalismes. De l'archéologie au musée. Mélanges offerts à Jean-François Jarrige,* (Indicopleustoi 9), 127–136. Turnhout.

Callieri, P. (2014) Tucci as Archaeologist. In *On Swā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Notes*, ix-xx. (Repr. of Callieri 2006, Tucci as Archaeologist. *East and West* 56 [1–3], 11–22). Islamabad.

Callieri, P. et al. (1992) *Bīr-koṭ-ghwaṇḍai 1990–1992.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of the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sMEO. Annali dell'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52 [4], Suppl. 73.

Callieri P. ed. (2006) *Architetti, capomastri, artigiani. L'organizzazione dei cantieri e della produzione artistica nell'Asia ellenistica. Studi offerti a Domenico Faccenna nel suo ottantesimo compleanno*. Roma (with English articles).

Callieri, P. et al. (2006) *Valli della memoria. Antiche Genti, Luoghi e Immagini dello Swat. 50 anni della Missione Archeologica Italiana dell'IsIAO in Pakistan/Valleys of memory. Ancient People, Sites and Images from Swat. 50 Years of the IsIAO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n Pakistan*. Roma.

Callieri P. et al. (2008) Technical and Diagnostic Investigation on Some Metallic Objects Coming from the IsIAO Excavations at the Site of Barikot (Swat, Pakistan), *Conservation Science in Cultural Heritage* 8, 111–146.

Callieri, P. et al. (2000) Bīr-koṭ-ghwaṇḍai, Swāt, Pakistan. 1998–1999 Excavation Report. *East and West* 50 [1–4], 191–226.

Callieri, P., L. Colliva, and Abdul Nasir (2000–2001) Bir-kot-ghwandai, Swat, Pakistan.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Autumn 2000 Campaign of the IsIAO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n Pakistan, *Annali dell'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60–61, 215–232.

Callieri, P., D. Faccenna, and A. Filigenzi (1984) Pakistan 1. Excavations and Researches in the Swat Valley – Bīr-koṭ Ghwanḍai. *East and West* 34 [4], 493–500.

Callieri, P., A. Filigenzi and G. Stacul (1990) Bir-Kot Ghwandai, Swat: 1987 Excavation Campaign. *Pakistan Archaeology* 25, 183–192.

Callieri P., and A. Filigenzi eds. (1997) G. Tucci. *On Swa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Notes*. Rome.

Callieri, P, and A. Filigenzi eds. (2005) *East and West* 55 [1–4] (Commemoration volume for the 5th Anniversary of the Parinirvāṇa of Maurizio Taddei).

Callieri P., and A. Filigenzi eds. (2014) G. Tucci, *On Swā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Notes* (with Introduction by M. Ashraf Khan). Islamabad (Repr. P. Callieri, and A. Filigenzi eds. (1997) G. Tucci, *On Swā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Notes*. Rome).

Coarelli, F. (1966) The Bronze Handles of Chārsada. *East and West* 16 [1–2], 94–108.

Colliva, L. (2007) The Apsidal Temple of Taxila. Traditional Hypotheses and New Possible Interpretations. In A. Hardy ed., *The Temple in South Asia*, 21–27. London.

Colliva, L. (2011) The Excav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Barikot (Bīr-koṭ-ghwanḍai) and its Chronological Sequence.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Special Issue) 34 [1], 157–191.

Colliva, L. (2012) *I manufatti metallici del sito di Barikot (Swat, Pakistan), Studi tecnico-diagnostici e tassonomici* (IsIAO Reports and Memoirs). Bologna.

Cupitò, M., and L.M. Olivieri (2013) Architectural and infra-structural evidence of re-use of residential units in macro-phase D, sector W of Bīr-koṭ-ghwanḍai/Barikot.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36, 41–81.

De Marco, G. (1987) The Stūpa as a Funerary Monument: New Iconographical Evidence. *East and West* 27 [1–4], 191–246.

Di Castro, A.A. (2003) A Late Gandharan Wrestlers' Weight. *East and West* 53, 257–265.

Di Florio, M.R. et al. (1992) Geo-archaeological Study of Gandharan Remains in the Swat Valley (NW Pakista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Geology. Abstracts*, 388. Kyoto.

Di Florio, M.R. et al. (1993a) Lithological Analysis of Material Used in the Buildings of the Sacred Area of Pānṛ I (Swat Valley, Northern Pakistan) and Their Origins. In D. Faccenna et al. *Saidu Sharif I (Swāt, Pakistan), 2. The Buddhist Sacred Area. The Stūpa Terrace,* (Reports and Memoirs XXIII [2]), 357–372.

Di Florio, M.R. et al. (1993b) Evidence of Ancient Stone Quarrying in Lower Swat, NWFP, Pakistan. A Geo-archaeological Stud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Cultural Heritage* 2, 63–74.

Di Florio, M.R. et al. (1995) Lithological Analysis of Material Used in the Buildings of the Sacred Area of Saidu Sharif I (Swat Valley, Northern Pakistan) and Their Origins. In D. Faccenna et al. *Saidu Sharif I (Swāt, Pakistan), 2. The Buddhist Sacred Area. The Stūpa Terrace,* (Reports and Memoirs XXIII [2]), 605–623.

Di Flumeri Vatielli, G. (2010) The Museo Nazionale d'Arte Orientale 'G. Tucci' and the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A Long and Intense Collaboration of 50 Years' Duration. In A. Filigenzi, and R. Giunta eds. *The IsIAO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n Afghanistan 1957–2007. Fifty Years of Research in the Heart of Eurasia.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held in the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Conferenze 21), 185–202. Rome.

Di Giulio, G. et al. (2014) *Note on the xilotomic analysis for wood identification*. In L.M. Olivieri et al., *The Buddhist sites of Gumbat and Amluk-dara (Barikot)*. (ACT Reports and Memoirs [2]), 299–304. Lahore.

Faccenna, D. (1961) *A Glimpse of the Italia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Swat-Pakistan*. Karachi.

Faccenna, D. (1962) *Mingora: Site of Butkara I,* (Reports and Memoirs I). Rome.

Faccenna, D. (1964a) *A Guide to the Excavations in Swāt (Pakistan) 1956–1962*, Rome.

Faccenna, D. (1964b) Excavations in Swat by the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Pakistan Archaeology* 1, 67–68.

Faccenna, D. (1964–65)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1963 Excavation Campaign of Barama I (Swat-Pakistan). *East and West* 15 [1–2], 7–23.

Faccenna, D. (1974) Excavations of the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sMEO) in Pakistan: Some Problems of Gandharan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B.G. Gafurov et al. eds., *Central Asia in the Kushan Perio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Culture of Central Asia in the Kushan Period I*, 126–176. Moskow.

Faccenna, D. (1980–81) *Butkara I (Swāt, Pakistan) 1956–1962,* (Reports and Memoirs III, 1–5.2). Rome.

Faccenna, D. (1985) An Inscribed Stele from Peshawar.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VIII [1], 93–102.

Faccenna, D. (1986) Catalogue of the Material from the Excavation Carried Out by the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of IsMEO in Pakistan. Corpus of the Sculptures of Gandharan Art. *East and West* 36 [4], 351–53.

Faccenna, D. (1987) Catalogue of the Material from the Excavation Carried Out by the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of IsMEO in Pakistan. Corpus of the Sculptures of Gandharan Art. *East and West* 37 [1–4], 461–62.

Faccenna, D. (1988) Catalogue of the Material from the Excavation Carried Out by the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of IsMEO in Pakistan. Corpus of the Sculptures of Gandharan Art. *East and West* 38 [1–4], 313–314.

Faccenna, D. (1991) A Type of 'Composite' Gandhāran Capital. *Pakistan Archaeology* 26 [1], 199–217.

Faccenna, D. (1993a)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of IsMEO in Pakistan. *Vestnik drevnej istorii* 2, 123–124.

Faccenna, D. (1993b) Problemy svjaščennoj Buddhiskoj arhitektury i gandharskoj skul'ptury (Problems of Buddhist Architecture and Gandhara Sculpture). *Vestnik drevnej istorii* 2, 137–152.

Faccenna, D. (1995a) A Relief in the Lahore Museum Showing a Columned Stūpa. *Lahore Museum Bulletin* VIII [2], 1–45.

Faccenna, D. (1995b) Note on a Decorative Motif Appearing on a Blanket in a Gandharan Art Relief.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XVIII [2], 1–19.

Faccenna, D. (1995c) *Saidu Sharif I (Swāt, Pakistan)*, 2. *The Buddhist Sacred Area. The Stūpa Terrace,* (Reports and Memoirs XXIII [2]). Rome.

Faccenna, D. (1997a) Athena nell'arte del Gandhara. In E. Degani et al. eds. *Mousa. Scritti in onore di Giuseppe Morelli,* 197–210. Bologna.

Faccenna, D. (1997b) Sculptors' Trial Pieces in Gandharan Art. *East and West* 47 [1–4], 67–69.

Faccenna, D. (1999–2000) The Turban in the Figural Frieze from the Main Stūpa of the Buddhist Sacred Area of Saidu Sharif I (Swat, Pakistan) and the Corpus of Gandhāra Sculpture. In E. Errington, and O. Bopearachchi eds.,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6, 45–49. Kamakura.

Faccenna, D. (2005) On Two Cornice Segments from Dharmarajika, Taxila. *East and West* 55 [1–4], 81–102.

Faccenna, D. (2006) Reconstruction of a Sculptural Complex in the Buddhist Sacred Area of

Butkara I. *East and West* 56 [1-3], 177-194.

Faccenna, D. (2007a) Columns at Dharmarajika (Taxila). *East and West* 57 [1 -4], 127-173.

Faccenna, D. (2007b) The Artistic Centers of Butkara I and Saidu Sharif I in the Pre-Kuṣāṇa Period. In D.M. Srinivasan ed., *On the Cusp of an Era: Art in the Pre-Kuṣāṇa World*, 165-199. Leiden-Boston.

Faccenna, D., P. Callieri, and A. Filigenzi (2003) At the Origin of Gandharan Ar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sIAO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n the Swat Valley, Pakistan,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9 [3-4], 277-280.

Faccenna, D., and A. Filigenzi (2007) *Repertory of terms for cataloguing Gandharan sculptures: based on materials from the IsIAO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n Swat, Pakistan* (Reports and Memoirs, New Series V). Rome.（中文版:《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以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斯瓦特考古项目所出资料为基础》上海古籍，2014）.

Faccenna, D., A.N. Khan, and I.H. Nadiem (1993) *Pānṛ I (Swāt, Pakistan)*, (Reports and Memoirs XXVI). Rome.

Faccenna, D., and M. Taddei (1962) *Sculptures from the Sacred Area of Butkara I (Swāt, W. Pakistan)*, (Reports and Memoirs II [2]). Rome.

Faccenna, D., and M. Taddei (1964) *Sculptures from the Sacred Area of Butkara I (Swāt, Pakistan)*, (Reports and Memoirs II [3]). Rome.

Faccenna, D., and M. Taddei (1997) Two Graffiti from Butkara I, Swat, Pakistan. *Indologica Taurinensia. Professor Gregory M. Bongard-Levin Felicitation Volume*, 507-513.

Faccenna, D., and R. Salomon (2007) The Sacred Area of Butkara I, Stūpa No. 27: Location Letters and Marks. *East and West* 57 [1-4], 113-126.

Faccenna, D., and P. Spagnesi (2014) *Buddhist Architecture in the Swat Valley, Pakistan. Stupas, Viharas, A Dwelling Unit*, (ACT Reports and Memoirs, Special Volume). Lahore.

Faccenna, C. et al. (1993) Geo-archaeology of the Swat Valley (NWFP, Pakistan) in the Charbagh-Barikot Stretch. *East and West* 43 [1-4], 257-270.

Filigenzi, A. (1997) Buddhist Rock Sculptures in Swat, North West Pakistan. In R. Allchin, and B. Allchin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5* II, 625-635.

Filigenzi, A. (2000) Marginal Notes on the Buddhist Rock Sculptures of Swat. In M. Taddei, and G. De Marco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7* III, 1065-1085.

Filigenzi, A. (2000-2001) Wisdom and Compassion: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of

Avalokiteśvara/Padmapāṇi in the Rock Sculpture of Swat (NWFP, Pakistan). *Annali dell'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60-61, 247-264.

Filigenzi, A. (2003a) Narrative Art. In D. Faccenna, P. Callieri, and A. Filigenzi, At The Origin of Gandharan Ar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sIAO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n the Swat Valley Pakistan.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9 [3-4], 350-380.

Filigenzi, A. (2003b) A Vajrayanic Theme in the Rock Sculpture of Swat (NWFP, Pakistan). In G. Verardi, and S. Vita eds., *Buddhist Asia 1. Papers from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Buddhist Studies Held in Naples in May 2001*, 37-55. Kyoto.

Filigenzi, A. (2003c) The Three Hares from Bīr-koṭ-ghwaṇḍai: Another Stage in the Journey of a Widespread Motif. In M.V. Fontana, and B. Genito eds., *Studi in onore di Umberto Scerrato per il suo settantacinquesimo compleanno,*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 Dipartimento di Studi Asiatici - IsIAO, Series Minor, LXV [1]), 327-346. Napoli.

Filigenzi, A. (2005a) A Figured *stūpa* Model of the Shahi Period: Art, Faith and Ritual Practices in the Late-Antique Buddhism. In U. Franke-Vogt, and H.-J. Weisshaar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2003*, 421-430. Aachen.

Filigenzi, A. (2005b) Gestures and Things: The Buddha's Robe in Gandharan Art. *East and West* 55 [1-4], 103-116.

Filigenzi, A. (2005c) Stone and Stucco Sculptures from the Sacred Building of Bīr-koṭ-ghwaṇḍai. Swat, Pakistan. In C. Jarrige, and V. Lefèvre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2001* [II], 453-461. Paris.

Filigenzi, A. (2006a) Post-Gandharan Swat. Late Buddhist rock sculptures and Turki Śāhi's religious centres. *Journal of Asian Civilisations* (Special issue [*Italian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Northern Pakistan (1955-2011)*] 34 [1]), 186-202.

Filigenzi, A. (2006b) Ānanda and Vajrapāṇi: An Inexplicable Absence and a Mysterious Presence in Gandhāran Art. In P. Brancaccio, and K. Behrendt eds., *Gandhāran Buddhism: Archaeology, Art, Texts*, 270-285. Vancouver.

Filigenzi, A. (2006c) From Mind to Eye: Two-Dimensional Illusions and Pictorial Suggestions at Saidu Sharif I. *East and West* 56 [1-3], 17-40.

Filigenzi, A. (2006d) From Saidu Sharif to Miran. *Indologica Taurinensia* 32, 67-89.

Filigenzi, A. (2006e) Sūrya, the Solar Kingship and the Turki Śāhis. New Acquisition o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wat. *East and West* 56 [1-3], 195-203.

Filigenzi, A. (2008a) Buddhist Art in Its Social Context. In M. Jansen, and C. Luczanits eds., *Gandhara. Das buddhistische Erbe Pakistans. Legenden, Klöster und Paradiese*, 298-301. Mainz (also in English version).

Filigenzi, A. (2008b) In Memory of Domenico Faccenna (Castel Madama 1923-Roma 2008). *Rivista di Studi Sudasiatici* III, 239-244.

Filigenzi, A. (2008c) Sculptures from Swat. In M. Jansen, and C. Luczanits eds., *Gandhara. Das buddhistische Erbe Pakistans. Legenden, Klöster und Paradiese*, 197-99. Mainz (also in English version).

Filigenzi, A. (2009a) In memory of Domenico Faccenna. *Ancient Pakistan* XX, 257-260 (Repr. of Filigenzi 2008).

Filigenzi, A. (2009b) Migration, Diffusion, Localisation: The common roots of late Buddhist art in Afghanistan/Pakistan and early Buddhist art in Himalayan countries. In *Tibetan Arts in Transition: A Journey through Theatre, Cinema and Painting. Seminars Proceedings, Rome and Naples 2008-2009* [Le arti tibetane in transizione: Un viaggio attraverso teatro, cinema e pittura. Atti dei seminari Roma e Napoli 2008-2009], 79-87. Rome.

Filigenzi, A. (2010a) Le vie dello Swat. In K. Kritz, W. Cartwright, and L. Hurni eds., *Mapping Different Geographies*, 184-200. Berlin-Heilderberg.

Filigenzi, A. (2010b) Post-Gandharan/non-Gandharan: archaeological inquiry into a still nameless period. In M. Alram et al. eds.,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II.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In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389-406. Vienna.

Filigenzi, A. (2010c) The Shahi Period: A reappraisal of Archaeological and Art Historical Sources. In M. Alram et al. eds.,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II.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in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407-427. Vienna.

Filigenzi, A. (2011) Post-Gandharan Swat. Late Buddhist rock-sculptures and Turki Śāhis religious centres.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Special Issue) 34 [1], 193-210 (revised version of Filigenzi 2006).

Filigenzi, A. (2012) Oriental Hellenism vs. Hellenised Orient. Reversing the Perspective on Gandharan Art.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18, 111-141.

Filigenzi, A. (2015) *Art and Landscape; Buddhist Rock Sculptures of Late Antique Swat/ Uḍḍiyāna.* With contributions by L.M. Olivieri and P. Rockwell.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Wien.

Galli, M. (2011) Hellenistic Court Imagery in the Early Buddhist Art of Gandhara.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17, 275-325.

Ghani-ur-Rahman, and L.M. Olivieri eds. (2011) Italian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Northern Pakistan (1955–2011),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Special Issue) 34 [1].

Gnoli, G. (1963) The Tyche and the Dioscuri in Ancient Sculptures from the Valley of Swat. *East and West* 14 [1–2], 29–37.

Göbl, R. (1976)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Butkara I (Swāt, Pakistan),* (Reports and Memoirs IV). Rome.

Gullini, G. (1958) Marginal Note on the Excavations at the Castle of Udegram: Restoration Problems. *East and West* 9 [4], 329–348.

Gullini, G. (1962) *Udegram,* (Reports and Memoirs I). Rome.

Lo Muzio, C. (2011) Gandharan Toilet-Trays: Some Reflections on Chronology.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17, 331–340.

Lorenzoni, S., and E. Zanettin Lorenzoni (1994) A Geo-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Buddhist Gandharan Remains in the Lower Swat Valley (NW Frontier Province - Pakistan). Activities and Inhabited Centr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uilding of Sacred Are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Cultural Heritage* 3, 35–47.

MacDowall, D.W., and P. Callieri (2004)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the Excavations at Bīr-koṭ-ghwaṇḍai 1984–1992. *Bīr-koṭ-ghwaṇḍai Interim Reports II,* (Reports and Memoirs, New Series III), 27–90. Rome.

Marati, I., and C. Vassallo C. (2013) *The New Swat Archaeological Museum. Architectural Study, Master Plan and Execution,* (ACT Reports and Memoirs 1). Lahore.

Meister, M., L.M. Olivieri, and M. Vidale (2015), Gumbat-Balo Kale (Swat) Architectural Analysis, Conservation, and Excavation (2011). In V. Lefèvre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and Art 2012, 2. South Asian Religions and Visual Forms in their Archaeological Context,* (Indicopleustoi. Archaeologies of the Indian Ocean 12), 553–566. Paris.

Meister, M.W., and L.M. Olivieri (2012). Conservation and Studies at Gumbat-Balo Kale (Tahsil Barikot, District Swat, Pakistan).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35, 1–22.

Nasir, A. et al. (1995) The Recent Discovery of Cave Paintings in Swat. A Preliminary Note. *East and West* 45 [1–4], 333–353.

Noci, F., R. Macchiarelli, and D. Faccenna (1997) *Saidu Sharif I (Swat, Pakistan) 3. The Graveyard,* (Reports and Memoirs XXIII [3]). Rome.

Olivieri, L.M. (1993) Excavations at Bir-kot-ghwandai (Swat) 1992. Preliminary Report. *Pakistan Archaeology* 28, 103–116.

Olivieri, L.M. (1994) Recent Discoveries of Rock-carvings in Buner and Puran. *East and West* 44 [2-4], 467-480.

Olivieri, L.M. (1996) Notes on the Problematic Sequence of Alexander's Itinerary in Swat. A Geoarchaeological Study. *East and West* 46 [1-2], 45-78.

Olivieri, L.M. (2003) *The Survey of the Bir-kot Hill. Architectural Comparisons and Photographic Documentation. Bīr-koṭ-ghwaṇḍai Interim Reports I,* (Reports and Memoirs, Series Minor IV). Rome.

Olivieri, L.M. (2006) Outline History of the IsIAO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n Pakistan (1956-2006). *East and West* 56 [1-3], 23-43.

Olivieri, L.M. (2006) The IsIAO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n Pakistan.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1956-2006). *East and West* 56 [1-3], 301-318.

Olivieri, L.M. (2007) 'Scale Armour' from Bir-kot-ghwandai and Correlated Finds. Clues for a Tentative Historical Reassessment. *Gandhāran Studies* 1, 23-43.

Olivieri, L.M. (2008a) Fallstudie Swat: Die Stadt Barikot und ihr Umfeld. In M. Jansen, and C. Luczanits eds., *Gandhara. Das buddhistische Erbe Pakistans. Legenden, Klöster und Paradiese*, 294-297. Mainz (also in English version).

Olivieri, L.M. (2008b) Hanging Rocks and 'Intoxicating Drinks': The Rock Art Sequence of the Swat Valley. *South Asian Studies* 24, 15-26.

Olivieri, L.M. (2009) Archaeology in Swat: Activ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Italian Mission, 2000-2010. *Ancient Pakistan* XX, 97-102.

Olivieri, L.M. (2010) Late Historic Cultural Landscape in Swat. New Data for a Tentative Historical Reassessment. In M. Alram et al. eds.,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II.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in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357-369. Vienna.

Olivieri, L.M. (2011a) Behind the Buddhist Communities: Subalternity and Dominancy in Ancient Swat.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Special Issue) 34 [1], 127-156.

Olivieri, L.M. (2011b) Coat Scales and Correlated Finds from Bir-kot-ghwandai Stratigraphic Context. *South Asian Studies* 27 [1], 1-24.

Olivieri, L.M. (2011c) Bibliography (1940-2011). IsMEO/IsIAO research and activities in Northern Pakistan.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Special Issue) 34 [1], 315-356.

Olivieri L.M. (2012a) Newly Discovered Painted Shelters from Swabi, Swat and Buner: A Brief Note.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35, 185-196.

Olivieri, L.M. (2012b) *Painted Rock Shelters of the Swat-Malakand Area From Bronze Age to Buddhism - Materials for a Tentativ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Stratigraphy of Ancient Swat. Berlin.

Olivieri, L.M. (2012c) When and why the ancient town of Barikot was abandoned? A preliminary note based on the last archaeological data. *Pakistan Heritage* 4, 109–120.

Olivieri, L.M. (2014a) *Digging up. Fieldwork guidelines for archaeology students*, (ACT Report and Memoirs, Series Minor Ⅰ). Lahore.

Olivieri, L.M. (2014b) The Last Phases at Barikot: Urban Cults and Preliminary Chronology. Data from the 2012 Excavation Campaign in Swat.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6, 7–40.

Olivieri, L.M. (2015a) "Frontier Archaeology". Sir Aurel Stein, Swat and the Indian Aornos. *South Asian Studies* 31 [1], 58–70.

Olivieri, L.M. (2015b) *M.A. Stein and the 'Lords of the Marches'. New Archival Materials*, (ACT Reports and Memoirs, Archival Studies 1). Lahore.

Olivieri, L.M. (2015c) *Talking stones. Painted rock shelters of the Swat valley*, (ACT Report and Memoirs, Series Minor 2).

Olivieri, L.M. (2015d) Urban defenses at Bīr-koṭ-ghwaṇḍai, Swat (Pakistan). New data from the 2014 excavation campaign.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21 [1], 183–99.

Olivieri, L.M. ed. (2006) *East and West* 56 [1–3] (Special Issue for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IsIAO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n Pakistan).

Olivieri, L.M. et al. (2006) Archaeology and Settlement History in a Test-Area of the Swat Valley.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AMSV Project (1st Phase). *East and West* 56 [1–3], 73–150.

Olivieri, L.M. et al. eds. (2010) *Picture in Transformation. Rock Art Research from Central Asia to the Subcontinent.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19th EASAA Conference (Special Session and Thematic Symposia), Ravenna 2–6 July 2007*,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2167). Oxford.

Olivieri, L.M. et al. (2014a) *The Buddhist sites of Gumbat and Amluk-dara (Barikot)*, (ACT Reports and Memoirs 2). Lahore, 255–319; 321–394.

Olivieri, L.M. et al. (2014b) *The Last Phases of the Urban site of Bir-kot-ghwandai (Barikot)*, (ACT Reports and Memoirs 2). Lahore, 1–252.

Petech, L. (1966) A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 from Butkara I (Swat). *East and West* 16 [1–2], 80–81.

Pugliese Carratelli, G. (1966) Greek Inscrip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East and West* 16 [1–2],

35-36.

Rafiullah Khan (2011) Visual iconicity along the ancient routes: Buddhist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Malam-jabba valley (Swat).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Special Issue) 34 [1], 211-231.

Rockwell, P. (2006) Gandharan Stoneworking in the Swat Valley. In P. Callieri ed., *Architetti, Capomastri, Artigiani. L'organizzazione dei cantieri e della produzione artistica nell'Asia ellenistica. Studi offerti a Domenico Faccenna nel suo ottantesimo compleanno,* (Serie Orientale Roma C), 157-179. Roma.

Spagnesi, P. (2006) Aspects of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Buddhist Sacred Areas in Swat. *East and West* 56 [1-3], 151-175.

Stacul G., and A. Filigenzi (1985) Pakistan 1. The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n Pakistan. *East and West* 35 [4], 436-39.

Taddei, M. (1962) An Ekamukhaliṅga from N.W.F.P. and Some Connected Problems. A Study in Iconography and Style. *East and West* 13 [4], 288-310.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63) Iconographic Considerations on a Gandhāra Relief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Oriental Art in Rome. *East and West* 14 [1-2], 38-55.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64-65) A Liṅga-shaped Portable Sanctuary of the Śāhi Period. *East and West* 15 [1-2], 24-25.

Taddei, M. (1965) On a Hellenistic Model Used in Some Gandharan Reliefs in Swāt. *East and West* 15 [3-4], 174-178.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66a) A Problematical Toilet-tray from Uḍegrām. *East and West* 16 [1-2], 89-93.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66b) An Interesting Relief from the Swāt Valley (II). *East and West* 16 [1-2], 84-88.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69a) Harpocrates-Brahmā-Maitreya: 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a Gandharan Relief from Swāt. *Dialoghi di archeologia* 3, 364-390.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69b) The Hariścandra Seal from Moṛhā Morādu. An Iconographical Note.

Annali dell'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19, 57–68.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79) The Story of the Buddha and the Skull-Tapper. *Annali dell'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39, 395–420.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83) Addenda to 'The Story of the Buddha and the Skull-Tapper'. *Annali dell'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43, 333–339.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85a) A New Early Śaiva Image from Gandhāra. In J. Schotsmans, and M. Taddei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3*,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Series Minor XXIII), 615–628.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85b) Two Notes on Gandharan Iconography. *East and West* 35 [1–4], 271–276.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87) Non-Buddhist Deities in Gandharan Art. Some New Evidence. In M. Yaldiz, and W. Lobo eds., *Investigating Indian Art*.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Museums für Indische Kunst 8), 349–362. Berlin.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90) A Flaming Buddha and His devotees from Far-away Countries. In C. Bautze-Picron, ed., *Makaranda: Essays in Honour of Dr James C. Harle*, 43–50. Delhi.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92) The *Dīṃpakara-jātaka* and Siddhārtha's Meeting with Rāhula: How Are They Linked to the Flaming Buddha? *Annali dell'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52, 103–107.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94) A Gandharan Stone Lid and the Chronology of the Tall-e Takht at Pasargadae. In A. Parpola, and P. Koskikallio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3*, 715–724. Helsinski.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97) Greek Fretwork in India: A Significant Presence. In R. Allchin, and B. Allchin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5, 563–571. Cambridge-New Delhi-

Calcutta.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98) Some Remarks on the Preliminary Reports Published on the Shnaisha Excavations, Swat. *East and West* 48 [1-2], 171-188.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98) Ten Years of Research in the Art of Gandhāra 1987-1997. In Rajeshwar Ghose ed.,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uddha. An Iconic Journey from India to China 26.9.1998-15.12.1998*, 51-57. Hong Kong.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99) Oral Narrative, Visual Narrative, Literary Narrative in Ancient Buddhist India. In A. Cadonna ed., *India, Tibet, China. Genesis and Aspects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 71-85. Firenze.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1999-2000) A Note on Some Luxury Artefacts Imported from Andhra into Gandhāra. In E. Errington, and O. Bopearachchi eds.,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6*, 45-49. Kamakura.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2004) Imported Artefacts from Bīr-koṭ-ghwaṇḍai. *Bīr-koṭ-ghwaṇḍai Interim Reports II*, (Reports and Memoirs, New Series III), 9-24. Rome.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2006) Rec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Gandhāra. The New Evidence. In P. Brancaccio, and K. Behrendt eds., *Gandhāran Buddhism: Archaeology, Art, and Texts*, 41-59. Vancouver.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2008)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Buddha Image (with an Appendix by F. Sferra: Kośagatavastiguhyatā). In K.R. van Koji, and E. Raven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9*. Leiden. (Previously published without Appendix in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and D. Klimburg-Salter (1991) The Uṣṇīṣa and the Brahmarandhra: An Aspect of Light Symbolism in Gandharan Buddha Images. In G. Bhattacharya ed., *Akṣayanīvī. Essays Presented to Dr Debala Mitra in Admiration of Her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73-93. Delhi. (Repr. G. Verardi,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Taddei, M. and U. Scerrato (1995) A Possible Hindu-Shahi Lintel from Swat. In J. Guy ed., *Indian Art, Connoisseurship: Essay in Honour of Douglas Barret,* 52–61. Middleton-New Delhi.

Tanweer, T. (2011) The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A Preliminary Archival Study.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Special Issue) 34 [1], 41–49.

Tucci, G. (1940) *Travels of Tibetan Pilgrims in the Swāt Valley.* Calcutta. (Repr. P. Callieri and A. Filigenzi eds., G. Tucci, *On Swā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Notes*, 1997. Rome).

Tucci, G. (1958a) On a Sculpture of Gandhāra. *East and West* 9 [3], 227–230. (Repr. P. Callieri and A. Filigenzi eds., G. Tucci, *On Swā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Notes*, 1997. Rome).

Tucci, G. (1958b) Preliminary Report on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Swāt. *East and West*, 9[4], 279–348. (Repr. P. Callieri and A. Filigenzi eds., G. Tucci, *On Swā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Notes*, 1997. Rome).

Tucci, G. (1963a) Oriental Notes II: An Image of a Devī Discovered in Swāt and Some Connected Problems. *East and West* 14 [3–4], 146–182. (Repr. P. Callieri and A. Filigenzi eds., G. Tucci, *On Swā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Notes*, 1997. Rome).

Tucci, G. (1963b) *Swat Museum, Saidu Sharif.* Roma. (Repr. P. Callieri and A. Filigenzi eds., G. Tucci, *On Swā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Notes,* 1997. Rome).

Tucci, G. (1968) Oriental Notes III: A Peculiar Image from Gandhāra. *East and West* 18 [3–4], 289–292. (Repr. P. Callieri and A. Filigenzi eds., G. Tucci, *On Swā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Notes*, 1997. Rome).

Tucci, G. (1970) Oriental Notes V: Preliminary Account of an Inscription from North-Western Pakistan. *East and West* 20 [1–2], 103–04. (Repr. P. Callieri and A. Filigenzi eds., G. Tucci, *On Swā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Notes*, 1997. Rome).

Tucci, G. (1971) Himalayan Cīna; Padmasambhava in Swāt. In *Études Tibétaines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Marcelle Lalou*, 548–552. Paris. (Repr. P. Callieri and A. Filigenzi eds., G. Tucci, *On Swā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Notes*, 1997. Rome).

Tucci, G. (1977) On Swāt. The Dards and Connected Problems. *East and West*, 27 [1–4], 9–85; 94–103. (Repr. P. Callieri and A. Filigenzi eds., G. Tucci, *On Swā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Notes*, 1997. Rome).

Verardi G., and A. Filigenzi eds. (2003) M. Taddei. *On Gandhāra*. I-II. Napoli.

附录二：译名对照表

中　文	其他语种
阿巴萨赫布	Abbasaheb-china
阿波波龙	Apalāla
阿波罗	Apollo
阿波罗多托斯	Apollodotus
阿不拉遮	Apraca
阿尔塔巴奴斯	Artabanus
阿耳忒弥斯	Artemis
阿芙洛狄忒	Aphrodite
阿加托克利斯	Agathocles
阿喀琉斯	Achilles
阿克特翁	Actaeon
阿拉布汗	Arapkhan-china
阿拉霍西亚	Arachosia
阿拉米语	Aramaic
阿里阿德涅	Ariadne
阿利安	Arrian
阿利格拉马	Aligrama
阿马拉瓦蒂	Amaravati
阿敏塔斯	Amyntas
阿姆河	Oxus
阿穆路克达拉	Amluk-Dara
阿槃提	Avanti
阿契比乌斯	Archebius
阿契美尼德	Achaemenid
阿瑟斯	Azes, Aya
阿湿婆跋摩	Aśpavarman, Aspa
阿特拉斯	Atlas
阿特米多鲁斯	Artemidoros
阿伊哈努姆	Ai Khanum
阿逾陀	Ayodhya
阿育王	Aśoka
阿旃陀	Ajanta
阿质达霰	Ajitasena
阿最利西斯	Azilises
埃斯奎利诺山	Esquilinus
阿伊罗拔塔	Airāvata
安得拉邦	Andhra
安德拉戈拉斯	Andragoras
安提奥西达斯	Antialcidas
安提玛科斯	Antimachus
安提玛科斯二世（胜利拥有者）	Antimachus II (Nikephoros)
奥德	Audh
奥拉城	Ora

（续表）

中　　文	其他语种
巴尔胡特	Bharhut
巴尔米拉	Palmira
巴尔—夏明	Baal-Shamin
巴格尔	Barger, Evert
巴基斯坦政府考古和博物馆部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s, Government of Pakistan
巴焦尔	Bajaur
巴克特拉	Bactra
巴克特里亚	Bactriana, Bactria
巴拉马	Barama
巴拉希撒	Bala Hisar
巴黎纪念章陈列馆	Cabinet des Médailles
巴里格拉姆	Baligram
巴里果德	Barikot
巴林	Bahrain
巴齐拉	Bazira
白沙瓦	Peshawar
班尔	Pāṇr
般遮迦	Pāñcika
包尼	Pauni
薄伽梵	Bhagavat
《报告与回忆》	Reports and Memoirs
比尔·科特·古万代	Bir-kot-ghwandai
比尔丘	Bhir Mound
波利比乌斯	Polibius
波塞冬	Poseidon
波吒厘城	Pāṭaliputra
华氏城 / 钵颠阇利	Patañjali
布奈尔	Buner
布特卡拉	Butkara
查克德拉	Chakdara
刹帝利	kṣatriya
超日王	Vikramāditya
达尔	Dar, Saifur Rahman
达尔德人	Dard people
达芙妮	Daphne
达摩拉吉卡窣堵波	Dharmarājika stūpa
达尼	Dani, Ahmad Hasan
大力罗摩	Saṃkarṣaṇa
大力罗摩—巴拉罗摩	Saṃkarṣaṇa-Balarāma
德米特里	Demetrius
德墨忒尔	Demeter
狄奥多德	Diodotos
狄奥尼索斯	Dionysius
狄俄墨得斯	Diomedes
狄俄斯库里	Dioscuris
地中海与东方学国际研究协会	ISMEO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terranean and Oriental Studies)
《东方与西方》	*East and West*
厄洛斯	Eros
恶醯掣呾逻	Ahicchatra
法兰克福	Francfort, Henri-Paul
法切那	Faccenna, Domenico
法王	Dharmarāja
法显	Faxian
菲利真齐	Filigenzi, Anna
菲洛克塞努斯	Philoxenus; Philoxenos
吠舍	vaiśya
福斯曼	Fussman, Gérard
富歇	Foucher, Alfred

（续表）

中　　文	其他语种
伽色尼的马哈茂德	Mahmud of Ghazna
伽色尼王朝	Ghaznavid Dynasty
噶达德韦	Gadadevī
盖勒戈	Ghalegay
甘迦拉克希米	Gaja-Lakṣmī
高加索	Caucasus
戈格达拉	Gogdara
戈什	Ghosh, Amalananda
格伦威德尔	Grünwedel, Albert
根本说一切有部	Mūlasarvāstivādin
贡巴特	Gumbat (Balo Kale)
贡巴图那	Gumbatuna
贡多法勒斯	Gondophares
古杜哈罗大王、	Maharaja Guduvhara
古利尼	Gullini, Giorgio
贵霜	Kuṣāṇa
哈达	Hadda
哈里斯矩阵	Harris system
哈特拉	Hatra
诃梨帝	Hārītī
赫尔迈欧斯	Hermaios
赫耳墨斯	Hermes
赫淮斯托斯	Hephaestus
赫拉克勒斯	Herakles
赫利奥克勒斯	Heliocles
赫利俄斯	Helius
赫帕斯特拉托斯	Hippostratos
黑海北岸草原斯基泰地区	Pontic Scythia
黑里欧多拉斯	Heliodorus
黑天	Kṛṣṇa

中　　文	其他语种
黑天—婆苏提婆	Kṛṣṇa -Vasudeva
恒河	Ganges
花幢	Kusumadhvaja
黄金之丘	TillyaTepe
惠勒	Wheeler, Mortimer
慧超	Huichao
吉葛特佩	Jiga Tepe
吉霍尼迦	Jihonika
加尔各答	Calcutta
加哈那巴德	Jahanabad
迦毕试	Kapiśa
迦梨陀娑	Kālidāsa
贾尔瑟达	Charsada
贾罕泽布·米安谷	Miangul Jahanzeb
贾马尔—葛利博物馆	Jamalgarhi Museum
犍陀罗	Gandhāra
江布尔	Jambil
金标币	Stater
金刚乘	Vajrayāna
精舍	vihāra
拘萨罗	Kosalā
喀布尔	Kabul
喀喇昆仑山	Karakoram
卡尔沙巴纳	karsapana
卡拉克德莱	Kalako Derai
卡利俄珀	Calliope
卡列宁	Callieri, Pierfrancesco
卡特来	Katelai
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	Khyber Pakhtunkhwa
凯泽劳斯特	Kaiseraugst
坎大哈	Kandahar

（续表）

中　　文	其他语种
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	Archaeology-Community-Tourism Field School (ACT - Field School)
科塔	Kotah
克里奈	*kline*
孔雀王朝	Maurya
库尔奥巴	Kul Oba
昆都士	Qunduz
拉合尔	Lahore
拉吉乌拉	Rajuvula
拉维河	Ravi
赖特	Wright, Philip
栏楯	vedikā
立柱	stambha
莲花生	Padmasambhava
留西波斯	Lysippos
龙树窟	Nāgārjunakoṇḍa
罗里央唐盖	Loriyan Tangai
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	Rome, Museo Nazionale d'Arte Orientale 'Giuseppe Tucci'
裸行外道	Gymnosophists
洛伊班	Loebanr
吕西阿斯	Lysias
马尔加奈	Marjanai
马哈茂德	Mahmud
马吉安那	Margiana
马祭	aśvamedha
马拉姆贾巴	Malam Jabba
马其顿	Macedonia
马歇尔	Marshall, John
玛玛尼德里	Mamane Dheri

中　　文	其他语种
曼荼罗	maṇḍala
芒格洛尔	Manglaore
毛埃斯	Maues
梅安德河	Meandro River
瞢揭釐	Mengjieli
弥兰陀王	Milinda
米安谷·巴德沙哈伯	Miangul Badshaheb
米南德	Menander/Minedra
米特拉达梯	Mithridates
明戈拉	Mingora
摩揭陀	Magadha
摩腊婆国	Mālava
《摩罗维迦与火友王》	Mālavikāgnimitra
摩耶摩怛	Māyamatā
莫赫拉莫拉都	Mohṛā Morādu
秣菟罗	Mathura
默罕默德纳里	Mohammad Nari
穆罕默德扎伊	Mohammad Zai
穆拉玛丽让	Mohra Maliaran
纳瓦格	Nawagai
娜娜	Nana
尼姬	Nike
尼莫村	Nimogram
涅瑞伊得斯	Nereides
宁芙	nymph
欧克拉提德	Eucratides
欧西德莫斯	Euthydemus
帕噶莫亚	Bhagamoya
帕里斯	Paris
帕洛帕弥撒达	Paropamisadae
帕米尔	Pamir

（续表）

中　文	其他语种
帕尼人	Parni
帕提亚	Parthia
潘达雷昂	Pantaleon
旁遮普邦	Panjab
佩加蒙	Pergamon
佩拉	Pella
毗底沙	Vidiśā
毗奈耶	Vinaya
毗讫罗摩	Vikrama
毗沙跋摩	Viśpavarman
毗湿奴	Viṣṇu
毗湿奴跋摩	Viṣṇuvarman
婆罗门	brāhmaṇa
婆罗谜	Brāhmī
婆苏提婆	Vasudeva
菩提伽耶	Bodh Gaya
弗沙蜜多罗王	Puṣyamitra
齐拉斯	Chilas
恰特帕特	Chatpat
乔答摩·悉达多	Siddhārtha Gautama
乔尔卡拉	Gyaur Kala
丘就却	Kujula Kadphises
佉卢文	Kharoṣṭhī
如来	Tathāgata
萨尔纳特	Sarnath
娑枳多城	Sāketa
萨萨	Sasa
萨珊	Sassan
萨特莱杰河	Satlej River
塞杜河	Saidu River
塞杜沙里夫	Saidu Sharif
塞琉西	Seleucid

中　文	其他语种
塞纳	Senart, Émile
塞人	Saka
桑奇	Sanchi
桑山正进	Kuwayama Shoshin
突厥沙希	Turki Shahi
上军王（嗢呾罗犀那）	Uttarasena
邵瑞祺	Salomon, Richard
绍瓦基	Shewaki
奢羯罗	Sāgala
胜友	Vijayamitra
湿婆	Shiva
史密斯	Smith, Vincent
释迦牟尼	Śākyamuni
斯基泰人	Scythians
斯拉托	Strato
斯里巴哈劳尔	Sahri Bahlol
斯那跋摩	Senavarman
斯坦因	Stein, Aurel
斯特拉波	Strabo
斯瓦特	Swat
四德拉克马	Tetradrachm
宋云	Songyun
俗语	Prakrit
索伊罗	Zoilo
塔代伊	Taddei, Maurizio
塔科特依桑吉	Takht-i Sangin
塔克特依巴依	Takht-i Bahi
塔克西拉	Taxila
塔里木	Tarim
塔玛	Trama
塔玛洛斯帕	Tramanospa
塔门	vedikā

（续表）

中　　文	其他语种	中　　文	其他语种
忒勒福斯	Telephos	须扶提喀	Subhūtika
特佩卡兰	Tepe Kalan	玄奘	Xuanzang
特佩萨尔丹	Tepe Sardar	巽伽王朝	Śuṅga
提奥菲罗斯	Theophilus	雅典娜·阿尔西德莫斯	Athena Alkidemos
提喀	Tyche	亚历山德里亚	Alexandria
提卡尔达拉	Tokar Dara	耶输陀罗	Yaśodharā
提欧达马斯	Theodamas	嚈哒	Ephtalites
图齐	Tucci, Giuseppe	伊斯米亚	Isthmia
托勒密	Ptolemy	伊希马霍	Işmaho
托普达拉	Top Dara	意大利亚非研究院	IsAO (Italian Institute for Africa and Orient)
陀罗	Tolo	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	IsMEO (Italian Institute for Middle and Far East)
瓦利	wali		
王舍城	Rājagṛha		
威达勒	Vidale, Massimo	因陀罗跋摩	Indravarman
威玛·塔克图	Vima Takto	因陀罗婆苏	Indravasu
乌德格兰	Udegram	印度考古调查局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乌迪	Oḍi		
乌仗那	Uḍḍiyāna	印度—希腊	Indo-Greek
西北边境省	North-Western Frontier Province	印度中部地区	Madhya Desh
		印度沙希	Hindu Shahi
西尔卡普	Sirkap	尤曼尼斯	Eumene
西尔克里	Sikri	《瑜伽往世书》	Yuga Purāṇa
西尔苏克	Sirsukh	郁多罗	Uttarā
锡斯坦	Sistan	旃陀罗笈多	Candragupta
象鼻神	Gaṇeśa	占拉姆	Jhelam
谢汗代里	Shaikhan Dheri	珍迪尔	Jandial
谢拉多	Scerrato,Umberto	中央邦	Madhya Pradesh
新沙	Shnesha	中央城	Madhyamika City
信科特	Shinkot	宙斯“胜利者”	Zeus Nicephorus
兴都库什山	Hindukush	朱尼厄斯·布鲁图斯	Iunius Brutus
匈奴	Huns	总督	Satrap
须跋陀罗	Subhadra		

附录三：斯瓦特地区朝代表

当地朝代		主要朝代	国王	年代	主要佛教寺院遗址分期	
					布特卡拉一号遗址	塞杜沙里夫一号遗址
		伽色尼王朝 GHAZNAVIDS	MAWEDUD	1041—1050		
			MUHAMMAD	1040—1041		
			MAS'UD I	1030—1040		
			MAHMUD	1002—1030		
		印度教沙希 HINDU-SHAHI	JAYAPALADEVA	约 964—1002	5	
			BHIMADEVA	约 921—964		
			TORAMANA/KAMALU/VAKKADEVA	约 903—921		
			LALLIYA	约 880—902		
			KHUDARAYAKA	约 870—880		
			SAMANTADEVA	约 850—870		
			KALLAR/SPALAPATIDEVA	约 843—850		
		突厥沙希 TURKI-SHAHI	LAGATURMAN	约 820—843		
			（继任者）	—		
			BARHATIGIN	7 世纪早期		
		嚈哒 HEPHTALITES	（继任者）	—		
			醯罗尼矩罗 HIRANYAKULA	—		
			摩醯逻矩罗 MIHIRAKULA	6 世纪中叶	4/5	
			头罗曼 TORAMANA	6 世纪早期		
		寄多罗 KIDARITES	-	4 世纪末至 5 世纪末	4/4	III
		贵霜—萨珊 KUSHANO-SASANIANS	沙普尔二世 SHAPUR II	约 309—379	4/3	
			瓦赫兰 BAHRAM (VARAHRAN)	约 330—365	4/2	
			卑路斯二世 PEROZ II	约 300—330	4/1	
			巴赫拉姆一、二世 HORMIZD I-II	约 270—300		
			卑路斯一世 PEROZ I	约 245—270	3	II
			-	—		

（续表）

当地朝代		主要朝代	国王	年代	主要佛教寺院遗址分期	
		贵霜 KUSHANS	韦苏提婆一世 VASUDEVA I	约 190—230	3	
			胡毗色伽 HUVISHKA	约 150—190		
			迦腻色伽一世 KANISHKA I	约 127—150		
			阎膏珍 WIMA KADPHISES	约 113—127		
			威玛·塔克图 WIMA TAKTO (=SOTER MEGAS)	约 100—113		
	马迪 ODI		丘就却 KUJULA KADPHISES	约 50—100		I
阿婆罗遮 APRACA 萨萨 SASA	斯那跋摩 SENAVARMAN	帕提亚 PARTHIANS	（继任者）贡多法勒斯 GONDOPHARES（前任者）	约 25—50?		
阿湿婆跋摩 ASPAVARMAN	阿质达霰 AJITASENA	塞人 SAKAS	阿瑟斯二世 AZES II	约公元前 5 年至公元 25 年		
因陀罗跋摩 INDRAVARMAN			阿最利西斯 AZILISES	约公元前 25—前 5		
毗湿奴跋摩 VISNUVARMAN			阿瑟斯一世 AZES I	约公元前 46—前 25	2	
因陀罗婆苏 INDRAVASU			（继任者）	—		
吠闍耶密多 VIJAYAMITRA			毛埃斯 MAUES	公元前 90—前 80		
		印度—希腊 INDO-GREEK	（继任者）	—		
			安提奥西达斯 ANTIALKIDAS	约公元前 110—前 100		
			斯特拉托一世 STRATO I	约公元前 120—前 110		
			索伊罗一世 ZOILOS I	约公元前 130—前 120		
			米南德 MENANDER	约公元前 155—前 130		
			安提马科斯二世·尼基弗鲁斯 ANTIMACHOS II NIKEPHOROS	约公元前 165—前 155		
			（前任者）	—		
		希腊—巴克特里亚 GRAECO-BACTRIAN	德米特里乌斯 DEMETRIUS	约公元前 200—前 190		
		孔雀王朝 MAURYA	布柯提婆陀 BRIHADRATHA	公元前 2 世纪早期		
			（继任者）	—	1	
			阿育王 ASOKA	约公元前 272—前 232		
			宾头沙罗 BINDUSARA	公元前 3 世纪早期		
			旃陀罗笈多 CHANDRAGUPTA	公元前 305—		
骑兵 ASSAKENOI-ASVAKA		马其顿人 MACEDONIANS	尼卡诺 NIKANOR	公元前 327—前 326/325		
			亚历山大 ALEXANDER	公元前 327		
		阿契美尼德人？ ACHAEMENIANS	—	公元前 6 世纪末期		

附录四：图片说明

图版说明

图版1　斯瓦特河谷位置及斯瓦特河景观

图版2　犍陀罗地区考古遗址分布图；John C. Huntington (Huntingtonarchive.osu.edu) 2004年绘制；卡列宁2015年修改更新

图版3　斯瓦特河谷地图；菲利真齐负责的FWF Stand-Alone Project P21902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Uddiyana 4th to 8th Century CE" ÖAW（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ocumenta Antiqua（Numismatic Working Group）项目调查勘测、Karel Kritz和Daniel Neil绘制

图版4　斯瓦特地区考古遗址分布图；根据菲利真齐负责的FWF Stand-Alone Project P21902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Uddiyana 4th to 8th Century CE" ÖAW（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ocumenta Antiqua（Numismatic Working Group）项目调查勘测、Karel Kritz和Daniel Neil绘制的地图改编

图版5　明戈拉附近主要遗址图；根据菲利真齐负责的FWF Stand-Alone Project P21902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Uddiyana 4th to 8th Century CE" ÖAW（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ocumenta Antiqua（Numismatic Working Group）项目调查勘测、Karel Kritz和Daniel Neil绘制的地图改编

图版6　斯瓦特河下游地区佛教石刻造像分布图；菲利真齐负责的FWF Stand-Alone Project P21902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Uddiyana 4th to 8th Century CE" ÖAM（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ocumenta Antiqua（Numismatic Working Group）项目调查勘测、Karel Kritz 和 Daniel Neil绘制

图版7　布特拉卡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公元前3—公元11世纪）；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档案馆藏；Callieri 1982年摄

图版8　班尔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公元1—5世纪）；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档案馆藏；

Filigenzi 1984 年摄

图版 9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公元 1—4 世纪）；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档案馆藏；Noci 1981 年摄

图版 10　比尔·科特·古万代遗址（从斯瓦特河谷中央远眺巴里果德山）；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档案馆藏；Olivieri 摄

图版 11　斯瓦特河下游科塔的碉楼遗址（公元 7—10 世纪）；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藏；Olivieri 摄

图版 12　比尔·科特·古万代遗址及发掘区分布示意图；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藏

图版 13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BKG 4—5 公元前印度—希腊时期城墙（自南向北）；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藏；Callieri 摄

图版 14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BKG 4—5 西墙内居住区（公元 4—5 世纪）；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藏；Olivieri 摄

图版 15　巴里果德山顶的长方形殿堂基址（自西南向东北）；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藏；Olivieri 摄

图版 16　比尔·科特·古万代出土的陶塑女神像（公元 1 世纪）；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和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Olivieri 摄

图版 17　阿巴萨赫布佛教寺院遗址

图版 18　江布尔河谷阿拉布汗的摩崖造像；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藏；Olivieri 摄

图版 19　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新馆照片；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藏；Colliva 2005 年摄

图版 20　乌德格兰墓地发掘；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Loliva 2011 年摄

图版 21　比尔·科特·古万代古城西南区正射影像图；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Genchi 2012 年摄，Marati 绘

图版 22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BKG 11 西端发现的神龛内的雕像；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Olivieri 2013 年摄

图版 23　发掘修复前的贡巴特佛殿；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Loliva 2011 年摄

图版 24　发掘前的阿穆路克达拉大窣堵波；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Olivieri 2012 年摄

图版 25　发掘后的阿穆路克达拉大窣堵波（踏道部分被修复，前有一座小型的克什米尔式盝顶寺庙）；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Loliva 2012 年摄

图版 26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BKG 11 西端发现的造像碑；编号BKG 2304；塞杜沙里

夫斯瓦特博物馆和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Aurangzeib Khan 2012年摄
图版27　贡巴特佛殿远景；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Loliva 2011年摄
图版28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残段细部；编号SSI 3；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和藏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Loliva 2011年摄
图版29　塞杜沙里夫一号小型窣堵波的发掘；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Olivieri 2014年摄
图版30　萨尔纳特出土的阿育王石柱上的狮子柱头；萨纳拉特考古博物馆藏；图片采自Klimburg 1995, fig. 1
图版31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BKG 12修复后的城墙及城壕；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Olivieri 2014年摄
图版32　布特卡拉一号发掘区示意图，不同颜色和形状分别代表不同建造阶段；图片采自Faccenna 1980-81, pl. 18

插 图 说 明

图1　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年）；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档案馆藏；Bonardi 摄
图2　法切那（Domenico Faccenna, 1923-2008年）；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档案馆藏；Bonardi 摄
图3　塔代伊（Maurizio Taddei, 1936-2000年）；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档案馆藏
图4　乌德格兰古城（公元5—14世纪）；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档案馆藏
图5　卡特来M185（公元前7—前4世纪）；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档案馆藏；Stacul 1964年摄
图6　洛伊班一号墓地；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档案馆藏；Stacul 1965年摄
图7　盖勒戈岩棚内的地层堆积；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档案馆藏；Stacul 1967年摄
图8　阿利格拉马聚落遗址（公元前18—前4世纪）；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档案馆藏；Tusa 1977年摄
图9　卡拉克德莱遗址出土的石质收割工具（公元前18—前15世纪）；与克什米尔和喜马拉雅地区直接相关；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Stacul 摄
图10　斯瓦特河谷巴林清真寺门楣局部（公元19—20世纪）；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档案馆藏；Noci 摄
图11　公元11世纪伽色尼王朝时期清真寺遗址（自西向东）；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档案馆藏；Scerrato 摄
图12　乌德格兰巴扎遗址发掘（公元前4—公元4世纪）；原意大利亚非研究院档案

馆藏

图13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BKG 4—5城墙内的小型佛堂（公元2—4世纪）；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藏

图14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BKG 2高台上的方体建筑内立四根砖石柱；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藏；Filigenzi 1990年摄

图15　巴里果德山顶的长方形殿堂基址出土的毗湿奴权杖的拟人形象噶达德韦石雕像残段；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和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Callieri 摄

图16　巴里果德山顶的长方形殿堂基址出土的灰泥像残段线描图；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和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Martore 绘

图17　比尔·科特·古万代出土的彩绘陶器（公元4世纪）；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和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

图18　加哈那巴德大佛；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藏；Olivieri 1989年摄

图19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BKG 10；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藏；Olivieri 2006年摄

图20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BKG 11的发掘；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Olivieri 2012年摄

图21　比尔·科特·古万代探沟BKG 11东端和家用佛堂轴测图；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Martore 2013年摄

图22　贡巴特弧顶穹窿顶双顶佛殿复原后的正视图和轴测图；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Martore 2011年摄

图23　贡巴特台地上的三座大型建筑复原图；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Martore2011年摄

图24　阿穆路克达拉大窣堵波复原轴测图；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Martore 2011年摄

图25　修复前的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Olivieri 2014年摄

图26　修复后的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藏；Olivieri 2014年摄

图27　表现太子诞生场景的浮雕板；编号AKD 89；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和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Loliva 2012年摄

图28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供养人雕像；编号SSI 1；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和考

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Loliva 2011年摄

图29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残段细部；编号SSI 2；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和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Loliva 2011年摄

图30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残段；编号SSI 3；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和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Loliva 2011年摄

图31 塞杜沙里夫一号坐佛像大浮雕板残段；编号SSI 22；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和考古—社会—旅游田野学校；Loliva 2011年摄

图32 布特卡拉一号出土的浮雕板残段，上刻丑化的婆罗门像；编号B 4270

图33 犍陀罗地区出土的浮雕板，上刻佛陀慰问婆罗门苦行者；白沙瓦博物馆藏；图片采自*The Art of Gandhara, Pakistan*, Tokyo 2003，fig. 23

图34 布特卡拉三号出土的犍陀罗浮雕板，上刻僧侣礼拜四角立柱的窣堵波；图片采自Faccenna 2001，fig. 10

图35 现已不存的恰特帕特小窣堵波老照片；图片采自Proser 2011，fig. 2, p. 73

图36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供奉龛遗址；也是用来存放舍利盒的小型建筑，内常有供养人布施的供品，有时甚至撒有信众的骨灰；图片版权归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所有

图37 斯瓦特发现的浮雕板残段，上部刻佛陀在窟内禅定（仅右下方保存），基座上刻服饰各异的信众举行火祭仪式；编号B 2465；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图38 塔克西拉附近的珍迪尔佛寺遗址；Callieri 1977年摄

图39 刻有希腊字母的陶片；斯瓦特乌德格兰出土；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图40 比尔·科特·古万代印度—希腊时期城墙西南角的五边形角楼；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藏；Callieri 1990年摄

图41 比尔·科特·古万代印度—希腊时期地层出土的“巴洛克女士”陶塑像残段；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和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Callieri 1990年摄

图42 比尔·科特·古万代塞人时期地层出土的希腊化风格陶塑女像头部；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和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Callieri 1990年摄

图43 比尔·科特·古万代塞人和帕提亚时期地层出土的单模制作的陶塑女像；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和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Callieri 1990年摄

图44 欧西德莫斯一世（约公元前230—前200年在位）四德拉克马银币；阿提卡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右向的国王头像，背面为扶木棍坐于石上的赫拉克勒斯神像和意为“属于欧西德莫斯王”的希腊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

塞佩·图齐”藏，编号 17889；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45 德米特里一世（约公元前200—前190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阿提卡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右向、头戴象头的国王头像，背面为披狮皮站立、手举王冠准备佩戴的赫拉克勒斯神像和意为“属于德米特里王”的希腊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 13143；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46 阿波罗多托斯一世（约公元前180—前160年在位）德拉克马方形银币；印度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右向的大象像和意为“属于阿波罗多托斯王，救世主”的希腊铭文，背面为右向的瘤牛像和意为“属于阿波罗多托斯王，救世主”的佉卢文字体西北俗语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 17802；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47 安提玛科斯二世（约公元前160—前155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印度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左向、戴头饰、手持棕榈的尼姬像和意为“属于安提玛科斯王，胜利者”的希腊铭文，背面为骑马国王像和意为“属于安提玛科斯王，胜利者”的佉卢文字体西北俗语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 17838；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48 米南德（公元前155—前130年在位）四德拉克马银币；印度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右向、戴头盔的国王半身像和意为“属于米南德王，救世主”的希腊铭文，背面为左向、手持盾作投掷状的雅典娜阿尔西德莫斯像和意为“属于米南德王，救世主”的佉卢文字体俗语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 17887；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49 米南德（公元前155—前130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印度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向左、戴头饰、持皮制甲标枪的国王半身像和意为“属于米南德王，救世主”的希腊铭文，背面为左向、手持盾作投掷状的雅典娜·阿尔西德莫斯像和意为“属于米南德王，救世主”的佉卢文字体俗语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 17849；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50 欧克拉提德一世（公元前170—前145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阿提卡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右向、戴装饰牛角和耳朵的头盔的国王半身像，背面为骑马的狄俄

斯库里像和意为“属于欧克拉提德王，大王”的希腊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 17806; 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51 欧克拉提德一世（公元前170—前145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印度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右向、戴装饰牛角和耳朵的头盔的国王半身像和意为“属于欧克拉提德王，大王”的希腊铭文，背面为两位身披斗篷、手持矛站立的狄俄斯库里像和意为“属于欧克拉提德王，大王”的佉卢文字体俗语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 17807; 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52 欧克拉提德二世（约公元前 145—前140年在位）四德拉克马银币；阿提卡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右向、戴头饰的国王半身像；背面为手持箭和弓站立的阿波罗像和意为“属于欧克拉提德王”的希腊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 17886; 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53 赫利奥克勒斯一世（约公元前145—前130年在位）四德拉克马银币；阿提卡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右向、戴头饰国王半身像，背面为手持箭头和权杖站立的宙斯像和意为“属于赫利奥克勒斯王，公正”的希腊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 17885; 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54 阿波罗多托斯二世（约公元前80—前65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印度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右向、戴头饰的国王半身像和意为“属于阿波罗多托斯王，意为爱其父亲的救世主”的希腊铭文，背面为左向、手持盾作投掷状的雅典娜阿尔西德莫斯像；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 17885; 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55 阿瑟斯一世（约公元前57—前35年在位）四德拉克马银币；印度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右向、持矛的骑马国王像和意为“属于诸王之王，伟大的阿瑟斯王”的希腊铭文，背面为左向、持火焰和棕榈枝的女神像和意为“属于诸王之王，伟大的阿瑟斯王”的佉卢文字体俗语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 17892; 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56 阿最利西斯（约公元前57—前35年在位）四德拉克马银币；印度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右向、持矛的骑马国王像和意为“属于诸王之王，伟大的阿最利西斯

王”的希腊铭文，背面为左向、持火炬和棕榈枝的女神像和意为“属于诸王之王，伟大的阿最利西斯王”的佉卢文字体西北俗语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17895; 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57　阿瑟斯二世（约公元前15/5—公元17/20年在位）四德拉克马银币；印度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右向、手拿鞭子的骑马国王像和意为“属于诸王之王，伟大的阿瑟斯王”的希腊铭文，背面为持长矛的宙斯“胜利者”神像和意为“属于大王，诸王之王，伟大阿最利西斯王”的佉卢文字体俗语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17901; 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58　贡多法勒斯（约公元20—55年在位）四德拉克马掺红铜银币；印度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右向、戴头饰的国王半身像和意为“属于贡多法勒斯王，救世主”的希腊铭文，背面为右向、手持头冠或棕榈枝的尼姬像和意为“属于贡多法勒斯王，救世主”的佉卢文字体俗语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13133; 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59　索伊罗一世（约公元前130—前120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印度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向右、戴头饰的国王半身像和意为“属于索伊罗王，公正”的希腊铭文，背面为戴冠、持木棍、披狮皮站立的赫拉克勒斯神像和意为“属于索伊罗王，公正”的佉卢文字体俗语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17795; 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60　安提奥西达斯（约公元前115—前95年在位）德拉克马银币；印度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右向、戴头饰的国王半身像和意为“属于安提奥西达斯王，胜利者”的希腊铭文，背面为一手托胜利女神，一手持权杖，坐在宝座上的宙斯“胜利者”神像，左侧有一大象和意为“属于安提奥西达斯王，胜利者”的佉卢文字体俗语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17829; 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61　赫尔迈欧斯（约公元前90—前70年在位）德拉克马钱币；印度钱币重量单位；正面为右向、戴头饰的国王半身像和意为“属于赫尔迈欧斯，救世主”的希腊铭文，背面为手持权杖、坐在宝座上的宙斯神像和意为“属于赫尔迈欧斯，救世主”的佉卢文字体俗语铭文；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编号17861; Giuliano 摄；图片版权归拉齐奥大区博物馆管理局和罗马国家东方

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所有

图62 布特卡拉发现的绿泥片岩浮雕板残段，上刻一对夫妻站在圆拱下；35×25.5×6.5厘米；编号3216；图片采自Faccenna 1962-64，pl. CLVIII

图63 西尔卡普发现的绿泥片岩化妆盘，内刻阿波罗与达芙妮；直径11厘米；卡拉奇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藏；图片采自Higuchi ed. 1984，pl. V-1

图64 西尔卡普发现的绿泥片岩化妆盘，内刻狄奥尼索斯与阿里阿德涅的婚礼；直径16.7厘米；新德里国家博物馆藏；图片采自Francfort 1979, pl. VII

图65 出处不明的黑泥片岩化妆盘，内刻涅瑞伊得斯骑海兽；直径10.5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藏；图片采自Francfort 1979，pl. XVII

图66 西尔卡普发现的黑泥片岩化妆盘，内刻宴会场景；直径13.5厘米；卡拉奇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藏；图片采自Francfort 1979，pl. XIV

图67 西尔卡普发现的灰泥片岩化妆盘，内刻宴会场景；直径13.5厘米；卡拉奇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藏；图片采自Francfort 1979，pl. XV

图68 西尔卡普发现的灰泥片岩化妆盘，内刻一对饮酒者；直径17.4厘米；卡拉奇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藏；图片采自Francfort 1979，pl. XXIX

图69 犍陀罗发现的灰泥片岩化妆盘，内刻一对饮酒者；直径16.9厘米；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图片采自Francfort 1979，pl. XXX

图70 犍陀罗发现的片岩化妆盘，内刻一对饮酒者；直径18.8厘米；伦敦大英博物馆藏；图片采自Francfort 1979，pl. XLIV

图71 西尔卡普发现的灰泥片岩化妆盘残片，内刻多对饮酒者；直径18厘米；塔克西拉博物馆藏；图片采自Francfort 1979，pl. XXXVIII

图72 克里米亚半岛库尔奥巴发现的金饰牌，上刻两位斯基泰人从同一来通中饮酒；高4.5厘米；图片采自Schiltz 1994, fig. 132

图73 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遗址照片拼接图

图74 布特卡拉一号大窣堵波五次建造阶段轴测图；图片采自Faccenna 1980-81, I, pl. V

图75 布特卡拉一号大窣堵波3立面复原图；图片采自Faccenna 1980-81，I, fig. 30

图76 布特卡拉一号遗址内第14号窣堵波东侧立面；图片采自Faccenna 1980-81，fig. 81

图77 布特卡拉一号遗址内第14号窣堵波西侧檐口细部；图片采自Faccenna 1980-81，pl. 139a

图78 布特卡拉一号遗址内第14号窣堵波基座的檐口细部；丰富的雕刻装饰为同时期其他石刻提供了参照；图片采自Faccenna 2001，tav. 96b

图79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檐口残段，上部雕刻与第14号窣堵波檐口类似，下部刻一排半身像；编号B 6841；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摄

图80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第135号方柱柱头，上刻叶丛与半身像；编号B 3744；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图81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柱头，上刻叶丛与半身像；编号B 5637；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摄

图82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柱头，上刻叶丛与半身像；编号B 7036；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摄

图83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自然”组浮雕板残段，上刻佛陀和供养人像；编号BI 782；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图84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自然”组浮雕板残段，上刻沉思女性和老年苦行者，表现的或是占梦；编号B 1193；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摄

图85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自然”组浮雕板残段，上刻向金刚手守卫的佛陀致敬；编号B 15395；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摄

图86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立体”组由三块残段组成的浮雕板，上刻两位佛陀（中、右）和左手持净瓶的弥勒菩萨（左）；编号B 2542-3598-3814；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摄

图87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立体”组拱形浮雕板残段，上刻菩萨像和结跏趺坐于莲花上的佛像（左）；编号B 7086；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摄

图88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拱形浮雕板残段，上刻坐佛、王室供养人和一位年老仆人；编号B 7362；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摄

图89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拱形浮雕板残段，上刻坐佛和王室供养人；编号B 6694；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摄

图90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浮雕板残段，表现赠送大象场景；编号B 683；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图91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浮雕板残段，上刻一对舞乐者；编号B 5937；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摄

图92　贡巴特发现的“线刻”组浮雕板，“印度式”佛像两侧分别为梵天（左）和帝释天（右）；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

图93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夜叉女雕像(左);编号B 1700;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 摄

图94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夜叉女雕像(右);编号B 1710;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 摄

图95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着印度式服装的男供养人雕像(左);编号B 5929;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图96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着帕提亚式服装的男供养人雕像(右);编号B 2598;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图97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檐口残段;编号B 291;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 摄

图98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爱神承托波浪形花纲的分隔构件;编号B 48;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 摄

图99　“线刻”组浮雕板残段,上刻坐佛及两侧供养人;编号V 20;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 摄

图100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浮雕板残段,上刻坐佛及两侧供养人;编号B 2222;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 摄

图101　“线刻”组浮雕板残段,下排刻坐佛及两侧供养人;编号B 3632;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图102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浮雕板残段,上刻华盖下的菩萨立像和供养人;编号B 2353;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 摄

图103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线刻”组浮雕板残段,上刻佛陀立于莲花上,两侧各有三排供养人;编号B 655

图104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立于莲花上的立佛雕像;编号B 4324;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图105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全景;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藏;Noci 摄

图106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平面布局图

图107　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第一期平面布局图

图108　塞杜沙里一号大窣堵波立面复原图

图109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复原模型;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第4展厅

图110　塞杜沙里夫一号僧院遗址(自西向东);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考古项目档案馆藏;Noci 摄

图111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上的装饰复原正面图;图片采自Faccenna 2001, fig. 5

图112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上排组件彼此连接以及与大窣堵波壁面连接示意图（左）；图片采自Faccenna 2001，fig. 6

图113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下排组件彼此连接以及与大窣堵波壁面连接示意图（右）；图片采自Faccenna 2001，fig. 18

图114 塞杜沙里夫一号大窣堵波横饰带下排场景假设复原示意图；图片采自Faccenna 2001，fig. 18

图115 尼莫村出土的编浮雕板残段，表现太子路遇猎人并交换衣服的场景；编号NG 492；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图116 出处不明的浮雕板，表现乘象入胎场景；伦敦大英博物馆藏；图片采自Zwalf 1996，pl. 141

图117 罗里央唐盖出土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太子诞生场景；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图片采自Klimburg 1995, fig. 157

图118 布特卡拉一号窣堵波上多利安式三槽线细部；图片采自Faccenna 1980–81，pl. 152c

图119 桑奇一号窣堵波北侧塔门，上刻佛陀生平场景；图片采自Albanese 2001，fig. p. 135

图120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供养人雕像；编号B 2881；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 摄

图121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上刻两位青年苦行者；编号B 3673；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 摄

图122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太子决意出家的场景；编号B 2472；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图123 罗里央唐盖出土的具有希腊化“阿波罗”特征的说法佛像；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图片采自Klimburg-Salter 1995，fig. 129

图124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印度式”佛像；编号B 2147；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

图125 秣菟罗恶醯掣呾逻发现的造像碑；新德里国家博物馆藏；图片采自Klimburg-Salter 1995，fig. 71

图126 犍陀罗地区发现的浮雕板，表现尸毗王本生故事场景；此处的情节是悉达多的前生尸毗王舍身割肉从猎鹰口中救回鸽子，猎鹰实际上是帝释天为测试尸毗王的诚意而变；伦敦大英博物馆藏；图片采自Zwalf 1996，pl. V 136

图127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的佛传场景从右至左展开；编号S 563；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图128　斯瓦特出土的犍陀罗浮雕板，上刻一立佛，胁侍金刚手，接受王公贵族的礼拜；编号V55；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 摄

图129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浮雕板，表现降魔成道场景；编号B 3279；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图130　出处不明的菩萨苦修像，因长时间苦行后变得极度憔悴瘦弱，尽管不甚清晰，仍可看到头顶的梵穴；拉合尔博物馆藏

图131　梵穴线图；菲利真齐绘

图132　犍陀罗地区发现的假龛，表现太子逾城出家场景；贾马尔—葛利博物馆藏，图片采自Klimburg-Salter 1995，fig. 160

图133　犍陀罗地区发现的假龛，表现太子逾城出家场景；拉合尔博物馆藏，图片采自Proser 2011，fig. 32

图134　默罕默德纳里出土的造像碑，表现佛陀示现场景，曾被解读为舍卫城神迹；拉合尔博物馆藏，图片采自Rehmani 1999，fig. 6；Fig. 13

图135　公元5年造像碑；表现佛陀示现场景，曾被解读为舍卫城神迹；私人收藏；图片采自 Kurita 1988-1990，I, pl. p. 143

图136　弥勒菩萨像；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图片由Giuliano提供

图137　塔克特依巴依遗址出土的守护神夫妇雕像；伦敦大英博物馆藏；图片采自Zwalf 1996，fig. 98

图138　白沙瓦穆罕默德扎伊出土的年轻战神塞健陀或六面童天杀死恶魔马尼萨石造像；图片采自Proser 2011，fig. 3

图139　玛玛尼德里出土的帝释窟说法石造像，窟外最突出的两位形象是金刚手（左）和塞健陀（右）；塔克西拉博物馆藏；图片采自Kurita 1988-1990，I, fig. 300

图140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横饰带残段，下排表现佛传故事场景（右：太子诞生；左：占星，原为连续场景，现部分丢失），上排表现"非传记性"的故事场景；编号S 408；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图141　布特卡拉一号发现的带叠涩雕刻方框的门框残段：下部刻一立佛像，上部刻一对欢爱男女；编号 B 3215；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Poncar 摄

图142　班尔发现的檐口残段，表现被葡萄藤分隔的饮酒场景；编号P 646—7535；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

附图说明

附图1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乘象入胎场景；编号S 998；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2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太子诞生场景；编号S 920；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附图3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提婆达多杀死大象场景；编号S 1124；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附图4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竞赛场景；编号S 1088；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5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竞赛场景；编号S 246；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6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与爱马犍陟诀别场景；编号S 132；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7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车匿返回场景；编号S 622；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8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路遇猎人场景；编号S 48；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9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八王争舍利场景；编号S 708；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10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上军王骑象载回舍利场景；编号S 241；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附图11　浮雕板残段，表现苦行者在宴会上庆祝太子降生或婚礼场景；编号A 339；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附图12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选新娘场景；编号S 676；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附图13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拔河比赛场景；编号S 792；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14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竞赛场景；编号S 1128；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15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净饭王赠予太子大象场景；编号S 1112；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附图16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太子还宫场景；编号S 20

附图17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宫廷娱乐生活场景；编号S 1137；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18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宫廷奏乐生活场景；编号S 1152；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19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接受吉祥草场景；编号S 1412；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20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难陀皈依场景；编号S 1246；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21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难陀皈依场景；编号S 501；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22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骑士出城门场景；编号S 709；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23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表现骑士场景；编号S 621；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24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场景不明；编号S 129；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25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场景不明；编号S 784；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26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场景不明；编号S 1166；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27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场景不明；编号S 1176；塞杜沙里夫斯瓦特博物馆藏
附图28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场景不明；编号S 1310；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29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浮雕板残段，场景不明；编号S 1450；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30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叠涩边框内的犍陀罗—科林斯式半圆柱浮雕残段；编号S 1108；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Loliva 摄
附图31　塞杜沙里夫一号发现的装饰二方连续莨菪叶的檐口残段，编号S 251；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藏
附图32　檐口下部的水平连续槽
附图33　檐口上部内缘的楔形槽

参考书目

Albanese, M. (2001) *Antica India*. Vercelli.

Allouche-Le Page, M.T. (1956) *L'art monétaire des royaumes bactriens: essai d'interprétation de la symbolique religieuse gréco-orientale du IIIe au Ier siècle avant J.-C.* Paris.

Altare di Pergamo (1996) *L'altare di Pergamo. Il fregio di Telefo* (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Roma). Venezia.

Amedick, R. (1991) *Die Sarkophage mit Darstellungen aus dern Menschenleben, 4. Vita privata* (Die Antiken Sarkophagreliefs 1[4]). Berlin.

Andreae, B. (1996) I paesaggi odissiaci dell'Esquilino. In B. Andreae, and C. Parisi Prasicce eds. *Ulisse. Il mito e la memoria* (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Roma), 194–99. Roma.

Andreae, B. (2001) *Skulptur des Hellenismus*. München.

Bailey, H.W. (1978) Two Kharoṣṭhī casket inscriptions from Avac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13.

Bailey, H.W. (1982) Two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42–155.

Banerjea, J.N. (1941) *The Development of Hindu Iconography*. Calcutta.

Barger, E., and Ph. Wright (1941) *Excavations in Swāt and Explorations in the Oxus Territories of Afghanistan. A Detailed Report of the 1938 Expedition,*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64). Delhi-Calcutta.

Barringer, J.M. (1995) *Divine Escorts. Nereids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Art*. Ann Arbor.

Beard, M. et al. (1998) *Religions of Rome*. Cambridge.

Bernard, P. (1985) *Fouilles d'Aï Khanoum. IV. Les monnaies hors trésors. Question d'histoire gréco-bactrienne,* (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XXVIII). Paris.

Bivar, A.D.H. (1979) Mithraic Images of Bactria: Are they related to Roman Mithraism? In U. Bianchi ed., *Mysteria Mithrae,* (Études préliminaires aux réligions orientales dans l'Empire romain, 80), 741–759. Roma.

Bopearachchi, O., and W. Pieper (1998) *Ancient Indian Coins.* Turnhout.

Bopearachchi, O. (1990a) Graeco-Bactrian issues of later Indo-Greek kings. *Numismatic Chronicle,* 79–103.

Bopearachchi, O. (1990b) King Milinda's conversion to Buddhism, fact or fiction? *Ancient Ceylon* 7, 1–15.

Bopearachchi, O. (1991)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Bi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Boyce, M., and F. Grenet (1991) *A History of Zoroastrianism. III. Zoroastrianism under Macedonian and Roman Rule.* Leiden.

Brett, A.B. (1950) Athena Alkidemos of Pella.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Museum Newsletter* 4, 55–72.

Bussagli, M. (1984) *L'arte del Gandhāra.* Torino.

Callieri, P. (1989) *Saidu Sharif I (Swat, Pakistan). 1. The Buddhist Sacred Area. The Monastery,* (IsMEO Reports and Memoirs, XXIII [1]). Rome.

Callieri, P. (1992) The *Stūpa*-Court (BKG 420). In P. Callieri et al. (1992) *Bīr-koṭ-ghwaṇḍai 1990–1992.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of the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sMEO*, 27–35.

Callieri, P. (1995) The North-West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in the Indo-Greek period: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A. Invernizzi ed., *In the Land of the Gryphons* (Monografie di Mesopotamia V), 293–308. Firenze.

Callieri, P. (1997) Seals and Sealings from the North-West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and Afghanistan (4th Century BC - 11th century AD). (Dissertationes, 1). Naples.

Callieri, P. (1990) Archaeological Activities at Bīr-koṭ-ghwaṇḍai, Swāt: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Pottery of Historic Age from N.W.F.P. In M. Taddei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7*, 675–692. Rome.

Callieri, P. ed. (1982)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sMEO), Pakistan, Swāt, 1956–1981. Documentary Exhibitition.* Rome.

Callieri, P. et al., (1992) *Bīr-koṭ-ghwaṇḍai 1990–1992.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of the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sMEO* (Supplemento n. 73 agli *Annali* -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52 [4]. Napoli.

Callieri, P. et al., (2000) *Bīr-koṭ-ghwaṇḍai, Swat, Pakistan*. 1998 -1999 Excavation Report. *East and West*, 50 [1-4], 191-226.

Callieri, P. (2000) Decorated pottery from the IsIAO Excavations at Bīr-koṭ-ghwaṇḍai (Swat, Pakistan, 2nd cent. BC - 15th cent. AD). In M. Taddei, and G. De Marco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7, (Serie Orientale Roma, XC [2]), 857-876. Rome.

Callieri, P. (2006) Buddhist Presence in the Urban Settlements of Swāt. In P. Brancaccio, and K. Behrendt eds., *Gandhāran Buddhism: Archaeology, Art, Texts*, 60-82. Vancouver.

Coomaraswamy, A.K. (1927) The Origin of the Buddha Image. *The Art Bulletin* IX [4], 1-43.

Cupitò, M., and L.M. Olivieri (2013) Architectural and infra-structural evidence of re-use of residential units in macro-phase D, sector W of Bīr-koṭ-ghwaṇḍai/Barikot.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36, 451-81.

Curiel, R., and G. Fussman (1965) *Le trésor monétaire de Qunduz* (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XX). Paris.

Dani, A.H. (1965-66) Shaikhan Dheri Excavations (1963 and 1964 Seasons). *Ancient Pakistan* 2, 17-214.

Dar, S.R. (1979) Toilet trays from Gandhara and beginning of Hellenism in Pakistan.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2, 141-84.

Dar, S.R. (1984) *Taxila and the Western World*. Lahore (ed. 1998).

De Marco, G. (1983) *I "Kuṣāṇa" nella vita del Buddha. Per una analisi del rapporto tra potere politico e religione nell'antico Gandhāra* (Supplemento n. 34 agli *Annali* -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43 [1]). Napoli.

De Puma, R.D. (1991) The Roman Bronzes from Kolhapur. In V. Begley, and R.D. De Puma eds., *Rome and India. The Ancient Sea Trade*, 82-112. Madison.

Dehejia, V. (1990) On modes of visual narration in early Buddhist art. *The Art Bulletin* 72, 374-92.

Dehejia, V. (1996) The animated world of the toraṇas. In V. Dehejia ed., *Unseen presence. The Buddha and Sanchi*, 36-57. Mumbai.

Dehejia, V. (1997) *Discourse in early Buddhist art. Visual narrative of India*. New Delhi.

Deloche, J. (1992) Étude sur les fortifications de l'Inde. I. Les fortifications de l'Inde ancienn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79 [2], 89-131.

Demiéville, P. (1931 -32) L'origine des sects bouddhiques d'après Paramartha. *Mélanges*

chinoises et bouddhiques 1, 15–64.

Dobbins, K.W. (1970) Eras of Gandhara.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7, 23–36.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1961–), G.P. Malalasekera ed. Ceylon.

Ensoli, S., and E. La Rocca eds. (2000) *Aurea Roma. Dalla città pagana alla città cristiana* (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Roma.

Erdosy, G. (1990) Taxila: Political History and Urban Structure. In M. Taddei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7*, 657–674. Rome.

Errington, E. (1987) *The Western discovery of the art of Gandhāra and the finds of Jamālgarhī*.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Errington, E. (1999–2000) Numismatic evidence for dating the Buddhist remains of Gandhar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6, 191–216.

Errington, E., and J. Cribb eds. (1992) *The Crossroads of Asia*. Cambridge.

Fabrègues, Ch. (1987) The Indo-Parthian beginnings of Gandhara sculpture.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 33–43.

Faccenna, D. (1949–1950) Monumento funerario dalla Via Portuense. *Bollettino della Commissione Archeologica Comunale di Roma* 73, 215–33.

Faccenna, D. (1951) Roma (Via Portuense). *Monumento funerario. Notizie degli Scavi di Antichità.* (Atti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1–6), 114–19.

Faccenna, D. (1962) *Mingora: Site of Butkara I,* (IsMEO Reports and Memoirs, I). Rome.

Faccenna, D. (1964a) *Sculptures from the Sacred Area of Butkara I* (Swat, W. Pakistan), photographs by Francesca Bonardi, descriptive catalogue by Maurizio Taddei, (IsMEO Reports and Memoirs Ⅱ [3]). Roma.

Faccenna, D. (1964b) *A Guide to the Excavations in Swat (Pakistan) 1956–1962.* Roma.

Faccenna, D. (1964–65) Results of the 1963 Excavation Campaign at Barama I (Swat-Pakistan). Preliminary report. *East and West* 15, 7–23.

Faccenna, D. (1980–81) *Butkara I (Swāt, Pakistan) 1956–1962,* (IsMEO Reports and Memoirs, III). Rome.

Faccenna, D. (1984) Note Gandhariche–1. Ricostruzione di un pilastro con cakra nell'area sacra di Butkara I (Swat, Pakistan). *Anna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 44, 319–38.

Faccenna, D. (1986) Lo stūpa a colonne dell'area sacra buddhistica di Saidu Sharif I (Swat, Pakistan). In G. Brucher et al. eds., *Orient und Okzident im Spiegel der Kunst.*

Festschrift Heinrich Gerhard Franz zum 70. Geburtstag, 55–80. Graz.

Faccenna, D. (1995a) *Saidu Sharif I (Swat, Pakistan). 2. The Buddhist Sacred Area. The Stūpa Terrace*, (IsMEO Reports and Memoirs, XXIII [2]). Rome.

Faccenna, D. (1995b) Note on a decorative motif appearing on a blanket in a Gandharan relief. *Journal of Central Asia* 18 [2], 1–10.

Faccenna, D. 1996: Alcuni segni facciali nel Medio e Vicino Oriente. In E. Acquaro ed., *Alle soglie della classicità, il Mediterraneo tra tradizione e innovazione. Studi in onore di Sabatino Moscati*, 695–706. Pisa-Roma.

Faccenna, D. (1997a) Sculptors' trial pieces in Gandharan art. *East and West* 47, 67–93.

Faccenna, D. (1997b) Observation on the two complexes, the graveyard and the sacred area, an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m. In F. Noci et al. *Saidu Sharif I (Swat, Pakistan)* 3. *The Graveyard*, (IsIAO Reports and Memoirs, XXIII [3]). Rome, 105–11.

Faccenna, D. (2001) *Il fregio figurato dello Stūpa Principale nell'area sacra buddista di Saidu Sharif I (Swat, Pakistan)*, con contributi di Riccardo Garbini e di Pietro Spagnesi (IsIAO Reports and Memoirs, XXVIII). Roma.

Faccenna, D., and P. Spagnesi (2014) *Buddhist Architecture in the Swat Valley, Pakistan. Stupas, Viharas, a Dwelling unit*, (ACT Field School Project Reports and Memoirs, Special Volume). Lahore.

Falk, H. (2001) Names and weights inscribed on some vessels from the silver hoard. *Journal des Savants* 2, 308–19.

Filigenzi, A. (1990a) La triade buddistica nell'arte del Gandhāra. *Anna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 50 [1], 93–100.

Filigenzi, A. (1990b) *Le immagini epifaniche nell'arte buddistica del Gandhāra. Studio sulle triadi e su alcune iconografie affini*. Tesi di dottorato,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

Filigenzi, A. (1997) Buddhist rock sculptures in Swat, North-West Pakista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5*, 625–635.

Filliozat, J. (1973) Representations de Vāsudeva et Saṃkarṣaṇa au II siècle av. J.C. *Arts Asiatiques* 26, 113–21.

Filigenzi (2005) Maître du ciel, héros de la terre: la triade Bouddha-Vajrapāṇi-Skanda dans l'art du Gandhāra. In Z. Tarzi, and D. Vaillancourt eds., *Art et archéologie des monastères gréco-bouddhiques du Nord-Ouest de l'Inde et de l'Asie Central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u Crpoga, Strasbourg, 17-18 mars 2000*, Paris, 93-111.

Filigenzi, A. (2006) Ānanda and Vajrapāṇi: An Inexplicable Absence and a Mysterious Presence in Gandhāran Art. In P.Brancaccio, and K. Behrendt eds., *Gandhāran Buddhism: Archaeology, Art, Texts*, 270–285. Vancouver.

Foucher, A. (1899) Sur la frontière indo-afghane. *Le Tour du monde, journal de voyages et des voyageurs* 5, 469–504; 541–564.

Foucher, A. (1905–51) 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âra, I-III. Paris-Hanoi.

Foucher, A. (1909) Le "Grand Miracle" du Bouddha à Çrāvastī. *Journal Asiatique*, dixieme série 13, 5–78.

Francfort, H.-P. (1979) *Les palettes du Gandhāra,* (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XXIII). Paris.

Fussman, G. (1972) Intailles et empreintes indiennes du Cabinet des Médailles de Paris. *Revue Numismatique*, VIe série 14, 21–47.

Fussman, G. (1980) Nouvelles inscriptions Saka: ère d'Eucratide, ère d'Azès, ère Vikrama, ère de Kaniṣka.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67, 1–43.

Fussman, G. (1986) Documents épigraphiques kouchans (IV): Ajitasena, père de Senavarma.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75, 1–14.

Fussman, G. (1991–92) Chocs de cultures: Grecs, Indiens et Kouchans aux alentours de notre ère. *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ce* 1991–1992. Résumé des cours et travaux, 659–667.

Fussman, G. (1993) L'Indo-grec Ménandre ou Paul Demiéville revisité. *Journal Asiatique* 281, 61–138.

Fussman, G. (1994) *Upāya-kauśālya. L'implantation du bouddhisme au Gandhāra. Bouddhisme et cultures locales. Quelques cas de réciproques adaptations* (Actes du colloque franco-japonais de septembre 1991. Études thématiques 2), ed. F. Fukui and G. Fussman, 17–51. Paris.

Getty, A. (1914) *The Gods of Northern Buddhism*. Oxford (reprint Hong Kong 1962).

Ghosh, A. (1948) Taxila (Sirkap) 1944–1945. *Ancient India* 4, 41–84.

Giuliano, L. (1998) Il *vajrapuruṣa* in due rilievi di Nāgārjunakoṇḍa.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72, 143–175.

Göbl, R. (1976)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Butkara I (Swāt, Pakistan),* (IsMEO Reports and Memoirs, IV). Rome.

Goloubew, V. (1924) Recensione a Foucher 1905.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3, 438–454.

Gullini, G. (1962) *Udegram,* (IsMEO Reports and Memoirs, I). Rome.

Gupta, P.L., and T.R. Hardaker (1985) *Ancient Indian silver punchmarked coins of the Magadha-Maurya Kārshāpana series*. Nasik.

Higuchi, T. ed. (1984) *Gandhara Art of Pakistan*. Tokyo.

Holliday, P.J. ed. (1993) *Narrative and Event in Ancient Art*. Cambridge.

Huntington, J.C. (1980) A Gandhāran Image of Amitāyus' Sukhāvatī. *Anna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 40, 651–672.

Huntington, S.L. (1985) *The Art of Ancient India, Buddhist, Hindu, Jain*. New York -Tokyo.

Ingholt, H. (1957) *Gandhāran art in Pakistan*. New York.

Irwin, J. (1973 –76) Aśokan Pillars: A Reassessment of the Evidence. *Burlington Magazine* 115 (1973), 706–720; 116, (1974), 712–727; 117 (1975), 631–643; 118 (1976), 734–753.

Irwin, J. (1987) Buddhism and the Cosmic Pillar. In G. Gnoli, and L. Lanciotti eds.,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Serie Orientale Roma, LVI [2]), 635–660. Rome.

Jenkins, G.K. (1955) Indo-Scythic Mints.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2, 1–26.

Khan, M.A. et al. (1996) Field Survey Report on the Right and Left Bank of River Swat. In Saeed-ur-Rehman ed.,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 in Gandhara*, 80–95. Karachi.

Khan, Sh.N. (1995) Preliminary Report of Excavations at Marjanai, Kabal, Swat. *Ancient Pakistan* 11, 1–74.

Klimburg-Salter, D.E. (1995) *Buddha in Indien. Die Frühindische Skulptur von König Asoka zur Guptazeit.* Wien.

Klimburg-Salter, D.E., and M. Taddei (1991) The *uṣṇīṣa* and the *brahmarandhra*: An Aspect of Light Symbolism in Gandharan Buddha Images. In G. Bhattacharya ed., *Akṣayanīvī, Essays Presented to Dr. Debala Mitra*, 73–93. Delhi.

Kräling, C.H. ed. (1957) Narration in Ancient Art (A symposium, 57th General Meeting of 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Chicago, Illinois, December 29, 1955).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61, 43–91.

Kurita, I. (1988-1990) *Gandhāran Art*, Vol. I: *The Buddha's Life Story;* Vol. II: *The World of the Buddha*. 2 vols. Tokyo.

Kuwayama, Sh. (1987) Literary Evidence for Dating the Colossi in Bāmiyān. In G. Gnoli, and L. Lanciotti eds.,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Serie Orientale Roma, LV1 [2]), 703–727. Rome.

Lamotte, E. (1958)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des origines à l'ère Saka* (Bibliothèque du Muséon, 43). Louvain (reprint 1967).

Leriche, P. (1986) *Fouilles d'Aï Khanoum V. Les remparts et les monuments associés,* (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XXIX). Paris.

Litvinskij, B.A., and A.V. Sedov (1983) *Tepai Šax. Kul'tura I svjazy kušanskoj Baktrii.* Moskva.

Lohuizen-de Leeuw, J.E. van (1972) Gandhāra and Mathurā: Their cultural relationship. In P. Pal ed., *Aspects of Indian art,* 27–43. Leiden.

Lohuizen-de Leeuw, J.E. van (1981) New evidence with regard to the origin of the Buddha image.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79*, 377–400. Berlin.

Lo Muzio, C. (2011) Gandharan Toilet-Trays: Some Reflections on Chronology.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17, 331–340.

MacDowall, D.W. (1991)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Indo-Parthian and Kushan Chronology. In P. Bernard, and F. Grenet eds., *Histoire et cultures de l'Asie Centrale préislamique,* 243–250. Paris.

MacDowall, D.W., and P. Callieri (2004) A Catalogue of Coins from the Excavations at Bīr-koṭ-ghwaṇḍai 1984–1992. *Bīr-koṭ-ghwaṇḍai Interim Reports II* (IsIAO Reports and Memoirs, New Series, III), 27–90. Rome.

Majumdar, N.G. (1937) *A Guide to the Sculptures in the Indian Museum,* II. *The Graeco-Buddhist school of Gandhāra*. Delhi.

Malalasekera, G.P. (1960) *Dictionary of Pāli Proper Names*. London.

Mani, V.R. (1985) *The Cult of Weapons. The Iconography of the Ayudhapuruṣas*. Delhi.

Marshall, J. (1951) *Taxila*, I-III. Cambridge.

Mitchiner, M. (1975–76) *Indo-Greek and Indo-Scythian coinage* (9 vols.). London.

Meister, M.W., and L.M. Olivieri (2012). Conservation and Studies at Gumbat-Balo Kale (Tahsil Barikot, District Swat, Pakistan).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35, 1–22.

Miyaji, A. ed. (1998) *Buddha. The Spread of Buddhist Art in Asia* (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Nara.

Narain, A.K. (1957) *The Indo-Greeks*. Oxford.

Narain, A.K. (1988) Iconographic Origins of Gaṇeśa and Evidence of the Indo-Greek Coinage. In G. Gnoli, and L. Lanciotti, eds.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Serie Orientale Roma LVI[3]), 1007–19. Rome.

Noci, F., R. Machiarelli, and D. Faccenna (1997) *Saidu Sharif I (Swat, Pakistan.)* 3. *The*

Graveyard (IsMEO Report and Memoirs, XXIII [3]). Rome.

Olivieri, L.M. (1996) Indagine preliminare su strutture civili e militari tardo-antiche nell'area dello Swat. In L. Marino, ed. *Restauro architettonico. Lezioni ed esercitazioni*, 95–102. Firenze.

Olivieri, L.M. (2003) The Survey of the Bir-kot Hill. Architectural Comparisons and Photographic Documentation. *Bīr-koṭ-ghwaṇḍai Interim Reports I,* (IsMEO Report and Memoirs, Series Minor, IV). Rome.

Olivieri, L.M. (2006) Outline History of the IsIAO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in Pakistan (1956–2006). In *East and West*, 23–43.

Olivieri, L.M., and M. Vidale (2006), *Archaeology and Settlement History in a Test-Area of the Swat Valley.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AMSV Project (1st Phase)*, 73–150 (14).

Olivieri, L.M. (2010) Late Historic Cultural Landscape in Swat. New Data for a Tentative Historical Reassessment. In M. Alram et al. eds.,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II.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in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357–369. Vienna.

Olivieri, L.M. (2011) Behind the Buddhist Communities: Subalternity and Dominancy in Ancient Swat. In Ghani-ur-Rahman, and L.M. Olivieri eds. (2011) Italian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Northern Pakistan (1955–2011)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Special Issue) 34, 127–156 .

Olivieri, L.M. (2012) When and why the ancient town of Barikot was abandoned? A preliminary note based on the last archaeological data. *Pakistan Heritage* 4, 109–120.

Olivieri, L.M. ed. (2013) Swat Museum: A Visual Cultural Path. In I. Marati, and C. Vassallo, *The New Swat Archaeological Museum. Architectural Study, Master Plan and Execution* 41, 105–121.

Olivieri, L.M. (2014) *Excavations and Conservation Activities in Swat District (2011 –2013) Khyber-Pakthunkhwa - Pakistan.* 1: *The Last Phases of the Urban Site of Bīr-koṭ- ghwaṇḍai (Barikot); The Buddhist Sites of Gumbat and Amluk-dara (Barikot),* (Act-Field School Project Reports and Memoirs, II). Lahore.

Pisani, V. (1970) Le letterature in sanscrito, pāli e pracrito. In V. Pisani, and L.P. Mishra, *Le letterature dell'India*, 9–228. Milano.

Przyluski, M.J. (1914) Le Nord-ouest de l'Inde dans le *Vinaya* des Mūla-Sarvāstivādin et les textes apparentés. *Journal Asiatique*, onzième série 4, 493–568.

Quagliotti, A.M. (1999–2000) An inscribed image of Hārītī in the Chandigarh Government Museum and Art Gallery.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6, 51-60.

Raducha, J. (1985) Interpreting Narrative Art: A Gāndhāran [*sic*] Example. In A.K. Narain ed., *Studies in Buddhist Art of South Asia*, 89–102. New Delhi.

Raevskij, D.S. (1977) *Očerki ideologii skifo-sakskix plemen'*. Moskva.

Rapin, C. (1992) *Fouilles d'Aï Khanoum. VIII. La Trésorerie du Palais hellénistique d'Aï Khanourn. L'apogée et la chute du royaume grec de Bactriane,* (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XXXIII). Paris.

Rehmani, A. (1999) *Masterpieces of Lahore Museum*. Lahore.

Salomon, R. (1982) The "Avaca" Inscrip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Vikrama Er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2 [2], 59–68.

Salomon, R. (1986) The Inscription of Senavarma, King of Oḍi. *Indo-Iranian Journal* 29, 261–293.

Salomon, R. (1988) The Reliquary Inscription of Utarā: A New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Apraca. *Indo-Iranian Journal* 31, 169–177.

Salomon, R. (1995) A Kharoṣṭhī Reliquary Inscription of the Time of the Apraca Prince Visnuvarma. *South Asian Studies* 11, 27–32.

Salomon, R. (1996) An Inscribed Silver Buddhist Reliquary of the Time of King Kharaosta and Prince Indravarm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6, 418–452.

Salomon, R. (1999)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agment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London-Seattle.

Salomon, R. (2006) New Manuscript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Gandharan Buddhism. In P. Brancaccio and K. Behrendt eds., Gandhāran *Buddhism: Archaeology, Art, Texts*, 135–147. Vancouver.

Santoro, A. (1991) Note di iconografia gandharica -V. Appunti sul Vajrapāṇi-Eracle.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65, 269–309.

Santoro, A. (1999–2000) A note on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narrative, visual narrative, and oral narrative in Gandharan ar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6, 61–67.

Sarianidi, V. (1985) *The Bactrian Hoard of Bactria. From the Tillya-tepe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New York–Leningrad.

Scerrato, U. (1997) Pakistan. Ricerche di archeologia, storia dell' arte e architettura islamica. *Missioni archeologiche italiane. La ricerca archeologica, antropologica, etnologica,* 243–248. Roma.

Schiltz, V. (1994). Gli Sciti. VIII secolo a.C.-I secolo d.C. Milano.

Schmidt, C.W. (2000) Reassembling Long-Separated Buddha Triads and Iconographic Programs. In M. Taddei, and G. De Marco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7* [III], 1101–1124. Rome.

Schopen, G. (1996) Immigrant Monks and the Proto-historical Dead: The Buddhist Occupation of Early Burial Sites in India. *Festscktrift Dieter Schlingloff*, 215–238. Rheinbek.

Senart, É. (1905) Vajrapāṇi dans les sculptures du Gandhāra. *XIV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 I, 121–131. Paris.

Senior, R.C. (1994) Indravarma and Aspavarma. Text of a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Oriental Numismatic Society, London, May 28th, 1994.

Sinisi, F. (2003) Tradizione ed innovazione nella monetazione del Nord-Ovest del sub-continente indiano dai Greci ai Parti. In E. Acquaro, and P. Callieri eds. *Le forme di trasmissione delle iconografie in ambiente ellenistico-orientale*. La Spezia.

Srinivasan, D.M. (1997–98) Skanda/Karttikeya in the Early Art of the Northwes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5, 233–268.

Stacul, G. (1987)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wāt, (IsMEO Reports and Memoirs, XX). Roma.

Stählin, F. (1906) Die Thensa Capitolina. *Romische Mitteilungen* 21, 332–386.

Stein, M.A. (1930) *An Archaeological Tour in Upper Swāt and Adjacent Hill Tracts*,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42). Calcutta.

Swati, M.F. (1997) Special feature of the Buddhist art in the Swat Valley. *Athāriyyāt Archaeology* 1, 1–60.

Taddei, M. (1966) A Problematic Toilet-Tray from Uḍegrām. *East and West* 16 [1–2], 89–93.

Taddei, M. (1990) A Flaming Buddha and his Devotees from Far-away Countries. In C. Bautze-Picron ed., *Makaranda, Essays in Honour of Dr. James C. Harle*, 43–50. Delhi.

Taddei, M. (1993) *Arte narrativa tra India e mondo ellenistico*, (Conferenze IsMEO, 5). Roma.

Taddei, M. (1997) Pakistan. Missione archeologica italiana nella valle dello Swat e aree limitrofe. *Missioni archeologiche italiane. La ricerca archeologica, antropologica, etnologica*, 249–252. Roma.

Taddei, M. (1999) Oral narrative, visual narrative, literary narrative in ancient Buddhist India. In A. Cadonna ed., *India, Tibet, China. Genesis and aspects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 71–85. Firenze.

Taddei, M. (2008)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Buddha Image (with an

Appendix by F. Sferra: Kośagatavastiguhyatā). In E.M. Raven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9. Proceedings of the fif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 Asian Archaeologists, held at the Universiteit Leiden, the Netherlands, 5-9 July 1999, Gonda Indological Studies* XV, 1-13. Groningen.

Tanabe, K. (1985) *Gandharan Ladies and Toilet-trays from Japanese Collections*. Tokyo.

Tanweer, T. (2011) The Italian Archaeological Mission. A Preliminary Archival Study. In Ghani-ur-Rahman, and L.M. Olivieri eds. Italian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Northern Pakistan (1955–2011).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Special Issue) 34 [1], 41–49.

Tarn, W.W. (1951)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2nd ed. Cambridge.

Thapar, R. (1966) *A History of India* I. Harmondsworth.

Thapar, R. (2000) *Cultural Pasts. Essays in Early Indian History*. New Delhi.

Tucci, G. (1958)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Swat. *East and West* 9 [4], 279–328.

Tucci, G. (1977) On Swāt. The Dards and Connected Problems. *East and West* 27 [1–4], 9–85; 94–103.

Verardi, G. (1994) Homa *and other Fire Rituals in Gandhāra* (Supplemento n. 79 agli *Annali* -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54 [2]). Napoli.

Vermaseren, M.J. (1982) *Mithriaca III. The mithraeum at Marino*. Leiden.

Vidale, M., and S. Laurenza (2005) Towards an Archaeological Map of Swat: A Preliminary Field Test in the Kandak Valley. In C. Jarrige, and V. Lefèvre e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2001* [I], 171–177. Paris.

Vogel, J.Ph. (1935) *Buddhist Art in India, Ceylon and Java*. Oxford (reprint New Delhi 1977).

Wheeler, M. (1962) *Chārsada. A Metropolis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xford.

Whitehead, R.B. (1944) The Dynasty of the General Aspavarma. *Numismatic Chronicle*, 6th series 4, 99–104.

Widemann, F. (2000) Scarcity of Precious Metals and Relative Chronology of Indo-Greeks and Related Coinages (1st Century B.C. - 1st Century A.D.). *East and West* 50 [1–4] 227–58.

Wölfel, C. (1997) *Die lanx von Stráže. Das Haus lacht vor Silber. Die Prunkplatte von Bizerta und das römische Tafelgeschirr*. H.H. von Prittwitz und Gaffron, and H. Mielsch eds. (Kataloge des Rheinischen Landesmuseums Bonn, 8), 153–167. Köln.

Zwalf, W. (1996) *A catalogue of the Gandhāra Sculpture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At the Origin of Gandharan Art

PIERFRANCESCO CALLIERI
ANNA FILIGENZI
LUCA M. OLIVIERI

上架建議：考古/艺术
ISBN 978-7-5325-8123-8
9 787532 581238 >
定价：108.00元
易文网：www.ewen.co